

中国地域文化大系

楚文化

奇谲浪漫的
南方大国

上海远东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香港）



道文化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中国地域文化大系

主 编 陈万雄
丛书策划 张倩仪

本卷编撰委员会名单

主 编 舒之梅 张绪球
副主编 彭 浩 王纪潮
摄 影 郝勤建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湖南省博物馆
图 253 由 Courtesy of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提供

© 1997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授权上海远东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楚文化——奇谲浪漫的南方大国

出 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编 200233)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湾耀兴道 3 号东汇广场 8 楼)

发 行 上海远东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17.75

版 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

ISBN 7-80613-809-9/G·617 图字: 09-1997-179
定 价: 248.00 元



中国地域文化大系

「楚文化」

奇谲浪漫的
南方大国

上海远东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香港)



中国地域文化大系

楚文化

奇谲浪漫的南方大国

主编：舒之梅 张绪球

上海远东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香港）



〔总序〕中国文明史的新图像

面

积辽阔、地貌多变、景致万殊的中国大地，经过悠长岁月，孕育出灿烂多彩的中国文明。我们策划出版“中国地域文化大系”，所昭示的就是人类文明史上所仅见，既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又直到现在依旧生气勃勃的中国文明史的图像，而且是一幅非我们所习知惯闻的新图像。

新图像的中国文明史，是由新材料、新内容、新视野和新观念所构成的。

近代以还，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终于由自在而自觉，辛亥革命也推翻了行之久远的王朝体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未能用更广阔的视野，去考察和理解幅员 96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的历史。

20世纪 20 年代初，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重要考古遗址遗迹不断发现，尤其是近几十年，时空跨幅极大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绩昭著，举世瞩目，开始超轶了传统文献的不足，为中国文明发展史描绘了一幅崭新的图像。

试举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该种事实。

首先，长久以来都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文化，

在新的发现陆续出现后，这种习说显然已经无法应付考古资料的问难。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史只能说是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此之前，中国文明的演进已经过一段极其漫长的历程。这段历程虽然缓慢，却是中国逐步跨入文明门槛的基础，而它所显示的文明程度，远比我们想象的为高。经过几十年的各地考古发掘，在中国大地上这段漫长又无文字记载的文明发展的脉络，已如草蛇灰线，有踪可寻了。尤其是新石器时代，其遗址分布之广、社会发展阶段和时代序列之清楚，都足以建构出由母系氏族社会到进入初始国家的历史面貌，这是令人兴奋的成果。而且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也改变了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唯一起源的说法，而展现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甚至其他地域多源并起，最后渐归融合的中国文明发展新样貌。

其次，丰富的考古文物发现，结合了古代文献的新研究，也使夏商周以来的历史文化呈现新的面貌，尤其是社会经济、物质文化等方面，在得到实物佐证后，更令人耳目一新。

较可惜的是，直到现在，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在研究上并未能互相沟通，充分整合，丰硕的学术成果也未能化为教育的材料和普及的社会知识，所

以大多数人对这几十年的考古大发现和研究所展现的中国文明新图像，是无所认识的。“中国地域文化大系”的出版，旨在填补这种对中国文明研究和认识脱节的阙失，试图综合考古和文献的研究新成果，撷取存世和最新出土的文物艺术精品，结合自然地貌风光和地上仅存的名胜古迹，图文并茂地展现中国文明发展的新图像。

这套图录所以用地域分册的出版形式，去展示中国文明的发展长河，主要有以下理由。

由于近几十年卓越的考古成果再结合文献学术研究，中国文明“一体多元”的发展格局和文化特征，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史前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及其他地方的独立文化体系，多源并起，相互影响，成为日后中国文明的“多元”基础。及有信史后，中原的商周文化、山东的齐鲁文化、战国及汉代的楚文化、太湖地区的吴越文化，以至辽金元清的北方草原文化等等，在中国文明发展的长河中，都曾在不同时空起过推动历史文化发展的主体和主导作用。所以通过地域文化演进的脉络，相当能反映出中国文明发展的实在，这是过往较少注意的。同时，直到现在，事实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一体”所以成其悠久博大，“多元”

所以成其丰富。地域分册的编写形式似可加强这种历史文化的新认识，也为中国日后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19世纪及以前，地球上形成几个不同的文化圈，文化圈之间在历史上虽有交通，但是却一直保持自成系统的自我发展。直到20世纪，以西方为主导的近代文化，冲击了其他包括中国在内的原有传统文化世界，牵动整个地球，归向为一个近代文化的世界。原有的传统文化世界，经过一百年的挑战和调节，面对21世纪，将呈现东西文化均衡交流和平等共创世界新文化的风貌。如果所言信是，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要在创造21世纪世界新文化上作出积极贡献，首先须对自我文化有充分的认识，“中国地域文化大系”的出版的另一宗旨正是希望推动这种认识。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陈万雄 1995.9.30

目录

总序	中国文明史的新图像	4
绪论	10	
第一章	楚国兴起以前江汉地区的文化与文明	17
一.	史前时期江汉地区的发展	18
1.	史前时期江汉地区的物质文化——农业	19
2.	史前时期江汉地区的物质文化——制陶	20
3.	史前时期江汉地区的物质文化——纺织	20
4.	史前时期江汉地区的物质文化——治玉	20
5.	史前时期江汉地区的精神文化——原始宗教	21
二.	三苗集团的兴衰与江汉地区的发展	21
三.	商、周时期江汉地区的发展	22
1.	商、周时期楚国的发展	22
2.	商、周文化对楚地的影响	22
第二章	楚人的世界	51
一.	概说：楚国历史的发展	52
二.	楚人的精神世界	56
1.	信巫好鬼	56
2.	多神崇拜	57
3.	崇道哲学	58
三.	楚人的社会	78
1.	国家机制——礼乐与军事	78
(1)	礼制——饮食器具与鼎制	78
(2)	礼制——朝聘	79
(3)	乐制	80
(4)	军事	80
2.	生活面貌之一——饮食	83
(1)	楚人的日常食物	83
(2)	楚人喜爱的饮品——酒	84
3.	生活面貌之二——服饰	84
(1)	南冠与结衣	84
(2)	发式	85



4. 生活面貌之三——葬俗 85
 - (1) 墓地 85
 - (2) 葬具 86
5. 文化面貌之一——天文与历法 86
 - (1) 天象观测 86
 - (2) 纪年方式 87
6. 文化面貌之二——音乐 87
7. 手工业技术之一——丝织 88
 - (1) 织品 88
 - (2) 染料 89
8. 手工业技术之二——采矿冶铸 89
 - (1) 楚国的铜矿资源与采矿技术 89
 - (2) 冶铸技术 90
 - (3) 编钟的铸造 91
9. 手工业技术之三——漆器 92
 - (1) 楚漆器的制作技术水平 92
 - (2) 原漆生产和漆器制作的专业化管理 93

四. 楚人的艺术 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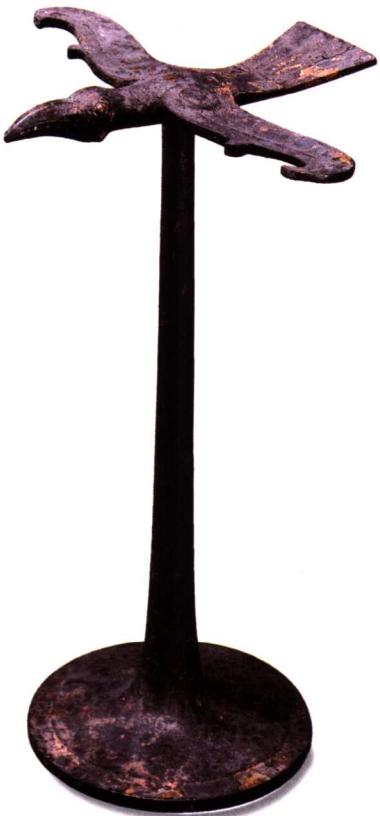
1. 楚艺术渊源及特点 206
2. 楚人的各种艺术 207
 - (1) 青铜艺术 207
 - (2) 漆器艺术 210
 - (3) 丝织艺术、帛画和壁画 212
 - (4) 玉器艺术 214

第三章 楚文化的流播 261

- 一. 楚文化对秦人的影响 262
- 二. 楚文化在汉代的作用 262
 1. 思想的影响 263
 2. 葬俗的影响 263
 3. 服饰的影响 264
 4. 漆器的影响 264
 5. 丝织品的影响 264
 6. 绘画的影响 264
- 三. 楚文化在现今的遗留 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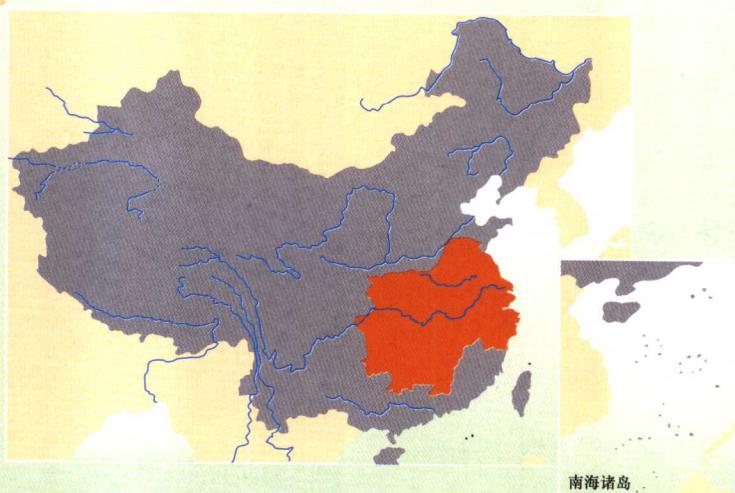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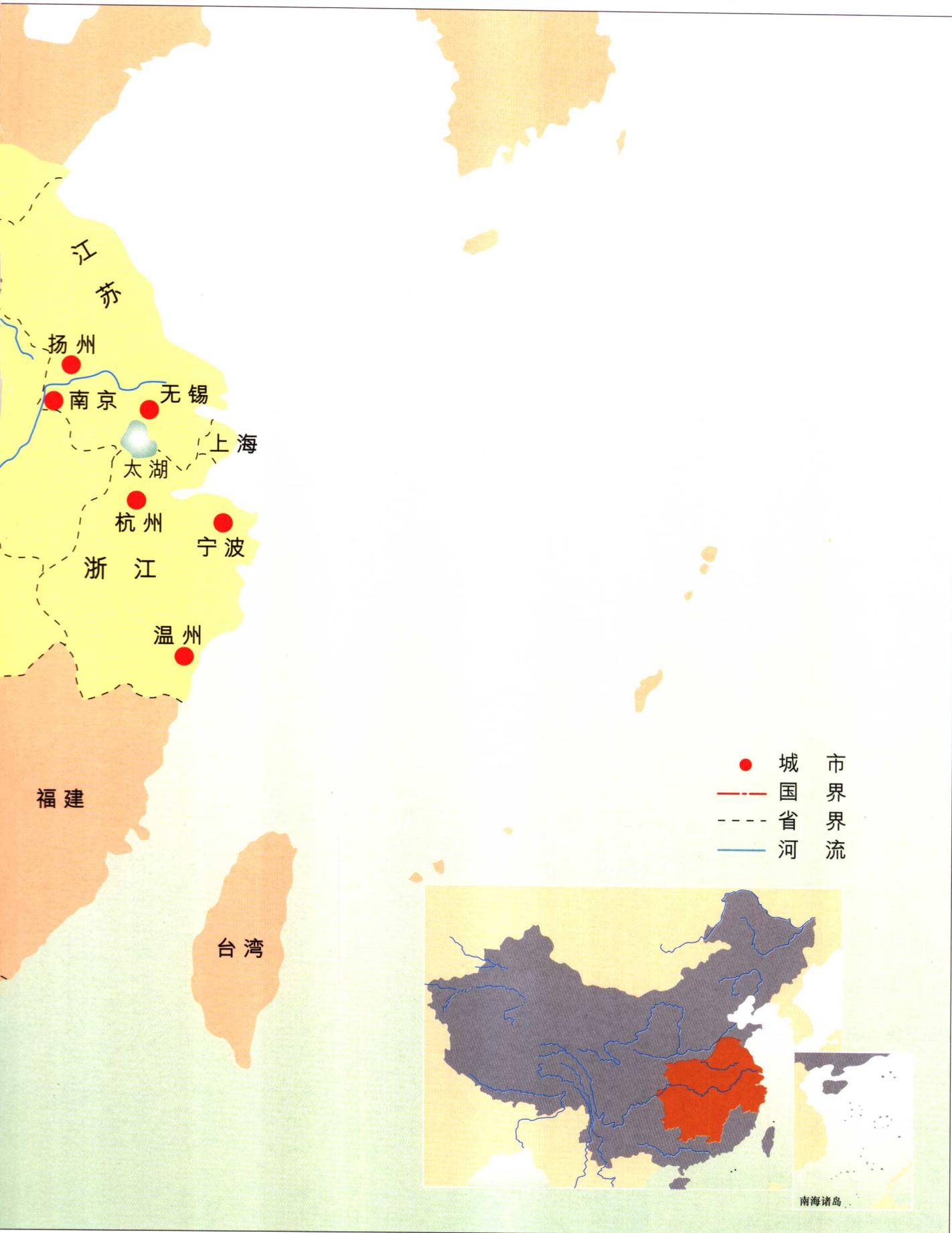
楚地区大事年表 276

图片索引 280



楚地区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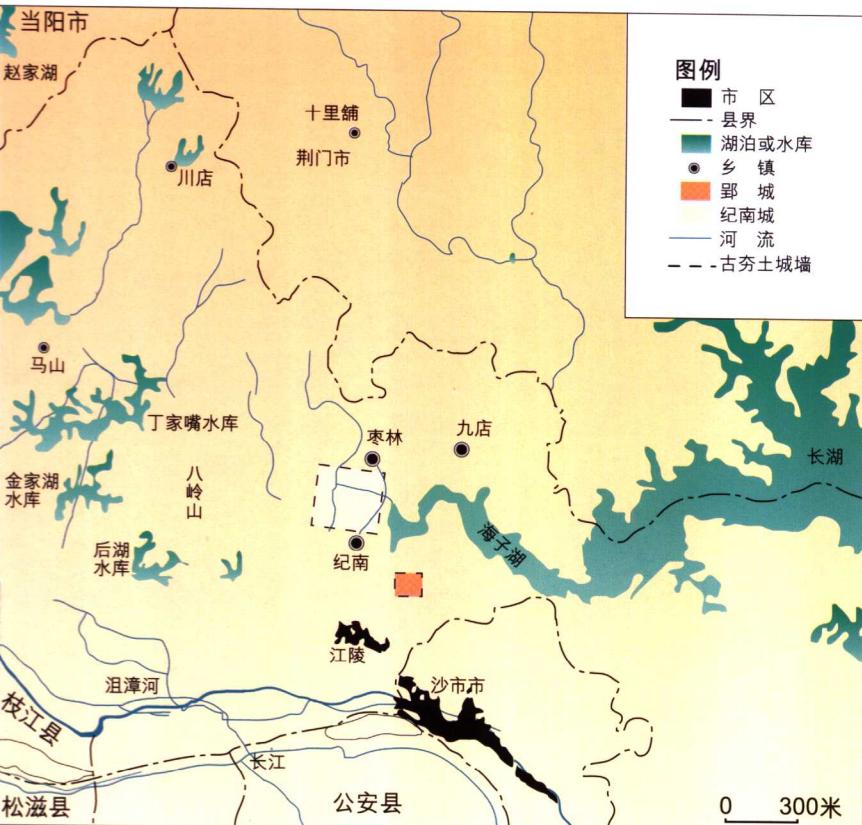
绪论

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和长江流域，前者的
作用早已为世人熟知，而长江流域是中国文明
的源头之一，则是 20 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学、
考古学的进步，才逐渐得到证实。在长江中上
游的四川巫山，湖北郧县、长阳，下游的安徽
和县，南京汤山等地都先后发现了猿人化石。
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址，从长江中上游的
湖北枝城城背溪、四川巫山大溪、湖北京山屈
家岭、天门石家河到长江下游的浙江河姆渡、
江苏青莲岗、浙江良渚文化等，其发展序列清楚，遗址分布广泛，文
化类型多样，文化遗存丰富。1995年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距今
一万多年中国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进一步奠定长江流域是中国农业文
明源头之一的地位。进入商代
以后，四川广汉三星堆、湖北
黄陂盘龙城、江西新干大洋洲
等地，发现了各具特色的青铜
文化。周代以来，长江流域已
形成各族杂居、邦国林立的局
面，尤其是在长江中游兴起以
楚文化为代表的强大势力，更
与中原各国相抗衡。到战国晚
期，楚文化已相继融合了巴
濮、南蛮、东夷及吴越文化，
覆盖了整个长江中下游，成为
中国南方的代表性主流文化，

1 江汉平原

江汉平原是长江和汉水的冲积平原，
当地气候温和、林木茂密、湖网纵横；饭稻羹鱼、火耕水耨是早期主要
的生活特色。随着人口增长，生产技
术改良，以往火耕水耨的粗放农业被
精耕细作方式取代。现今的江汉平
原，虽随处可见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
但仍透出一点南方水乡特色。





示意图·2 楚郢都江陵纪南城四周位置图



影响遍及南中国，并以巫、道、骚和崇尚自然的文化特色，与中原儒家崇尚政治权威的礼教，分别成为中国南北文化的象征。经过秦汉的政治统一，中国南北文化逐渐合流，但楚文化仍分别在不同层面起主要作用。在士大夫阶层和政治层面，儒家的仁义道德、忠君理想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夙求，牢牢占据主导地位，而广大民间则弥漫着巫风，保持着对鬼神的敬畏，并流行着各种祈福斋醮仪式，可谓千年如故。但从积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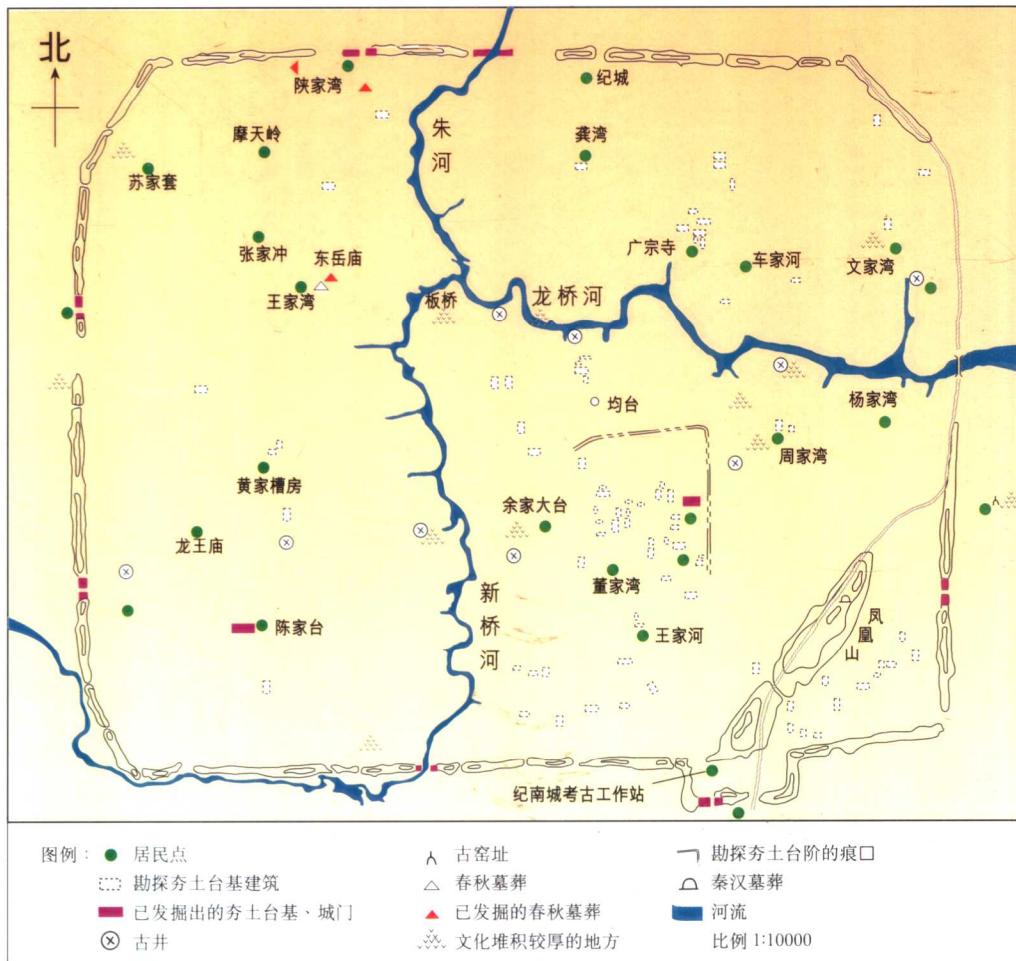
的意义来看，这种由楚文化延续下来的神秘主义，不仅满足了民众的心理和宗教需要，也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长准备了必要条件，这也是楚文化在中国文明长河中地位重要的主要原因。

楚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由楚人创造，在长江中游异军突起的地域性文化，也可以说是中国进入信史时代后，第一支影响巨大的南方文化。楚本是一支势力不大的民族，立国虽早，但兴盛较晚，所以形成自己独有文化的时间不早于春秋早期，下限稍延及西汉前期。至于楚文化的范围，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本来楚国、楚人都不难界定，但随着时代推移，楚国疆域时有变迁，要绝对界定楚文化的范围便不容易。从文化覆盖面而言，楚文化不仅是楚地、楚国、楚族文化的统称，而且泛指所有在楚疆域或楚势力范围内受楚人影响的地方文化。文献所载楚人信巫好鬼的习俗、神秘诡异的艺术、奇幻瑰丽的楚辞文学和自然无为的道家精神，都是楚文化的特色，也可以看成是楚人吸收南方各族精华的结果。至于楚族源于南方还是北方，学者间仍未有

共识。从考古材料上看，早期的材料与中原相比，同多于异，所以楚文化极有可能是中原文化的一支，与南方江汉地区苗、越、濮及巴蜀等土著文化融合，吸收了南方土著文化与北方中原文化的元素，形成有本土基础而又开放多元的混合型文化。

“楚”最早只是族名，后来成为国名，“楚”是“木”的意思，顾颉刚

认为“楚”是指在山林中建国。楚人自称远祖是黄帝之孙颛顼（高阳氏）。周代立国后，楚臣服于周，受五等爵中的第四等——子爵，封在丹阳（有关丹阳的所在，众说纷纭，但大抵都同意是在汉水流域地区），这是楚国封土建国的开始。《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周成王（约公元前10世纪）时，楚先王熊绎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筚路是柴车，蓝缕是破衣，桃弧、棘矢都是当地山林特产，反映出楚人早期生活环境恶劣，国力弱小。在周王室势力衰落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楚国以江汉地区为中心迅速扩张，不断消灭江汉地区及长江中下游的诸侯国，至春秋中晚期，楚国已发展到湘江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成为五霸之一。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前221年），楚国是七雄之中的大国，已基本统一中国南方的江汉、江淮地区，囊



示意图·3 楚郢都纪南城文化遗迹分布图

括今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的全部，北方及于陕西、河南、山东，南方到达广东、广西、贵州的一部分；融合了南蛮、东夷、华夏各族，成为当时疆域最大、民族众多的国家。公元前223年，楚被秦所灭。至此，楚国有记载的历史已超过八百年。

特殊的地理条件对楚国的兴起和文化特色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楚人早期活动于荆山（今湖北西部，武当山东南，汉水西岸），故楚又名荆。荆和楚都泛指楚国或楚地。荆山是秦岭——大巴山的余脉，在江汉平原的西北缘，楚人早期活动区域的古漳水和古沮水（即今天的清涼河和蛮河）均源于此，并东南流向汉水。然而，荆山达海拔1000米左右，年降雨量不到1000毫米，无霜期只有二百多天，不利于农业生产。在人口增长等因素的压力下，楚人很自然地沿着古沮漳河（古沮水和古漳水的汇流）进入江汉平原，时间约在公元前十至九

世纪间，这是楚国兴起的转折点。江汉平原在湖北省中部和南部，是长江和它最大的支流汉水冲积而成，它与湖南的洞庭湖平原相连，并称为两湖平原，是长江中游最大的平原，年降雨量在1200毫米以上，无霜期超过二百五十天。在先秦时期，由于汉水沿武当山、荆山而下，而长江冲出三峡进入平原后，并无堤防约束，因此在涨水期是呈自由漫流状态，容易在低洼地形成变化无常的大片泽国，最远可绵延至鄱阳湖，这就是古代所谓的云梦大泽。它实际上是古人对江汉地区这种平原岗地、湖泊沼泽相互交错地貌的统

称。这种地理生态环境，由于林莽茂密，湖网纵横，物产丰饶，取食方便，人们不忧冻饿，生活极为便利，很容易形成墨守自然的生活方式，信巫好鬼的宗教信仰、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就在这种环境下孕

2 荆山山脉

荆山山脉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武当山东南，汉水西岸，山势自西向东，沮水、漳水均源于此。周文王时，楚人首领鬻熊受封于丹阳，其子熊丽又率部迁往荆山山脉的主峰景山（今保康县）和睢山（今南漳县西北）一带。周成王时，正式把荆山地区封给熊丽之孙熊绎。熊绎率领楚人，在荆山一带发展。



育出来。其便利的交通条件，向北可以经由南阳盆地进入中原，向东可顺长江而下经略吴越，向南则能控制潇湘，向西经三峡可以通往巴蜀，活动空间极为广泛，这不仅方便了各种文化在此汇流，而且也造就了日后楚人比较容易向北、向东扩展的战略方向。

一种文化能迅速壮大，除了具备自然地理条件外，该文化自身的适应性、开放性或者说包容性也是十分重要的。楚人进入江汉平原前的远古时代，当地早有人类活动。在新石器时代的土著文化，先后有城背溪、大溪、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有的学者把它们看成先楚文化（即楚以前的地方文化）。虽然目前还没有找到确切证据，证明它们与楚文化的器物发展序列有渊源关系，但其反映出来的信巫好鬼精神与楚人并无不同。由于交通便利，这些文化越到晚近，受周边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响越为显著。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土著文化虽然仍占有重要地位，但江汉平原已是东方的淮夷、西（北）方的华夏、南蛮三大集团势力交汇所在。从文献和考古发现，江汉平原受外来的影响多表现在制陶、青铜铸造等技术方面，而该地饭稻羹鱼、火耕水耨的生活方式一直非常稳定，所以精神上一直是信巫好鬼，直到两汉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如此。这种地缘优势和取食方便



示意图·4 楚熊绎时期的荆山、沮漳河上游位置图

的条件，使当地居民能够迅速接受外来的文化和技术，同时又不至于因接受外来文化而放弃崇尚自然的传统。楚人建国后，陆续消灭周边国家，各族也相继并入楚国。楚人文化与被灭国相互渗透、顺利融合，内容更为丰富，原因也正在楚文化所在的地域优势，使它具备了开放性的特征。而楚文化之崇尚自然、信巫好鬼又是南方各种文化的共同特征，使它具备了很强的包容性，因此被征服者的心理和文化抵制基本就不存在，双方也不必费力去互相适应，这就是楚文化在江汉地区壮大并覆盖整个长江中下游的必然原因。

3 眇山远景

眇山是楚人的发源地之一。源于眇山的古漳水（现今的清凉河），在南漳临沮旧城与古沮水汇流后，称为沮漳河（现今的蛮河），东南流入汉水，是楚境早期最重要的大河。



对楚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很早便开始，因为楚地老庄思想和楚辞文学一经产生，已经哄动一时，迅速被吸收及认定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我们对楚的了解，最初也是通过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已有巨大影响的精神文化来认识的。但从文化的广度来研究楚地，还是20世纪的事。从

20至30年代起，安徽、湖南等地的楚墓陆续出土了艺术风格迥异于中原的铜器、漆器和丝织品，开始使人意识到先秦时的南方，在物质文化形态上与中原有异，将楚人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楚文化。从50年代起，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湖南长沙一带，60至70年代则在湖北江陵一带。当时已基本解决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物质文化早晚期演变的序列问题。80年代以来，楚文化考古工作已不限于湖南湖北两省，而是在河南、安徽、湖北、湖南等地普遍展开，现时墓葬发掘已在五千座左右，占春秋战国时期墓葬的百分之七十，目的是探索楚文化的渊源，与周边文化关系及文化本身的整合问题。考古学迅速发展，对人们重新认识楚文化乃至先秦时代中国南方文明，提供了大量材料。至于楚文化的研究概

况，可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说明。

在物质文化上，楚人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丝织、漆器技术。冶铸业方面，先秦时代较先进的冶铸技术都可以在楚国找到。如在湖南麻阳、湖北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楚地出土了最早的钢制品、最早的失蜡法铸件及大型成套铸造的双音钟等。

在精神文化上，楚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楚国产生的老庄思想、屈宋的骚赋，与中原的儒家学说和《诗经》，分别成为中国南北文化的代表，目前发现的竹简、帛书及金文，在数量上都居先秦各国之首，涉及哲学、历史、历法、政治、军事、法律多方面，其重要程度堪与甲骨文的发现比肩。如近年发现战国楚简上的《老子》写本，是先秦诸子最早的材料，价值更难以估量。此外，楚地绘画艺术的瑰丽、音乐水准之高超都远在先秦各国之上。这说明先秦时代，中国南方存在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高度文明，并体现了长江流域作为中华文明摇篮之一的地位。而且楚国在南方的开拓和文化融合成就，为日后秦王朝的统一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南北文化的融合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括而言，人们对中国南方长江流域文明的重新发现和认识，以及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史上地位的重新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逐渐揭开了楚文化的面纱后开始的。从这一点来看，没有考古学的发展，就不能重新认识楚文化，而中国先秦文明史就可能是一个不完整的文明史。可以这样说，经过近几十年对楚文化的科学的研究，不仅带动了中国地方文化的研究，更使先秦文明史以科学的面貌重现于世人面前。

1

楚国兴起以前 江汉地区的文化与文明

为什么在密布森林沼泽的

湖网地区，后来

能产生一个强大的国家？

一万二千年前长江中游地区的人

已懂得种植稻米？

为什么在青铜时代，

江汉地区的铜矿资源会由

中原人取用呢？

在公元前 4400 年以前，长江地区史前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后来黄河流域才逐渐超过长江流域。至于江汉地区早期文化，是长江流域早期文化的重要部分，也为后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文化融合打下了基础，中华文化就是在这种南北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

江汉地区气候温和，物产丰饶，从非常久远的古代起，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创造了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在楚文化兴起前的史前（旧、新石器时期）及商周时期，江汉地区已开始孕育独特的区域文化。因楚文化是由江汉地区土著文化与商周文化融合而形成的，而江汉地区以外的地方只是楚文化形成后的新占领地。因而要谈楚文化的源头，当然以江汉地区为主。

一· 史前时期江汉地区的发展

远古人类在江汉地区的活动，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早期。该地区现已发现了大量古人

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年代最早的是在湖北省西北部的郧县发现的，其年代约为七八十万年。这说明江汉地区在七八十万年前已经有人类活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遗存，以湖北省长阳人化石最为著名，距今有十多万年。

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人类在江汉地区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山区丘陵地带。他们大多依山傍水，择穴而居，偶尔也在河流的高级阶地上搭建简陋的小茅棚，作为季节性栖身之所。

五万年前后，人类进入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由于人口增加和经验累积，江汉地区的先民开始离开山林，迁到低岗和平原，寻找更开阔的生存空间。近年在湖北和湖南，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就有不少是在平原地区。如荆州市荆州区鸡公山遗址，就是这一时期江汉先民活动范围不断向平原地区扩大的真实反映。

大约在一万多年前，中国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在长达六千年以上的新石器时代历史中，

文化	年代	特征
城背溪文化	公元前 7000—公元前 5000 年	至今所知江汉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中心地区在湖北西部三峡地区和湖南西部澧水一带。
大溪文化	公元前 5000—公元前 3000 年	在城背溪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分布范围扩及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地区。
屈家岭文化	公元前 3000—公元前 2600 年	江汉地区原始文化最兴盛的时期，其分布范围超越了大溪文化区，向北扩展到南阳盆地北部。
石家河文化	公元前 2600—公元前 2000 年	江汉地区的最后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范围与屈家岭文化大致相同。

图表 · 1 史前时期江汉地区主要文化简表



示意图·5 新旧石器时代文化传承图

江汉地区先后产生了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等四个主要土著文化，分布范围广泛，而各个文化的中心地区不尽重合，当与土著居民的迁徙有密切关系。这四个文化构成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特色。

1·史前时期江汉地区的物质文化——农业

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是新石器时代区别于旧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长江中游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城背溪文化起，就出现了稻作农业（稻作农业是南方农业特征，北方则是旱作或粟作）。据考古发现，城背溪文化的一些稻谷遗存，如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的稻谷壳，年

代可达到九千年前，近年又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一万二千年的人工栽培稻，这是世界上已知年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到大溪文化时，江汉地区的稻作农业进一步发展。水稻的种植范围和产量都增加了。到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时期，农业生产进一步增加，开始有剩余农产品。

2 · 史前时期江汉地区的物质文化——制陶

江汉地区从九千年前就已能熟练地制作陶器，但当时只属家族内部的辅助性生产。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由于出现快轮制陶技术，制陶逐渐发展为独立的手工业。在石家河文化中期，更出现以交换为目的的商业性生产，从此制陶手工业开始与农业分离。

制作彩陶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但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性质的文化中，彩陶艺术的表现形式并不完全相同。江汉地区的彩陶流行于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时期。大溪文化的彩陶花纹中，土著们创造了漩涡纹、波浪纹和横人字纹，它们均取材自水的流态，表现了江汉地区先民长期与水为伴的深切感受。屈家岭文化中，出现了新的彩陶形式——彩陶纺轮。纺轮上的花纹有四分直线纹、漩涡纹等十余种，当纺轮旋转时，花纹便随之变化，产生种种美感。

除了制作彩陶外，史前时期的江汉地区也

出现了陶塑艺术。陶塑艺术盛行于石家河文化时期，可能和原始宗教有关。目前至少已发现五千件以上陶塑工艺品，内容有人、禽、兽和水生动物等四大类。在中国史前文化中，还没有其他原始艺术留下过如此众多的陶类制品。这些陶塑品形象逼真，质朴无华，至今仍能给人艺术的启示。

3 · 史前时期江汉地区的物质文化——纺织

纺织的出现晚于制陶。江汉地区是原始纺织业发展最蓬勃的地区之一。在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时期的人已懂得纺织，但这两个时期没有太多纺纱工具出土，暗示纺织尚不普遍，而且这两个文化时期出土的纺轮全都大而厚重，说明纺锤的转动惯量偏大，只适合纺粗纤维及粗纱。

屈家岭文化是江汉地区原始纺织业发展的重要时期，纺轮的特点是小而轻薄，纺锤的大小、重量及转动惯量亦减低，说明已能纺细而柔软的纤维及织出细密的布。这时期出土的陶纺轮特别多，更意味着纺纱织布已成为妇女的日常家务。由此可见，屈家岭文化时期，纺织技术有了很大进步。

4 · 史前时期江汉地区的物质文化——治玉

治玉最早出现于大溪文化，在四川巫山大溪和湖北松滋桂花树等遗址的大溪文化墓葬，都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玉饰。在石家河文化时

期，治玉发展成独立的艺术形式，目前石家河文化发现的玉器已有三百多件。石家河文化的玉雕有浮雕、透雕和圆雕三种，题材主要有人头像以及虎、蝉、鹰、龙、凤等，其特点是小巧玲珑，工艺精湛。值得注意的是，石家河文化的某些玉器，如带獠牙的人头像、凤、鹰等，在加工方法及纹饰特征上，与山东龙山文化的作品十分相似，而良渚文化中流行的玉琮，在江汉地区也有发现，说明江汉地区的玉雕工艺受到黄河流域及长江下游的影响。

5·史前时期江汉地区的精神文化——原始宗教

江汉地区的史前文化，充满了原始宗教和神话色彩，楚地重鬼淫祀的传统，很可能与此有关。远在城背溪及大溪文化时期，已有多神崇拜。考古学者在屈家岭文化遗址发现的巨型陶祖，是当时祭祀祖先的器具。可证屈家岭文化中，原始宗教极为盛行。

石家河文化时期，宗教活动进一步加强。人们为祈求禽畜饲养和狩猎丰足，烧制了许多陶塑小动物。古人认为，只要供奉这些小动物并经常祈祷，便可以获得好运。故这些制品不仅是工艺品，也是江汉地区原始巫术的反映。

此外，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也是当时宗教信仰的载体。例如石家河遗址出土的一件玉人头像，戴着弯角头饰，口角有上、下獠牙，应是

当时居民信奉的神祇形象。而具有沟通人神关系本领的虎、鹰、凤、龙及蝉等，一向被古人视为神兽、神鸟和神虫，也成为玉器制品。当巫师作法时，便穿上缀有这类玉器的法衣，发挥动物媒介的通天作用。

二·三苗集团的兴衰与江汉地区的发展

新石器时代的江汉地区，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是当地民族的努力成果。史籍记载，在尧、舜、禹时代，江汉地区是三苗部落的活动范围，三苗别称“有苗”或“苗民”，是一个由众多支系部落组成的联盟，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就是由他们创造的。

屈家岭文化时期，华夏集团内纷争不已，而三苗却正值强盛，于是三苗集团乘虚北进，把势力推到豫中一带。三苗集团的强盛局面，一直延续到石家河文化中期之末，才因战争和内耗而逐渐削弱，但此时华夏集团却又再度强大。尧、舜、禹时期，华夏集团对三苗展开长期征战，最后三苗惨败。三苗虽然失败，但他们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并没有消灭。夏、商、周三代，江汉各地仍有许多三苗的后裔，他们还保留着三苗的一些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

三·商、周时期江汉地区的发展

夏、商之际，中原部落纷纷南迁，楚人的先祖芈系部落就是在这时来到江汉地区的。对于芈系部落的起源（即楚族的族源），学术界有两派不同意见，一派认为楚族原来生活在中原地区，后辗转南迁到丹江流域定居；另一派认为芈系部族是江汉地区的土著民族，甚至有可能是三苗部族的后代。两派虽持论不同，却都认同芈系部落就是楚人的祖先、此后楚地长期的统治者和楚文化的发扬者。

1·商、周时期楚国的发展

商、周两代十分重视对江汉地区的开拓、统治和控制，早在商代初期，商人的势力就到达了长江两岸。江汉地区发现的一百多处商代遗址，以及大量的遗迹、遗物，就是商王朝统治和控制江汉各地的证据。在众多遗迹中，以湖北黄陂县盘龙城的发现最为重要。盘龙城是商王朝初期在南土建立的军事据点，学者认为，驻守这个城堡的武将可能是商王室的亲族，职责是确保商王朝从这一带获得铜矿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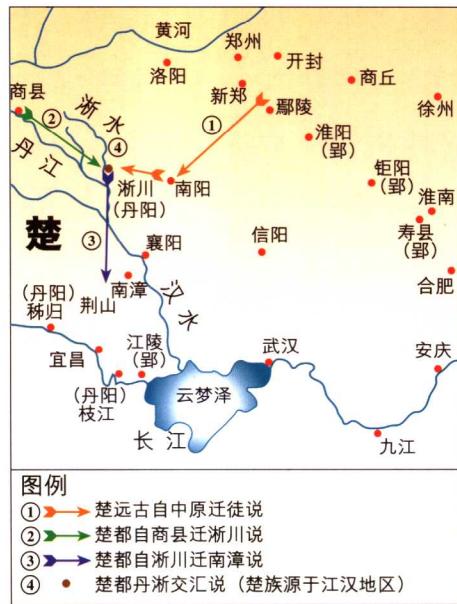


示意图 · 6 楚族源流图

上古时代，民族迁徙之后，原地名相应搬迁到新的地方，楚境出现多处丹阳和荆山，就是这个原因。

但因为距离遥远、力量难及的关系，商人

对南土的统治并不牢固。当时江汉地区存在着众多方国和部落，每当商王朝的控制力削弱

时，这些方国便乘机反叛。

西周王朝吸取了商朝异姓方国时服时叛的教训，在各地大封同姓诸侯。其中在汉水东部地区分封了大批同姓（姬姓）诸侯国，史称“汉阳诸姬”。他们是从南面屏藩周王室的重要力量。但另一方面，楚人先祖在丹江流域定居后，渐渐与土著融

合，周人因而常以“荆蛮”贬称楚人，楚人不以为然，反以蛮夷自居。正由于与土著的混融，楚国势力渐大。当周室衰微后，这些姬姓诸侯纷纷被楚国所灭。在吞并的过程中，又加深了楚人文化与其他各族文化的交流，扩大了楚文化的内涵。

2·商、周文化对楚地的影响

楚地的范围完全处在商周文化圈内，故在商、周两朝的统治下，江汉地区北部基本上全面接受了商周文化，江汉地区南部也受到商周文化极深的影响。故此，楚人能善采华夏和蛮

夷之长，是楚国能在江汉地区独树一帜，最终统揽江汉的关键。更可说楚文化的形成，实际上是商周文化与楚地土著文化互相吸收和融合的过程。

商周文化对江汉地区的最大贡献，是传播了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屈家岭文化时期，江汉地区可能已出现铜器。但直到夏代，该地区的青铜器使用似仍未进入实用阶段。商代初期，随着商人对南方的扩张，中原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也迅速传到江汉各地。近数十年在湖北发现了许多商代初期的青铜器，如盘龙城一座商初的墓里，就出土青铜器六十三件，其中的大铜鼎和大铜钺，就是在商朝的都城也很少见。另外在江陵荆南寺等商初遗址，也发现了青铜礼器和工具。

那么，这些青铜器是哪里铸造的呢？虽然湖北地区所出的商初青铜器，在形制和花纹等方面与中原差别不大，但从盘龙城发现的铸铜作坊以及坩埚、木炭、铜渣等遗物证明，大部分铜器应为本地铸造。到了商代晚期，江汉地区的铸铜技术更加普及和精良，例如在湖北江陵发现的大铜尊，以及在长江南岸湖南临湘县发现的大铜钲和四羊尊等，不仅造型宏伟庄严，装饰与花纹也极富地方色彩，毫无疑问，这些青铜器也是由当地铸造的。

西周时期，江汉地区青铜冶铸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铜矿的开采也更普遍。江汉地区发现的

西周青铜器，数量比商代更多，其中最突出的是京山县苏家垄窖藏，一次就出土曾侯青铜礼器九十七件。此外，在黄陂鲁台山和江陵万城等墓葬中，也发现了大量青铜器。这些材料说明，西周时期江汉地区的青铜冶铸业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青铜冶铸技术的应用，必然会促进生产力发展。虽然考古发现的商周农具大部分是石器，但在商代初期，青铜工具就已开始应用。在江汉地区发现的商代青铜工具有斧、锛、钁、禹、斤、锄、刀、鱼钩等。这些青铜器代表新的生产力。西周中晚期，楚国能拓地开疆，公开和周王室抗衡，都是在青铜手工业推动下，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力不断增强的结果。

史前时期 江汉地区的 文化遗存

从现今的遗存来看，史前时期，江汉地区农业、制陶、纺织、治玉等物质文明已逐渐发展，宗教气氛仍甚为浓厚，这在艺术品上亦有充分表现，说明楚国出现前的江汉地区，已存在独特的土著文化。



4-5 鄖县猿人头盖骨

6 鄖县猿人发掘现场

—— 鄖县曲远河口远景

湖北鄂西一带是中国古人类重要的发现地。1956年在长阳下钟家湾，首次发现长江以南的早期智人（长阳人）上颌骨化石。此后在1973、1976—1989及1990年先后发现多具猿人化石。经测定，其年代约在60万至90万年前，属于晚期猿人。同时出土的还有各种石器和带有南方色彩的哺乳动物群化石，显示湖北地区很早就是人类的栖息繁衍地。



7 鸡公山遗址鸟瞰图

江陵鸡公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一个制作场的遗址，布满了数以万计的各式打制石器，是世界同类遗址中较罕见的。此遗址位于平原地区，周围甚多水泽，说明五万年前的原始人，已能适应和利用这种自然条件生存。



8 石斧

新石器时代 大溪文化/高19.8厘米/
松滋桂花树

新石器时代的石斧，主要是用来砍斫的，属于生产工具。此器磨制精细，刃部锋利，使用时更为便利。

9 石刀

新石器时代 大溪文化/顶宽6.2厘米/
刃宽8.6厘米 高23.5厘米 厚0.3厘米/
松滋桂花树

形体长而轻薄，磨制精细，其天然的白色石纹，显得华丽而尊贵。有人认为此器应是礼器。



10

10 石铲

新石器时代 大溪文化 / 顶宽13.1厘米 刃宽15.5厘米 高18.5厘米 厚0.6厘米 / 监利柳关

石铲形体大而轻薄，磨制精细，质料细腻，并非实用的工具，似为礼器。

11



**12 彩陶筒形瓶**

新石器时代 大溪文化/高23.2厘米/
松滋桂花树

大溪文化的彩陶艺术已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这件筒形瓶全身红衣，上绘黑彩，上下两端绘陶索纹，中间有变体回纹，是大溪文化的典型器类。

13



14



13 彩陶器座

新石器时代 大溪文化 / 高9.6厘米 /
松滋桂花树

彩陶器座是用来垫放陶器器皿的。这器座全身红衣，腹部用黑彩绘两组云纹，也有人认为是两犁相交的图形。

14 彩陶罐

新石器时代 大溪文化 / 高13.2厘米 /
松滋桂花树

这罐全身红衣，腹部用黑彩绘陶索纹。

15



15 红陶杯

新石器时代 石家河文化 / 左高5.4厘米 右高4.7厘米 / 天门石家河

喇叭形红陶杯是石家河文化的典型器物。这种器物出土数量众多，造型简单；加以在天门石家河遗址群中，有专门生产红陶杯的遗址。由此看来，它应是当时的主要生活器皿。

16



16 彩陶高足壶

新石器时代 屈家岭文化 / 高16.1厘米 / 天门邓家湾

屈家岭文化的彩陶艺术特点，是以红、黑为主色，兼有褐色。花纹主要有斜网格纹、棋盘格纹和漩涡纹。一般装饰在壶、杯和碗等器物上。这壶通体红衣，上用黑白绘斜网格纹，是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类。

17



18



17-18 彩陶纺轮

新石器时代 屈家岭文化 / 直径3.3-4.4厘米 / 天门邓家湾

屈家岭文化以彩陶纺轮最具特色，它既是原始文化艺术的反映，也是纺织手工业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产物。彩陶纺轮的形式及花纹丰富多彩，大多与旋转有关。当纺锤旋转时，这些纹样便随之产生快速的动感。

19 玉虎头像

新石器时代 石家河文化/宽3.5厘米
高2.8厘米/天门萧家屋脊遗址

在石家河文化中已发现十多件玉虎头像。虎是神威勇猛和不可战胜的象征，也是中国古代沟通人神关系的神兽。佩戴虎的头像，可以驱邪保身，得到神灵庇佑。

19



20 玉猪龙

新石器时代 石家河文化/厚0.8厘米
最大径3.8厘米/天门萧家屋脊遗址
龙是中华文化的象征。石家河文化中，发掘出三种蟠龙，头上有角，面部有眼。它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和仰韶文化的濮阳蚌龙，同为中华古龙的雏形。

20



21



21 玉蝉

新石器时代 石家河文化/长2.55厘米
米/天门萧家屋脊遗址

玉蝉是石家河文化玉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种，特征是近长方形、翘尾、雕琢精致。因为蝉能够蜕变，羽化后又能“饮而不食”，对于古人自然是一种神秘莫解的现象，这也是古人视蝉为神虫的原因。在商周青铜器和玉器中，蝉的形象仍是屡见不鲜。

22



22 玉雕人头像

新石器时代 石家河文化/长2.9厘米
宽2厘米/天门萧家屋脊遗址

玉雕人头像是石家河文化玉器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类，至今已发现十多件。虽然人物形象与冠饰不尽相同，但全都穿戴整肃，表情庄重，并都佩戴耳环。这类人头像大概是代表巫觋一类的神职人物。古人佩戴这些头像，是为了确保平安。

23



24



25



23-24 玉雕神灵头像

新石器时代 石家河文化 / 长3.7厘米
最宽3.6厘米 / 天门萧家屋脊遗址

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发现的唯一一件神灵头像。类似的玉雕神像在国内外的博物馆，也多见收藏，但均不清楚其年代和出土地点，在陕西和江西的商周墓葬中，也有数件出土，但年代都较晚。这类神像的共同特征，是耳上方有弯角形饰物，口中露出一排或两排牙齿，口角有上、下两对獠牙。不同的是，年代较晚的神像，服饰较为复杂。此类神像可能是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人们共同尊奉的神祇形象。

25 飞鹰

新石器时代 石家河文化 / 身长1.9厘米
米 / 天门萧家屋脊遗址

这是一件圆雕，鹰作飞翔状，造型上主要是取其凶猛和善于飞翔。在古人的观念中，鹰是神鸟的一种，可以充当巫觋的助手。



26 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发掘现场

石家河遗址群，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最具代表性的遗址群，包含了四十处遗址，面积达八平方公里。

27 清理石家河遗址瓮棺葬的现场

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瓮棺葬往往随葬玉器，如在这具瓮棺中便出土了玉雕神灵等五件精美的玉器。

28 陶人

新石器时代 石家河文化/高10厘米/
天门邓家湾

陶人头戴浅圆帽，身穿长袍，细腰，宽裙，耳鼻清晰，颈部修长，正面跪坐，神态庄重。





29 陶塑动物一组

新石器时代 石家河文化 / 高2.5-9厘米 / 天门邓家湾

石家河文化的陶塑品，以丰富多彩的造型，在中国原始艺术中独树一帜，较常见的有象、狗、龟、猴、鸟等。象的出现，反映当时江汉平原气温较高，森林茂密的特征。而这些动物，除予人艺术的感受和启示外，亦反映当时人们祈求畜禽饲养和捕猎丰足的愿望。

南方的 商人遗迹 ——盘龙城

盘龙城是商代在南方的一个重要据点，它的位置靠近长江，与出产铜矿的铜绿山距离不远，可能是商人为开采及保护铜矿资源而建立的。由此反映出商人的势力已伸展至长江流域。

30 盘龙城外景

盘龙城是商代中期的城市遗址，年代约在公元前15世纪前后。图中由左面的白点至右面的稻草垛，就是城址所在。这城址南北约290米，东西约260米，四面的中部都有城门。城北和城南是居住遗址，城东北高地有宫殿遗址，城外有居民和手工业区以及商代的墓葬，其中的

李家嘴墓，出土了二十三件青铜礼器。

盘龙城遗址的城墙构筑技术、葬俗、出土器物的工艺和风格，都与中原商文化一致，证明它是商人在南方长江流域经营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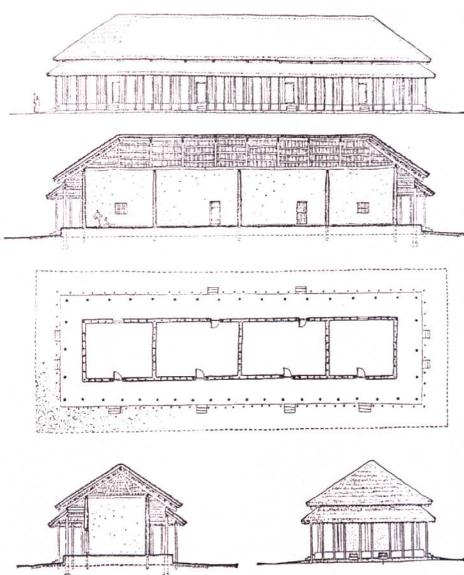
30



31 盘龙城宫殿复原图

此图的最上部分是南立面图；第二部分是南立面的剖面图；第三部分是平面图；最下部分的右方是东立面图，左方是东立面的剖面图。

31



33



32

32 蟠纹铜钺

商代/通长41厘米 宽26厘米/盘龙城
李家嘴2号墓

钺是权仗性的兵器。但一般情况下，钺是用作君主授权的象征，盘龙城有铜钺出土，表明墓主人与商王朝有重要的联系。

**33 大玉戈**

商代/长94厘米 宽13.5厘米/盘龙城
李家嘴2号墓

戈是商代的主要兵器，盘龙城出土的玉器亦以玉戈为主，此器用长达90多厘米的玉料做成，是出土玉器中最大的一件。从它的体积来看，显然是仪式性的用具，但也反映出盘龙城在当时的军事地位。



34 餐餮纹铜鼎

商代中期/通高55厘米 口径40厘米/
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

鼎是商周社会的核心礼器，是用来煮或盛放牲肉的。鼎的大小、多寡，是权势的象征。此器是最早在长江流域发现的大鼎，其风格与中原完全一致，说明中原文化在商代就已浸润到长江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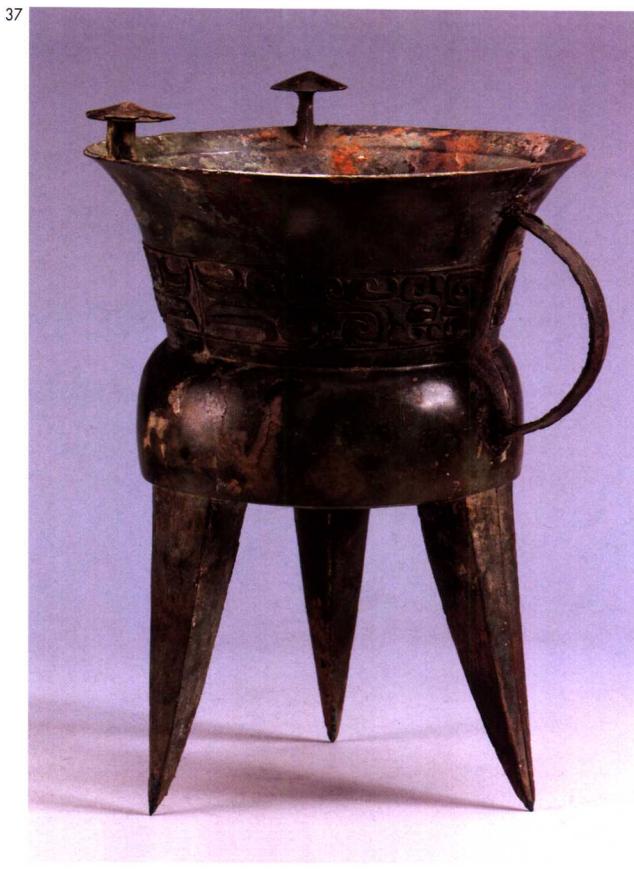
35 餐餮纹铜簋局部

36 餐餮纹铜簋

商代中期/通高17.4厘米 口径24.5厘米/
盘龙城李家嘴1号墓

簋为盛饭的器皿，也是商周社会的重要礼器。在祭祀仪式中，用偶数的簋与奇数的鼎配合使用。





37 餮餮纹提梁铜卣

商代中期/通高31厘米 口径7.8厘米/
盘龙城李家嘴1号墓

商人嗜酒，酒可以作为巫祭仪式的兴奋剂，使巫师迅速进入状态。由于商人对酒的重视，酒器在商代铜器中占有数，如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十一种饮食器中，觚、爵、斝、卣、盉、罍及尊等酒器就占了七种。但卣在商代前期酒器中为数较少，故甚罕见。此器造型清秀挺拔，亦属佳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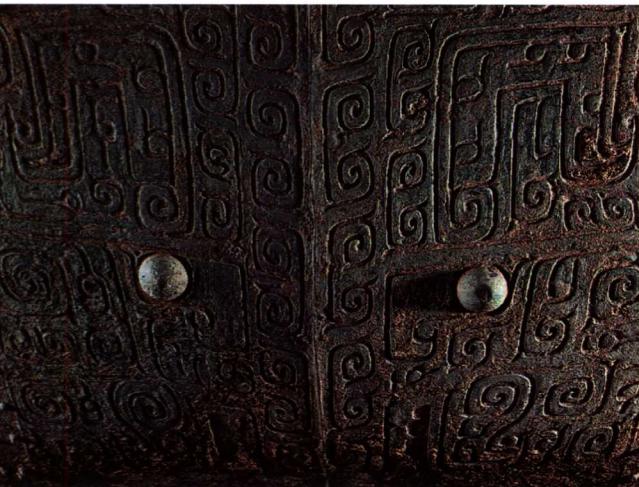
38 蔼纹铜斝

商代/高32厘米 径22.2厘米/盘龙城
李家嘴2号墓

铜斝是商代用作祭祀的酒器，夔纹是商代青铜器常见的纹样。古人认为，夔是一种有角、单足的龙形动物，实际上它是龙的侧面像。

两湖地区 的商文化遗存

盘龙城以外，两湖地区亦发现不少商代青铜器，其风格跟中原甚为相似，但与同时期的南方其他地方的青铜器却差异较大，显示商代时的两湖地区亦受到中原文化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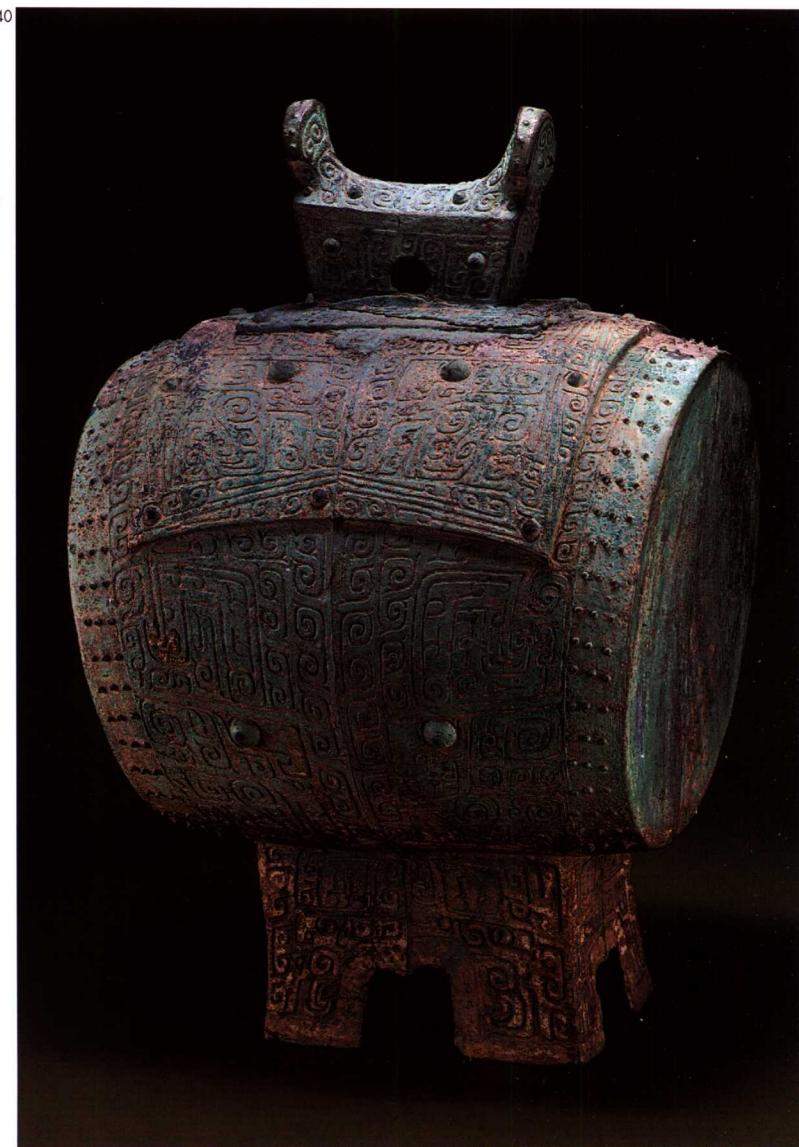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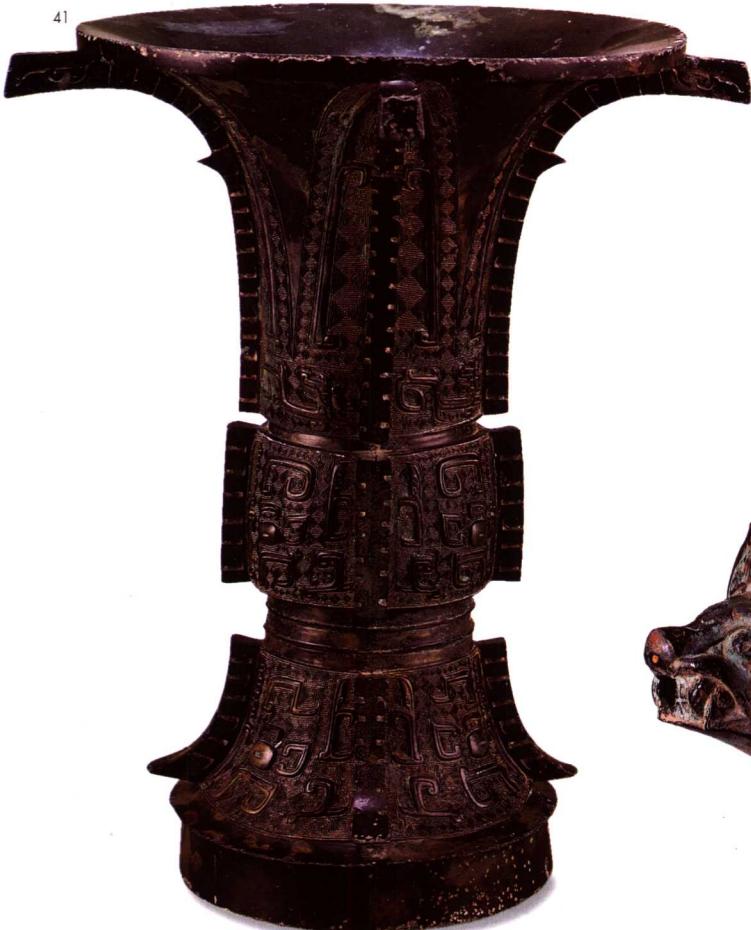
39 饕餮纹铜鼓局部

40 饕餮纹铜鼓

商代/通高75.5厘米 面径39.5厘米/
崇阳白霓

此器完全按商代的蒙革木鼓制作。在周代这种大鼓发展为建鼓，但传至楚地，它的法器功能被虎座鸟鼓架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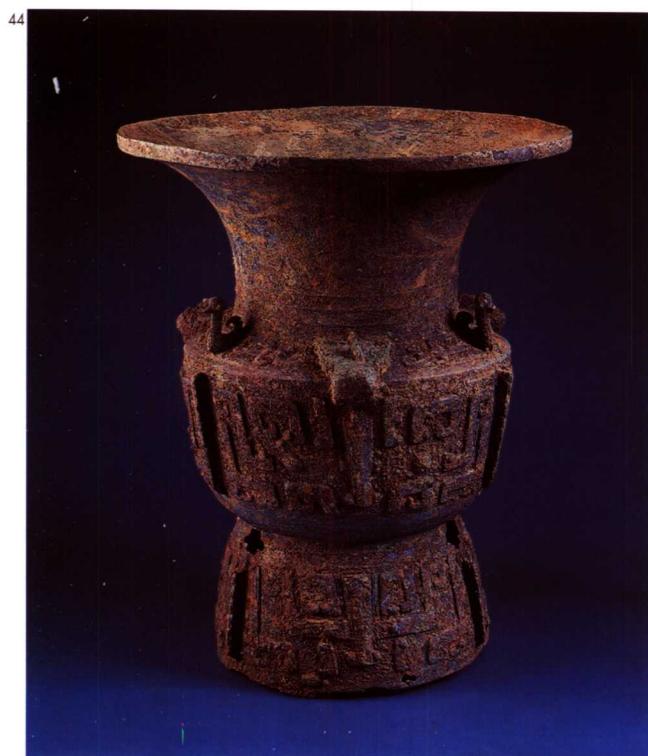




42



43

**41 铜尊**

西周早期/通高37.1厘米 口径26.4厘米/汉阳纱帽山

尊是盛行于商至西周的盛酒器，因而古代的“尊”字，就像双手奉酒的样子。周代时的尊曾用作礼器，后来则用于款待宾客。这器铸有蕉叶、饕餮、夔纹等装饰，都是商周青铜器的典型纹样。

42 虎尊局部**43 虎尊**

西周早期/长35厘米 高21.8厘米/江陵江北农场

整个器身圆雕虎形，虎首微昂，口内有獠牙利齿，双目圆睁，四肢直立，短尾上卷，身上有虎纹。脊背上有盖，盖顶的鸟形钮与虎背连为一体。此器造型奇特，纹饰简洁。

44 铜尊

商代晚期/通高46.2厘米 口径46.2厘米 腹径34.5厘米 底径27.5厘米/江陵岑河

这是商代的青铜重器，器表以云雷纹衬地，肩部雕铸三鸟三牺首，在鸟与牺首之间，饰有三组对称的夔纹图案。整个器物造型厚重。

商周时期 楚地的酒具

中国古代，饮酒风气浓厚，目前在南方的江汉地区，发现了不少商周时代的酒器，显示当时的南方地区也盛行好酒的风尚。



45 蟒纹铜觯局部

46 蟒纹铜觯

西周早期 / 高16.8厘米 / 江陵万城

觯是流行于商周之际的饮酒器皿。文献记载，只有尊贵身份的人才能用觯。这件觯上的龟形链环，在同期青铜动物造型中较为罕见。

47



48

**47 麟纹铜罍**

西周早期/高31.5厘米 口径16.3厘米/
江陵万城

罍出现于商代晚期，是盛酒和
盛水的大型容器。在春秋中期
以后的南方各国，罍的功能渐
渐被盛酒的尊缶和盛水的盥缶
取代。

48 环带纹铜盉

春秋早期/高20.5厘米/京山苏家垄
盉是装水的器皿，用途是盛水
来调和酒的浓淡，适应不同的
祭祀需要。当它与盘一起使用
时，又可以浇水洗手，有着祭
祀时的净手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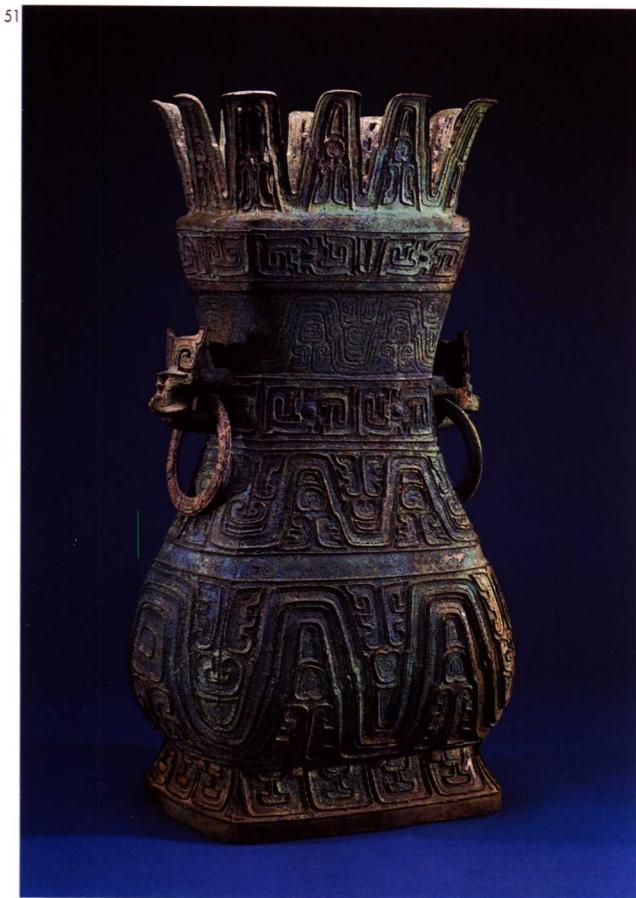
中原文化 对楚地艺术传统 的影响

楚国的强盛，是由春秋以来无数灭国战争积累的结果，而各国在归并入楚国之前，都有本身的艺术传统。从现有资料显示，这些国家的艺术风格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



49 父乙卣

西周早期 / 高24.2厘米 / 江陵万城
文献记载卣是一种酒器，汉代时已不清楚其形制，但明显与楚地流行的酒器——尊缶，在器形上有渊源关系。从铭文上知道，这件卣的主人是父乙，“父乙”是以干支为人名，这是商人的习惯，说明物主可能与商人有关，亦反映出商周之际，中原文化对江陵地区的影响。



52

**50 曾仲斿父铜方壶局部****51 曾仲斿父铜方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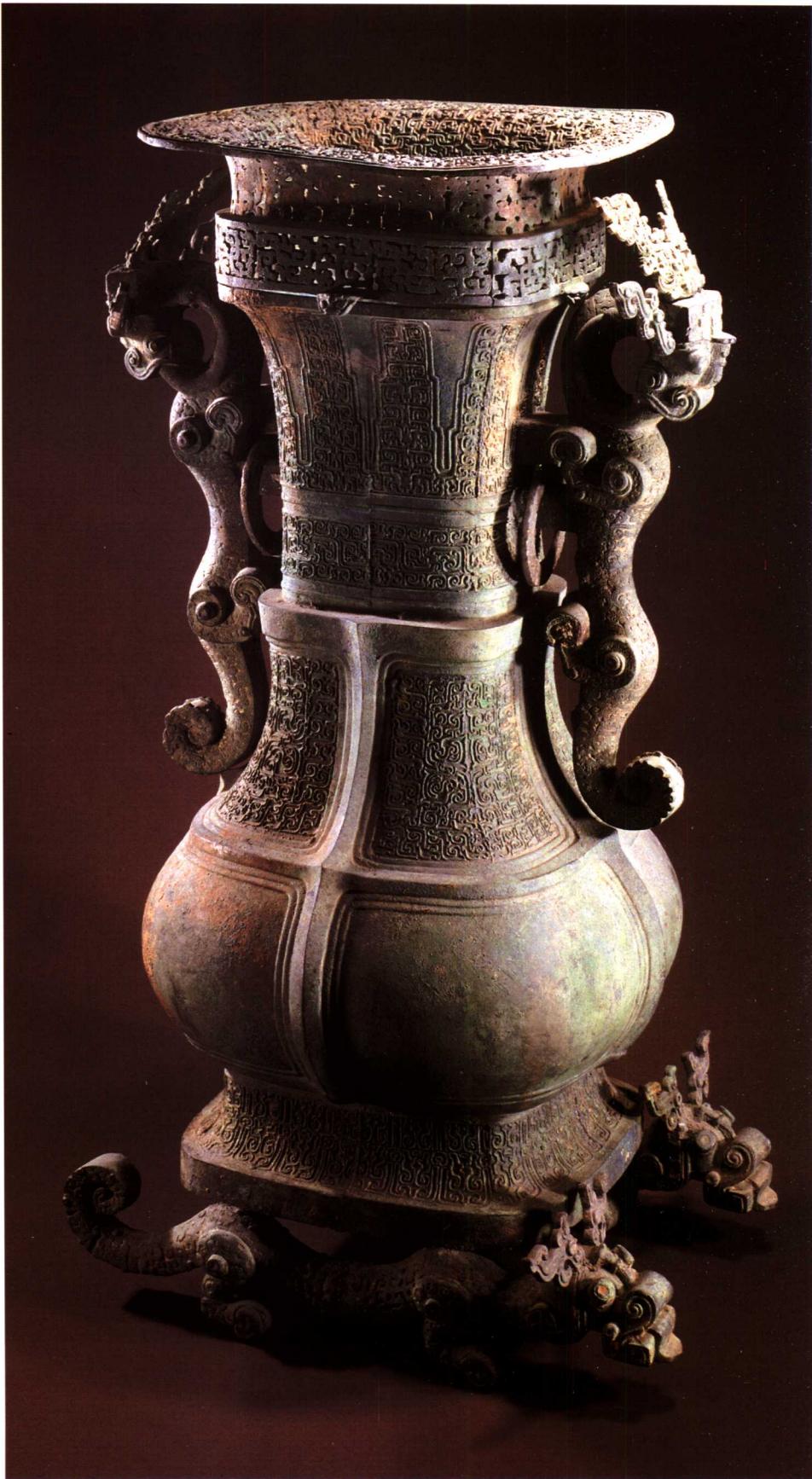
春秋早期/底长30.8厘米 宽23.8厘米
高66厘米/京山苏家垄

曾国是姬姓的、更是周室分封的“汉阳诸姬”中规模最大的国家。现时学者大抵已同意，曾国与文献上记载的随国，是同一个国家。至于京山曾国墓地，是春秋早期的国君墓，此墓出土有九鼎七簋（已缺一簋）等大批铜器，风格与中原相似。它和同期其他方国都出现了鼎成列、簋成套、鬲成组、豆成对、盘匜相配的组合，显示周代湖北地区的方国也是采用周礼的，而这种主流文化对当地土著和楚人社会都产生影响。

52 父乙尊

西周早期/高20.1厘米 口径18.5厘米/
江陵万城

此器内有与父乙卣相同的铭文。



53 铜方壶

春秋/通高79厘米/河南淅川下寺
1号墓

壶上有镂孔壶盖，壶身装饰细密的蟠螭纹，由高冠的双龙承托，壶耳的造型也是高冠的双龙。这种新巧的造型和繁密的纹饰，与西周晚期中原方壶造型凝重、纹样雄浑的风格迥然有别。此外，1923年河南新郑郑国国君墓所出土的莲鹤方壶（约公元前575年），是东周青铜器新式风格的代表作，它与这件楚式方壶极为类似。春秋时期郑国位于晋楚两个大国之间，因而楚、郑两国的铜器风格，也可能透过交往而互相影响。

54



55



54 象首龙纹铜方甗局部
55 象首龙纹铜方甗

春秋早期/口长36厘米 宽22.5厘米
高52厘米/京山苏家垄

甗是蒸饭的器皿，在周代最为盛行，它常与鼎、簋、豆、壶、孟及盘等组成一套随葬礼器。这件甗的下部是烧水的鬲，上部是盛饭的甑。此器出自春秋早期的曾国墓地，形制与中原同类器物一致，显示在春秋早期，周文化对这一地区仍有很大的影响。



56 垂鳞纹铜方彝

春秋早期/口长28.4厘米 高32厘米/
随州均川

彝是古代青铜酒器的通称，西周中期以后，方彝已属罕见。在随州曾国地域出土这件方彝，反映出当地对传统的恪守。



57

57 蔡侯朱之缶

春秋晚期/高36.7厘米 口径24.2厘米/

宜城安乐塚

此器的铭文刻有“蔡侯朱之缶”字样。蔡侯朱之缶是具有南方风格的盛水器，是蔡国君主悼侯朱（公元前521年至公元前518年）的用器。蔡国位于江淮流域，是周朝的同姓国（姬姓），

迫于楚的压力曾两次迁都，与楚国屡有战和关系，并两度灭于楚。公元前521年蔡侯朱被国人逐到楚国，铜缶可能因此留在楚地。实际上，蔡楚两国的礼器有很多相似之处，反映了楚国与周边各国文化的交流。

58



59



58 父盘

59 父匜

春秋早期 / 匜口宽14.5厘米 盘高20.3厘米 盘高12厘米 径35.6厘米 /
枝江百里洲

春秋时期，楚人发动的兼并战争，主要在楚武王至文王期间以及楚庄王时期。前期扫荡了

汉水东边的小国，打通了由江汉平原北进中原的通道；后期沿江淮流域向东扩张，获得了与北方齐、晋、秦等国争霸的条件。这套盘匜上的铭文表明，此器可能是息国的铜器（息国是位于楚国东北的姬姓国家，是楚文王时代首批被兼并的国家之一）。

2

楚人的世界

在温柔敦厚的中华文化中，
怎么会产生一个
神秘诡异的楚国呢？

为什么楚人好鬼、激情、
豪迈、奢华，又能歌善舞，
艺术不凡呢？

富有艺术感的楚人，
为什么同时又是发明家和
好战者呢？

一·概说：楚国历史的发展

论及楚的历史，不能不先谈楚人那传说中的先世。楚人自称是黄帝之孙颛顼（高阳氏）

的后人，如楚国的大诗人屈原在《离骚》中便说自己是高阳的苗裔。颛顼之孙老童和老童之孙祝融都是楚人先祖，享受祭祀，楚墓出土有

年代	世系
公元前 26 至公元前 21 世纪	黄帝
公元前 26 至公元前 21 世纪	昌意
公元前 26 至公元前 21 世纪	颛顼（高阳氏）
公元前 26 至公元前 21 世纪	卷章（老童）
公元前 26 至公元前 21 世纪	重黎（祝融）
公元前 26 至公元前 21 世纪	陆终
公元前 21 至公元前 11 世纪	季连（始称芈姓，是楚人直系祖先）
公元前 21 至公元前 11 世纪	附沮
公元前 21 至公元前 11 世纪	穴熊（开始以熊为氏）
公元前 11 世纪	鬻熊（楚人进入信史时代）
公元前 11 世纪末	熊丽（率部进入荆山、睢山一带）
公元前 10 世纪	熊狂
公元前 10 世纪	熊绎（被周成王封为子爵）
公元前 9 世纪	熊渠（在江汉地区称王）
公元前 9 世纪	执疵（熊延）
公元前 847 至公元前 838 年	熊勇（楚国开始有确切纪年）
公元前 837 至公元前 828 年	熊严
公元前 827 至公元前 822 年	熊霜
公元前 821 至公元前 800 年	熊徇
公元前 799 至公元前 791 年	熊鄂
公元前 790 至公元前 764 年	熊仪（若敖）
公元前 763 至公元前 758 年	熊坎（霄敖）
公元前 757 至公元前 741 年	熊眜（盼冒）
公元前 740 至公元前 690 年	熊通（武王）
公元前 689 至公元前 677 年	熊赀（文王）
公元前 676 至公元前 672 年	熊蕡（庄敖）
公元前 671 至公元前 626 年	熊恽（成王）
公元前 625 至公元前 614 年	熊商臣（穆王）
公元前 613 至公元前 591 年	熊侔（庄王）
公元前 590 至公元前 560 年	熊审（共王）
公元前 559 至公元前 545 年	熊招（康王）
公元前 544 至公元前 541 年	熊员（郏敖）
公元前 540 至公元前 529 年	公子围（灵王）
公元前 528 至公元前 516 年	弃疾（平王）
公元前 515 至公元前 489 年	熊珍（昭王）
公元前 488 至公元前 432 年	熊章（惠王）
公元前 431 至公元前 408 年	熊中（简王）
公元前 407 至公元前 402 年	熊当（声王）
公元前 401 至公元前 381 年	熊疑（悼王）
公元前 380 至公元前 370 年	熊臧（肃王）
公元前 369 至公元前 340 年	熊良夫（宣王）
公元前 339 至公元前 329 年	熊商（威王）
公元前 328 至公元前 299 年	熊槐（怀王）
公元前 298 至公元前 263 年	熊横（顷襄王）
公元前 262 至公元前 238 年	熊元（考烈王）
公元前 237 至公元前 228 年	熊悍（幽王）
公元前 227 至公元前 223 年	负刍（楚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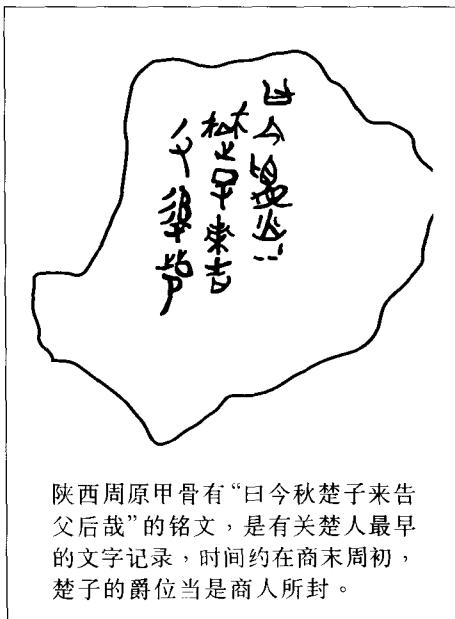
图表 · 2 楚世系表

“祷楚先老童祝融”的简文，可以为证。祝融之孙季连更被奉为楚人的直系祖先。因此，楚人虽然定居南方，但可能来自北方，其宗族首领是上古掌天文的巫师，后因与西部羌人（芈姓）集团联姻，季连这一支便从原来部落分离出来，到季连之孙穴熊时，部落世系已按父系计算。从穴熊开始，楚人便游离于华夏和蛮夷之间。

周朝初期，楚人向周室进贡祭祀用的包茅和桃木做的弓、荆棘做的箭等土产。首领熊绎还在周室从事放置滤酒用的香草、木牌标志、看守燎祭用的火炬的工作，被授予一级的封爵，领地在周室南方（即今天湖北丹江、河南淅水交汇的丹阳，面积百里左右）。到西周中

晚期周夷王时（公元前9世纪），楚人进入江汉地区，与土著杂处，这时，楚人的领袖熊渠已公然以蛮夷自居，不受中原封号。这标志着楚人已从筚路蓝缕、侍从周室的状态，走上与之分庭抗礼的道路。

春秋初年，当各诸侯国仍然表面尊周室为王的时候，楚的领袖熊通已始称武王，并开始扩张。他三伐姬姓大国随（今湖北随州），灭罗（今湖北宜城）及卢戎（今湖北襄阳西），据有汉水西边，迁都于郢（楚国都城多称



插图·1 陕西岐山周原甲骨“楚子来告”摹本

郢，武王建都的郢，一说在今宜城），形成北进中原的态势。其后，楚国北向灭掉息（河南今县）、黄（河南潢川）、邓（湖北襄樊北）等二十余国，在这些地方置县，渐有逐鹿中原之心。至楚庄王时，陈兵洛阳，向周室问九鼎之轻重，“问鼎中原”因而成为表示有争霸称雄野心的成语。楚本来是偏处南方的国家，与中原保持一定距离，到庄王时终于一鸣惊人，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这时的楚国疆域南及沅湘，北至淮水，西到巴蜀，东连吴越，是地方五千里，甲兵百万，粮食可用十年的大国，并一直

保持了三百多年，最后在秦楚争霸中落败。公元前278年秦国攻下郢都（今湖北江陵），楚迁都陈（今河南淮阳）。二十五年后，迁都鉶

阳（今安徽太和东南）。

公元前241年因避秦兵再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公元前223年，秦国掳楚王负刍，楚亡。

楚在五百三十余年扩张中，由小到大，灭诸侯国六十二个（西周末一，春秋四十八，战国十三），包融苗、蛮、巴、濮、百越等族，大致统一南方。最

后楚虽然为秦所灭，但楚国的强大和文化的鼎盛，对南方地区影响甚深。其后，秦虽统一中国，但南北畛域分歧仍在，楚地对秦中央一直存着离心倾向，更流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谣。秦朝末年，楚人陈胜、项羽、刘邦先后揭竿反秦兴楚，最后由刘邦建立汉朝。由于汉初朝廷多为楚人，而汉又是长期大一统的王朝，终于使楚人文化进一步与中原文化融合。

楚人的 遗址与风俗

楚国由兴起至衰落期间，曾经多次迁都，但都城仍称为郢都。目前对楚郢都纪南城的发掘，使今人对楚都城、楚人生活以至整个楚人的世界都得到更清晰的了解。

60 纪南城北墙的重点文物保护标志

61 楚故都纪南城东南角鸟瞰

纪南城是东周时期楚国郢都的遗址，因在纪山之南而得名。文献记载，从楚文王（公元前689年至公元前677年）迁郢都至此，到秦将白起拔郢（公元前278年），四百多年来一直是楚国都城的所在地。纪南城东西长4450米、南北宽3588米，面积约16平方公里，现今遗留的城墙仍高出地面4至8米。城内已

确定有八十四座夯土台基，六十一个分布于东南部，属宫殿区。城西发现有铸锡炉，可能是手工业区，全城共有水井四百眼以上。文献记载楚郢都的繁荣景象说，由于人口众多，道路拥挤，人们早上穿新衣出门，晚上回来衣服便扯破了。纪南城是先秦时代仅次于齐国临淄与燕国燕下都的第三大都城。

60



61



62



63



64



62 荆门纪山楚墓群远景

目前发现，纪南城外3至40公里范围内，有二十五处墓区，发掘出三千多座墓葬，其中西边的八岭山是楚王室和贵族墓地，东边的雨台山和九店，是中、小贵族和平民墓地，南边则主要是平民墓地。

63 楚章华台遗址

1984年潜江龙湾发现面积达200万平方米的春秋至汉代遗址，这遗址是由水章台、华家台、楚王放鹰台、打鼓台等十余个夯土台组成的。当1987年对放鹰台遗址进行试掘时，发现它是一座保存较好、有层台建筑的宫殿遗址，残存的两层台基约高3米，首次发现了高2米、厚0.7米、长约30米的红砖墙，并有宽1.3米的侧门和一条长10米、宽1米的贝壳路。遗址出土的各种板瓦、筒瓦、瓦当，都与江陵纪南城的同类器物风格一致。再综合文献记载和地理位置来看，它可能就是楚国著名“层台累榭”的宫殿建筑——章华台的一部分。

64 茅草缩酒风俗

楚人受封于周后，负责向周朝进贡用来缩酒的包茅。周代的缩酒有两个意思，一是用茅草过滤已发酵的粮食酒，使酒变成祭祀用的清酒。二是在祭祀祖先的仪式上，把茅草捆扎竖立，再往茅草灌酒，象征供神或尸（受祭人）饮用。至于包茅是何种植物，则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茅香、金茅或菁茅（三脊茅），但亦可能只是一个统称，并不局限于一种茅草。今天在鄂西和荆山一带，仍遗留有缩酒的仪式，通常是由巫师主持。此图摄于南漳的薛坪，是丧礼中的缩酒仪式，可能与三千多年前的情况大致相同。

二·楚人的精神世界

从渊源上看，楚民族既有可能是由北方迁来的一支，而商周两个中原王朝，势力都及于楚地，故此楚人兴起之初，它的主要文化都可以在中原找到源头。但从春秋时起，中原用器及艺术风格的宗教意味逐渐减轻，出现了人文化倾向，楚人的文化因而渐渐透露出与中原有异的精神。楚人认为万物均有生命力并相互联系；人类和动物本质上是一样的，灵魂可以互换并分享自然界。这种注重联系性的宇宙论，源于中国古代的原始巫教，既是商人精神的本质，也是楚人精神的出发点。楚国器物形态奇特、色彩丰富，楚人的生活习惯崇尚鬼神，皆渊源于这种独特的精神文化。故此，要了解楚文化，必先明白楚人的精神世界。这可从信巫好鬼、多神崇拜和崇道哲学三方面论述。

1·信巫好鬼

巫教是古代民族的原始信仰习俗。楚人的先祖曾为周室的火师，精通巫术，加以建国期间，楚国不断融合南方的土著民族，这些民族（如濮族）原来的巫风浓厚，因而信巫好鬼的风俗，普遍于楚国。除严肃的祭祀外，楚人的日常生活用品、艺术品以至乐舞，都表现出浓厚的巫风。

鼓舞祀神、重视卜筮的巫术仪式起源很古，商代尤为盛行，动辄卜筮请示鬼神。据统计，商人用卜的事例有祭祀、征伐、梦、疾病等

二十种之多。西周以后，巫风在中原逐渐消退，却在楚地保留下来，而且日渐兴盛。楚人巫风之盛，可从祭神及卜筮两方面观之。

楚国的大巫师观射父曾对楚昭王说，古代民、神不相混杂，只有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能予以沟通，其中女的称“巫”，男的称“觋”。他们一般通过祭祀、卜筮或靠饮用含兴奋剂的饮料（如酒）进入昏迷状态，以沟通上帝和鬼神，祭祀时都要配以乐舞。从楚灵王巫祭的场面“（楚灵王）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祓起舞坛前”，可见祭神仪式中，乐舞有很重要的作用。屈原在描写迎送日神东君仪式的诗句中，列举了仪式所用的乐器有瑟、鼓、箫、钟、箎、竽等。直到东汉时期，在楚故地沅湘之间，还可以见到当地信巫好鬼的风俗——“使巫觋作乐，鼓舞以娱神”的场面。今天在楚故地的墓葬中，也常能发掘到这些祀神所用的乐器。

此外，楚王和商王都兼有巫长的职能，楚灵王、怀王都是有名的巫长。在一般的楚贵族中，卜筮非常普遍。如屈原就因受谗忧愤、心迷意乱而去太卜家问神明，用占卜来做决定。甚而国家大事也经常问卜，如共王选择继承人，也是用“请神决之”的办法。楚墓出土的大量简册中也多是占卜的内容。如包山的楚简记载，当时卜筮分为前辞（记录时间、占卜的人、用具）、命辞

(贞问事由；身份高者多问政事，低者问吉凶)、占辞(贞问的结果)、祷祠(请鬼神保佑)。墓主人生前移祝(即沿用以前贞问祝辞，向祖先或神灵祈福)问立爵之事，据称结果很灵验。

这种信巫好鬼，是先秦社会人们普遍的心理和宗教需要，所以楚人的巫术仪式有着严肃的社会意义。占卜使楚人更相信他们与超自然能力紧密相关，而把占卜看成与鬼神联系的有效方式。有学者指出，楚人的巫术活动是道家哲学和原始科学发展的渊源。

2 · 多神崇拜

从现有的遗存来看，楚人有崇拜动物的风气，这可能与楚人生活环境有关。楚人认为自然是一体的，认为天与地之间，神鬼与人之间，山川与人之间，乃至禽兽与人之间，都有某种联系，故有动物崇拜的现象。动物崇拜在古代是十分普遍的。如楚王常用作名字的熊、与楚人芈姓有关的羊(芈据说与羊的叫声有关)、楚人艺术中常见的母题凤鸟(一说为祝融的化身)、龙、蛇、虎、鹿等都曾被学术界视为楚人尊奉的图腾，但无论主张楚人以哪一种动物为图腾，都无

法否认楚人也尊崇其他动物的事实。在楚人的神话和艺术题材中，除了对动物的崇拜外，还有大量半人半神(人面兽身、鸟身、兽身人面、多首

人面)或怪诞的虎座飞鸟、鹿角兽面等合体动物形象。这类想象力丰富的合体形象，大抵无法确定是源于何种图腾崇拜或祖灵崇拜的。

除此以外，楚人也畏惧大自然力量和敬重祖先，故又崇拜自然神及祖先神。由《楚辞》可见楚人崇拜的神祇可分为三类：一是天神，如被尊为“上皇”的太一、大司命、少司命(星神)、东君(日神)、云中



65 根雕神兽

战国中期 / 长 69.5 厘米 高 40.5 厘米 / 江陵马山 1 号墓

兽首的各部分雕刻精细简练。身细长、短尾上卷。前肢和后肢各朝相同方向，但长短不一，作行走状。此外，四肢皆刻为竹枝状，并附有动物。如右侧前肢上附有长蛇，后肢上是蛇吞青蛙；左侧前肢附有一条衔着鸟儿的四足蛇，后肢则附有一只蝉。此器造型充分利用树根的自然形态，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君(云神)；二是地神，如湘君、湘夫人(水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三是自然神，如风伯(飞廉)、雨师(屏翳)、雷神(丰隆)。此外，尚有轩辕、高辛氏、伏羲、女娲等与祖先崇拜有关的神祇。这些神祇既有中原华夏民族的神系，又有当地土著神系，多少反映出中原文化对楚地的影响。此外，有学者指出，楚人尊崇的神“太一”与“道”、“太极”实质上是同源于一种宇宙论，又分别成为楚人神学、哲学和科学的渊源。

楚人这些驳杂的神怪系统和崇拜，正是巫教的宇宙论中多神崇拜的体现。楚人尊崇的动物

在巫教中也是备受崇拜的，像楚人艺术母题中常见的龙、虎、鹿被认为有通天地的本领，常常在巫师作法时充作助手。因此巫教中的泛神崇拜也很自然地在楚人的生活中表现出来。那些极富浪漫情趣的合体形象，反映出人

与动物可互换交叠的巫教思维形式，这形式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在人与自然界关系相对密切的远古时代和非集约化生产地区（投入人力很少的粗放式农业区），多无法摆脱这种思维定式。

楚地有川泽山林之饶，地广人稀，于是就采用刀耕火种这种简单省事的方法。食物丰足，人们不忧冻饿；但就早期而言，也没有很富庶的家庭，所以人们信巫鬼、重淫祠。在依赖自然界维持最低生存条件的情况下，任何一种自然因素，如过量的雨水、果树的大小年、过量捕杀动物或迁徙等都可能影响楚人的生活质量，为保障各方面的生活资源，崇拜多神也是合理的。加以地域广大，杂居的土著民族众多，崇拜对象各不相同，多神崇拜也成为楚人顺利融合其他民族的有利因素。至于楚国后期出现的宇宙总神“太一”，则反映出强大国家对精神统一的需要。

3 · 崇道哲学

信巫好鬼与多神崇拜，都是楚人信仰方面的特点，但要了解楚人的整体精神面貌，就必须旁及其哲学思想，这就是著名的老庄崇道哲学。

“道”、“道家”、“道教”三者，都有“道”字，但概念并不相同。“道”是中国先秦时代的哲学概念，“道家”是春秋战国时代主张绝圣弃智、清静无为的政治学派；

“道教”则是始于汉代，讲求丹醮符篆，希望炼气长生、羽化登仙的中国传统宗教。

“道”从一种哲学概念，衍生出无为而治这种影响后世政府运作的政治学说，最后又发展出追求长生的神仙思想，这是西洋近世哲学难以理解

的。“道”在东方传统思维模式中，代表万事万物间都存在的某种必然联系。“道”的观念不是楚地独有，但只有在楚地形成完整的哲学体系，最能体现楚人的精神，与中原强烈入世的儒家学说可谓泾渭分明。

谈到楚人崇道，就必然要提到道家的开创人老子和庄子。老子是春秋时楚苦县人（今河南省鹿邑县东），略与孔子同时。他做过周室的史



66 虎座飞鸟

战国中期 / 翅宽72厘米 高92厘米 /
江陵九店526号墓

此器是虎和鸟两种动物的结合，鸟骑在虎的身上。鸟背上原插有一双鹿角，但出土时已腐朽。

官，有《老子》一书传世。庄子生活于战国时代，宋国蒙地人（今河南商邱东北），宋后来并入楚国。庄子当过地方漆园吏，有《庄子》一书传世。老、庄思想在楚国日渐流行，最终形成完整的哲学体系。

楚人的“道”最初并没有哲学中形而上的意义，而是指宇宙的本体。老、庄认为“道”能产生出万物，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庄子也提出，天、地、鬼神和上帝都是由道生出的，而道又是自古就存在的，它“无为无形”。道家既然认为“无”能生成“有”，“有”亦能生成万物。这个“无”显然是“道”的同义词，它绝不是“空无”和“零”的意思，而是先于天地等物质形态的一种自然界混沌状态。这种以道为核心的理论是要揭示宇宙间万物存在着联系，这和古代印度哲学中“梵天”是万物，是“无”是“空”，希腊早期哲学中“万归一”等哲学概念的意思几乎完全一样。它显然是人类依赖自然界生活的一种必然的思维方式。形成“道”的环境在古代东方是普遍存在的，在没有集约化农业生产的条件下，生产和社会组织的任何变动都可能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这就成了信守自然、无为而治的社会根源。

但是到了西周，因人口压力和自然条件的改变，中原的干旱及半干旱地区出现了投入很多人

力的精耕细作式农业（称集约式农业）。在这环境下，需要组织和投入更多劳动力从事生产，人们通过组织协作能获得更好收成，就逐渐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这引起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出现了以孔子为代表，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施行仁政的儒家。如此，南、北方的哲学体系便开始分歧。

胡适指出，儒是商代从事丧礼一类宗教职业的知识分子，老子本人也是儒，他和孔子分别是积极和消极的儒的代表。出现这种分化的原因，是由于气候变冷、干旱和人口压力等因素，使北方国家需要更有效地组织人力发展经济，人变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保民”的重要性被认识，而早期儒家的“敬畏天命”，也逐渐变成“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甚至“人定胜天”。

另一方面，楚人在南方并不需要集约农业来强化粮食生产，人际接触便不如北方的频繁，天人合一这种联系性和整体性宇宙论遂有继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商人宇宙论因而得以在此传承，形成崇道的哲学。也正是由于“道”的精神根植于楚人意识的深处，他们的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主体与客体永远是一元和整体的，是联系的和连续的。他们在社会生活、艺术创作上表现出的种种怪诞，是心灵与自然一体性、联系性的流露。这是一种与现代理性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明乎此，也就把握住楚人精神文化的基本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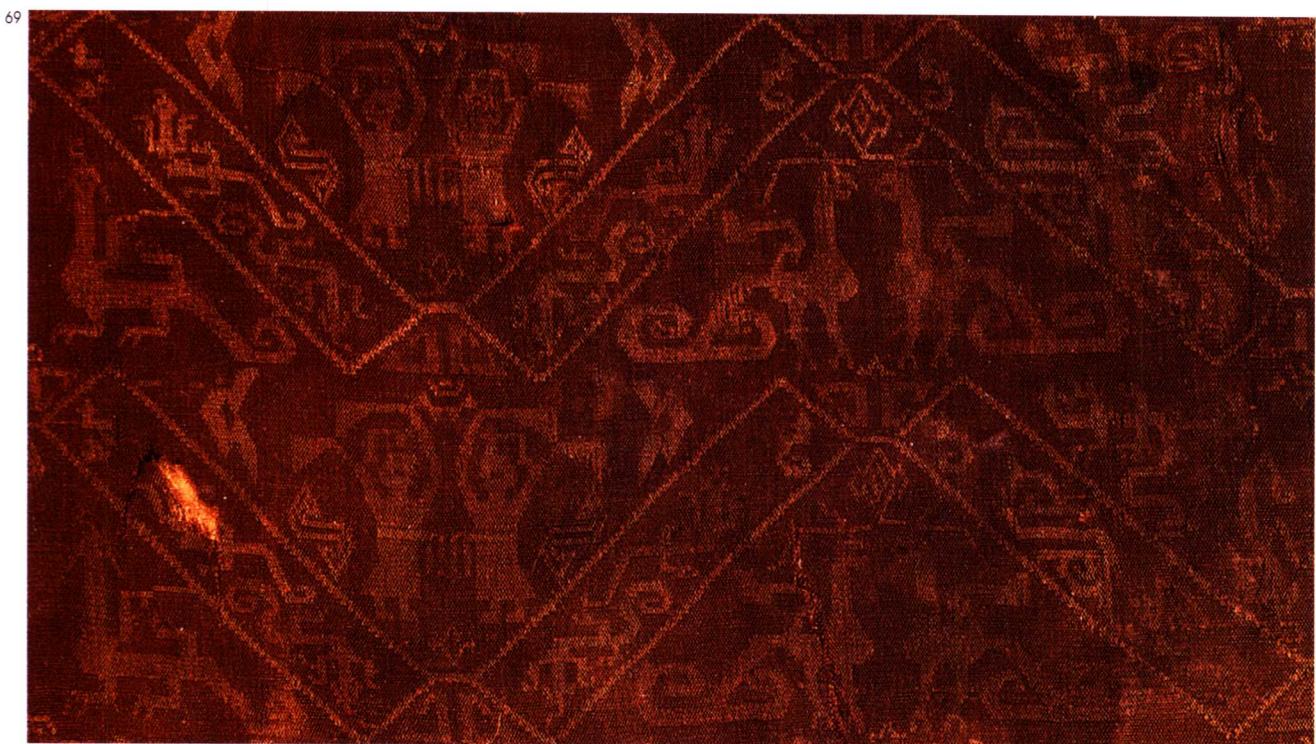
楚人的巫风

楚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内结集了不少深信巫术的少数民族，其崇巫的程度远远超越北方诸国。及至汉代，也以南方巫师的名声最大；而唐宋时的巫歌和巫舞仍以楚地最为流行。现有的出土文物可见，楚人的用品常刻有巫师形象或祭神祈祷仪式；而雨台山、九店一千一百多座墓葬出土的二十六件鼓，墓主也多是巫师（鼓是巫术仪式的典型器物），这多少反映了楚地信巫好鬼的传统。



67 漆鸳鸯盒上的鼓舞图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鸳鸯盒，一面绘有类似巫师的佩剑人物形象，该巫师正在击建鼓和跳舞。另一面则绘有一撞钟击磬的图案。



68 舞人动物纹锦
69 舞人动物纹锦局部

文献记载，楚人的舞蹈是具有巫舞性质的，图中所见的舞人或许与巫舞有关。

70



71



72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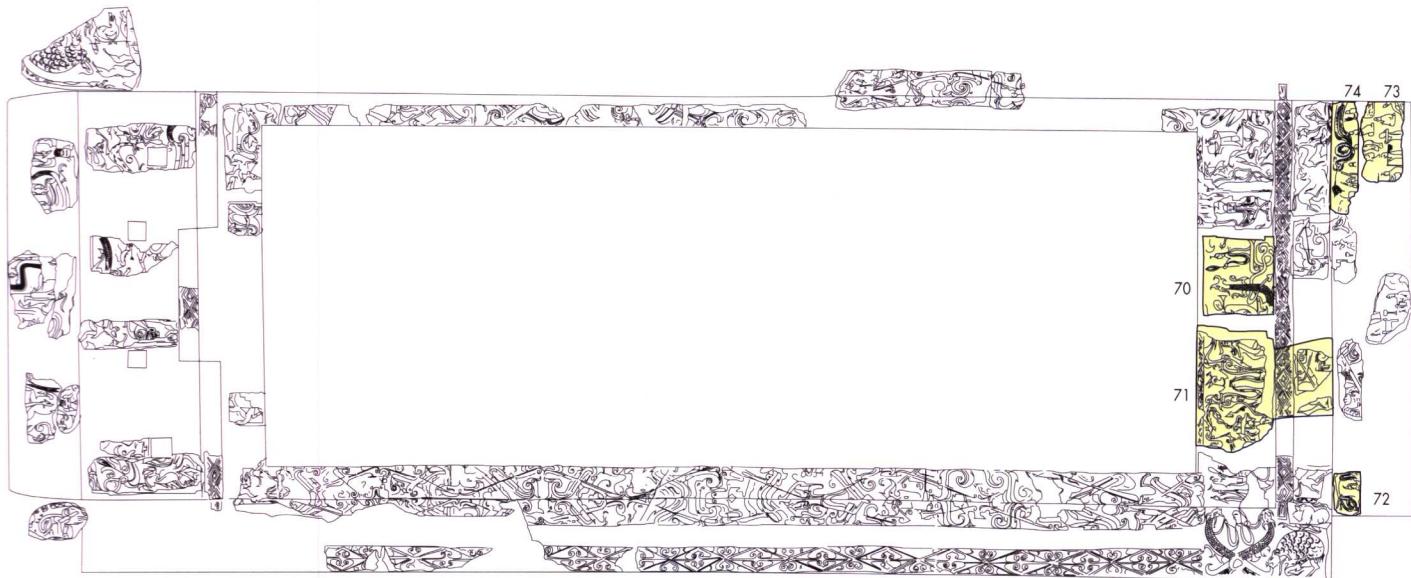


70 锦瑟残片局部——巫师

71 锦瑟残片局部——巫师

72 锦瑟残片局部——巫师头部

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一件锦瑟上，满饰神灵、巫鬼、动物及狩猎宴乐场面。以上三片残片均是巫师的形象。图70绘巫师穿着法衣、手持法器，前面有一条龙；图71及72则绘一个头上有角的巫师。



插图·2 锦瑟图案展开图



73 锦瑟残片局部——祈祷仪式

残片上绘有数人跪地祈祷的形象，有可能是反映巫祭仪式的一个片断。

74 锦瑟残片局部——凤尾龙

这图上方有一条卷龙，下方有一人跪坐作祈祷状，可能是在表达某种意愿。

楚人与神

沟通的器具

楚人继承了商人崇信巫鬼的传统，重视与幽明界的沟通，祭祀仪式自然不可或缺，甚而行事也每每征求鬼神的意见，这现象从楚人的遗物中亦有迹可寻。



75

75 鞴鼓（有柄鼓）

战国早期/高23.8厘米 鼓面径24厘米/曾侯乙墓

在中国古代，巫术活动多与音乐相关，而鼓又是祭祀仪式的一种重要法器，有使人兴奋和控制音乐节奏的作用。据《诗经》记述，古人在祭祀仪式中要用四种鼓，即应、田、鞶和悬鼓。田是大鼓（建鼓），鞶是有柄鼓，在曾侯乙墓中，四种鼓全部齐备。除祭祀场合外，鞶鼓平时也与其他的乐器配合演奏。



76

76 虎座鸟架鼓

战国中期/高86厘米 鼓径38.4厘米/江陵枣林铺1号墓

虎座鸟架鼓是楚人的典型器物。古人认为，龙、虎、鹿、凤等动物，具有沟通幽明的能力，巫师作法时常以它们充当助手。这种做法渊源自远古时代，在河南濮阳出土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蚌壳龙虎，便是一个典型例子。龙、虎、鹿后来被道教视作“三踩”（具沟通幽明能力的动物），而楚人因凤兼具飞天本领，更对其特别钟爱。



77-78 包山竹简的卜筮内容

战国/简长64.7-69.1厘米 宽0.7-0.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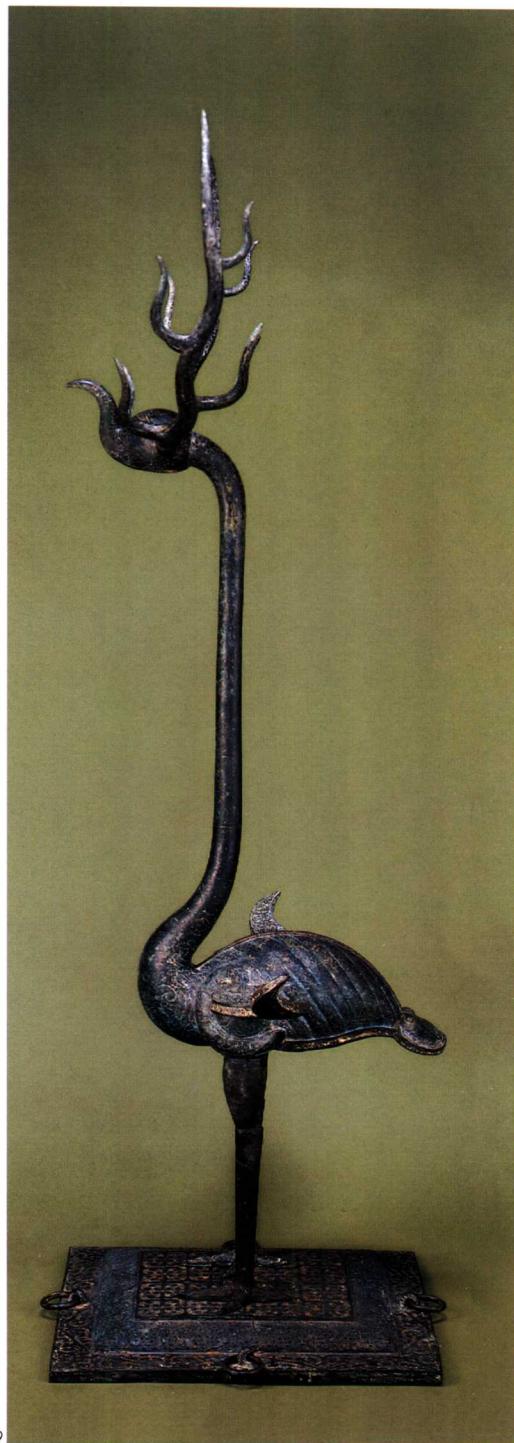
厘米/包山2号墓

包山楚墓出土竹简四百四十八枚，内容分为文书、卜筮祭祷、遣策三类。图中的竹简，记录墓主邵佗贞问吉凶，结果得到随卦䷐ 和离卦䷬。楚简中出现《周易》卦象，说明楚人问卜是运用了《周易》的卜筮系统，从而表明楚地的道家和中原的儒家最早是合流的，而两地的卜筮也有共同的来源。

这组竹简选自“受期”（受理诉讼案的时间及初步结论）和卜筮记录简。第一简的内容，是楚郡县司马及州、里的官员受理辛未日陈某伤害一案，不能定罪。第二简记述邵佗对楚大司马邵滑在公元前316年4月率师救郢一事，贞问吉凶。第三及四简是墓主患心疾后，向司命、大水、山川和楚祖先等神灵的祭祷。

楚人创作 的合体动物

东周时期，江汉平原的生存条件较北方优越，使楚人有较多时间从事宗教活动。加以江汉地区的交通便利，周人、南蛮、巴濮、东夷等族的宗教信仰容易传入楚地，在融合不同的宗教传统后，楚人渐渐发展出多神崇拜。从考古发掘上看，多神崇拜的遗物多由合体动物组成，这大抵与楚人认为动物有沟通幽明的能力有关，也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土著文化的影响。而这种多神崇拜的传统，与中原越趋浓厚的人文精神形成了强烈对照。



79 鹿角立鹤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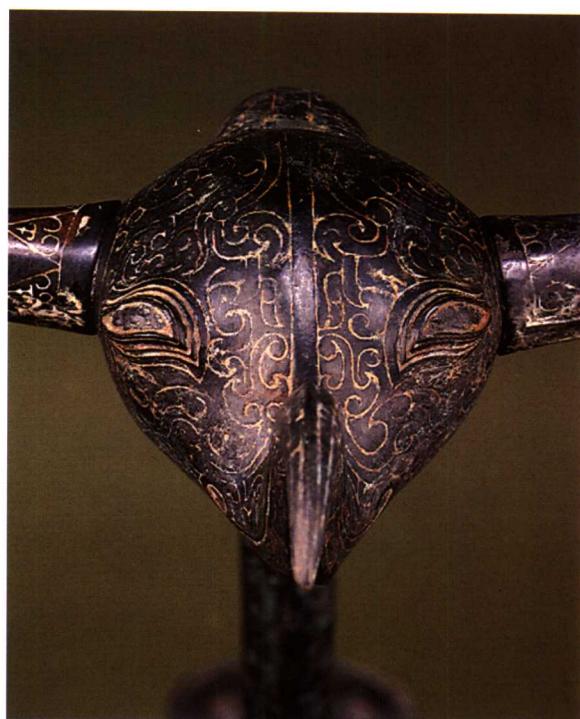
80 鹿角立鹤正面

81 鹿角立鹤头部

战国早期/高143.5厘米/曾侯乙墓
鹿和鹤在中国古代象征祥瑞和长寿。在重巫的南方，人们大抵认为把瑞兽的特点结合在一起，会更有神通，这具灵媒便是反映这种思想的一件典型器物。此器出土于主棺东侧，可能意在保护或导引主人的灵魂升天。在鹤的头、颈和鹿角皆饰错金涡云纹，背、腹及翅则镶嵌绿松石，并饰蟠螭纹。加以造型独特，容易予人深刻印象。



80



81



82 马胄残片——鹿首龙

83 马胄残片——双首龙及怪鸟

84 马胄残片——蟠龙

85 马胄残片

战国早期/曾侯乙墓

漆皮马胄上彩绘龙、鹿及怪鸟等动物合体形象，以表现不同的动物神通能融合在一起。出土时，原有的兽皮已经腐烂，仅存漆皮。





86

86 彩漆木雕箭箙

战国中期 / 长21厘米 宽20厘米 / 江陵
望山1号墓

这是装箭的箭盒残部，上雕龙、
凤鸟、雀及蛇等动物。

87 彩绘漆内棺

88 彩绘漆内棺局部——神鸟

89 彩绘漆内棺局部——烛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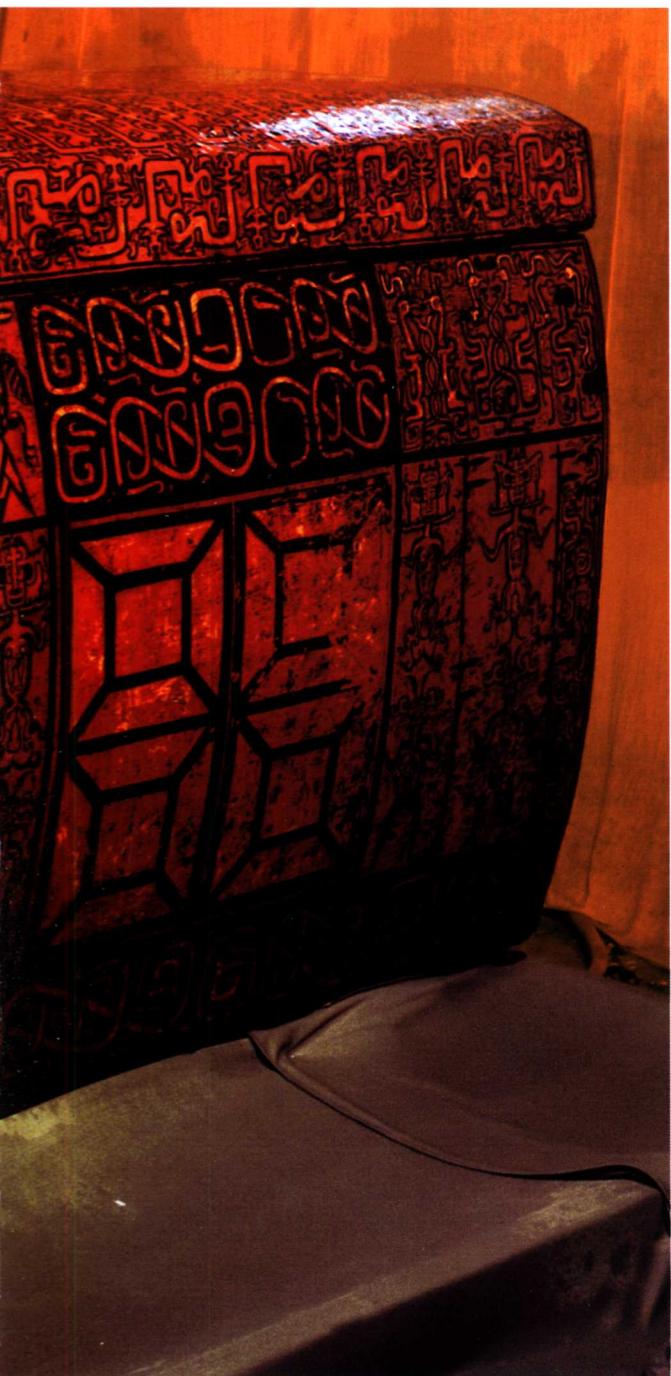
战国早期 / 长250厘米 头宽127厘米
足宽125厘米 高132厘米 / 曾侯乙墓

曾侯乙墓内棺是用巨板榫接、
髹漆彩绘而成，共绘有各种龙
蛇七百五十三条、各类动物一
百四十二只、神人四个、神兽
武士二十个。另有窗格和门户
纹样。其中大部分的怪异神兽，

87



可与先秦古籍《山海经》的描写相印证。在诸侯主棺上绘制神怪，并不是单纯的艺术创作，而是与葬仪的需要有关。护卫墓主的神灵和门窗纹样，说明人们相信死后灵魂可以自由出入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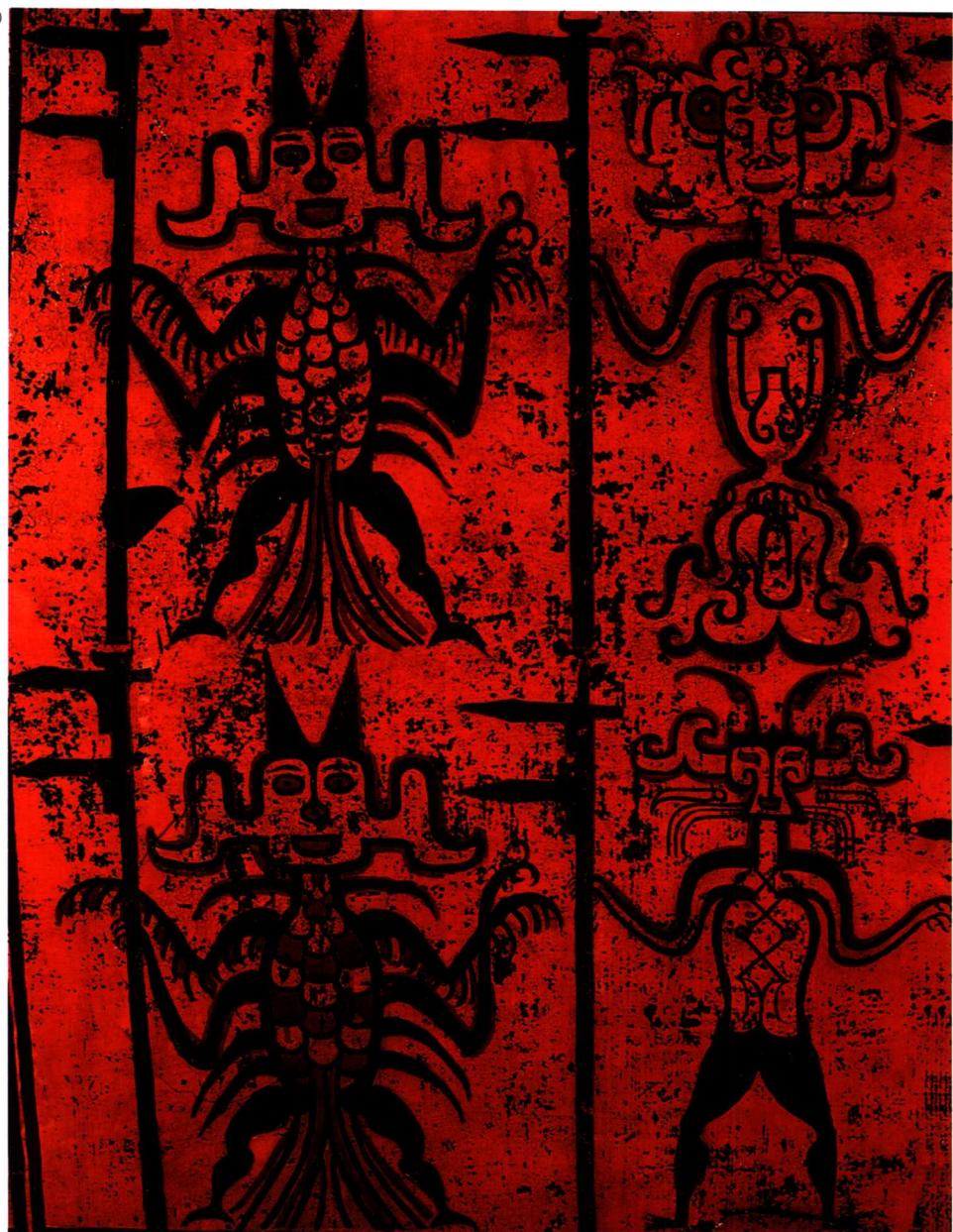
88



89

人与动物 结合的神祇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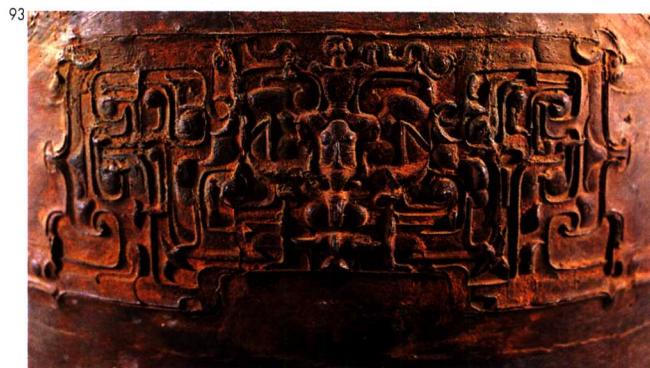
多神崇拜的肖像，除了以不同动物结合外，尚有人与动物的合体，显现出人面兽身、人面鸟身、人面多首等似人非人的神祇或巫觋形象。当中尤以镇墓兽最具特色，仅江陵雨台山、九店发掘的一千一百五十五座墓，就出土有二百二十一件之多。



90 彩绘漆内棺局部——方相、羽人、神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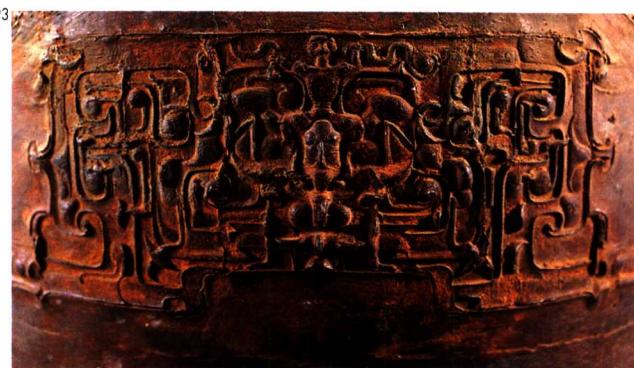
91



92



93



91 兵辟太岁铜戈

战国中期/长21.9厘米 宽6.5厘米/荆门车桥

铜戈两边铸有相同的神像。神人头部饰卷羽，耳饰卷蛇，腰部缠蛇，两手分别操龙和两头兽，双腿左右分跨，足踏日月，胯下有一条龙。铜戈的两面各铸有两字铭文，连续读为“兵辟太岁”。这种铜戈的式样，在巴蜀等地是常见的，但其上的图像及戈铭所表达的信仰，却与楚文化相同。

92 甬钟

93 甬钟局部——神巫操蛇图像

战国中期/高98厘米 重76.25千克/随州擂鼓墩2号墓

这是在随州擂鼓墩出土的大型甬钟局部上的神巫操蛇图像。在《山海经·海外西经》描述巫咸国的神话中，巫人是以双手操蛇为特征的。传说中巫咸是帝尧时代的巫医或商代的神巫。这件甬钟上的神巫操蛇图像，说明了敲击乐器是具有法器功能的。



94 双头镇墓兽

战国中期/高52厘米（不连鹿角）/
江陵雨台山18号墓

头插真鹿角、长舌凸眼的镇墓兽，是楚人的典型器物，功用是显示神通、驱邪通灵。这种半人半兽、多种动物特征合一的造型，普遍存在于巫术文化浓厚的社会，而且是经过从简单到复杂，由彩绘装饰到精雕细刻的发展过程。应注意的是，双头镇墓兽只在身份较高的楚贵族墓发现，而单头镇墓兽的墓主身份较低，显示灵媒的级别与墓主身份有一定关系。



95

95 人面镇墓兽

战国中期/通高95.8厘米/江陵九店
712号墓

楚人的 生产工具

商代的江汉地区，是以铜和石作为主要生产工具的。

直至春秋时期的楚贵族墓，才开始发现有青铜农具随葬。战国中至后期则以应用铁农具为主。据统计，从1951年至1979年出土有五十八批楚国铁器，共一百六十八件，大多是属于战国时代的，可见当时铁农具已相当普遍。楚人的生产工具，由石器、青铜器演变至铁器，是人口增长压力和粮食需求增加的结果，也是社会转型的标志。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最终会引起人们的思想变化。

96 铁口木耒

战国/通长109厘米 柄长59厘米 铁口长7厘米 宽8厘米/纪南城82号井
耒耜是中国最古老的农具，传说是由神农所创。此器是在楚纪南城的井中发现的，是迄今最完整的铁口耒，在纪南城发掘的四座井中，有三座出有铁器，仅耒耜便有三件，说明铁器在当时已不是罕有之物。



97 凹口铁齿

战国中期/上宽8厘米 刀宽11.2厘米
高9.8厘米/江陵雨台山232号墓

这种铁口齿是安装在木齿刃口上的，用以增加切割力。检测发现，楚国的铁工具分别是用韧性铸铁、白口铁和锻铁制作的。而铁工具的使用，对提高生产力起了极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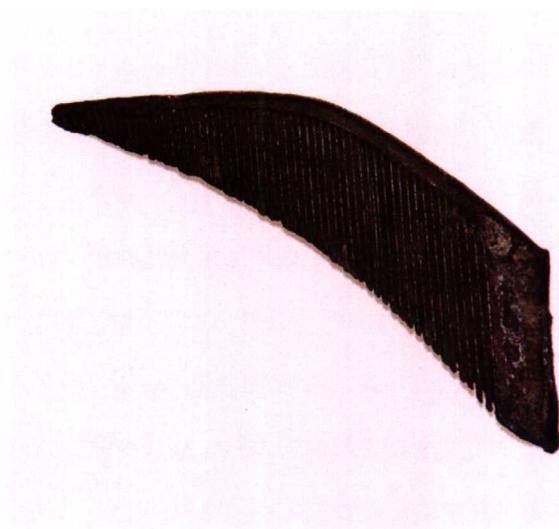




99



100

**98 石镰**

商代中期/长17.7厘米 宽5.7厘米/黄陂盘龙城遗址

99 铜镰

春秋晚期/长11.5厘米及6.5厘米 宽9.2厘米及8.5厘米/襄阳山湾2号、11号墓

100 铜镰

战国早期/长11.2厘米 宽2.7厘米/江陵雨台山403号墓

铜镰是收割水稻用的，是具有南方特色的工具，类似的铜镰在楚地屡有发现。此器背部和背部光平，正面是锯齿。

三·楚人的社会

要认识楚文化，就要认识楚人的社会。研究文献和出土的器物，有助于我们透视楚人的社会情况。而从礼乐制度、政治军事活动、生活情态（包括习俗、技术）和艺术几方面，可以基本了解楚人的社会生活。但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进入文明时代的社会，都不免会有贫富、贵贱之别，下层百姓很少能有像样的墓地安葬，故现今所见的文献和文物，多来自楚国的上层贵族。仅从湖北近年来发掘的数千座楚墓来看，能完整地复原当时普通百姓的生产状况、生活情态的资料实在太少了，因而本书叙述的楚人社会生活，依据的多是社会中上层的记载和遗存，由于“祭祀”与“军事”等国家大事，以及与政治宗教和财富密切相关的艺术品，不是老百姓所能问津的，故从中能看到的楚平民生活可能较少。

1·国家机制——礼乐与军事

礼乐制度是指周代社会的行为规范，是周代重要的统治方法和文化核心。它源于新石器时代逐渐形成的风俗习惯。“礼”涉及到成丁、婚丧、农事、交往、商业等方面。“乐制”则可能直接与巫祭时的乐舞规则有关。礼乐制度的形成，使早期社会按财富多寡判别社会地位的标准逐渐扩展，此制度更牵涉到家庭血缘方面的嫡长子制、宗族权力传承上的大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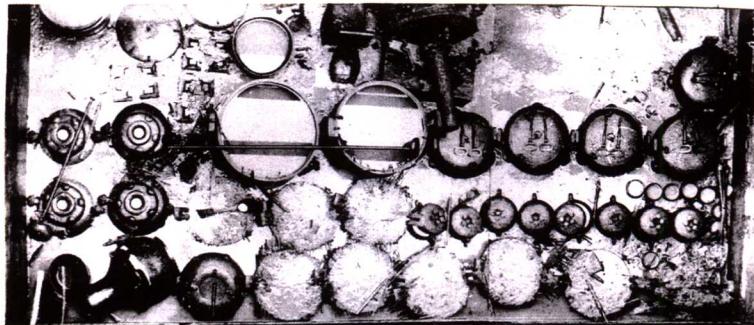
小宗昭穆制、个人身份标志的爵位等级制等复杂的分层系统。各阶层都不可以逾越这些规范，否则就将被视为“失礼”。这套系统和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法律、维系民族的精神的巫觋仪式相结合，成了稳定社会的重要支柱。军事则是楚国消灭邻国，扩张势力的途径。礼乐和军事都是楚国安定内外的重要机制。

礼乐制度虽然是周朝的制度，而楚曾经以蛮夷自居，但由于与中原仍维持着频繁的交往（如会盟），因而先进的中原制度、文化也成为楚人初兴时模仿学习的对象，故楚人的制度难免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楚贵族更有与中原基本一致的礼乐制度，这成为了解其社会形态的基本点。

1) 礼制——饮食器具与鼎制

礼是一切行为的规范，礼的内容有很多，成丁、婚丧、祭祀等均体现礼的存在，无法一一论述。现在我们最能具体见到的礼制表现，是礼乐场面的饮食器。所谓“民以食为天”，饮食行为亦成为表现礼的一种仪式，诸如食物来源、种类、数量、烹饪方式、饮食器皿的排列组合和纹饰，都成为人们关心的内容。《周礼》记载，负责帝王起居的人中，大部分是管饮食的，进餐时按地位和年龄，划定菜肴多寡的规则，例如：“天子之豆二十六，诸公十六，诸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礼记·礼器》）；

六十岁的三豆，七十的四豆，八十的五豆，九十的六豆（《礼记·乡饮酒义》）。这些规定亦用在祭礼、婚丧一类活动中，成为“礼”的形象体现。楚人的礼乐制度正是沿袭商周这种传统，用饮食器和乐器的种类、数量、



101 曾侯乙墓中室出土的青铜礼器

品质与组合关系，表现社会各阶层的身份。

周人的礼器是以鼎为中心，用鼎的数量和器物的组合关系来表示身份。如诸侯用九鼎八簋、上大夫用七鼎、下大夫五鼎、士三鼎（另有天子九鼎说，今按《周礼》说）。目前从考古材料上看，楚人用鼎基本遵从这个规则。无论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晚期的王墓和大夫墓，都完全按照周人规定的铜鼎、铜簋数目。在器物组合关系上，直到春秋初期，楚人还完全按周人的铜鼎、铜簋的组合，器物风格亦一如中原。

到战国时期，楚人礼器的组合基本上由盛牲器（鼎）、食器（簋、簠、豆）、酒器（壶、缶）、盥洗器（盘、匜、盉）构成，和中原稍有区别的只在食器的演变序列上，中原是按照簋——豆——敦演变，楚人则按簋——敦——盒演变。豆是盛肉和调味品的器皿，簋、簠则是

盛饭器皿。此外，楚人对盥洗器也格外重视。

楚人在饭稻羹鱼的优裕状态下，礼器组合上用盛饭的簠代替中原的簋，这只是形状上的非功能上的变化。至于鼎、簋、壶与鼎、敦、壶组合关系中，似乎由于楚人强调

兴奋剂——酒的作用，因而盛酒的壶从来没有从器物组合中消失，组合稳定不变，而且酒器的制作精美，形制多样。除了饮酒之外，楚人的菜肴也很有特色。中原饮食的传统一直把荤菜当作奢侈品，所谓“肉食者鄙”、“肉虽多，不使胜食气”，都反映出对食用荤菜的克制。从楚人仍用陶、漆木豆充作礼器，也似乎表示他们在恪守传统、不放弃荤菜享受的同时，顺应自然的态度。

2) 礼制——朝聘

以鼎制为中心的礼仪，便于确定社区内部尊卑等级关系，但在邦国间就需另建立一套严密的朝觐（下见上曰“朝”）聘报（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回聘曰“报”）制度。朝聘最早是长途贸易和邦国间通婚的产物，其程序是以郊劳（君使士迎于境）开始，赠贿（赠人财

帛)告终，并有贾人参与。周人把聘报视为明辨君臣、诸侯身份的重要礼制，对各种身份的人都有严格要求。楚人聘报完全按照周制。以楚公子弃疾——即后来的楚平王——到晋国一事为例，弃疾途经郑国，私见郑国君，以乘马八匹见。见郑国的子皮、子产、子大叔等三卿，次第降为乘马六匹、四匹、二匹，并严禁随从在郑禁地放牧采樵，弃疾因而被认为“知礼”，可做国君。包山楚墓出土的漆奁上绘有聘报的情景，图中人物车马服饰均甚讲究，可分使者出行聘报、主人迎宾郊劳等场面，形象地说明楚人对中原礼仪的遵循与追慕。

3) 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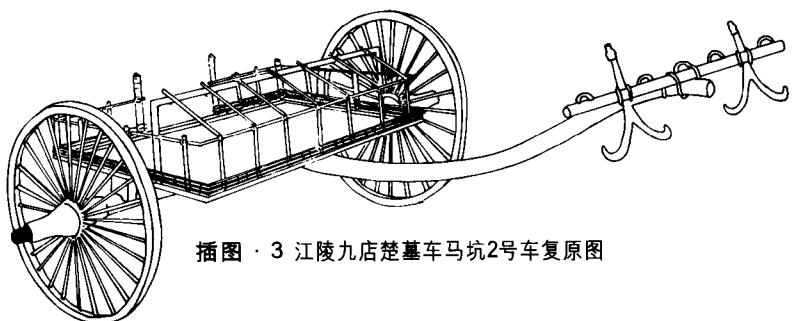
乐是礼制的一部分，负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不是单纯的音乐表演。楚人将乐用于军事、宴享、祭祀、婚丧和外交等方面。晋国派人到楚行聘礼，楚人在地宫内鸣钟磬予以礼遇。楚高级贵族的随葬品中，往往有成组钟磬，以显示主人生前钟鸣鼎食的身份。钟磬的安放也是礼的一项内容，以受楚影响很深的曾侯乙墓为例。该墓钟磬悬挂呈曲尺形，正是《周礼》记载诸侯享用的“轩悬”之制（三面悬乐器，类似古代敞开一面的房屋“轩”），它与随葬的九鼎八簋一起，成为主人的身份标志。由此观之，楚人的礼乐与中原是十分相似

的，和中原稍有不同的是楚墓多见的瑟鼓一类乐器，还含有巫祭仪式的法器意味。

4) 军事

先秦时期，楚人社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军事。楚民族兴起于荆山地区，生活困苦，民族性格强悍刚劲、崇尚武力。故此，楚国壮大后，不断地对外用兵。楚康王曾说五年不出兵，是莫大的耻辱，死后不得见祖先。这种好战风尚，使楚国成为春秋时灭诸侯国最多的国家。军事活动在楚国有重要的地位，而楚人军事技术的进步，也带动其他行业的进步。

楚人十分重视军事，这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楚国的令尹（相当于中原的丞相），其管辖范围及于军事，这与中原有所不同。二是楚国对外一直采取主动进攻策略。从《楚墓出土兵器一览表》可见，楚墓发现的兵器以攻击性武器为主，盾甲等防御性武器只占少数，暗示楚人对外战术以进攻为主。这虽使楚人军功卓著，却因疏于防守，楚郢都被吴、秦等国一破再破，这也是在其他国家甚为罕见的。三是楚国对立下军功的将领皆赐封土，从楚国“封君太众”的情况，可见楚人对成功的重视。凡此



插图·3 江陵九店楚墓车马坑2号车复原图

时代	地点	短兵器		长兵器		远射武器		防守兵器		武器数量总计	出土兵器墓总计	出土兵器墓比率
		剑	匕首	戈	矛	戟	弓	箭簇	盾			
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	当阳楚墓(297座)	57 (56)	11 (11)	41 (34)	12 (11)	1(1)	2(2)	125 (27)	1(1)	249	65	21.8%
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	雨台山楚墓(558座)	172 (168)	41 (41)	98 (91)	15 (13)	7(6)	25 (24)	185 (31)	17 (17)	518	216	38.7%
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	九店楚墓(597座)	203 (201)	20 (20)	76 (74)	6(6)	2(2)	28 (26)	271 (46)	6(6)	580	235	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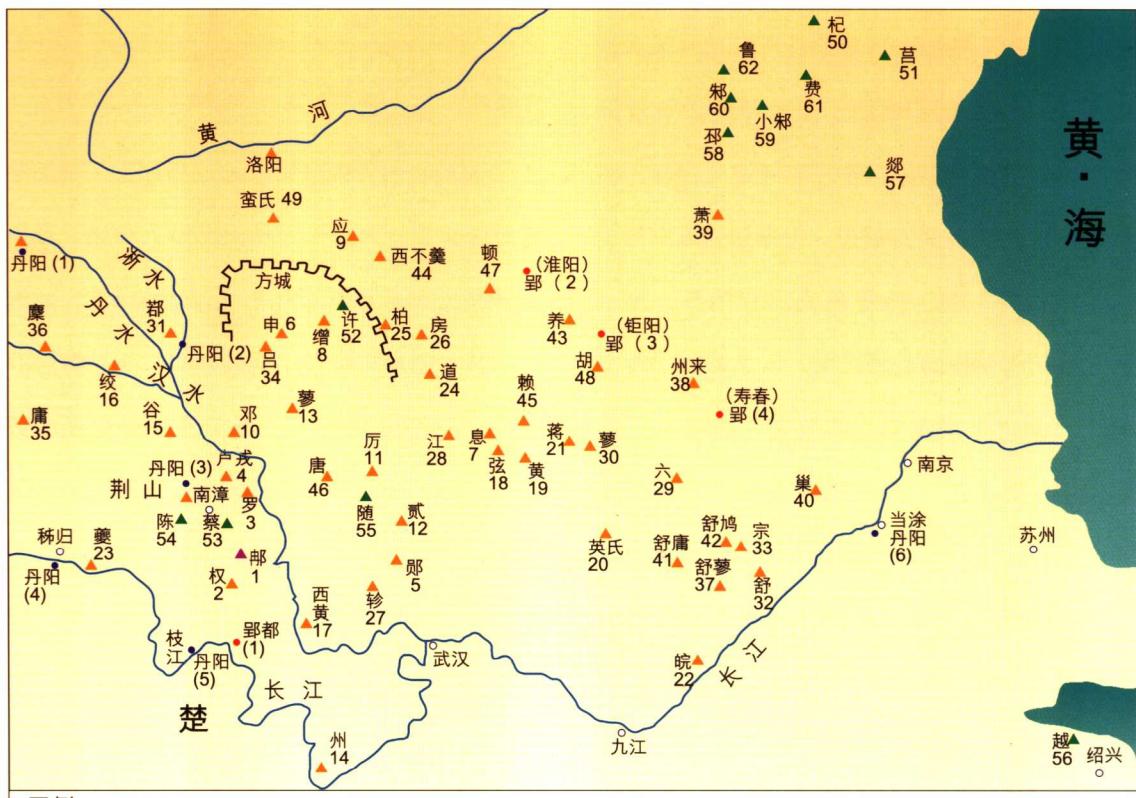
图表·3 楚墓出土兵器一览表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字是出土兵器的墓数。

左表可见，楚墓出土的兵器种类繁多，显示楚军的武器多种多样。另外，亦带出两个重要讯息：

(一) 楚军的作战形式改变。春秋初期以车战为主，武器主要是戟和矛等长兵器，但战国以来战略形式却出现变化，北方逐渐以步、骑兵作战，南方则变为以步兵及弓兵为主，以剑和弓箭作为主要武器。后期楚墓出土剑和弓的数量大大增加，与步战流行的时间是相应的。

(二) 楚墓出剑比例增多，显示军功人士的身份变化。在东周时代，只有贵族才有资格配剑，因而早期只有贵族墓才有剑出土，但后期则在平民墓亦有剑出土。说明军功人士在楚社会成员比率中的变化。



图例

- ▲代表西周时灭国顺序
- ▲代表春秋时灭国顺序
- ▲代表战国时灭国顺序
- 代表楚人始封地丹阳
- 代表楚国都城——郢都
- 代表地名

注(1)楚国在西周灭国一个，春秋灭国四十八个，战国灭国十三个，总计灭国六十二个。

注(2)越国一说灭于公元前333年，一说灭于公元前306年。另有秦灭越之说。

注(3)今人对楚人始封地丹阳的地望，有六个说法，图中分别列出这六个地方。

注(4)郢都先后多次迁徙，图中所列的数字，代表其迁徙次序。其中钜阳(今安徽太和县东北)仅《史记》曾有记载。

示意图·7 楚灭国示意图

皆见，楚国是重视军事的国家。楚国在五百余年的灭国战争中，充分显示它如何适应环境，采用简单有效技术改进军备的能力。

当车战成为主要的战争形式后，中原各国每辆战车配马四匹，甲士十人（车上三人），步兵七十二人，车兵执长杆，步兵执短杆，实行“长以卫短，短以救长”的战术。楚人进入中原作战后，又改进了战车。淮阳马鞍冢楚墓出土的战车，每车配马两匹，战车四周镶有抵御敌箭的铜甲。楚战车还普遍设有插挂其他武器的配置，这不见于他处，显然是楚人改进战车，以便于南方以弓箭作战的环境。曾侯乙墓出土的车轂上还装有短矛，用来加强战车的攻击力。此外，楚、曾等墓还出有用丝、藤、竹、木结合制作的长杆三戈、双戈戟、三棱刃的殳等强化车兵攻击力的兵器，由于木质易断，用丝缠结竹、木，使兵器杆更坚固，起到平滑坚韧、刚柔相济的作用。同时楚兵又大量使用皮质甲胄，表明楚国的军队放弃了笨重的青铜铠甲，根据自身物产特点，适应快速机动的作战要求，这也是楚军“轻利剽速，卒如飘风”的重要原因（《荀子·议兵》）。

楚人多在适宜步战的丛林水网地带作战，对近战搏杀利器的需求，促使楚人从吴越等国，引进和发展自己的青铜铸剑技术。湖南、湖北楚墓出土了大量青铜剑，质量和数量为列

国之冠，最负盛名的吴王夫差矛和越王勾践剑也出在楚墓。要在青铜韧性好的条件下获得最大刚度，含锡量应控制在12%-18%之间；若要在刚性好的条件下得到最佳的韧度，含锡量则应控制在6%-12%之间。检测发现吴、越、楚先后采用了先铸剑脊再铸剑刃，使剑脊韧性大、剑刃硬度大的复合铸剑技术。以下是楚剑的合金成分。

图表·4 楚剑合金成分简表 (单位：%)

成分	铜	锡	铅
剑脊	78.16	10.28	10.44
剑刃	73.79	18.42	1.03

西周时期青铜剑长不超过40厘米，楚国采用复合铸造技术后，剑长达到60-70厘米。湖南长沙杨家山楚墓甚至还出土了含碳0.5%的钢剑。技术的进步带动了冶铁业和“士”阶层的变化，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带剑快意江湖的游侠。秦昭王就说：听说楚国的铁剑锋利，声色之乐不兴。铁剑锋利使军队勇猛；声色之乐不兴，则思考精密长远，这样，我便担心楚国将进攻秦国了。

随着战争规模扩大，车战费用日益高昂，所谓“车甲之奉，日费千金”。加上私田兴起，破坏了车战的道路系统（阡陌）。在北方游牧骑兵战术影响下，楚人很快采用了步骑野战，而最能配合野战的武器就是弓弩。弩是楚人发明的，它和弓的作用基本相同，但弩的不同之处在于储

存和控制了能量，能做到瞬间的密集发射，适合丛林地带的野战和对付骑兵突击。楚弩射理论家陈音说：单凭弓矢不足以破天下之敌，要将弓改为弩，设制机括，使力量更猛，迫使天下诸侯屈服（《吴越春秋》）。当时最好的强弩射程已能达六百步（约716米）。湖北江陵楚墓出土了一件带有箭匣（装箭二十支）、能双箭并射的连发弩，它把过去以为连发弩出现于11至12世纪的时间提早了一千多年。这种可控的远射兵器的出现，

各国军队的组织结构和战术发展必然受到影响，以往的阵战被先进的偷袭伏击等战术淘汰，最终使国家的战略产生变化。

我们从楚人在战车、铸剑和弓弩等军事技术上的成就，可以看出楚人的社会文化是在不断进化的，战车是楚人对西周传统有选择的继承，铸剑则预示了冶铁业和“士”阶层的变化，弓弩可以看作战国中后期的大规模统一战争和南北文化碰撞的产物，都是楚人文化发展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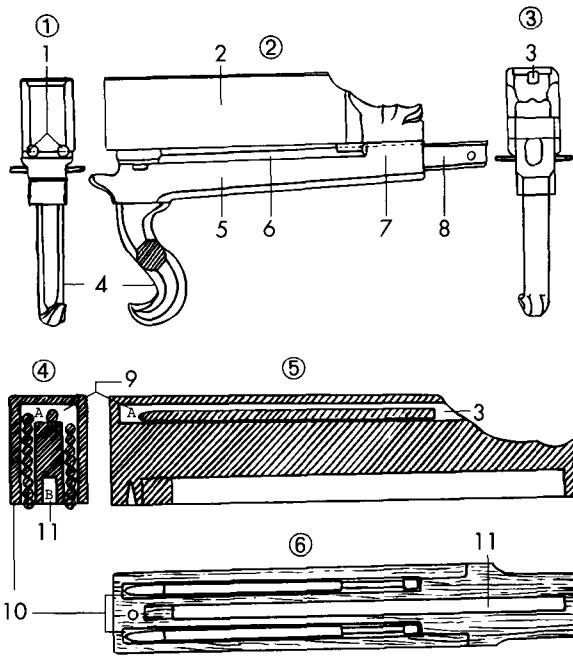
2·生活面貌之一——饮食

楚人的生活情态在文献上甚少记载，近年来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从楚墓中发掘出大量

器物，使今人对楚人生活面貌能有较清晰的了解，对楚人世界亦有更深入的认识。

1) 楚人的日常食物

江南地区适宜种稻，因而形成与中原以菽、粟为主粮的农业经济完全不同的，以稻米为主粮的水田农业经济，故此楚人亦以大米作主食。楚人有多种食用大米的方法，除蒸煮之外，



插图·4 连发弩结构图

还把米炒熟，甚而将炒熟的米压成粉末食用。现在江汉平原的居民，还有以炒米作为辅助食品的习惯。

楚国物产丰富，如《战国策·宋卫策》说：“荆有云梦，犀、兕、麋、鹿盈之，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饶。”可谓肉食水产兼有，所以楚人佐餐的副食品款式众多，贵族的食谱，自然更不乏山珍海味，如熊蹯、鼋等。肉食以牛、羊、豕、犬为主，同时亦用于祭祀。禽类有鸡和

鸕鷀等。楚国因有大面积的水域，水产丰富，以鱼类为主，而甲鱼等珍贵水产亦常见。常用的烹调方法有煎、蒸、烤（炙）等。

楚国的烹饪方法亦很多样。楚墓出土的竹简记载有多种菜式名称：豕脯、修脯、臝（蒸）猪、臞（炙）猪、臞（炙）鸡、薰鸡、薰鱼、筭（截）鱼等。

常用的蔬果有藕、笋、桔、梨、柿、桃、栗、荸荠、菱、梅、枣、桑椹等。这些蔬果的成熟期分散于一年四季，但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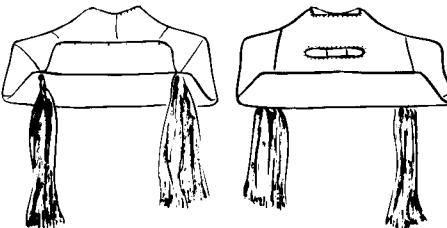
同一墓却都有发现，如无较好的保鲜、收藏方法是做不到的。其中一些产自南方的蔬果，更是楚人喜爱的食物，如楚卿屈到嗜芰（菱），生前便特别叮嘱家臣，在其死后以菱作为祭品。以上种种，都可见楚人生活富足的程度。

2) 楚人喜爱的饮品——酒

在楚人的饮食中，酒占有重要地位，上至公卿，下至黎民百姓，无不饮酒。楚王以熊为氏，然而在铜器刻铭或竹简文字中，却全都写作“禽”。 “禽”是人饮酒的形象，音与“熊”相通，后世多以“熊”代“禽”。楚人以“禽”为氏，或许与楚人先祖熊绎曾向周天子贡包茅、专司缩酒之事有密切关系（“缩酒”就是用叫做包茅的草滤酒）。当时的酒以粮食酿

造，一般是薄酒并含有酒糟，饮用前需经过滤。在祭祀活动中酒是沟通人与神的必不可少的物品，它用来祭神、祭祖、祭天地，祭山川、河流、祭宫室、道路，适用范围广泛，几乎无处不在。

3 · 生活面貌之二——服饰



插图·5 楚帽复原图

随着东周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动，原来的礼制受到极大的冲击。各国诸侯纷纷踰制，袭用天子之服，同时又标新立异，倡导民族服饰。沈从文指出，楚人的衣饰特征是“男女衣着多趋于瘦长，领缘较宽，绕裾旋转而下。衣多特别华美，红绿缤飞”，与中原服饰大不相同，故此，仅从服装的样式便可判定服用者的国属。

1) 南冠与结衣

楚人的先君穿着蓝缕之衣开辟荆山之地，服饰与常人并无太大差别。楚庄王时，随着版图开拓和国力增强，他的服装变得很有特色，戴着色彩鲜艳的冠，穿着长而宽的袍服。史载楚文王好服獬冠，楚人竞相仿效。由于獬冠样式新奇，与传统冠式差别颇大，所以被中原人称作“南冠”。

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衣袍，是楚国贵

族常见的服饰，有禅衣、绵袍、襦、紩衣、裙、裤等。它们用料上乘，纹饰华丽。在衣着款式方面，当时流行的直裾衣袍是上衣与下裳相连属，长可曳地，交领、右衽、直裾、双袖长大，领口、袖口和缘部都镶有华美的锦、绣或精工编织的绦。这种楚式直裾衣袍在结构上与中原贵族的常服有一定区别。

另一种流行的样子，是曲裾衣袍。也是交领、右衽，但外襟展开时如三角状，穿着时外襟绕至身后逐渐收杀。楚人称之为“结衣”。这种服饰在图像中屡有出现，其尺寸虽异于中原的深衣，但结构却与深衣极为相似，大抵是受深衣影响而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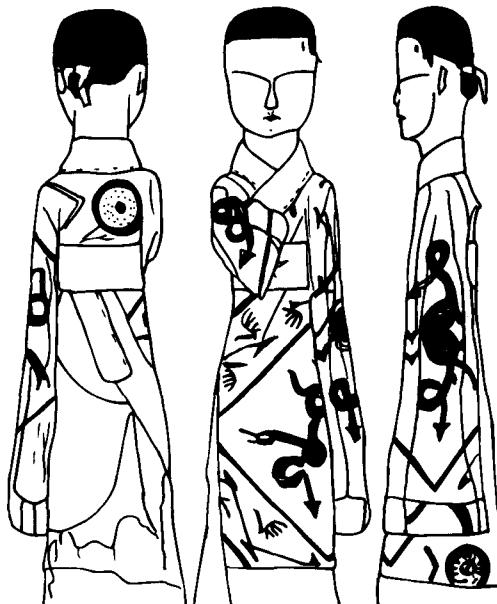
楚国平民的服装样式与贵族的常服相近，只是以麻布作面料。出于实用的需要，平民的上衣一般较短小，长仅及膝，与之相配的是紧身的裤。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漆瑟上描绘的“猎户”图像，可以看作是平民服装的代表。

2) 发式

楚人的发式有髽、弁、圆髻、垂髻、偏髻五种。髽是以带束发成一绺，垂在脑后，自然

松开。髽首是楚地土著民族三苗的传统发式。弁是把头发结成单辫垂在脑后。弁发亦称编发，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流行的发式。圆髻是

将头发在脑后挽成球髻，一般为贵族妇女采用，而部分北方贵族妇女亦用此发式。垂髻是将头发在颈后挽髻。偏髻是将头发在头上右侧挽髻，与西戎的发式相近。楚人发式多样，是融合了周围民族的特点，又保留了本民族传统的结果。由此亦反映



插图·6 江陵九店绣衣俑服饰图

出楚文化具有强烈的包容性。

4 · 生活面貌之三——葬俗

对中国人来说，生死乃人生大事，在葬仪中，常表现出其社会文化的特色。楚人崇信鬼神，深信死后有另一世界，观其葬俗就更能体会楚人的文化。

1) 墓地

东周时期的墓地分为公墓和邦墓两种。公墓是王室墓地，先王之墓居中，其余依辈份大小分居左右；邦墓是按族划分的墓地。楚国贵族一般不葬于邦墓，多另择高地上建墓，有高大的封丘，头向多朝东；而一般平民多葬于低

平之地，无封土，头向多朝南。

目前可以确认的楚王墓极少。位于安徽寿县境内的楚幽王墓（也称李三孤堆）地面上有高大的丘封，直径达300多米，大约是按照死者生前的地位来营造的，其布局是否符合文献的说法尚

难推测。楚人曾将谏王有功的鬻拳葬于公墓之前近门阙处，大约与公墓制度“有功者居前”的规定有关。

2) 葬具

身份较高的贵族以青铜礼器及成套乐器（钟、磬、瑟、鼓等）、车马器随葬。青铜礼器包括楚人特有的按单数成列的束腰平底鼎，其他鼎类多两两成双，有别于中原地区以单数组成的列鼎之制。身份较低的贵族则是铜礼器与仿铜陶礼器并用，前者多不成套，后者却配套齐全。此外，还有瑟和铜剑之类的兵器。庶人则仅随葬简陋的陶器。与以往不同的是，战国开始，日用漆木器在随葬品中所占的比例显著增大，往往被用来替代青铜礼器而不必拘泥

死者生前的身份与地位。这是对传统礼制的重大冲击。

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男性墓葬中，

不论身份高低，一般有剑、戈、矛、戟、弓矢等兵器。在邸旛君番墓（天星观1号墓）中竟有三十二件

铜剑，楚国尚武风气之盛可见一斑。

5 · 文化面貌之一——天文与历法

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为了确定季节与农时，特别重视天文和历法的观测。楚人在这方面有着独特见解，从他们遗留下来的线索，更可了解中原文化对楚地的影响。

1) 天象观测

楚人祖先祝融曾任火正，是观测天象之官，故楚人对天象历法的研究，由来已久。现存的楚帛书，详明地记载了楚人观察天象和确定季节的历史。楚人认为伏羲（庖牺）氏以四神相代之时推步定作一年，即为四时。千余年后，炎帝乃命祝融率四神降世，奠定三天、四极。共工推步十日（从甲至癸的十干），确定了



102 弋射衣箱上祈求天象平和的文字

白昼、黑夜和日出、定昏。这些古史传说，反映楚人很早就具备一定的天文历象知识，确认了年岁、四时和四方风对农业生产的作用。东周时期，楚人甘公（一说是齐鲁人）继承前人观象的基础，创立二十八宿星名。在公元前5世纪的曾侯乙墓中，发现漆衣箱盖上所绘二十八宿星名和青龙、白虎的图像可为明证。此外，楚人对其他星座和北斗星的观察也留下详尽的记录，明确指出，斗柄指向东、南、西、北是春、夏、秋、冬四季的星象。

2) 纪年方式

楚国的纪年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以楚王在位年为纪年。一种是以楚国前一年发生的大事作为次年的纪年，这屡见于楚简，如“齐客陈豫贺王之岁”、“大司马愬（卓）愬（滑）救郿之岁”等。春秋战国时期，除齐国偶有以事纪年外，各国均不使用。第三种是星岁纪年，如屈原在《楚辞》中就记有“摄提贞于孟陬兮”（意思是正当寅年的正月）为其生日。同时，楚国还有两套月名，楚帛书上的十二个月名与《尔雅》所记相符，也通行于中原各国。另一种月名及月序则较为特殊，通行于楚地。除八、九、十这三个月名外，其余都与周历不同，如一月为冬柰，二月为屈柰，三月为远柰，四月为翻柰，五月为夏柰，六月为盲月，十一月为鱼月，十二月为献马。关于楚历的第一个

月，据包山楚简的研究显示，是以冬柰之月为岁首，与殷历相同。

6 · 文化面貌之二——音乐

楚国巫风浓厚，楚地自古又是音乐之乡，音乐在巫术中扮演了沟通人与神鬼世界的角色，祭祠亦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楚辞·招魂》也写道：

“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敲编钟，按腰鼓，一面在唱歌。）

“竽瑟狂会，填鸣鼓些。……（大笙、大瑟和大鼓都热烈地演奏。）

“吴歈蔡讴，奏大吕些。……（唱吴歌、蔡曲，歌奏大吕调。）

“铿钟摇簴，楔梓瑟些。……（敲钟使钟柱也震动，鼓瑟令指头也疼痛。）

“耐饮尽欢，乐先故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缔结同心，相知对饮酒千盅。灵魂归来吧！回到你的故宫。）

这也是楚人用音乐作为媒介与鬼神沟通的明证。

此外，楚人也不像周人把音乐的功能集中在庙堂祭祀等严肃的礼乐层面，而是广泛应用于宫廷礼仪、民间社戏、个人婚丧、日常享乐诸方面，流行的乐曲也就能不拘一格，故中原的雅乐、淫靡的郑声、吴越的夷调、巴蜀的俚曲均能被楚人吸纳，丰富了楚的音乐内涵。有

关于楚音乐的资料，包括文献和出土乐器，屡见不鲜，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动人景象。由于音乐在楚人生活中须臾不离的重要性，使楚地的音乐文化异常发达。

《左传·成公九年》及《定公五年》记载有乐官（乐尹）钟仪、钟建二人。钟仪曾说“乐”是其先父之职。先秦时代，被视为国家要职的天文、史官、巫祝等皆以世袭形式出任，因而楚国有世袭专职乐官，就很能说明音乐在楚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楚国的乐器是丰富多彩的，先秦乐器八音的金（钟）、石（磬）、丝（琴瑟）、竹（篪）、箫）、匏（笙）、土（埙缶）、革（鼓）、木（柷）等在楚地出土文物中常见而基本齐全。

最重要的是，楚国乐律理论的发展和乐器制作技术的进步。西周早期的钟磬只能演奏曲式简单的巫乐或仪式乐曲，到西周晚期，楚国编钟已开始努力适应复杂乐曲的演奏。在晋侯墓地发现的八件西周晚期楚公逆（熊鄂）钟，钟腔内都有调音痕迹，这显然是楚国音乐进步的结果。春秋以来各地音乐相继传入楚地，蓬勃发展。淅川下寺楚墓的二十六件王孙诰编钟和六十四件曾侯乙编钟，更是这种复杂旋律音乐出现的必然产物。实测表明，前者的音律接近纯律；后者的铭文，证实中国音律按三分损益法生成十二律，已能提早到西周早期，并非由

希腊传入。其中二十八个律名，曾国有六个，宗周只有二个，而楚占十二个，反映出楚律更宜于复杂的旋律乐器。楚国的钟十二个半音齐备，均有旋宫转调能力和超出宗周正统五声的七声音阶。其他乐器制作技术方面，还出现了利用拼板制造共鸣箱的漆瑟和利用簧片振动发音的笙，后者到19世纪才在欧洲乐器簧风琴上出现。

凡此种种，皆说明楚人重视音乐的程度，故楚人在音乐理论和乐器制作上均有非凡成就，甚而在盛极一时的汉唐乐坛上，楚声还是不绝于耳。

7·手工业技术之一——丝织

楚人的编织工艺，绝不亚于中原各国，从编织技巧，材料运用，纹饰创造等方面更可见楚人自身的特色。

1) 织品

随着种桑、养蚕日益普遍，东周时期楚地的丝织业有很大发展。政府设有专门“织室”，负责管理生产各种丝绸。这时蚕丝的质量已甚高，反映在织物上则是丝线条份均匀，表面平整。这时已能织造十分细密轻薄的绢，有的经纬密度竟达每平方厘米 164×64 根。织物的组织结构渐趋复杂，除常见的平纹织物外，还出现斜向起花的平纹织物，如绮；绞经网孔状织物，如素罗；重经提花织物，如二色

锦和三色锦；用纬起花的绦和针织绦；只用经线编织的组等。

二色锦的纹样和色彩的组成，充分运用了分区配色法和阶梯连续法，色彩丰富。同时，采用了改变经线组织点构成局部纬浮线起花和“挂经”等方法，使颜色比较单调的二色锦增添新的色彩。三色锦的纹样构图大，著名的舞人动物纹横贯全幅，近50厘米，是先秦时期最大的经锦纹样。针织

绦带的出现，把中国针织技术起源的历史提前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纬线起花绦也是战国时

期丝织技术史上的新发现，它可能是采用织绣相结合的方法制成。

从出土织物分析可知，当时不仅使用手织机，还使用结构更复杂的罗织机和经线提花织机。提花技术的出现和提花织机的使用，是先秦时代丝织技术先进的表现。

2) 染料

楚地丝织品的丰富色彩，充分反映染料提

取和染色技术的发达。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成功使用朱砂染料，克服了朱砂不溶于水的特点，寻找适用的媒染剂使它牢固附在织物上，虽历经两千多年，仍然保持鲜艳夺目的色彩。

8·手工业技术之二——

采矿冶铸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的统治工具和财富象征，因而成为各国注视的重点，刺激了采矿和冶铸技术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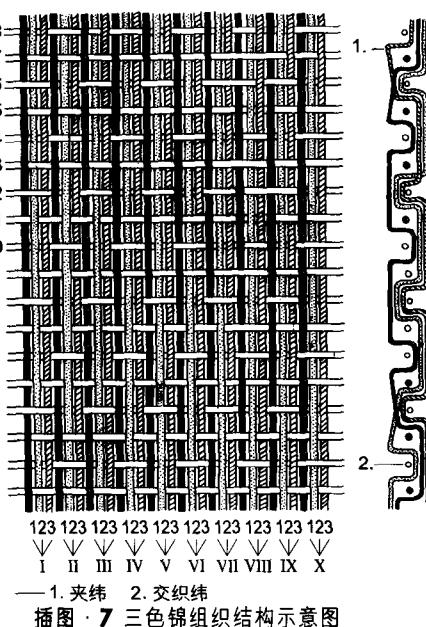
1) 楚国的铜矿资源与采矿技术

春秋战国之际，各国因礼制和军事的需要，纷纷开采矿藏，楚国也不例外。楚国的铜

矿资源丰富，为各国所羡。楚国的富强，除了农产水产丰富之外，金属资源的优势也不可忽视。湖北大冶铜绿山、湖南麻阳九曲湾都发现了先秦时的矿冶遗址。铜绿山遗址多是东周遗存，可以肯定它曾为楚人所利用。

当时采矿已采用竖井、平巷、盲井、斜井

等设施。距地表深达40—50米的竖井有专门支



插图·7 三色锦组织结构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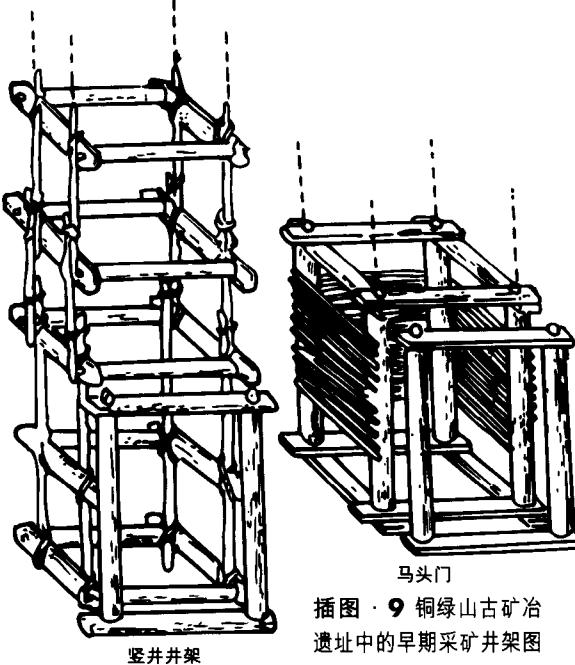
插图·8 凤鸟花卉纹浅绢面绣绵袍展开图

护木架、提升和排水设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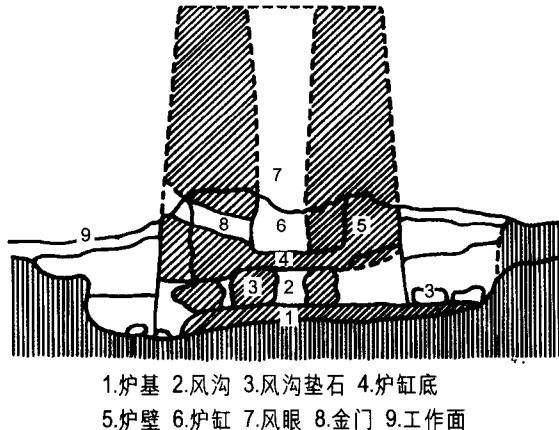
2) 冶铸技术

铜绿山是楚国最大的铜矿资源，当地现存的炼炉，充分反映楚国冶铸业的规模。铜绿山的十座炼铜竖炉均用泥土筑成，分炉基、炉缸和炉身三部分。炉缸一侧设有金门（排放铜或渣），炉身设有鼓风口。经模拟试验，当时竖炉是进行氧化矿的还原熔炼，能够熔炼块矿和粉矿，矿石品位不拘，可以连续加料、排渣，日产铜约300千克。从出土有水波纹状的炉渣中知道冶炼炉渣的流动性非常高，其含铜量仅为0.7%，与现代粗铜冶炼的标准完全一致。

曾侯乙墓能一次出土青铜器10吨，所需冶炼矿石至少在50吨以上，这正是依赖楚地丰富的矿源和先进的冶炼技术。



插图·9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中的早期采矿井架图



插图·10 铜绿山10号炼炉结构图

楚地出土的青铜器代表了周代中国冶铸技术的高峰，使用了当时所有的铸造方法和制作技术，如浑铸、分铸、熔模铸造（失蜡法）、铸镶、铸焊、鑄焊（低溶点金属焊）、铆接、嵌错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熔铸、铸镶、双音青铜编钟的铸造和复合铜剑的制作，后者在楚人的军事一节已有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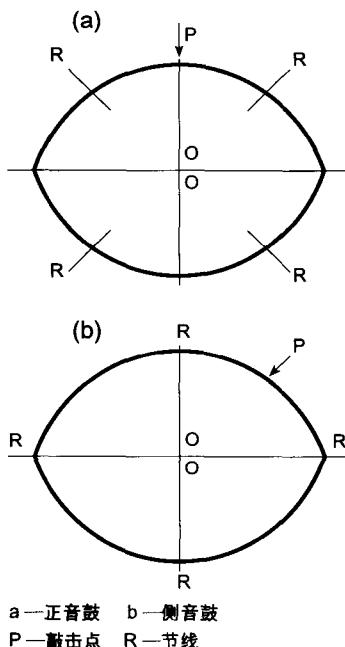
楚人的青铜礼器可以作为仪式中的法器，这使楚人青铜器在制作中更追求华丽的装饰效果，在无法更动传统器型的情况下，楚国工匠往往尽量在器物的耳、足和附饰上用各种动物衬饰。这种在礼仪用器上的耗费，既体现了楚人对神鬼世界的严肃态度，也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对淅川下寺楚令尹子庚（卒于公元前552年）墓和曾侯乙墓出土的铜禁和尊盘上透空的蟠螭纹附饰的研究发

现，如果用范铸成型，就需要在1立方厘米的空间用范十余块，这显然不可能，而且在器物身上又找到浇铸口和排气口的痕迹，这就可以肯定它们是采用熔模（失蜡）法铸造的。它把中国使用失蜡法的时间，从汉代提早到春秋中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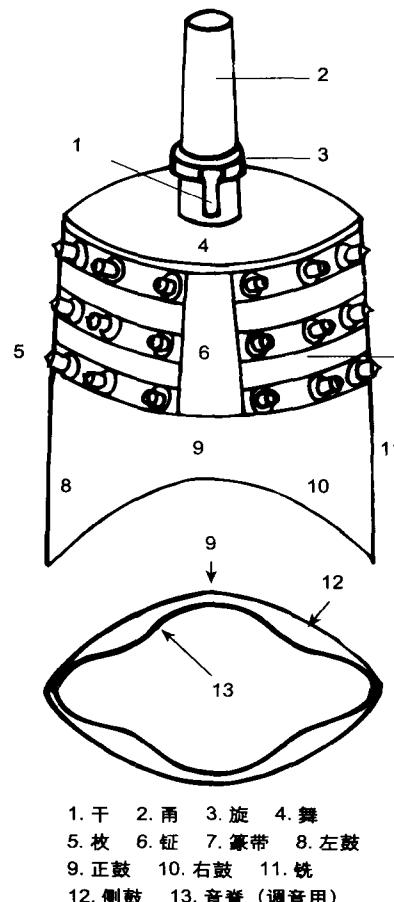
铸镶法就是把原来在器皿上镶嵌入红铜纹饰，改成置于铸范内与器体一次浇铸，避免嵌入红铜纹饰易脱落的现象。这种方法首次发现于曾侯乙墓的青铜器。由于两种金属成分不同，铸型中大量的红铜纹饰等于置放了“冷铁”（冷铜），使成型带来困难，所以必须采用预热铸型（ $200^{\circ}\text{C} \sim 300^{\circ}\text{C}$ ），使热胀冷缩的系数尽量一致的方法来避免骤然冷热，这技术解决了商代以来不易在一件器物上嵌错大量粗红铜纹饰和嵌错时易伤器物、易脱落的问题，是当时青铜冶铸技术进步的典型例子。

3) 编钟的铸造

先秦各国以楚地出土编钟



插图·11 一钟发出双音原理图



插图·12 青铜甬钟部位名称图

最多，在楚国发现有十四批百余件，曾国两批一百件。其中1957年信阳长台关掘出的曾侯乙编钟、1979年淅川出土的春秋晚期王孙浩钟和敬事天王钟，皆为楚国制品。而曾侯乙编钟及擂鼓墩2号墓编钟，则为曾国制品。这些编钟均为双音钟，即在钟的正面敲击部位（正鼓）和侧面敲击部位（侧鼓）各有一个乐音，二音多呈三度的谐合关系。这证明楚地已完全掌握制造双音钟的技术。此外，1993年在山西省天马曲村发现的晋侯墓中，也出土了八件西周晚期的楚公逆（熊鄂）钟，其时代比上述的编钟更早，虽然未肯定为双音钟，但其钟腔内亦有调音痕迹，显示早期楚国已有很高的铸钟技巧。

经过物理声学的检测，已知楚人在铸造和调制双音钟上采用了很先进的技术。首先是采用“合瓦”型钟体，在钟腔内形成多条凸起的音脊，当

钟的正鼓或侧鼓被敲击，一个振动模式的波节线就会叠加在另一振动模式的波腹上，两个振模可以互不干扰地分别激砺，产生相应的共振频率，形成一钟双音。其次是严格计算范型、按律学关系预调钟模。铸一件甬钟需用范一百三十六块，尺寸的偏差会影响到音调的准确，成型后的乐钟只需少许磨砺，显示楚人已非常熟谙以铸模调律的数学关系来制造合乎音律的钟模。第三是严格控制合金比例，楚人按《考工记》“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剂”的配方，把含锡量控制在 14% 左右，并有意加入少量的铅（平均含量为 1.88%）以增加声波传递的阻尼，加快钟声衰减，便利旋律演奏。此外，楚人也采用了预热铸型和延期脱范技术，使钟均匀退火，以利后期调音的音频稳定。

9·手工业技术之三——漆器

漆器是指表面髹漆的器物，胎骨有木、竹、革、藤、丝麻、陶、铜多种，以木为主。漆器最早见于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早期漆器是仪式用器的部分。商和西周的遗址已发现了漆绘雕花，镶绿松石、蚌泡、玉，贴金箔的漆器，制作讲究。而器型都是礼器的觚、罍、壶、簋、豆、杯、盘、俎，纹样有饕餮、夔、雷、蕉叶等。

当时楚国西部有很多漆树林，漆原料很丰富，加以南方湿润的环境易疏松陶质器皿、锈蚀铜器，故楚人除将漆器作为礼器外，还广泛用于生活（箱、奁、盒、席、笥、梳、篦、杯、盘、勺、扇、博具）、军事（甲、盾、兵、器杆、剑鞘、弓、矢箙、车）、乐器（琴、瑟、笙、箫、钟、鼓）和葬具（棺、椁、床、俑、镇墓兽）。此外，许多陶器、铜器也往往髹漆，如在铜镜的背面、铜尊的内壁。楚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漆器的范围远超过中原各国。可能由于保存条件的差别，楚国以外很少发现春秋战国漆器，使漆器成为楚文化的特色。战国时期楚漆器空前繁荣，品种繁多，工艺水平高，而且管理专业化。

1) 楚漆器的制作技术水平

春秋时期，漆器主要发现于北方，而且已有相当水准。同期南方楚地却很少发现漆器，近年才发现了属于楚的春秋中晚期的漆器；它们在构图、线条运用和制作工艺上还逊于北方。但到战国时期，楚国制漆工艺却飞跃发展，不仅数量多、用途广，工艺之发达更居世界之首。这可分漆胎材料和调漆技术两方面说明。

楚国漆器用来做胎的材料繁多，制作因材各异，目前已发现的胎质有木、夹纻、皮、竹、藤等。以木胎制作而论，楚人根据器物用途、大小，而分别用斫制、镟制、卷制和雕刻等手

法。如卷木胎多用于轻巧的奁、杯，雕刻则见于答床、座屏。又如夹纻胎制作已分成很多程序：在模具上涂漆灰、敷设织物再刮灰，然后脱模抛光髹漆彩绘等，与现代脱胎漆器程序相似。

楚人又发展出调制彩漆的技术。文物中已发现楚地至少使用原生漆、脱水精制漆和加油精制彩漆三种。原生漆用于调漆灰或作粘合剂；脱水精制漆呈黑褐色，一般用作器物底漆；与彩漆无关。加油精制彩漆则适用于器物上的彩绘。由出土文物，可知楚人已能调出红、黄、蓝、绿、金、银等彩漆。色彩绚丽的典型器物，有望山楚墓的木雕座屏和包山楚墓绘有聘报礼仪图案的漆奁。漆奁上的数十个人物、动物、植物、车马，分别用上黑、红、深红、橘红、黄、土黄、棕褐、青、金等彩漆。调制彩漆的技术发达，使楚器物的色调远较中原丰富多彩。

2) 原漆生产和漆器制作的专业化管理

从现有证据推测，楚国的原漆生产和漆器制作，可能有国家专业化管理，如庄子就曾当过漆园吏。这种对漆园的管理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云梦出土的秦简《秦律杂抄》中，有漆园被评为下等，负责人便要受罚的记载。

至于生产方面，估计亦有管理。秦汉时期的专业化漆器生产有确证，楚国中后期可能也

有类似情况。在各地楚墓中经常可见器型相同、制作规整、纹样一致而缺少艺术个性的漆器作品，撇开文化风格制约的因素，它们很可能就是漆器生产出现专业化的结果。

楚人的 铜礼器与漆礼器

楚国的礼制与中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楚人墓葬中，高级贵族遵循周礼，用奇数的正鼎随葬，显示楚贵族对中原身份等级的趋同，而中下层贵族则多用偶数的鼎随葬，也可能是对中原下级贵族随葬规定的变通。而在礼器的功能和组合上，楚人以镬鼎煮牲肉、升鼎放牲肉和饪食鼎放调味料，这种组合亦与周人完全相同。可说楚人礼制具有自身的特点，但仍属于周礼系统。应注意的是，楚人墓葬中，出现了大量漆礼器，这既是因为南方漆器资源丰富，也是因为漆器的质地更能保存食物的原味。

103 王子午升鼎

春秋/高67.4厘米 口径66厘米/河南淅川下寺2号墓

升鼎是用来盛放牲肉的，是代表身份和地位的正鼎。王子午是楚庄王（公元前613年至公元前591年）的儿子，他在康王（公元前559年至公元前545年）时担任令尹，公元前552年卒。王子午升鼎一套七件，代表大夫级的身份。此鼎造型华丽，装饰繁缛，有盖，是春秋时的典型楚器。



104



105

**104 铸客升鼎**

战国晚期/通高51厘米 口径48厘米/
李三孤堆楚幽王墓

铸客升鼎共九件，鼎上刻有“铸客”的铭文，说明此鼎是由外来工匠为楚王铸的。此鼎是楚国晚期的代表器物，装饰明显有异于早期风格，惟升鼎的形制基本不变，恪守祖制。

105 素面铜方豆

战国中期/口长19.8厘米 口宽17.1厘米 高29.5厘米/江陵藤店1号墓

《周礼》规定贵族按等级划分待遇，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可按年龄享用不同数量的肉。既然食肉是当时的身份象征，而豆是用以盛载肉酱、腌菜等调味品的专用器皿，因而豆也就成为身份的标志。此器造型古朴，与鼎、壺配合，成为一套礼器。



106 素面铜盖鼎

战国晚期/高28.3厘米 口径24厘米
重7.5千克/包山2号墓

这种高足牛钮盖鼎，是楚鼎的基本样式之一。而盖鼎也可以在代表身份的时候作为正鼎(升鼎)，如包山楚墓中，就以此器为正鼎。

107 楚屈子簠

春秋后期/口长27.7厘米 口宽20.9厘米
高20.3厘米/随县鲢鱼嘴

簠是周代祭祀中，盛稻粱等饭食的祭器。这种器物在周代甚为盛行，并常以偶数的形式出现，与奇数的鼎组合相配。此簠内有“楚屈子赤角”的铭文。文献记载，屈、景、昭是楚国的三大公族，他们有的以封地(如屈姓)，有的以封号(如昭姓)为姓氏，如包山楚墓墓主邵(昭)龙，就是楚昭王的后人。



108



109

**108 铜套盒**

战国晚期/高5.8厘米 径19.4厘米/包山2号墓

楚人的礼器组合中，食器的变化较大。在战国中后期，盒成为礼器组合的一部分。这套盒共有四件。

109 蟠螭纹提链铜壶

战国中期/高38.5厘米 口径6.4厘米/江陵马山1号墓

壶是礼器组合中的重要酒器。楚人经常变动礼器中的食器，但继承了商人重酒的传统，壶的配合始终不变。这件制作精细的铜壶，造型和纹样都是典型的越式风格，类似的器物在湖南长沙和江陵雨台山都有发现。而在楚地发现越式铜器或楚越器共存的墓葬，反映了楚、越两国的文化交流和融合。

110



111



110 错红铜云纹铜壶

战国晚期/高21厘米 腹径19厘米 重
2千克/包山2号墓

战国中期以后，铜器多为素面，但盛酒的铜壶上仍屡见精美的纹样，说明酒器在祭祀仪式中仍保有重要地位。这件铜壶用红铜嵌错云纹和几何纹样，外型美观。

111 蟠螭纹盥缶

112 蟠螭纹盥缶局部

战国晚期/高38.5厘米 口径26.8厘米/
江陵天星观1号墓

这是一件盛水器，与以鼎为代表的食器相配。先秦时期的饮宴中，主客均须多次洗手取食，盥缶就是用来储水备用的。



112



113

114



115

113 彩绘蟠螭纹漆簋

114 彩绘蟠螭纹漆簋局部

春秋/高21厘米/当阳赵巷4号墓

这是楚国最早的漆礼器，器型与中原的铜器相同，纹样粗犷豪放。礼器一般多为青铜器，漆礼器较为少见。其实青铜礼器主要是上层贵族的用品，至于下层贵族及平民则较多用漆器或陶器作为礼器。此因漆器易于制造和保存，又富装饰性，因而渐受欢迎。

115 彩绘云纹漆瓒

春秋/长24.5厘米 高8厘米 径11.2厘米/当阳赵巷2号墓

瓒是祭祀时盛鬯酒的勺，耳杯很可能是由此演变而来。



116

116 彩绘动物纹漆俎

春秋/长24.5厘米 宽19厘米/当阳
赵巷4号墓

俎是切肉和盛肉的案子。在祭祀仪式中，与鼎和豆一起使用，作为等级区别的标志。在一件俎上，可以放置两件豆或配一件鼎。《周礼》记载，天子膳食所用的十二件鼎都要与俎配合使用。



117

117 彩绘几何纹漆豆

春秋/高14.5厘米 径13.4厘米/当阳
赵巷4号墓



118



119

118 彩绘几何纹漆方豆顶部**119 彩绘几何纹漆方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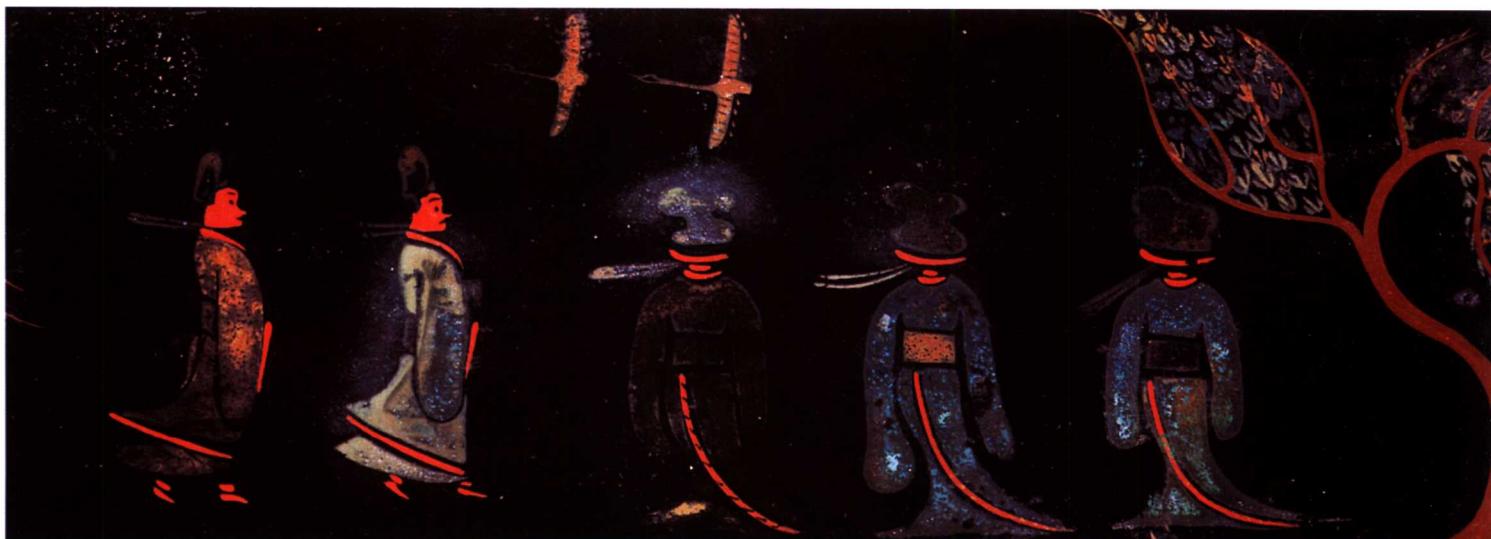
战国 / 宽18厘米 通高39.4厘米 口长21厘米 / 老河口安岗2号墓

方形豆在铜器和漆器中都不多见。这件漆方豆上的几何纹样，是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上的主流纹样之一，它以勾连、规整的线条构成二方或四方连续，依稀可辨龙凤的变体，其风格可能受到蟠螭纹的影响。



120

123



121



122

**120 彩绘浮雕龙纹盖豆****121 彩绘浮雕龙纹盖豆局部****——盖面****122 彩绘浮雕龙纹盖豆局部****——兽耳**

战国早期/高24.3厘米 径20.8厘米/
曾侯乙墓

商代和西周的漆木器多以仿铜风格出现，这盖豆便是一典型例子。此器的盖面浮雕龙纹，两个方形大耳由浮雕的龙组成兽面形象，器身彩绘云纹和变异凤纹等，体现出中原文化的影响。

123 彩绘人物车马漆奁局部

战国晚期/高10.4厘米 直径28厘米/
包山2号墓

周代的朝聘制度，是明辨宗主关系、贵贱等级的重要制度，也是贸易和通婚的重要手段。诸侯见天子称“觐礼”，叫做春朝、夏宗、秋觐、冬遇。诸侯间往来为“聘礼”，分小聘、大聘和朝聘。朝聘之礼，以郊劳（郊外迎宾）最为重要，它对宾主人数、车马服饰均有规定。这幅漆画所绘正是聘礼的郊劳场面，使者乘大夫的骖车（三匹马拉的车）、宾主戴皮帽演礼，所绘的雁、猪等暗示聘礼中的财物（“雁币”），均符合聘礼的规定。



显示身份 的乐器

在周代礼乐制度中，礼是模仿自然的外在秩序，乐是模仿自然的内在和谐。礼是以权力支撑的，而乐则以精神来维系。乐是指严肃的朝会宴飨音乐（雅乐）和宗庙祭祀音乐（颂乐），是具有社会功能的，不是单纯用以欣赏的音乐（俗乐），古人对二者是有严格区分的，如孔子要求摈弃纯粹作耳目之娱的郑声，老子更认为“五音令人耳聋”。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崇尚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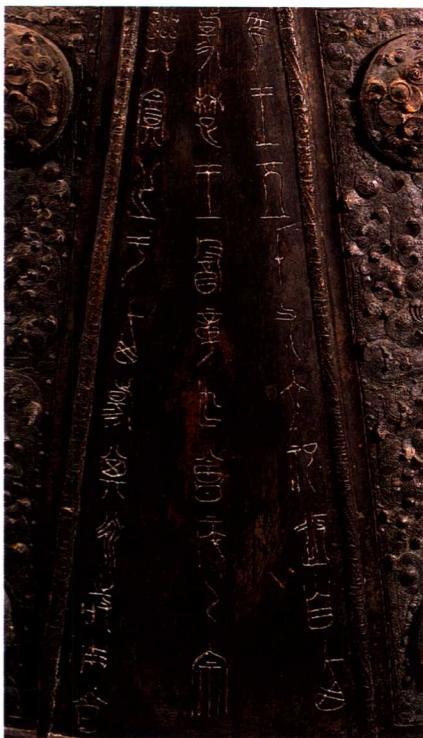
法和祭祀，故雅乐在中原及楚国都备受推崇。当时的乐制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乐曲的选用和乐器的摆放形式都必须合符使用者的身份；二是乐器是代表社会等级的，并兼具法器和教化功能；三是在众多乐器中，以敲击乐器占主导地位。

124



124 曾侯乙墓青铜编钟出土现场
青铜编钟出土于曾侯乙墓的中室，编钟与编磬沿椁室三面安放，呈“轩悬”之制。

125



126



127



128



**125 楚惠王熊章镈钟局部
——铭文**

**126 楚惠王熊章镈钟局部
——龙形钮**

**127 楚惠王熊章镈钟局部
——钟体纹饰细部**

128 楚惠王熊章镈钟

战国早期/高92.5厘米 重134.8千克/
曾侯乙墓

此镈钟出于曾侯乙编钟下层的
正中，是楚惠王赠给曾侯乙的

一套镈钟的其中一件，原因可能是报答其父楚昭王（公元前515年至公元前490年）在柏举之战（公元前506年）时到曾国避难一事。编钟是礼乐制度中的重要器物，为了在曾侯乙编钟的正中悬挂楚王钟，曾国特别挤掉最大的一件甬钟没有下葬，可见曾国对楚王赠品的重视。在宋代，随州附近的安陆也出土了两件与这件镈钟铭文完全相同的钟。

129



130



131



132



129-132 彩绘石编磬

战国/长61-22.5厘米 厚5-3.8厘米/江
陵纪南城

磬是一种能发音的打制石器，也是最早的敲击乐器。早在商以前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就发现有磬。商周时期，磬和钟配合演奏，被称为“金石之声”。此外，磬也是一种身份象征，

它可分别与编钟以四面（宫悬）、三面（轩悬）、二面（判悬）及一面（特悬）的方式悬挂，代表王、侯、大夫和士的身份。在纪南城共出土有二十五具编磬，其体积较一般编磬为大，绘有红、黄、蓝、绿等色的风纹，可能是王宫乐器。这些编磬虽埋葬地下二千多年，仍能奏出三个八度以上的乐音，反映了楚国在音乐上的发达水平。

楚人的 远射武器

弓箭是远射程的武器，也是对付阵战和车战的有效工具，而楚国尤以善射著称。楚国的箭簇有铜、铁两种，形式多样，以对付不同的敌人。到战国时代，楚人发明了弩，使楚国成为当时中国南部地区首先应用弩来作战的国家。弩和弓的作用基本相同，但威力更大，射程更远，且能密集发射，更适合丛林地带的野战和对付骑兵突击。

133



134



133 箭箙

134 箭箙底部

战国中期 / 长9.5厘米 宽4.5厘米 高19厘米 / 江陵纪城1号墓

箭箙是盛箭的盒，其内侧有一长块皮质或木质的材料，用来栓绳，固定箭杆。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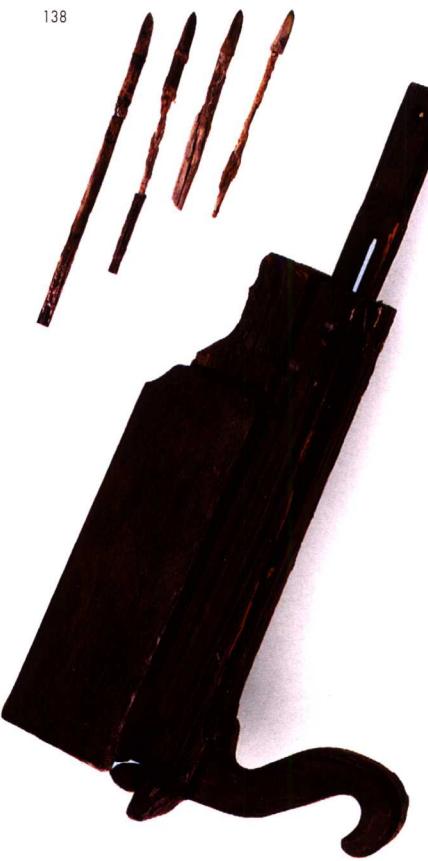
136



137



138

**138 连发弩****135-136 箭簇**

战国中期/江陵望山楚墓

137 彩漆弩

战国晚期/通长32.7厘米/老河口市仙人渡安岗2号墓

弩是丛林野战的有效武器，其作战准备的时间短，能形成密集火力。虽然楚人的墓葬经常发现弩机，但完整的彩绘弩尚不多见。

战国晚期/长27.8厘米 高17.2厘米/江陵秦家嘴47号墓

此器由弩机、短木弓及短箭合成。弩机上有箭匣，可容箭十九枚，其前端有两孔，可一次射出两枚短箭。短箭的发射和箭匣内短箭落入弩机的程序，均依靠手拉活动木臂来带动完成。这是一种新式的近射弩，形制及结构都异于远射弩，据初步实验，估计此弩的射程不超过20米。

楚人的 防御装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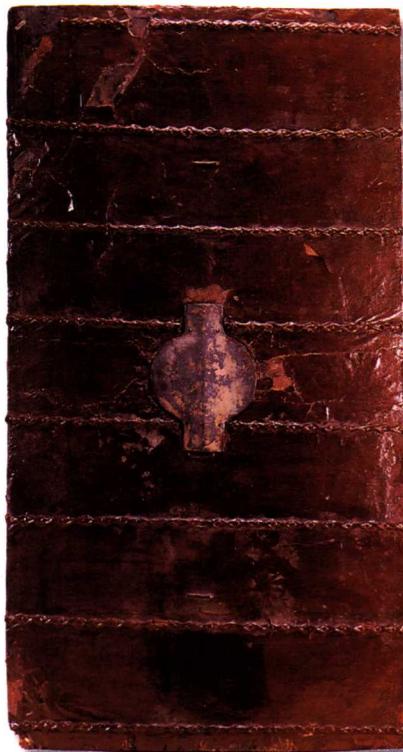
楚国处于四战之地，不进则退，不兴则亡。危机和希望并存的环境，使楚人重视军事，最终由一僻在荆山的小国，跃升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几乎占有半个中国的强国。它藐视周王朝，也正是自恃武装精锐、战术优良。从系统的材料看，楚国“士”这阶层所用戈和剑等步战武器，远多于矛和戟等车战武器，弓箭在战国时期的使用率显著增加，防御性的盾和甲，却不受重视。这反映楚人精于野战和步战，以进攻见长的特点。



139 龙凤云纹皮盾

战国晚期/高46.8厘米/包山2号墓
盾的正、反面用红、棕红、黄、
金绘四龙四凤卷云纹图案。

141



142



140



140 髴漆皮甲胄

战国早期/甲长84厘米 袖长40厘米 胸围119厘米 裙围156厘米/曾侯乙墓

现今发现，楚人的盔甲有木甲和皮甲两种，它们比青铜甲轻便，制作亦较容易，在皮甲上髹漆更有防潮作用。此物全套分胄、身、裙和袖甲四部分，是用四十六副青铜模具压成二百零一片皮甲，再用丝带编成。这是先秦最早和最完整的复原甲胄。

141 髴漆木盾正面

142 髴漆木盾反面

战国晚期/长91.8厘米 宽49.6厘米/包山2号墓

楚国战车的配备

春秋初期，中原以车战为主，而战车也是衡量中原各国军力的标志。楚人为求争霸中原，也发展了车兵，但楚国战车的取向与中原各国不同，中原强调战车的攻击力，楚国则注重战车的速度和灵活性。在宜城出土的春秋楚国车马坑，有七辆战车和十八匹马，多数是以两马驭车。及至战国时代，以两马驾驭的楚国战车更为普遍。

143



144



143-144 矛状车轔

战国早期/通高41.4厘米/曾侯乙墓
轔是安装在战车车轴两端的，用来保护轮毂的，也具有撞击穿削的功能。这种物品最早见于陕西户县的春秋墓，矛刃较短。曾侯乙墓车轔的矛刃长达30多厘米，证明曾国青铜冶铸技术的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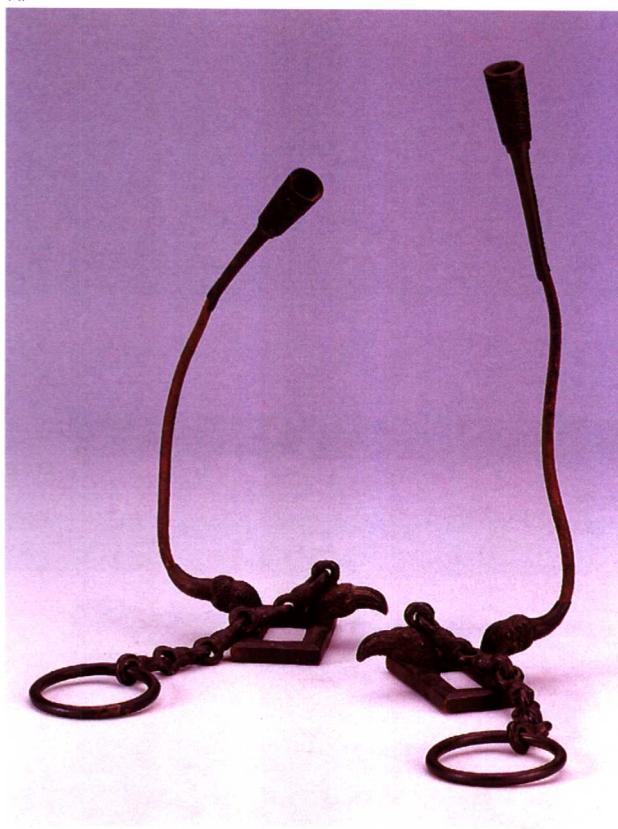
145



146



147



148

**145 错银车轂**

战国中期/高8厘米 头径6.2厘米/
江陵望山1号墓

在楚贵族的葬仪中，以一对车轂来代表一辆战车随葬，而这些随葬的车轂往往饰有精美的龙、凤和云纹。

146 错金凤鸟纹车轂

战国晚期/高8.9厘米 口径7.1厘米/
江陵天星观1号墓

金错工艺是东周时期发展起来的，多被上层贵族用作装饰铜器，常见的纹样有呈几何形状的云纹和小动物纹。

147 凤首车马具**148 凤首车马具局部**

战国晚期/荆门包山2号墓

配合车战的 长兵器

春秋初期，楚人发展车兵，配合长距离武器矛戟作战。但由春秋晚期开始，战术由车战转为步、骑战为主，南方各国的兵器亦出现由长到短的变化。曾侯乙墓出土的长杆兵器，最长的达4.36米，其中长3米以上的戟有三十柄，只有两柄是属于曾侯乙的，其余都是他先君的遗物。但另一方面，长1.3米左右的戈有六十六柄，刻有曾侯乙铭文，即属于曾侯乙的，占百分之七十九。由此可见，武器的长度有逐渐变短的倾向，这与楚国兵器变化的趋势大抵一致。

149 江陵九店楚国车马坑发掘
清理现场

春秋战国实行车战，楚国鼎盛时，号称千乘之国，带甲百万。图中是由两匹马拉的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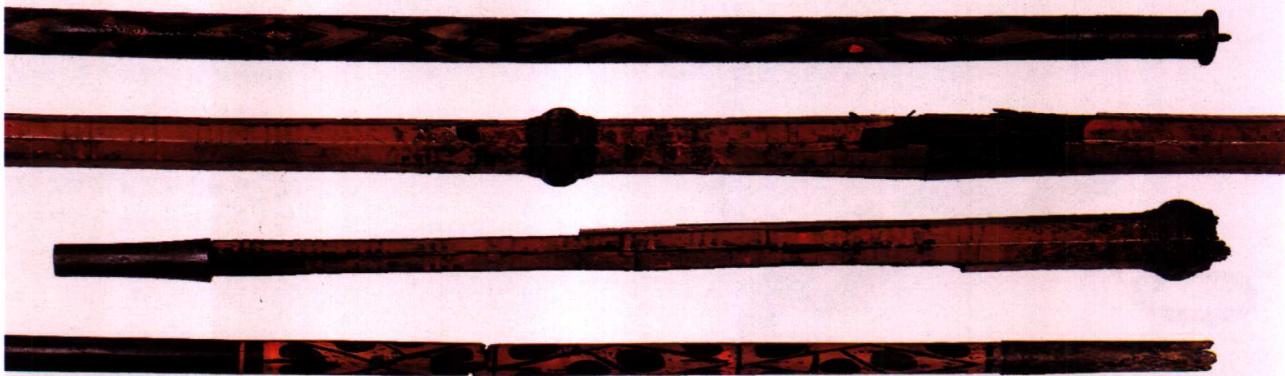
150 积竹木秘殳

战国中期/粗：通长39.2厘米
细：残长280厘米/包山2号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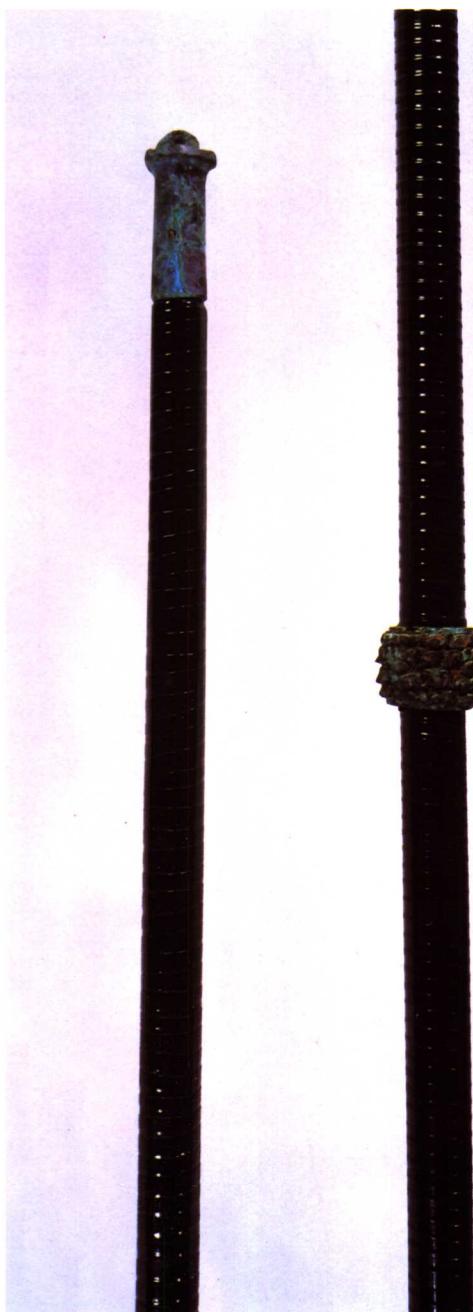
楚人的长杆兵器的杆以硬木为芯，外贴竹片，用丝或藤缠绕后再髹漆，称“秘”，这种做法可达致刚柔相济的效果。图中的长杆器物是一种仪仗用的兵器“殳”，中部的铜圈起着加固作用，较细者稍短则无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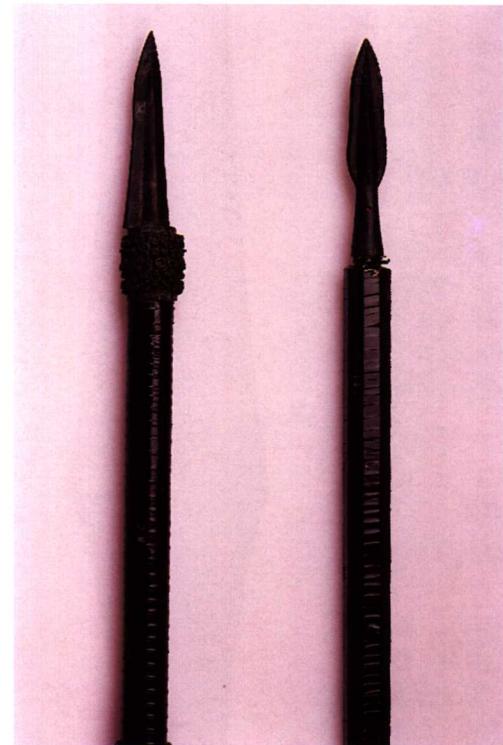
150



151



152



153

151 戟上端、戟中段
战国早期/曾侯乙墓

152 双戈戟头部
战国早期/曾侯乙墓

153 长杆矛(右)和长杆戟(左)头部
战国早期/曾侯乙墓

154



154 楚王孙鱼戟

战国前期/援长16.2厘米 胡长10.5厘米/江陵谭家湾

这是楚国司马子鱼（？—公元前524年）的兵器。公元前524年，子鱼率水师与吴国交战，死于军中。这是一钩击兵器，长援平直，中部起脊，内两面均有错金蟠螭纹。

155



155 黑斑点纹铜矛

战国中期/长25厘米/江陵雨台山264号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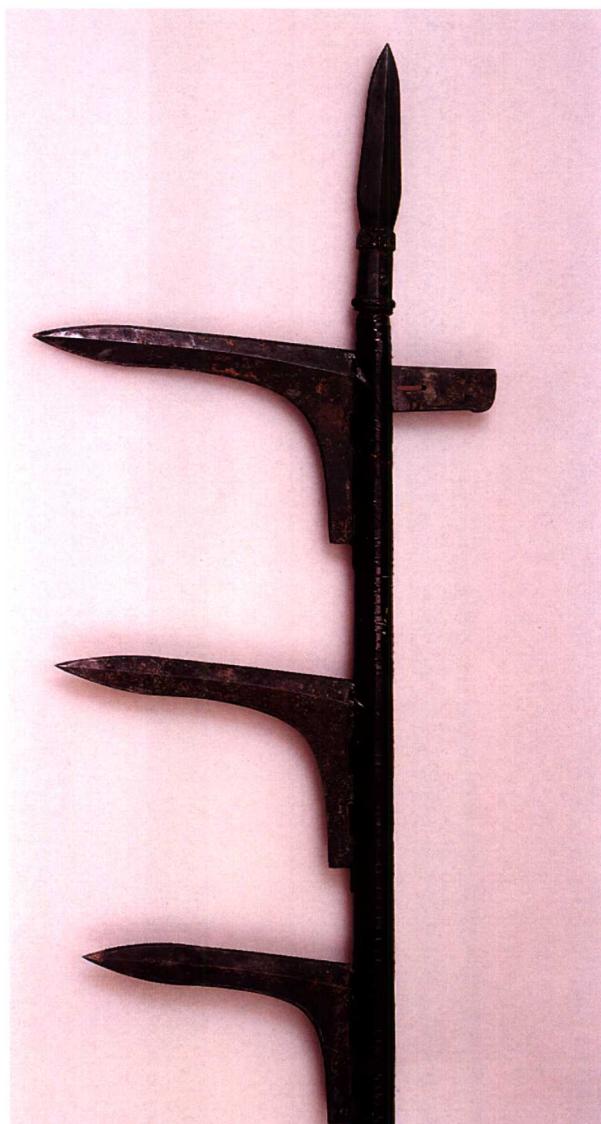
矛上饰满的黑色斑点，是采用表面硫化技术制成的，乃纯粹的装饰性花纹，只有精美的东西才会有这种装饰，在楚及吴越的出土物皆曾发现这种花纹。

156 长杆三戈戟头部

战国早期/长3.4米/曾侯乙墓

长杆戟是配合车战的最佳武器，它的杆用竹、木、藤和丝制作，是合成的，称“柂”，刚柔相济，不易折断。

156





157



158

157 周旟铜戈

战国中期/长20厘米/江陵雨台山100号墓

此戈的援部有“周旟之戈”的铭文。周旟是物主的名字。

158 云纹铜戈

战国中期/长21.5厘米/江陵九店452号墓

楚地出土的 短兵器

战国时代，以步骑战为主，剑成为主要武器，青铜剑因而大量生产。当时，南方各国以吴越的铸剑技术最高，其中越王勾践剑更是名闻后世。而楚国也借鉴了吴越的铸造技术，出土的青铜剑不乏精品，至于铁剑和钢剑的使用量，更无他国能出其右。武器制作技术进步，提高了楚国军队的战斗力，凭借军功上进和受封的人随之增加，促成了“士”及“封君”阶层的扩大。



159 剑盒附剑鞘

战国中期 / 长64厘米 宽6.4厘米 盒高10.8厘米 / 江陵雨台山6号墓

剑盒是用以盛剑的，剑不佩戴时便放在剑盒中。



160 楚式剑

战国中期 / 长48.2-63.8厘米 / 江陵望山楚墓

铜剑是武士佩戴的武器。这种形制的剑通行于中原、楚国和吴越等地，与巴人柳叶形剑的剑刃不同。

161



161 越王勾践剑局部

此剑正面有“越王鸠浅(勾践)自作用剑”的铭文。剑格正面嵌蓝色琉璃，背面嵌绿松石。剑身饰菱形暗纹，这就是史书记载吴越宝剑特有的“龟纹”。检测发现，此剑的剑脊、剑刃都是采用分铸复合的技术，这可能就是吴越宝剑锋利冠绝天下主要原因。

162 越王勾践剑

战国早期/长55.7厘米 宽5厘米/江陵望山1号墓

越王勾践(公元前497年至公元前465年)是春秋时代最后一位霸主，与楚国关系密切，楚惠王的母亲便是勾践的女儿，勾践剑可能因而带到楚国。但另一方面，越国在楚威王、怀王时期被楚国所灭，所以此剑亦可能是作为战利品而被随葬的。



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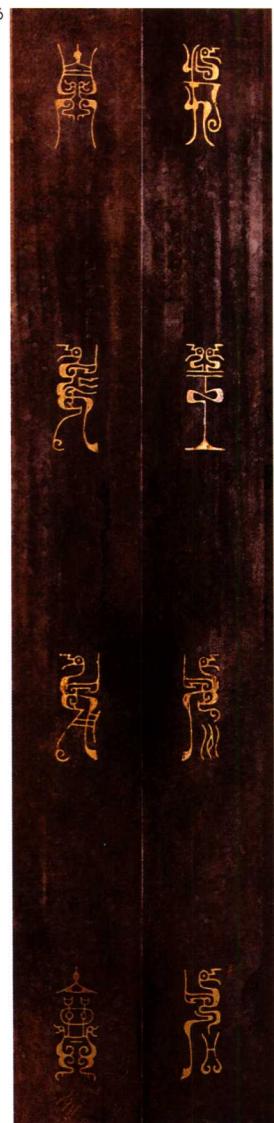
162



164



165



166

163 吴王夫差矛局部**164 吴王夫差矛**

战国早期 / 长29.5厘米 / 江陵马山砖瓦厂5号墓

吴王夫差是吴国最后一位国君。春秋末年，吴越楚争霸互有胜负。公元前506年吴王曾攻下楚的郢都，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更因战败被吴国所俘。其后，勾践复国，并出兵灭吴，杀掉夫差。吴越兵器同出于楚墓，正是三国纷争的见证。

165 越王州勾剑**166 越王州勾剑局部**

战国早期 / 长56.2厘米 / 江陵藤店1号墓

此剑的剑身近格有两行错金铭文，每行四字写着“戊(越)王州句(勾)自乍(作)用金(剑)”。州勾又名朱句，是越王勾践之后的第四位越王。此剑出自楚墓，可能是楚灭越后流入楚地的。

楚国的 酒器

先秦人好酒，楚人亦不例外。但周代时没有蒸馏法，只用发酵的方法造酒，当时的酒按清浊程度分为五级，经过滤的清酒是最好的，称为“醑”，专供祭祀使用；一般则饮汁滓相混的酒，称为“醴”。另一方面，由于用南方大米酿的酒不易过滤，时间一长就会发酵变酸，楚人对此用冰冻的方法解决，如夏季便用窖藏的冰来冰酒。1979年纪南城内的井底便发现一个藏冰陶瓮。屈原在《招魂》中写道“挫糟冻饮，酌清凉些”，就是楚人在祭祀时制作清酒，用冰冻法使酒醇厚成为“酎”的写照。

- 167 联禁对壶
- 168 联禁对壶局部——禁
- 169 联禁对壶局部——禁足
- 170 联禁对壶局部——壶耳
- 171 联禁对壶局部——龙形耳细部

战国早期/壶高99厘米 盖径53厘米
铜禁117.5×53.4厘米 高13.2厘米/曾侯乙墓

两壶的形制相同，有盖。盖外沿套以镂孔的盖罩，器身饰有蟠螭纹和填有蟠螭的蕉叶纹。禁面有两个空心圆圈，用以承放对壶的圈足。禁下有四兽用口和前肢衔托方禁，后足用力蹬地。此器形体硕大，铸制精工。下葬时，对壶与冰鉴同放一处，当是用以盛装祭祀用酒。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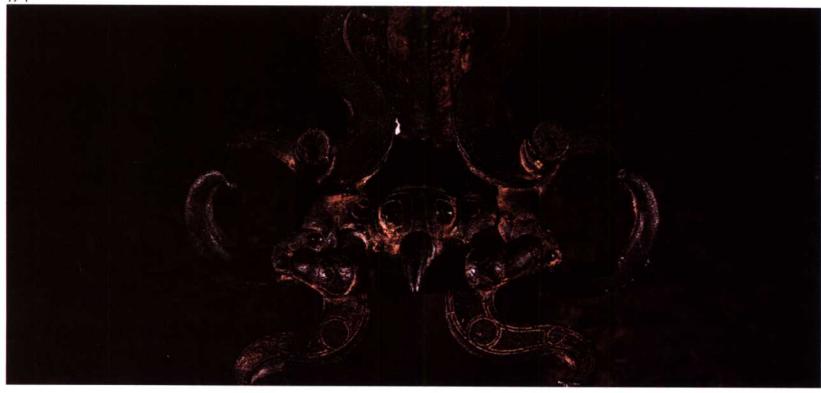
169



170



171





172 镶嵌云纹铜壶

战国中期/高23.3厘米 口径6.4厘米/
江陵藤店1号墓

镶嵌是东周时期青铜器的重要
特色，仅见于少数器物。此壶
纹饰以单线和小块面结合，在
小块面中镶嵌红铜。



173



174

173 蟠螭纹铜尊缶
174 蟠螭纹铜尊缶局部

战国早期/高126厘米 腹径100厘米
重327.5千克/曾侯乙墓

尊缶是楚人常用的酒器。这个尊缶出土时是一对，高和腹径都超过1米，容积约0.8立方米，是中国古代最大的酒器。





**175 蟠螭纹铜鉴缶
176 蟠螭纹铜鉴缶局部**

战国早期 / 高63.2厘米 口径62.8×
63.4厘米 重168.8千克 / 曾侯乙墓

鉴缶俗称冰鉴，可能是冰酒用器，有内外两层，内层方缶装酒，置于方鉴之中。鉴与缶各有一盖，可单独揭开，鉴和缶间的空隙则用来盛冰。冰鉴设计巧妙，鉴底有三个弯钩，其中一钩装有活动倒栓，当方缶放入鉴底，三个弯钩插入方缶底部的榫眼时，倒栓便会自动落下，固定方缶。此器出土时旁边有一件滤酒器。



177



178



179



180

178 彩绘云纹漆方耳杯

战国中期/左长18厘米 高6.7厘米
右长18.8厘米 高7.1厘米/望山1号墓

漆耳杯是楚墓中常见的酒具，得名于杯口沿的附耳。有人认为它就是《楚辞》中的“羽觞”，意思是杯耳似鸟的羽翼或杯轻如羽。用漆耳杯饮酒，可避免铜酒器中有害的离子析入酒中，带来害处，保证酒味清醇。

179 彩绘云纹漆圆耳杯

战国中期/左长14.7厘米 高4.2厘米
右长11.5厘米 高4.5厘米/沙冢1号墓

180 滤酒器

战国早期/通高88.5厘米/曾侯乙墓
此器出土时位于冰鉴旁边。上面是漏斗，斗有十二孔，可能是滤酒用的。

177 彩漆带流杯

战国晚期/左高10厘米 径19.3厘米 右高10.5厘米 径19.5厘米/包山2号墓
左面一件是彩绘凤鸟纹漆杯，身体通饰一只凤纹；右面一件是彩绘龙纹漆杯，饰有蟠龙纹样。



181 鸟首形铜杯

战国晚期/高7.5厘米 径14.3厘米/
包山2号墓

182-183 彩绘云纹漆曲耳杯

战国中期/长17.5厘米 高4.4厘米/
纪城1号墓

楚人的 其他生活用品

楚人居住的南方，物产丰富，肉食、鱼类及水果不虞匮乏，熊蹯、鼋等山珍海错也绝不为少。食物种类众多，烹饪方法亦多彩多样，因而除了盛酒及滤酒器皿外，亦遗下很多其他日常生活器具。

184



184 酒具盒

战国中期 / 长42厘米 宽19.5厘米
高14.3厘米 / 纪城1号墓

185



186



187



185 酒具盒

186 酒具盒(揭开)

187 酒具盒局部——兽首浮雕

战国晚期/长71.5厘米 宽25.6厘米 高19.6厘米/包山2号墓

楚人出行时常携带酒具盒和食具箱，称为“行器”。酒具盒内装壶、耳杯、小方盒、竹筭；食具箱内则装铜鼎、铜盒等器物。此器盖、身均用整木雕成，盖首两端浮雕成龙首，器身两侧均雕有云纹龙足，器内用隔板分为四段六格。出土时，盒外套有皮囊，内装耳杯两套，每套四件，方壶一对和食盒一件。这类酒具盒虽然是楚国漆器的典型器物，但目前仅在楚墓中发现了三件。



188 彩绘云纹漆耳杯豆

战国早期/通高21.5厘米/信阳长台
关2号墓

189 彩绘雷纹漆俎

战国早期/长22.6厘米 宽9.5厘米
高12.5厘米/信阳长台关2号墓

190 彩绘云纹漆案

战国中期/长沙楚墓

楚人席地而坐时，便用漆案置
放饮食器具。此器长度几达
1米，体积颇大。



192



193

191 金盏、金勺**192 金盏顶部****193 金勺**

战国早期/ 盂高11厘米 径15.1厘米
重2156克 勺长13厘米 重56.45克/
曾侯乙墓

早在商代，中国已发现了黄金制品。春秋战国时代，黄金多用作镶嵌，以表珍贵。曾侯乙墓一次出土了金器五件、金箔九百余件。而雨台山6号墓也发现了饰有金片的丝囊，说明金器在南方也颇为流行。这件金盏仿铜盏制作，饰有云纹、雷纹和蟠螭纹；金勺则饰有镂孔变形龙纹。

**194 炭盆、铜箕**

战国中期/盆高9厘米 径31厘米 箕

高10厘米 宽23.3厘米/望山1号墓

炭盆是楚人用来盛装木炭的取暖用器，箕则用来撮炭或渣。



195



196

195 凤纹铜熏杯

战国中期/高10.4厘米 口径8.9厘米
底径7厘米/江陵望山1号墓

196 龙纹铜熏杯

战国中期/通高12.7厘米 口径8.5厘米
米/江陵雨台山264号墓

器壁镂空，由十组直行龙纹构成，每组有卷曲的小龙六条，彼此相连。杯底是十字形孔。这类器物在楚墓中屡有发现，杯内残留植物，可能是用于熏香。



197 植物香料——櫻桃

198 植物香料——生姜

199 植物香料——云豆

200 植物香料——板栗

201 植物香料——花椒

202 植物香料——枣核

203 植物香料——桃核

204 植物香料——橙皮

楚人烹饪方法多样，并已懂得采用香料，图中所见的香料是在江陵望山1号墓发现的，分别有樱桃、生姜、云豆、板栗、花椒、枣核、桃核及橙皮。

201



202



203



204



楚人的服饰

先秦时代，中原民族上衣的前襟是向右的，称“右衽”，而周遭民族的前襟则是向左的，称“左衽”。这种不同的风格，是二者区别的标志。如孔子说，没有齐国的管仲抵御他族，他们便都要被迫披着头发，穿上“左衽”的衣服。在楚墓发现的着衣俑，其所穿衣服都是右衽的，证明楚人与南方断发、纹身、跣足的夷、越等少数民族不同。但因为长期与南方各族交往的关系，

楚人的服饰与中原也有一定区别。

205 绣衣俑背面

206 绣衣俑

战国晚期/高50.2厘米/江陵九店410号墓

此俑头上的麻质假发后梳，系以红丝带，是楚国妇女的典型发式。此俑身穿交领右衽的长袍、曲裾、腰系皮带，衣服上绣一凤三龙相蟠的纹样，这种纹样在当时楚国是十分流行的。

207 彩绘绢衣俑

战国中期/通高60.4厘米/江陵九店410号墓

俑身两侧各有一孔，似装手臂。头上假发后梳，盘髻，是楚国妇女的日常发式。上衣已坏，但仍可看出是交领右衽的。下身穿长裙，从胸部斜缠直到足部。



206



210



211



208



209

**208 着衣木俑****209 着衣木俑侧面**

东周/高48厘米/江陵刘家湾74号墓
木俑胸前的红带，是用来束衣的；带下垂挂两束饰物，可惜模糊不清。

210 彩绘佩玉饰木俑

战国中期/高66.7厘米/江陵纪城1号墓

木俑身穿黑白相间方裙，彩绘两条玉璧、玉璜编联的组佩。

211 人擎铜灯

战国晚期/包山2号墓

人擎铜灯的铜人梳着右髻，服饰是交领、右衽、直裾，是当时中原和楚人常见的服饰。

楚人的饰物

——带钩

春秋战国时代，贵族常在衣上衬以带钩，除了装饰之外，主要是用来连系革带的两端，使革带能牢固地系住衣袍。此外，带钩又可佩挂刀、剑及镜等物件，可说是装饰与实用兼备。



212

212 错金银龙凤纹铁带钩局部

213 错金银龙凤纹铁带钩

战国中期/弧长46.2厘米 宽6.5厘米/
江陵望山1号墓

带钩是束腰皮带的挂钩，过去认为由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1994年江苏武进寺墩出土有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200年）的玉带钩，可见带

钩已有很长的历史。此钩作龙首形，用金嵌出眼耳鼻嘴。正面用金银嵌出一龙四鸟和一龙一凤三鸟两组图案，以及卷云纹、菱形纹等。这种极尽华丽的铁带钩，有着装饰和炫耀身份的功能。



213

214



215



214 鎏金铜带钩

215 鎏金铜带钩局部

战国中期 / 长14.5厘米 宽2.6厘米 / 江陵望山3号墓

此钩正面铸有蟠绕的龙形，通体鎏金。

楚人的饰物

——佩玉

玉是古人对美石的统称。古人喜欢以玉作为衣饰的陪衬，不同数量、形式和含义的玉器编联成组佩，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等级。楚人基本上遵照中原“君子佩玉”的风俗，按贵族等级佩玉，大夫以上有组佩，士则佩一至两件，而平民是不佩玉的，雨台山、九店一千多座墓葬，仅有四十七座葬有玉器，就是一有力证据。至于佩玉的种类，战国以前的玉璧、玉璜、玉佩等，因器型不同而功能各异。到战国早期，偶然出现玉佩和玉璧合体的现象。在战国晚期，这类合体器型更多，如玉璜、玉璧等器物都附加龙形，这大抵是玉作为礼器的功能逐渐变化所引致的。

216 龙形玉佩

战国早期 / 左长11.3厘米 宽7.7厘米
右长11.5厘米 宽8厘米 / 曾侯乙墓
龙是玉佩中最基本的样式，楚国与中原都流行这种“S”形玉佩。

216



217



218

**217 龙形玉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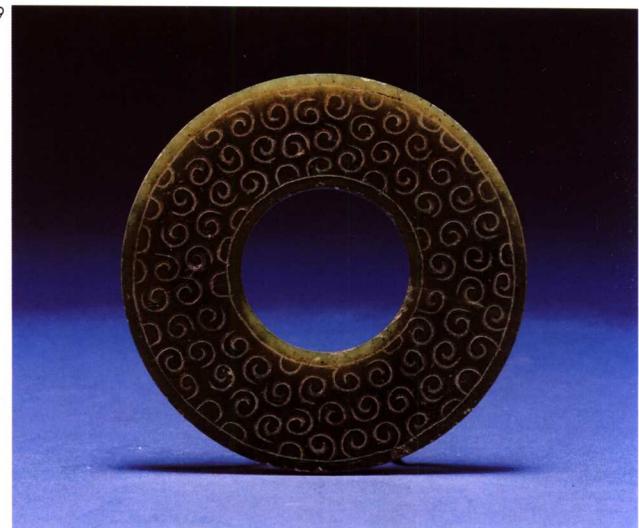
战国中期 / 长28.3厘米 宽6.7厘米 /
江陵望山3号墓

218 双龙玉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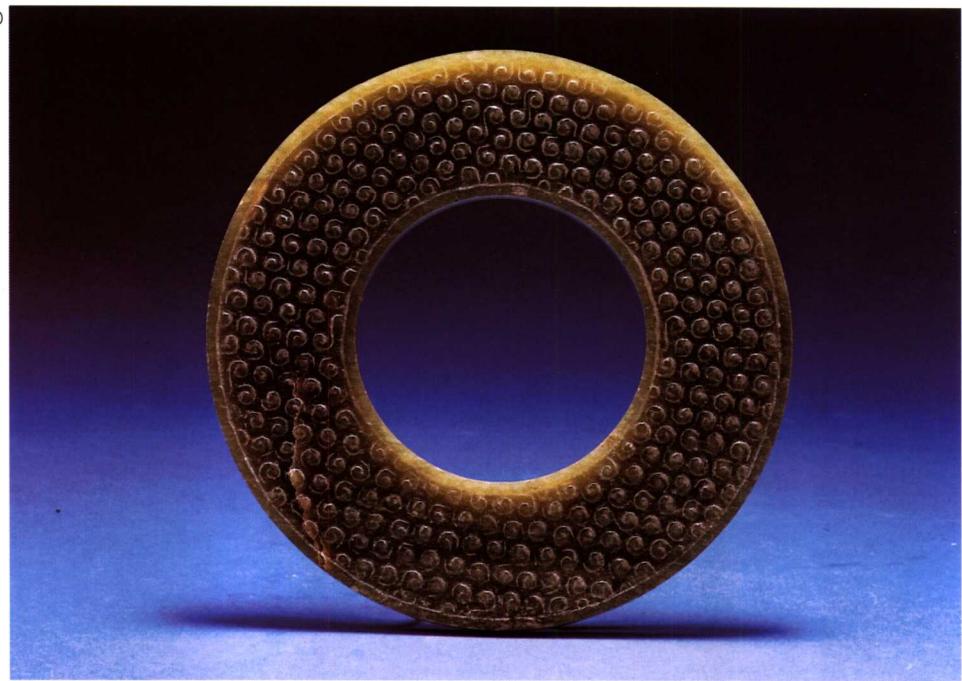
战国早期 / 长5.8厘米 宽3.8厘米 /
江陵九店44号墓

双龙反身相背，尾部雕有玉璧，
它的工艺简单，布局却开后来
同类器型的先河。

219



220



219 阴刻谷纹璧

战国晚期/径9厘米/包山2号墓

周代以璧礼天，璧上纹样也与天有关，似龙似云，简化后像谷粒发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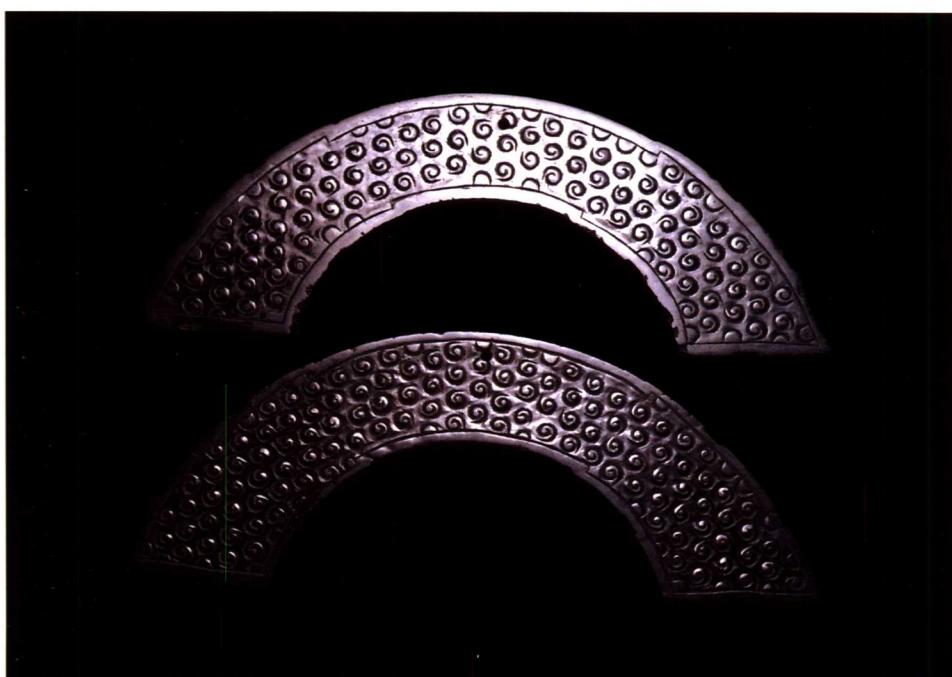
220 浮雕谷纹璧

战国晚期/径14.5厘米/包山2号墓

221



222

**221 云纹玉璜**

战国中期 / 上长17厘米 宽2.8厘米
下长16.7厘米 宽2.7厘米 / 江陵望山2号墓

222 谷纹玉璜

战国中期 / 上长20厘米 宽4.8厘米
下长20厘米 宽4.5厘米 / 江陵望山2号墓

璜身阴刻谷纹，这种类似谷粒发芽的纹饰，实际是由云纹简化而来的。

223



224



223 水晶环

战国中期/左径6厘米 右径4.7厘米/
江陵望山2号墓

224 水晶、紫晶串饰

战国中期/江陵九店294号墓

水晶串饰是玉饰组佩中用于玉
璜、玉佩、玉璧之间的装饰。

225



226



225 料珠

战国/江陵九店楚墓

料器原称琉璃，是早期的玻璃，而料珠则是料器的一种，是用来装饰的，在玉饰组佩中往往编缀料珠，增加美观。目前发现的料珠，大多出自楚国，而且数量不多，颇为珍贵。

226 玛瑙环

战国中期/径6.5厘米/江陵望山2号墓

楚人的 日用品

楚人生活富足，贵族的衣饰讲究，衣服的图案精巧多变，较诸中原各国尤有过之。除了一般衣服和装饰品外，楚人尚有很多实用的衣着用品。意想不到的是，原来楚人在两千多年前，已懂得穿戴手套了。



227 褐色绢帽

战国中期/高18.5厘米/江陵马山1号墓

此帽的前缘较高，后缘较低，帽缘镶大菱形纹锦。帽的顶部有圆孔，以容发髻。中原与南方地区，都有帽子出土，但图中这类型的帽子，在中原则尚未发现。

228



229

**228 彩绘云纹木梳**

战国早期 / 宽7.1厘米 高9.1厘米 /
江陵雨台山74号墓

先秦时期的成年男女虽然发式不同，但都是留长发的，故梳、篦是当时人们必备的用品。而楚墓中也有很多梳子出土，部分梳子更是放在墓主身旁的。

229 皮手套

战国中期 / 长28.5厘米 / 江陵藤店1号
墓

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五指分开手套，与西汉时期四指并拢、拇指分开的二分式手套是不同的，这种手套在中原地区从没有发现过。楚人的这种手套，主要是作战（如射箭）时持兵器用的。

楚国的典型墓葬

——包山楚墓

上古时代，墓不起坟。到商周时期，贵族开始按身份营造墓圹，形成一套葬礼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墓圹大小、棺椁层数、埋葬深度，甚至随葬器物的种类、数量和摆放方式等。埋葬完毕后，便在地表上堆起封土（坟），以永久显示死者生前的地位。楚国的大夫级以上，是用重棺重椁的，士是一棺一椁。棺内用衣衾包裹，棺椁外覆以丝织品棺罩，名帷荒（棺上为荒，四周曰帷），在最上面再覆以类似招魂幡的铭旌。楚人整个墓葬制度，基本上都是按照周礼的。

230



230 包山2号楚墓外景

包山墓地南距楚纪南城16公里，是楚贵族邵侯的家族墓地。它由南至北共五座，按父昭（左）子穆（右）排列。1、2、4和5号墓均为夫妻墓，其中4、5号墓排在2号墓的右边，是2号墓主人的晚辈。墓地中以2号墓最大，现存底径54米，高达5.8米。

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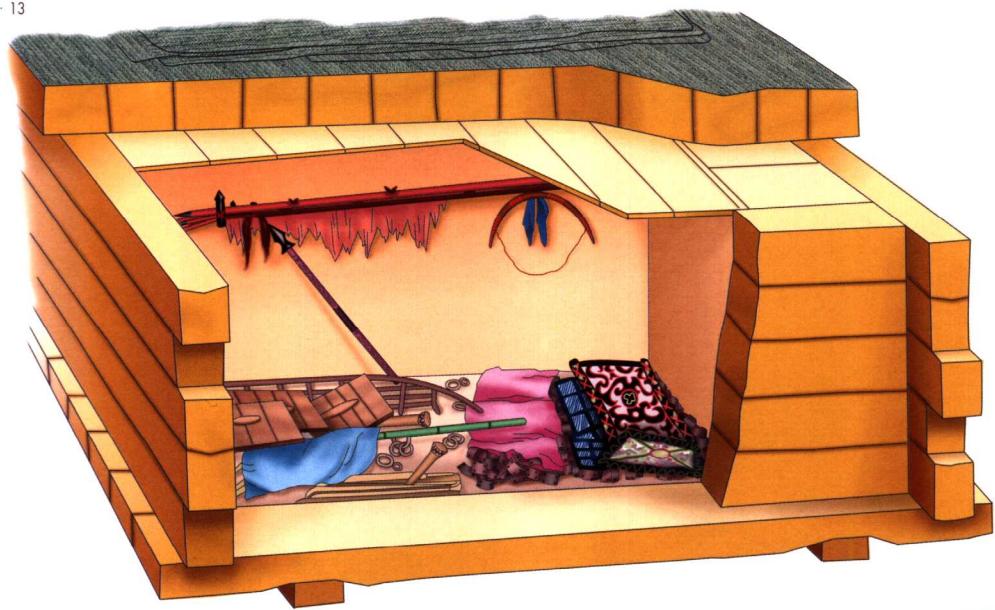
232

**231** 包山楚墓发掘现场**232** 包山楚墓椁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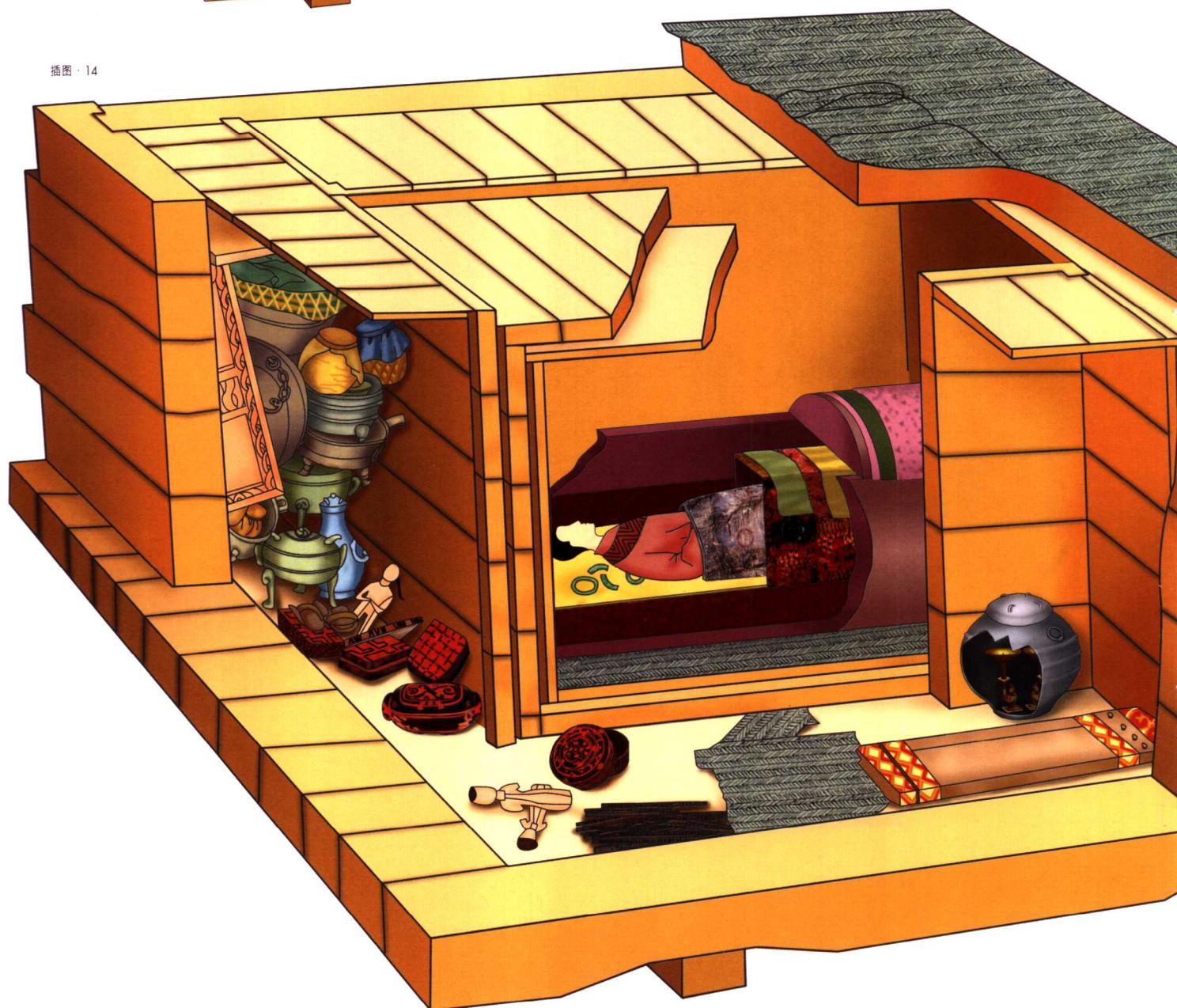
楚国墓葬，按照王、封君、大夫、士和平民等不同身份，划分区域和等级。1933年被盗掘的楚幽王墓，封土覆盖面积有10000多平方米，墓口面积1600多平方米，比诸侯身份的曾侯乙墓大八倍，有九个椁室之多。而包山楚墓墓主邵懿是楚国的左尹（令尹助手），是楚怀王时的大夫，按照规定，封君和卿大夫都是重棺重椁的，因而他的墓葬有十四层台阶，葬有三重棺二重椁。至于士的阶层则按照周礼，享用一棺一椁。

一般而言，士或以上的身份会有棺葬，身份稍高一点的，墓圹还会有墓道。相反，身份低下的庶人，却只有单棺下葬，而且很少被允许进入“邦墓地”（贵族墓地）。到战国中期以后，因为社会环境发生变化，邦墓地内的单棺墓才有所增加，这显示楚国等级关系的严密。此外，墓主的头向亦能显示身份的高下，楚幽王墓的头向朝东，望山1号墓主邵固、包山2号墓主邵懿等王族墓，头向也朝东，然而，现今发现的士或平民的墓葬，头向却多朝南，这应是按身份或职业来规定的。

插图·13



插图·14



233



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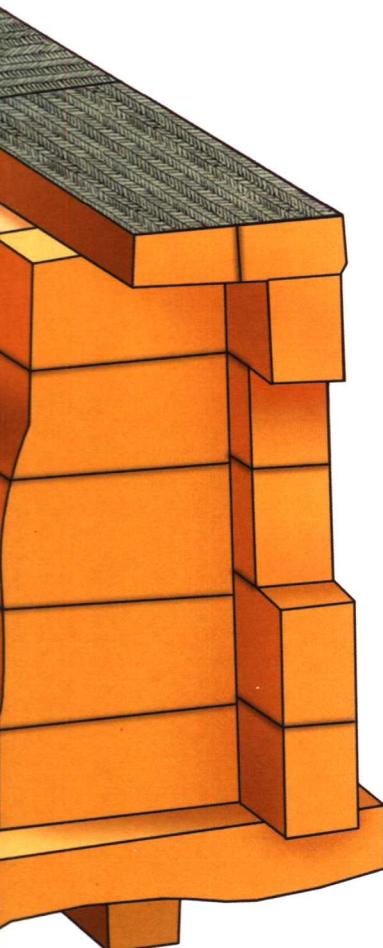
235



插图·13 包山楚墓南室复原图
插图·14 包山楚墓东、北及中室复原图

包山2号墓的葬具为两椁三棺，外椁长6.32米、宽6.26米、高3.1米，由隔板分成东、南、西、北、中五室。东室是头箱，西室是足箱，南和北室是边箱，四室放置青铜礼器、漆木竹器、兵器和竹简等随葬品。至于中室(内椁)则放置主棺三重，外棺长3.19米、宽1.78米、高1.72米，中棺是悬底弧形棺，内棺则是髹漆彩绘长方形棺，整个椁室共用成材木料77.23立方米。

包山墓主的身份是大夫级，却僭用诸侯葬制，享用三重棺。其椁室用方木垒造成，上覆竹席并以泥涂抹，外棺罩织物九层，内棺内髹上红漆，外饰有铜铺首等，与周代高级贵族的椁室和“饰棺”之制基本相合。



233 包山楚墓南室出土带羽毛的长杆兵器及弓

234 凤鸟纹绣绢面衾

战国晚期/包山2号墓

此衾是罩在中棺之外的第五层大衾，即帷荒，也是目前保存下来唯一完好的帷荒。

235 包山楚墓东室出土器物的情况



236



237

236 彩绘龙凤纹漆棺局部**237** 彩绘龙凤纹漆棺

战国晚期/长184厘米 宽46厘米 高46厘米/包山2号墓

包山2号墓主身份是卿大夫，葬有三重棺。这具内棺，棺内髹红漆，棺外髹黑漆，通体以红黄二色漆及金银粉饰共九个单元的龙凤纹样，每单元绘四龙四凤，色彩鲜明，龙为首双身，凤则展翅卷尾压于龙上。龙凤是楚人最喜欢的纹样。



楚人的 随葬品

楚国的葬具，因死者身份不同，有单棺、单棺单椁和多重棺椁之别。椁室内分隔成两室或多室，分别象征不同身份人士的居室。椁室内的头箱、棺室左右边箱和脚箱各象征着前堂、后寝、左右房和下室。除以严密的墓葬规划来显示身份外，墓内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亦代表着墓主生前的地位。



238 单头镇墓兽

战国中期/高47.5厘米（不连鹿角）/
江陵雨台山6号墓

239



240



239 彩漆竹笥

战国晚期 / 长24.6厘米 宽18.9厘米
高5.2厘米 / 江陵九店410号墓

241

**240-242 彩漆竹笥**

战国晚期 / 图240长21厘米 宽18.9厘米
高8.4厘米 / 包山2号墓 图241长
24.6厘米 宽18.9厘米 高5.2厘米
图242长25.1厘米 宽20.2厘米 高6.1
厘米 / 江陵九店楚墓

楚人的生活用品，如食物、香料、织物和装饰品等，均用竹笥盛放随葬，包山2号墓一次就出土了六十九件竹笥。竹笥的编织纹样，似乎也和内容有关，人字纹样的竹笥多是用来装植物的，至于纹样复杂的彩漆竹笥，则多用以盛织物和装饰品。



**243 楼空龙纹铜方镜**

战国晚期/径11.1厘米/包山2号墓
铜镜除照容之外，也是宗教仪式上的法器。春秋至战国早期，铜镜仍不太普遍，但战国中期以后，铜镜却变得非常流行，如战国中晚期的江陵雨台山、九店千多座楚墓，便出土了四

十八件铜镜。应注意的是，楚国是先秦时代最流行铜镜的诸侯国，楚国的士和平民阶层都以铜镜随葬，现今约有四分之一的楚墓有铜镜出土，而当时的湖南更可能是铸镜业最发达的地区。

244



245



244 五“山”字纹铜镜

战国中期/径14.6厘米/江陵九店15号墓

楚人墓葬中常见有“山”字纹铜镜。目前仍不清楚“山”的确切含义，但可能是与楚人的某种信仰有关。

245 镂空蟠螭纹铜镜

战国晚期/径14.9厘米/包山2号墓



**246 骨贝**

战国/包山2号墓 望山1号墓

先秦文献记载，在丧礼时，棺内和死者口中都要放玉、贝等物。放玉是希望保持尸体不腐，让灵魂返回；放贝则含有宗教意味。至于楚国贵族随葬骨贝的做法，也是仿效中原，希望子孙昌盛。

与天文历法 有关的楚地遗物

在古代，地域不同容易形成不同的观象系统。中原很早就用二十八宿为坐标观象，利用北斗斗柄计算月份，以斗建确立岁首；南方则较注意赤道恒星（昏旦中星）的升降。楚人对天象素有研究，并一直保持用数术方式处理天文历法，更将四时、八方、十二个月份与星占、卜筮、神鬼等紧密结合，逐渐衍为一种数术用的“式图”或“式盘”。式图后来成为阴阳家和道家运用五行、六壬来推算吉凶的工具；式盘则可能与博奕的棋有渊源关系。

247 《夸父逐日图》木衣箱

战国早期 / 长72厘米 宽48厘米
高36.5厘米 / 曾侯乙墓

衣箱一侧绘有夸父逐日的神话故事，所绘之鸟为日中金乌。盖面上绘有似马的四兽，可能指天驷星座的天马房四星（即房宿）。所绘内容涵义与弋射衣箱基本相同。

247



248



249



248 弋射衣箱盖面

249 弋射衣箱

战国早期 / 长69厘米 宽49厘米 高37

厘米 / 曾侯乙墓

“弋射”是用绳系箭射鸟的意思。箱盖两端均绘有弋射图像，

一人持弓弋射扶桑树中的金乌，旁边所绘双龙缠体图案，可能是最早的伏羲图像。



250 二十八宿衣箱

战国早期 / 长71厘米 宽47厘米
高40.5厘米 / 曾侯乙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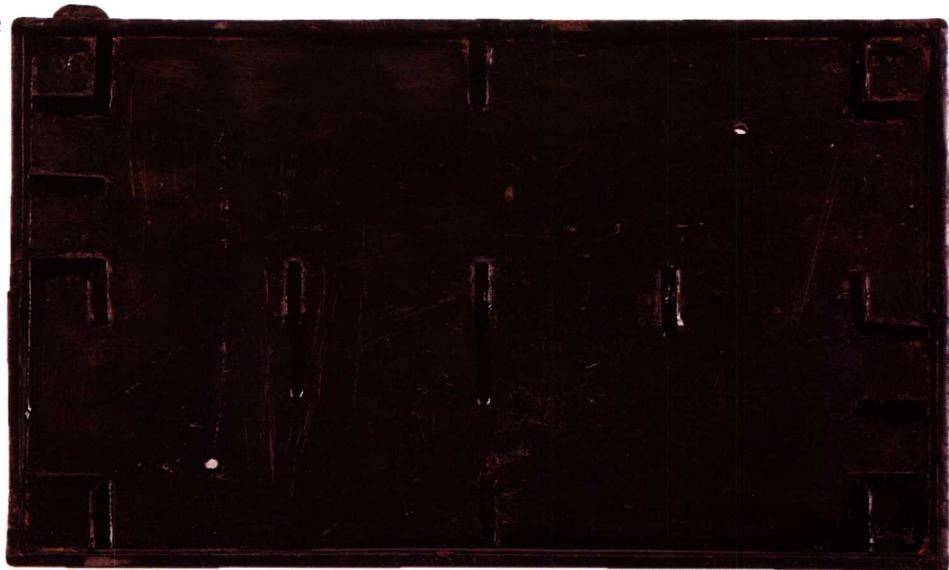
箱盖正中绘有北斗，环绕北斗，依次书写二十八宿的全部名称和四象中的苍龙、白虎。箱子两端则绘有日纹和象征月亮的蟾蜍。其实，二十八宿的个别星名，如大火（心宿二）最早见于公元前3400年的帝尧时代，至于载有二十八宿全部星名的文献，是公元前239年成书的《吕氏春秋》。但部分日本学者却认为二十八宿是源于印度，在战国中期才传入中国。对此，李约瑟、夏鼐等人早已提出异议。这个衣箱的出土，成为中国发现二十八宿全部名称的最早文字记录，把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时间，从公元前3世纪，提早到公元前5世纪。而衣箱上的二十八宿与北斗相配合，正是中国黄河流域观象的特点，这为二十八宿体系源于中国的观点，提供了新证据。



251



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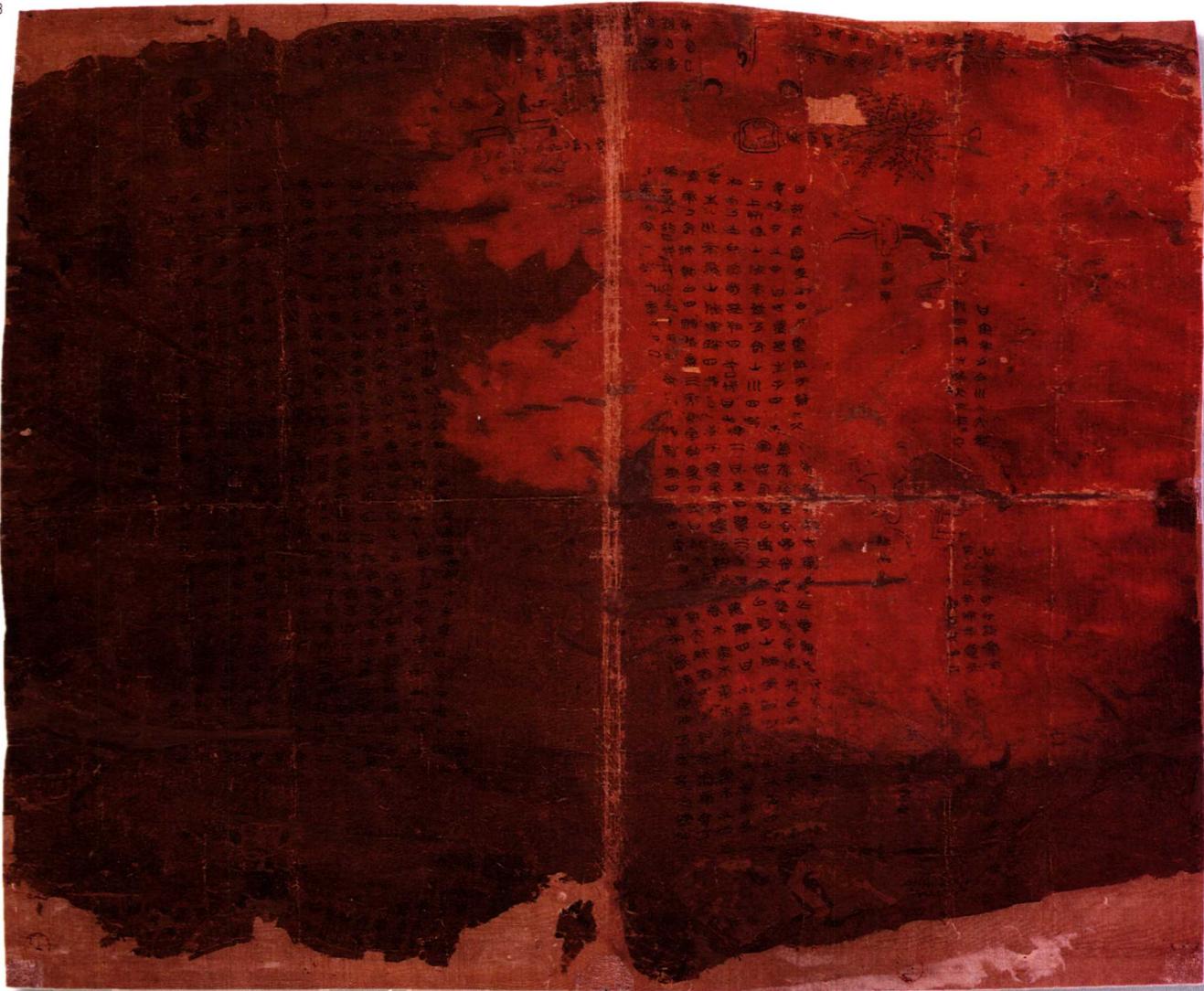


251-252 六博盘

战国中期/长34.6厘米 宽20.5厘米
高12.8厘米/江陵纪南城1号墓

六博又名陆博，《楚辞·招魂》说，这是宗教仪式中要用的棋类。它由二人对局，博盘上有“『”、“_”形棋道，亦称“规矩文”，本是古代一种阴阳四时五行宇宙论的图解。有的绘水陆桥梁图形，辅以筹、箸、骰子等历算工具，棋子多寡不一，汉代固定为十二枚。

253



253 楚帛书

战国/长47厘米 宽38.7厘米/长沙子
弹库楚墓

帛书分别有八行和十三行两段文字，共九百六十一字。四周配有一十二个神的图像。学者李学勤发现，这十二个神的名字，与周人文献《尔雅》中的十二

个月名是相同的。帛书的内容，主要是数术性质，曾提及天象灾异和伏羲、女娲、炎帝、祝融、共工、禹等人名。排列方法是以式图来配十二个神，而式图的系统，又与后来数术中六壬式的十二神有关系。

商业 与度量衡

春秋战国时期，工商业发达，楚国身为南方大国，商业贸易绝不比中原各国逊色。楚怀王就曾自称黄金、珠玑、犀象是楚地的特产，目前在鄂、豫、苏、陕等省的八十多处都发现有楚金币，总重约三万克，居先秦各国之首。至于安徽发现的鄂君启节，更有明文规定贸易和免税的限额。可以想见楚国商业的繁荣。随着贸易的发展，楚国极需要有效的交换媒介和计算单位，货币及度量衡工具遂应运而生。

254



254 鄢爰

战国/重36.4克/宜昌前坪汉墓

“郢”是楚国的首都；“爰”或有称量的意思。郢爰是楚国通用的一种金币。早期的爰呈饼状，后期的呈板状，打有“郢爰”、“陈爰”等戳记。它是一种称量货币，用于大宗贸易，包山楚简就有大量用黄金贸易的记录。郢爰多见于楚东境的苏皖，不见于墓葬，这反映楚国晚期商业贸易的繁荣和郢金在实际流通中的重要地位。

255

**255 鄢爰**

战国/长2.3厘米 宽1.5厘米 重14.8克/江陵郢南采集

此物正面压印阴文“鄢爰”。周边有切割痕。郢爰金币原为版金，使用时视需要切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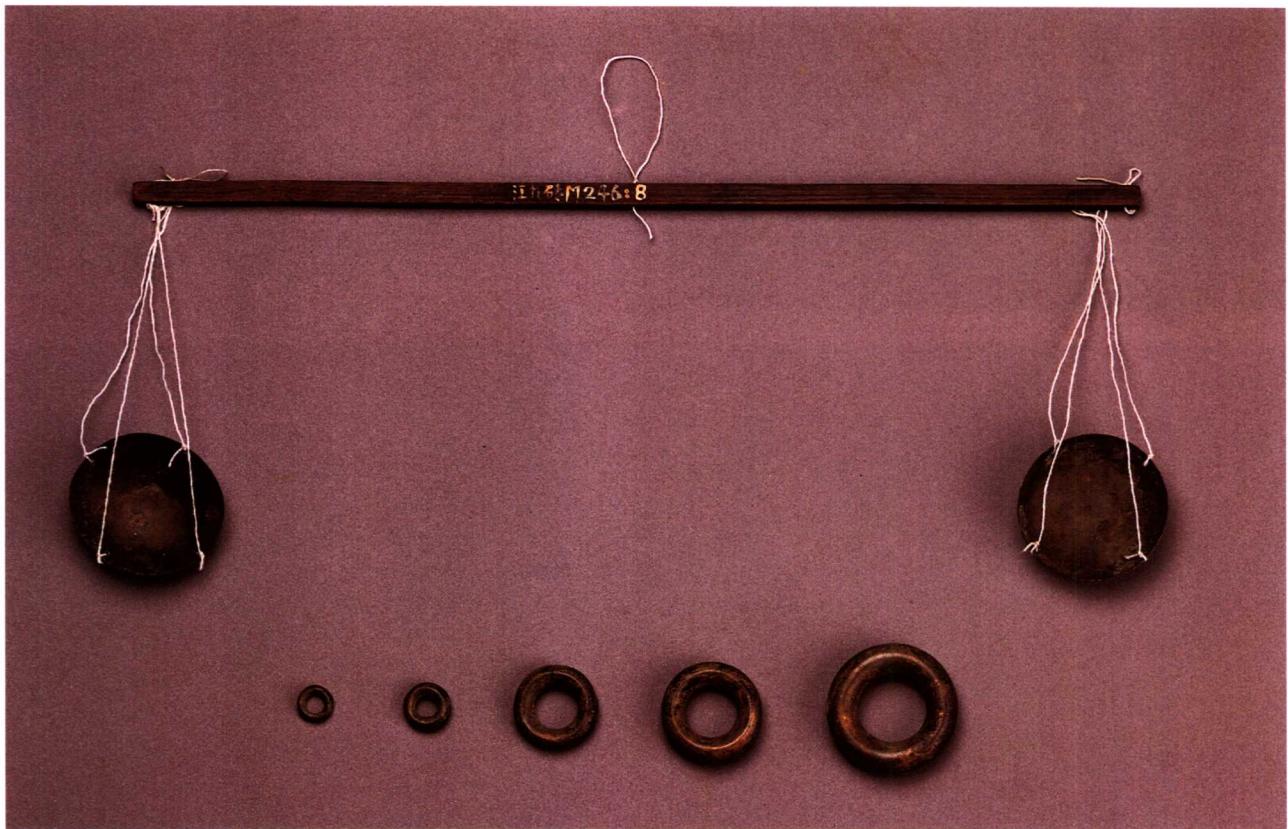
256 蚁鼻钱

战国/孝感野猪湖

楚国铜币除少量的布钱外，主要是以蚁鼻钱为主，蚁鼻钱俗称“鬼脸钱”，钱上印有“贝”等形状，清代的吴大澄认为它是“贝”字。蚁鼻钱是等量货币，一般重量在2-4克之间，多用于民间的小规模贸易，与郢爰相辅相成。

256



**257 铜砝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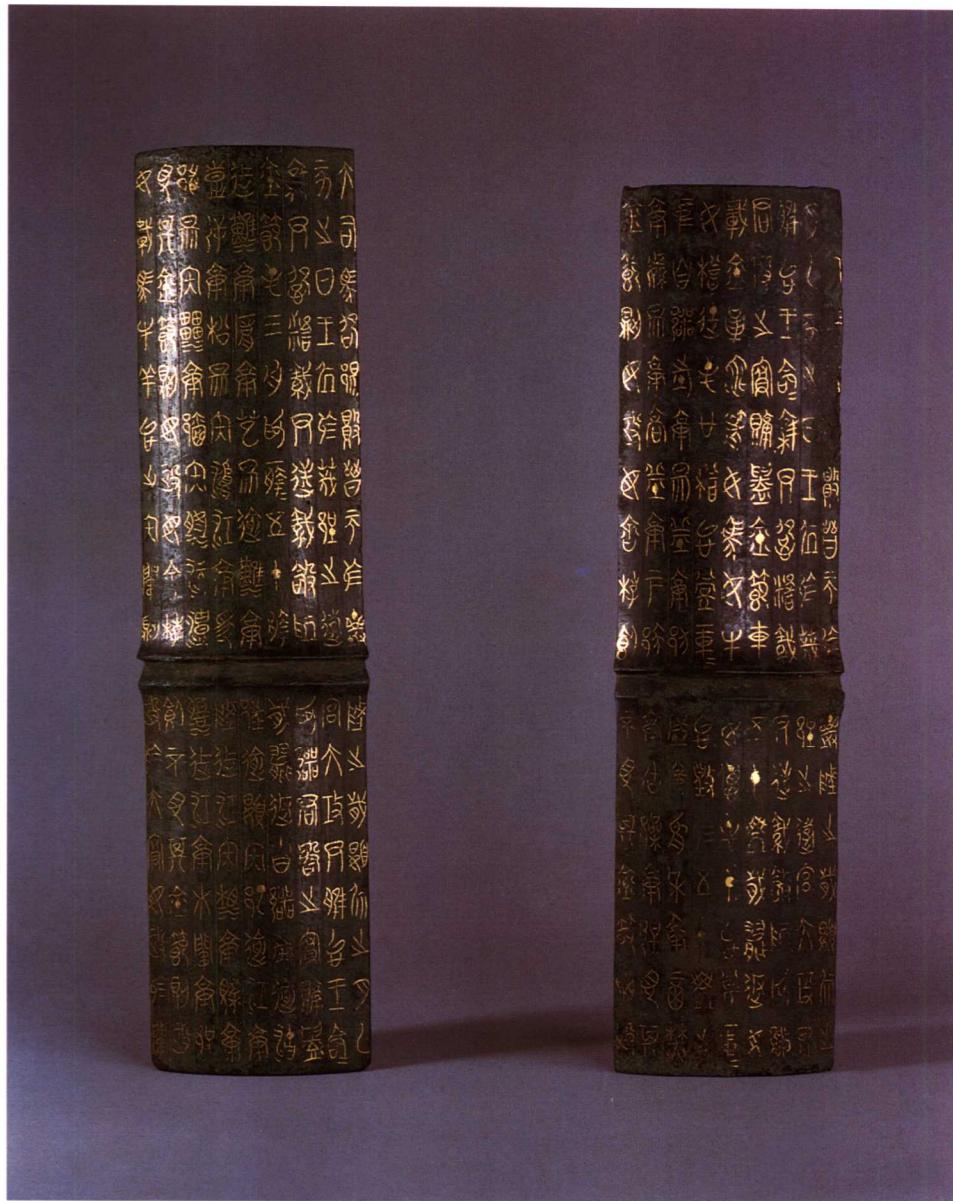
战国中期/江陵李家台4号墓

目前以楚地发现最多春秋战国时期的砝码，砝码与天秤相配，成为一套衡器，主要是用于称量金币“郢爰”。据湖南统计，二千余座楚墓中，共出土一百零一座天秤或砝码，可见当时商贸的繁荣。这套砝码共七件，由最小的2克至最大的124.9克，重量大致按倍数递增。

258 天秤

战国晚期/江陵九店246号墓

楚人的天秤由衡杆、天秤铜盘和砝码组成。这件天秤除系绳已朽外，均保存完好，穿绳复原之后，天秤两端能保持完全水平。其五件砝码的重量分别为4两（62.19克）、2两（31.12克）、1两（15.35克）、6铢（3.93克）和2铢（1.31克）。



259

259 鄂君启节

战国/车节长29.6厘米 宽7.3厘米 舟节长31厘米 宽7.3厘米/安徽寿县丘家花园

鄂君启节是楚怀王颁给湖北鄂城封君鄂君启从事贸易的凭证，包括车节三枚、舟节二枚。它规定持有每个车节免税五十乘，每个舟节免税五十舸，一年为限，到期返还郢都。陆路限于进行军资贸易，水路因在楚境，贸易性质没有限制。估计五十舸运量约900吨，五十乘约50吨。鄂君启这类官府的商人，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是楚地封君权力强大的明证。至于节上的铭文，详细记载了交通路线，是研究当时地理及交通的重要资料。

**260 “王”字夹刻刀**

战国中期/长17.6厘米 宽2.7厘米/江陵望山1号墓

夹刻刀是日用工具，一般带有木柄和鞘，用来削制简牍等物。

楚地的 敲击乐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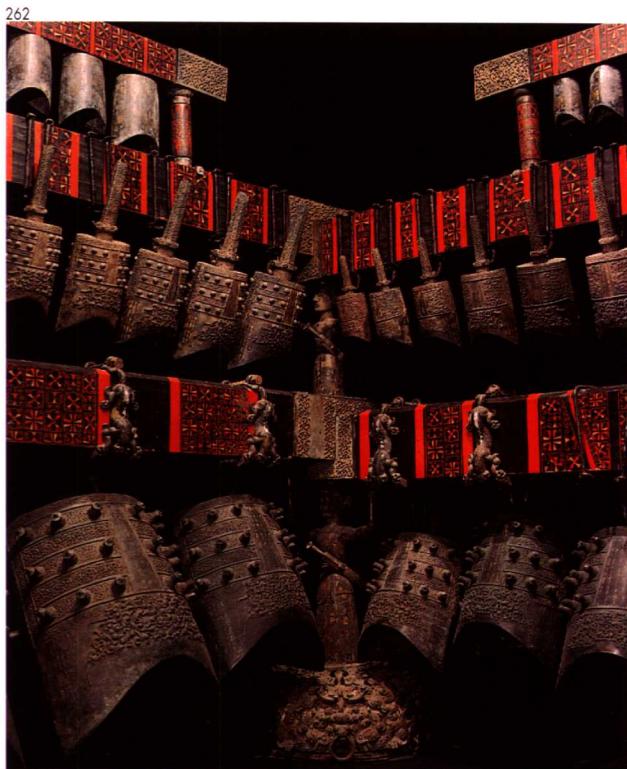
先秦时代的“乐”，包括歌、曲、舞三部分。西周以前，乐是巫师、祭司与天和神沟通的工具。西周以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中原地区的乐与礼制结合，变为一套具教化功能，能够移风易俗的礼乐制度。这时也产生了专业的乐师。至于南方的楚国，音乐也很流行，楚国贵族多知音晓乐，如楚灵王、伯牙、鍾子期、屈原和宋玉等，都以精通音律著名。加以楚地巫风浓厚，楚音乐亦以巫音和巫舞为主，尤其重视常用于祭祀仪式的敲击乐器，这是楚国音乐的一大特色。

261 随州擂鼓墩2号墓编钟

战国中期/最大钟高98厘米 重76.25
千克 最小钟高29.7厘米 重5.8千克/
随州擂鼓墩2号墓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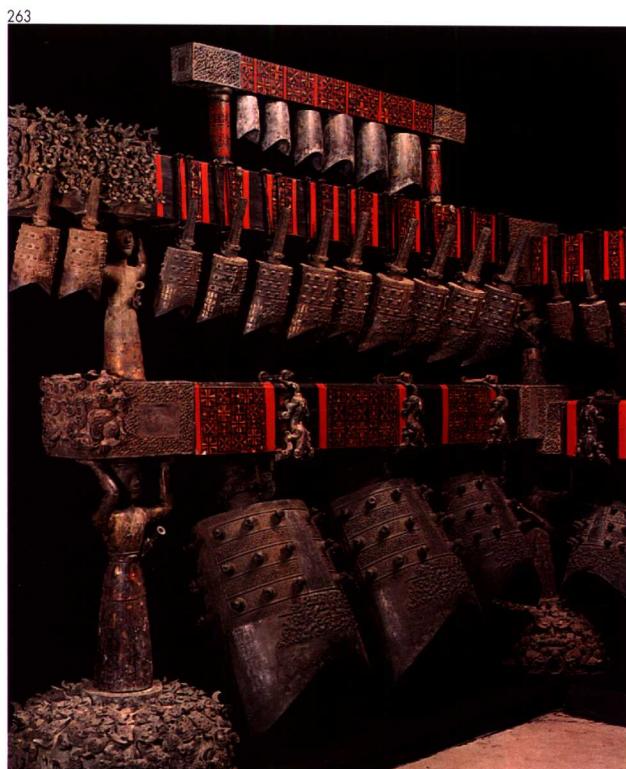


262

262 曾侯乙编钟局部**263** 曾侯乙编钟局部**264** 曾侯乙编钟

战国早期/钟架长748厘米 高265厘米
最大钟高152.3厘米 重203.6千克
最小钟高20.4厘米 重2.4千克 钟共重2567千克 钟架铜人、挂件总重4421千克/曾侯乙墓

曾侯乙编钟共六十四件，外加一件楚王镈钟，分三层八组，悬挂在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



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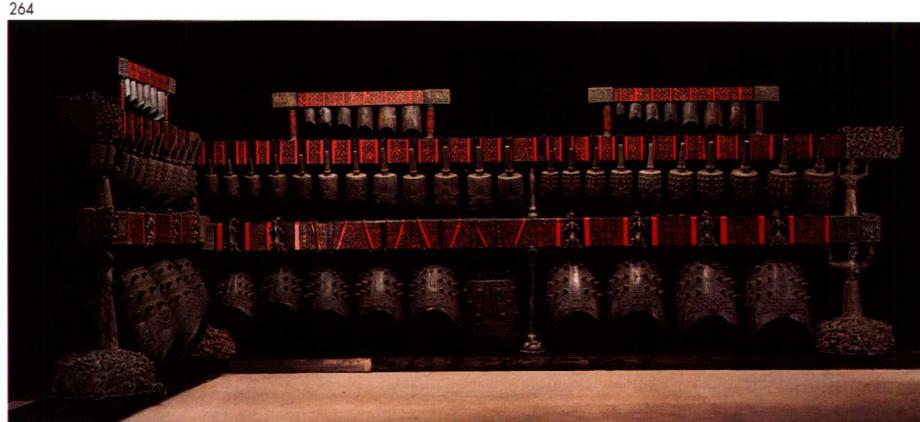
音列是现今通行的C大调，能演奏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的乐曲。

在编钟、钟架和挂钩上，共有三千七百五十五字铭文，内容分为铭记、标音、乐律关系；以及音名、阶名、八度组、各国（晋、齐、楚、周、申）律名对应关系等乐律知识，可说是一部先秦时代的乐律全书。

这套编钟的发现，主要有三个意义：首先，是证明中国在先秦时代，已有七声音阶和绝对音高；其次，十二律和十二个半音，在西周时已经出现，不是外来产物；第三，是先秦时代已能实践旋宫转调及铸出和谐的双音钟。

上。钟是分铸而成的，采用了铜焊、铸镶、错金等技术和圆雕、浮雕、阴刻、髹漆彩绘等装饰技法。这是迄今发现最大的一组编钟，展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宫廷乐队的基本建制及演奏时的大体布局。

这套编钟至今仍能演奏，而且音律准确。每件钟均能奏出呈三度关系的双音，全套钟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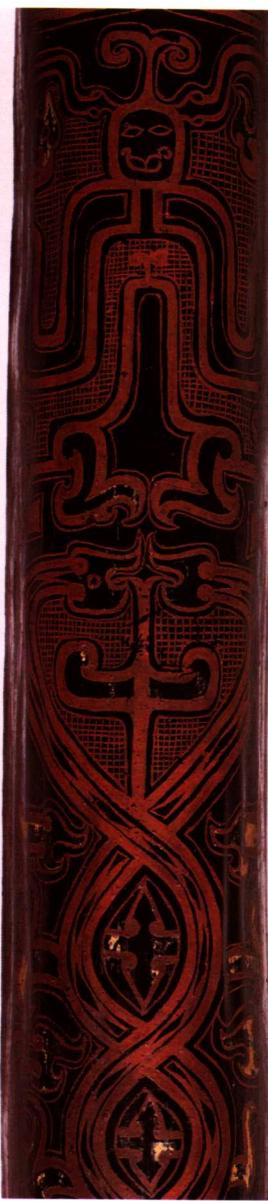


264

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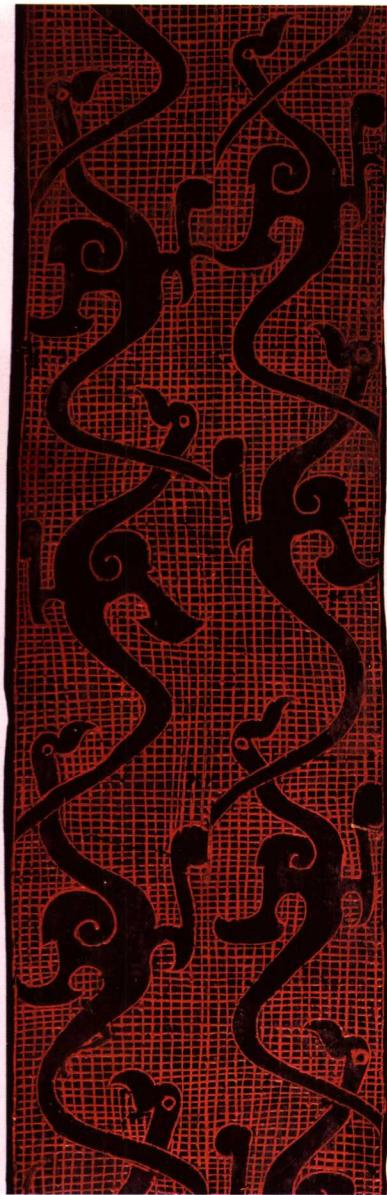
266



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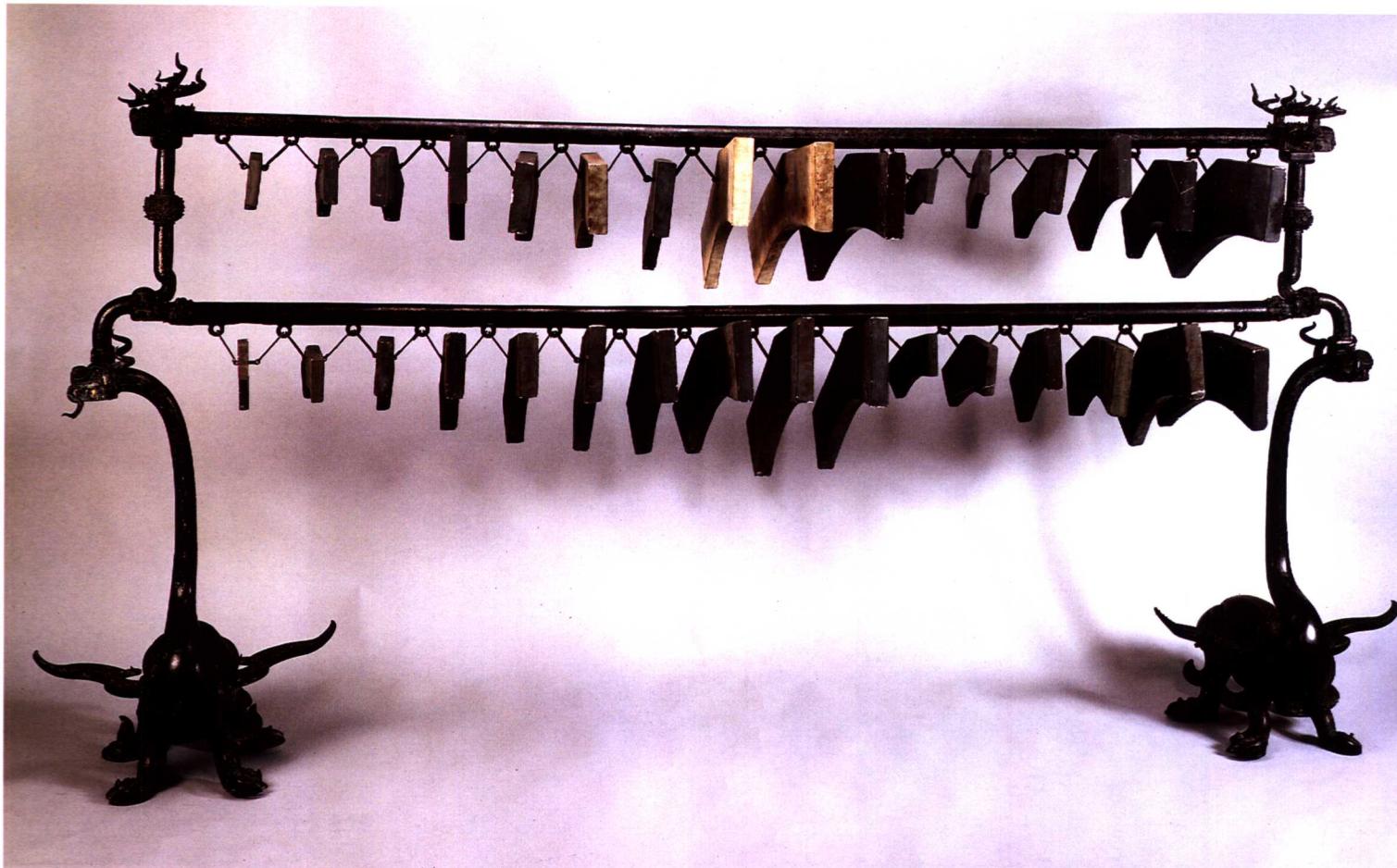
268

**265 均钟****266 均钟局部——背面的人面蛟龙纹样****267 均钟局部——背面的人面蛟龙纹样****268 均钟局部——侧面的凤鸟纹样**

战国早期/长115厘米 宽5.5-7厘米/
曾侯乙墓

均钟是用来调定编钟律高的正律器，也就是“律准”。此前文献记载，律准是汉代京房（公元前77年至公元前37年）所作，而日本学者林谦三认为唐代正仓院的七弦准，是现存最早的律准。曾侯乙墓均钟的出现，打破了这些旧观点。此器由整木雕成，两端各有五个弦孔，并绘神人跨龙和多组十二只凤鸟纹样，可能表现夏后启上天得乐，及黄帝命乐官伶伦仿十二只凤鸟的叫声定十二律的神话。





269 曾侯乙编磬

270 曾侯乙编磬局部——龙首

横梁

271 曾侯乙编磬局部——怪兽立柱

战国早期/宽215厘米 高109厘米/曾侯乙墓

磬是乐制中的重要礼器。此物出土时，与曲尺形的曾侯乙编钟呈三面摆放，显示这是“乐悬”中合于诸侯身份的“轩悬”（三面悬乐器）之制。磬架由青铜怪兽和饰错金云纹的横梁构成。磬块由石灰石或大理石磨制，共三十二块，刻有编号和乐律铭文，出土时磬块多已腐蚀。据复原研究，它的音域跨三个八度，而且十二个半音齐备，音色明亮。



271



272

**272** 铜铙局部**273** 铜铙

战国晚期/高27.5厘米/包山2号墓
铙是手持的打击乐器，最早见于商代。单件的铙，是用以退兵时指示停止击鼓，即“鸣金收军”。大小相次的编铙则用于祭祀宴乐。其后，编铙为了便于演奏，变得大型化，成为

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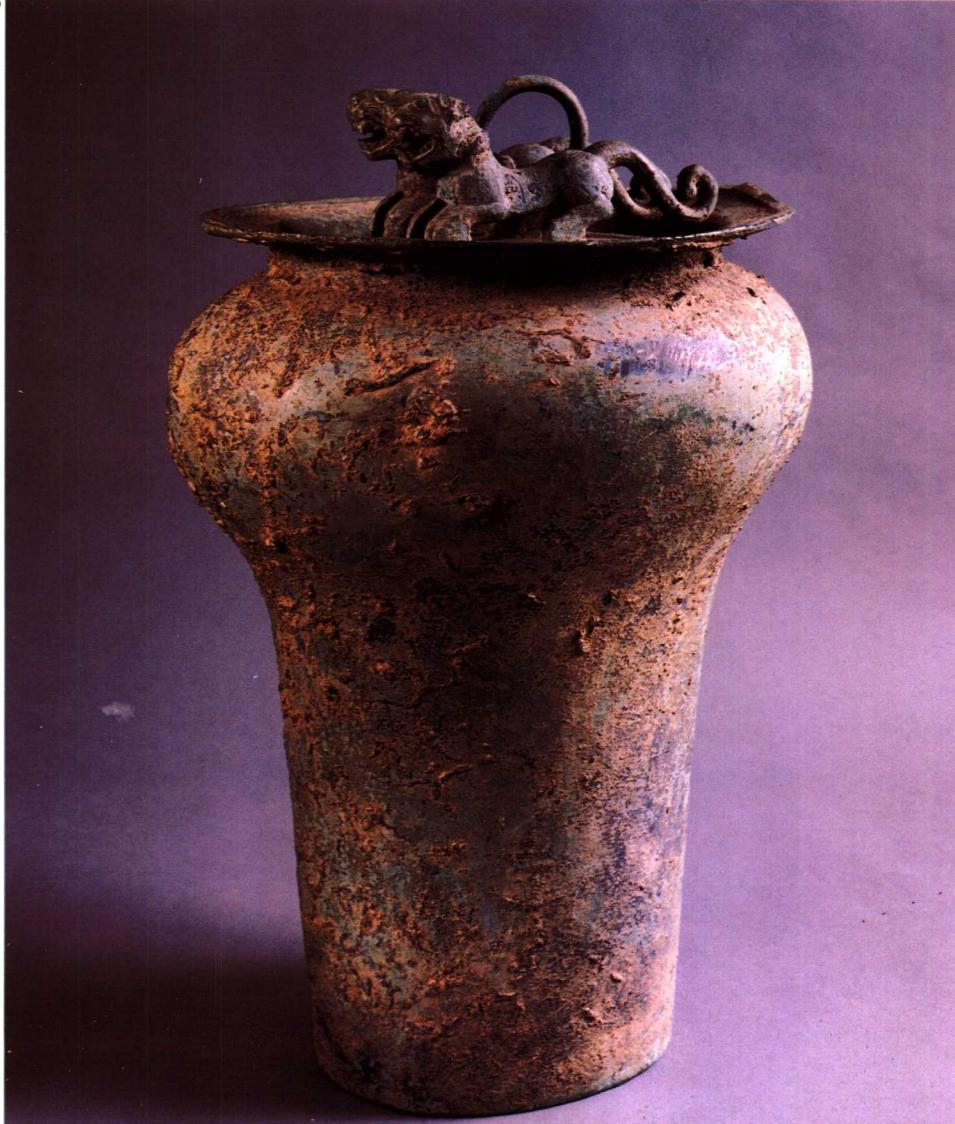


倒悬的编钟。在记录随葬品的遣策上记有“一铙”，应是指此件器物。这是最晚见的铙，可能是军用的。特别的是，这件铜铙的内壁满饰龙纹，这在先秦的铸造工艺中十分罕见，表明楚人已成功解决了铜器内壁装饰纹样要受到范型垫片限制等技术难题。



274

275



274 鹿鼓

战国晚期 / 通长32.2厘米 / 沙市喻家台41号墓

鹿鼓是一种打击乐器，流行于楚地。此鼓为木质，是明器。以卧鹿为座，鼓插在后背上。

275 双虎钮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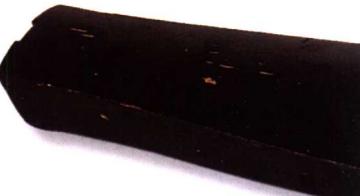
战国晚期 / 高55.5厘米 / 建始格塘二台子

钟于是先秦时代的一种军乐器，常与鼓合奏。南方巴、濮等族，直到汉代仍然使用钟于。钟于分为桥纽、马纽、虎纽等形制，至于这种双虎纽钟于则较为少见。

楚地的 管弦乐器

楚地音乐盛行，需要很多不同乐器来配合演奏。敲击乐器主要用于宴乐和祭祀仪式，至于民间社戏、俚曲等非仪式性的音乐，则多杂用琴、瑟、笙、箫等管弦乐器，使这类乐器在楚国得到充分发展。

276



277



276 七弦琴

战国晚期 / 长83.1厘米 宽13.3厘米
高7.4厘米 / 荆门郭店1号墓

春秋时期，琴在楚国已十分流行，有绕梁、青翻、秋阳等名琴。公元前582年，楚人钟仪被俘至晋国，用晋琴奏楚曲感动了晋人，反映出楚琴及琴曲已超越礼乐，更多地用来表现个人情感。楚国的琴并无定制，如长沙五里牌楚墓出土了十弦琴，而荆门楚墓又出有七弦琴，这说明楚琴不是规范性的仪式乐器。

277 十弦琴

战国早期 / 长67厘米 宽19厘米
高11.4厘米 / 曾侯乙墓

传说伏羲为禁邪声而作五弦琴，周文王、武王各增一弦，琴就有了七弦。十弦琴的发现，表明古琴的形成，是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此琴由琴身与活动底板组成，据弦孔和铉弦柱可推断，原张施十弦。底板内有四枚琴轸。

278





278 彩绘凤鸟纹漆瑟

战国晚期 / 长 88.7 厘米 宽 41.5 厘米
高 10 厘米 / 沙市喻家台 41 号墓
瑟身形绘凤鸟、龙、蛇等纹样，
构图精美，色彩丰富。



280

**279** 彩绘龙纹漆瑟**280** 彩绘龙纹漆瑟局部——

头部龙形雕刻

281 彩绘龙纹漆瑟局部——

瑟身纹饰

战国早期 / 长167.3厘米 宽42.2厘米
高13.7厘米 / 曾侯乙墓

相传伏羲作五十弦瑟，黄帝改良为二十五弦。南方因保存条件良好，因而考古发现最早的瑟见于春秋楚墓，尤以曾侯乙墓出土的瑟最多（十二具），保存最好。日本学者田边尚雄指出，中国的瑟是由苏美尔、波斯的洋琴传入，慢慢演变而成的。但从曾侯乙墓出有整木制作、多板拼制等以不断改良的工艺制作的瑟和楚地漆瑟弦数从十八到二十五弦不等看来，瑟是中国独自发展起来的大型弦乐器。这件漆瑟的侧板绘有凤鸟纹、菱纹、云纹、变形龙纹，瑟尾则有浮雕饕餮和龙蛇，可说是一件艺术珍品。

281



282



283



284



282 彩绘竹箎

战国早期 / 长29.3厘米 / 曾侯乙墓

先秦演奏雅乐时，箎是与钟磬琴瑟配合的，但因年代久远，箎的形制已不可考。曾侯乙墓出土的箎由竹管制成，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竹管乐器。与笛不同的是，箎的一端以竹节封底，另一端用物堵塞。管身的吹孔、出音孔与五个指孔呈九十度，所以演奏时是掌心向内的。

283 彩绘竹排箫

战国早期 / 长22.5厘米 上宽11.7厘米
下宽0.85厘米 / 曾侯乙墓

排箫古名“箫”或“参差”，是长短不齐的意思。曾侯乙墓的竹排箫，用十三根箫管依次排列，其中有八根箫管出土时尚能吹出乐音，箫管不按十二律的顺序排列，构成的音列至少是六声音阶。这是迄今所见最早和保全最好的竹质排箫。

284 汉阳古琴台

文献记载，楚人钟子期从伯牙的琴曲中，听出了高山流水的意境，这是一个十分著名的知音故事，后人就在两人相遇的汉水南岸琴断口，修筑琴台纪念此事。

秀丽缤纷 的丝织品

楚国蚕丝生产丰富，丝织技术更不下于中原各国，使楚国能生产大量美观的丝织品。据研究显示，楚国丝织品有很大部分是用自己生产的蚕丝织造的。在纹饰方面，以龙凤纹为主，又杂有菱形、六边形等几何纹样，甚至如宴乐、祭祀、田猎等日常生活情景，亦成为纹饰的题材，使楚国的丝织品丰富多彩。

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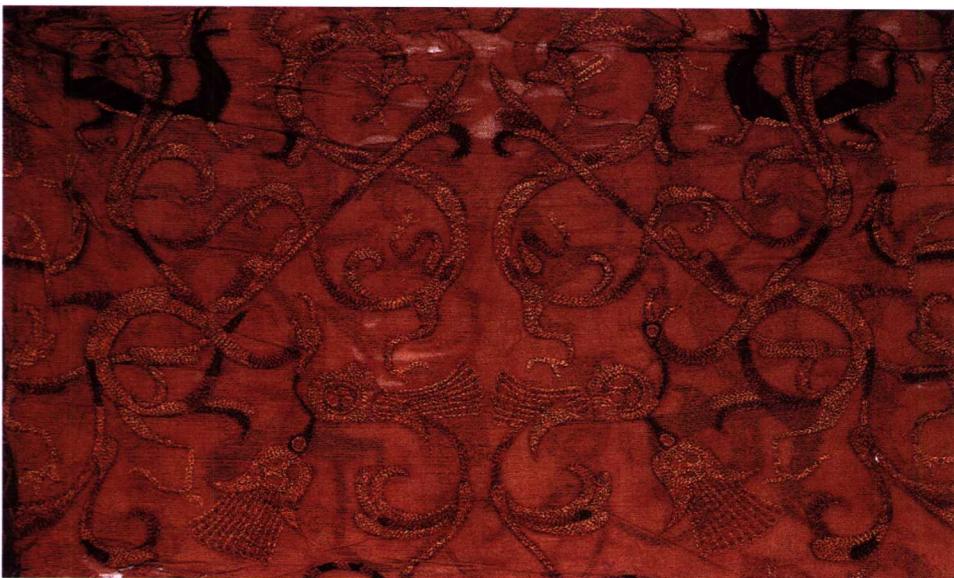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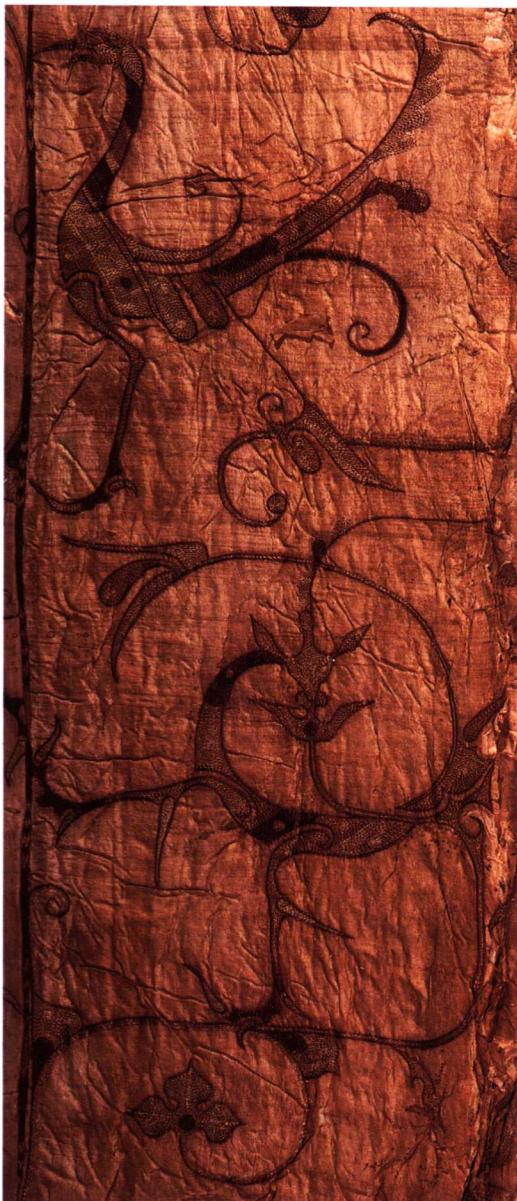


285 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衾

286 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衾
局部——单龙单凤

战国中期/长220厘米 宽207厘米/
江陵马山1号墓

衾面用五幅对凤对龙纹绣拼成，灰白绢里。对凤对龙纹由八对形态各异的龙和凤鸟构成，线条流畅，构图奇巧。这种图像显示的含意比较深奥，可以理解为当时人民的信仰，人们往往视龙凤为沟通人和天的神灵，这种思想反映在丝织品上，体现了楚文化的浪漫色彩。

**287 龙凤虎纹绣罗**

战国中期/纹样长29.5厘米 宽21厘米/江陵马山1号墓

绣地是四绞经素罗。纹样的主题是龙凤虎和蛇（小龙）争斗，斑斓的猛虎与一条大龙为一组，展开双翅的凤鸟与蛇（小龙）为一组，花草枝蔓把它们连接成菱形。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幅先秦时代的四神图，其中凤鸟为南方之神，虎为西方之神，龙为东方之神，小龙（蛇）为北方之神。



288 蟠龙飞凤纹绣浅黄绢面衾

战国中期 / 长190厘米 宽190厘米 /
江陵马山1号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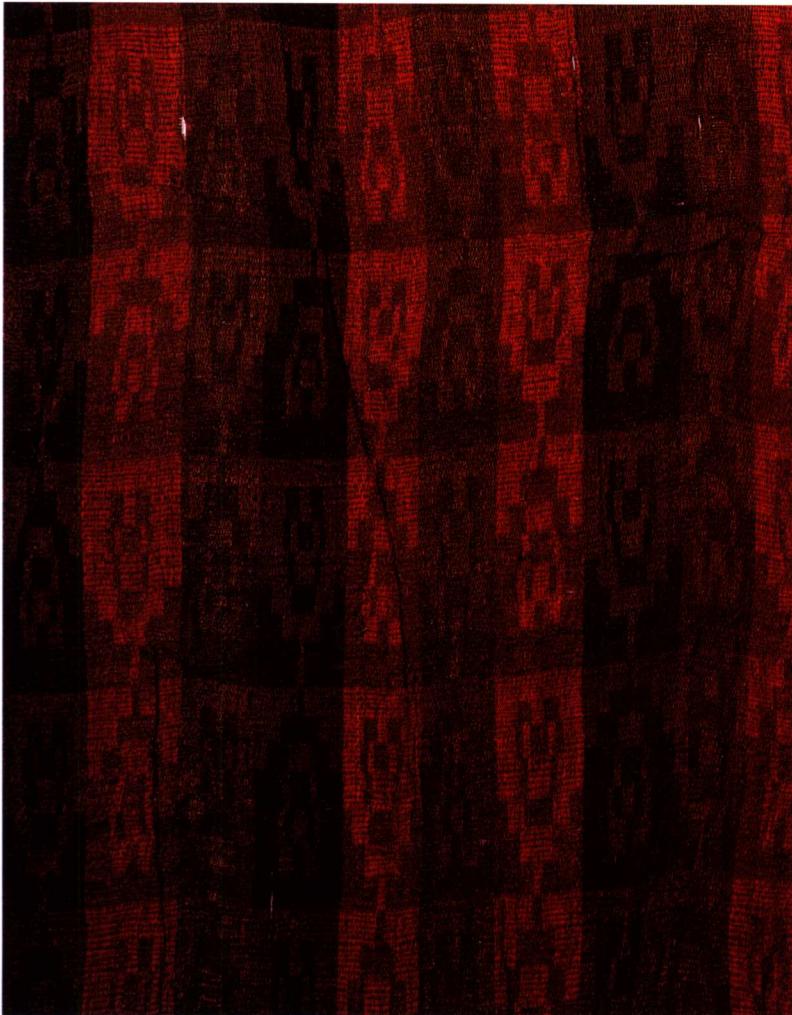
这件衾是实用品，绣绢面，灰白绢里，内絮丝绵。上端正中有凹口，并饰有用彩色条纹绮

做的被识（也名“紩”）。衾面用二十五片绣绢拼成，正中的二十三片，复原后为蟠龙飞凤纹，两侧各有一片舞凤逐龙纹。纹饰典雅、华贵，充满神话色彩。此种样式的凹口衾，或许是后世“鸳鸯衾”的前身。

289



290



289 舞人动物纹锦——麒麟、对凤、对龙

战国中期/幅宽50.5厘米 花纹经向长5.5厘米 纬向宽49.1厘米/江陵马山1号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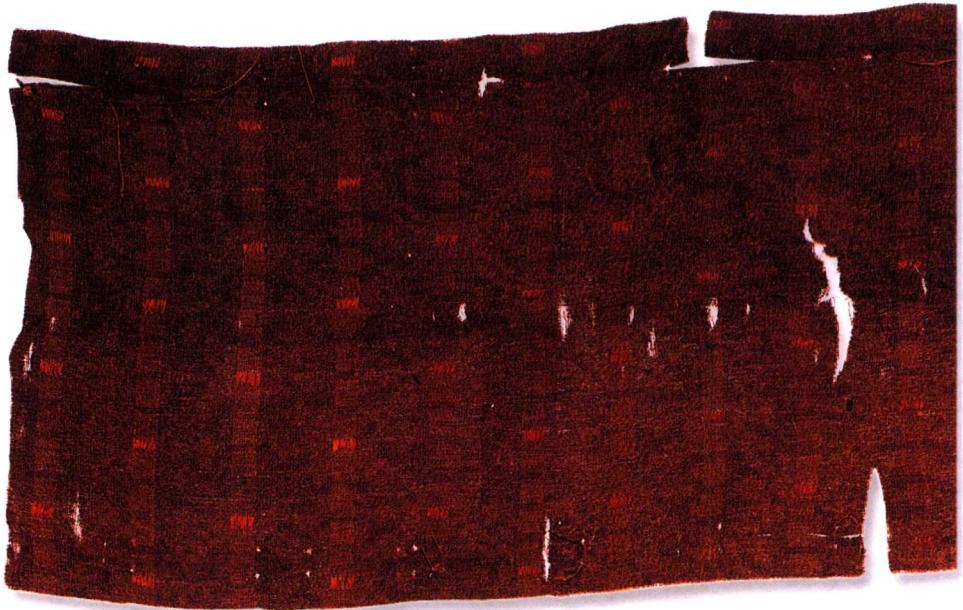
三色锦是经线起花的平纹重经织物。纹样横向布置，由按纬向排列的七组不同的三角形图案组成，以歌舞人物和龙、凤鸟及其他动物为主题。这种横贯通幅的提花纹样和织锦左侧一组图案的错综现象，反映当时已经有成熟的提花织机和织造技术。

290 塔形纹锦

战国中期/幅宽约49厘米 花纹经向长3.7厘米 纬向宽1.4-1.6厘米/江陵马山1号墓

这是一件二色锦，由小方块构成塔形的纹样。纹样顺经线方向作条带状排列，并用分区配色法，使相邻各条带的颜色避免重复。

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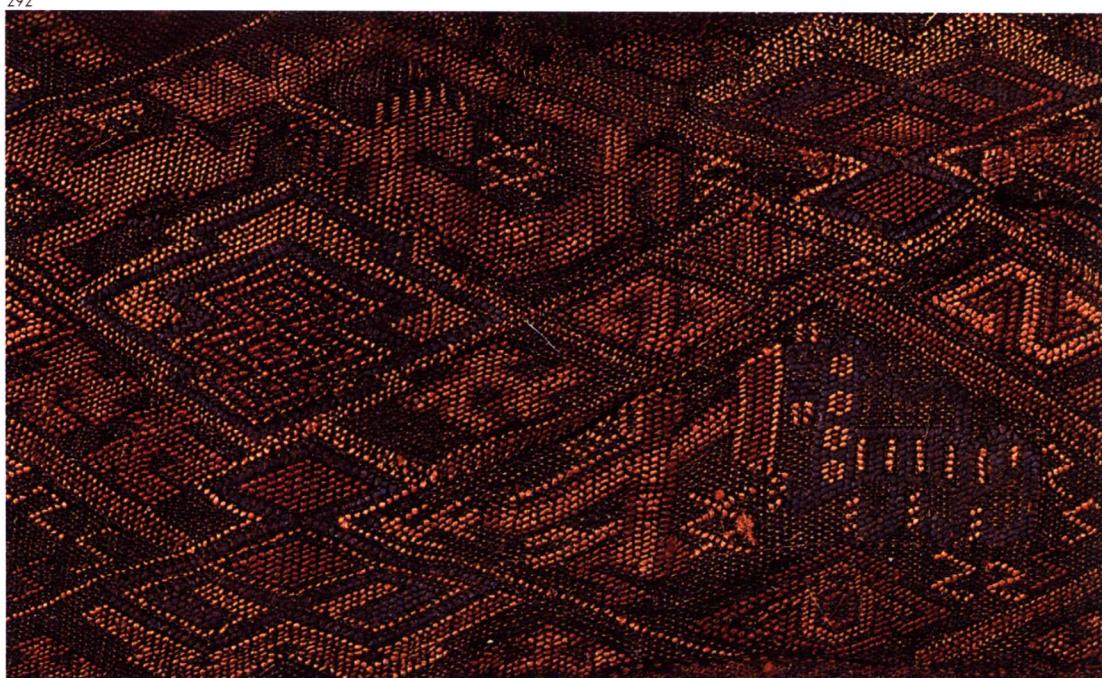


291 十字菱形纹锦

战国中期/花纹经向长4.2厘米
纬向宽2.8厘米/江陵马山1号墓

这是一件二色锦。在小方块组成的菱形内，填充四个十字形，在菱形四角各有一个大十字。在织造大十字的中心点时，改变经线的组织点，织入红色纬线，并使之浮在织物表面形成红心。由于这种锦有两色纬线，故织造时要使用两个杼，这是它不同于一般二色锦的地方。

292



292 田猎纹绦

战国中期/幅宽6.8厘米/江陵马山1号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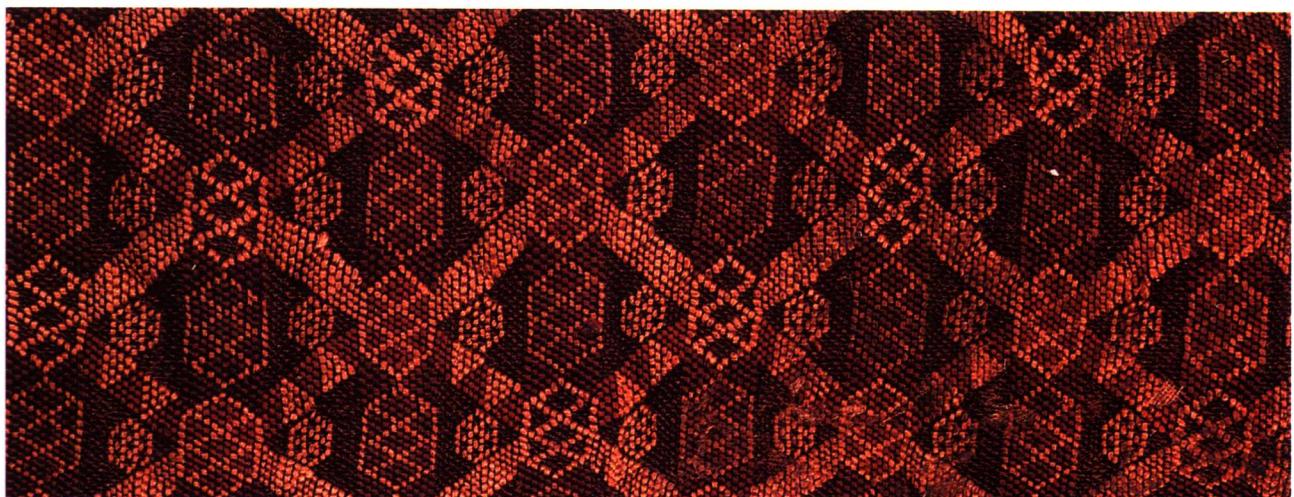
这是一件纬线起花绦，用作袍领。花纹由上下两行错位排列的四个菱形组成。上行是贵族射猎的场面。右侧的菱形内，是一辆奔驰的田车，驭者双手驾马，贵族作站立状正张弓放箭；左侧的菱形内，一只野兽已中箭倒地，另一只鹿正仓皇逃命，箭矢从旁掠过。下行是两名武士，手持长剑和盾牌，与虎豹搏斗。在狭窄的绦带上，描绘出田猎的广阔场面和诸多人物，足见设计、织造者的高超技艺。

293 六边形纹绦

战国中期 / 幅宽 6.1 厘米 / 江陵马山
1 号墓

这是一件纬线起花绦，用作袍的领缘。花纹由小六边形组成，按纬线方向排列成行。

293



马山的 丝绸宝库

1982年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大量丝绸，其中有锦袍、单衣、夹衣、单裙、锦裤及麻鞋等。按织造方法有绢、绨、纱、罗、绮、锦、绦及组带等八大类，包括了先秦丝织物的全部品种。织物的染色有棕、红、黄、黑、钴蓝、藕白、橘红、紫红、朱红、金黄、绿黄、灰白、浅褐等二十多种色彩。马山1号墓的发现，对研究楚国文化有很大意义：首先，它反映了楚国先进的织造技术。如经线提花的三色锦（舞人动物纹锦），织造时提花综多达一百四十三个，需要相当复杂的提花织机和织造技术。而新发现的三色锦带、提花和纬线起花技术，都把这些技术出现的时间，提前到公元前3世纪。其次，完好的衣衾包裹，也证实了文献记载的衣衾制度，并了解到楚国中、下层贵族对周礼葬俗的恪守。第三，墓中品类繁多的服饰，成为研究中国先秦服饰的丰富材料。最后，丝织品上大量的图案纹样，更成为研究楚人精神及时尚的艺术宝库。



294



295



294 凤纹绣绢被局部特写

295 马山1号墓棺盖揭开之后
满满一棺丝 绢

马山1号墓的放满丝质衣衾的楚贵族内棺，棺盖揭开后，丝绸保存完好，最上层放一件素纱绵袍和蟠龙飞凤纹浅黄娟面衾。图中是取去素纱绵袍后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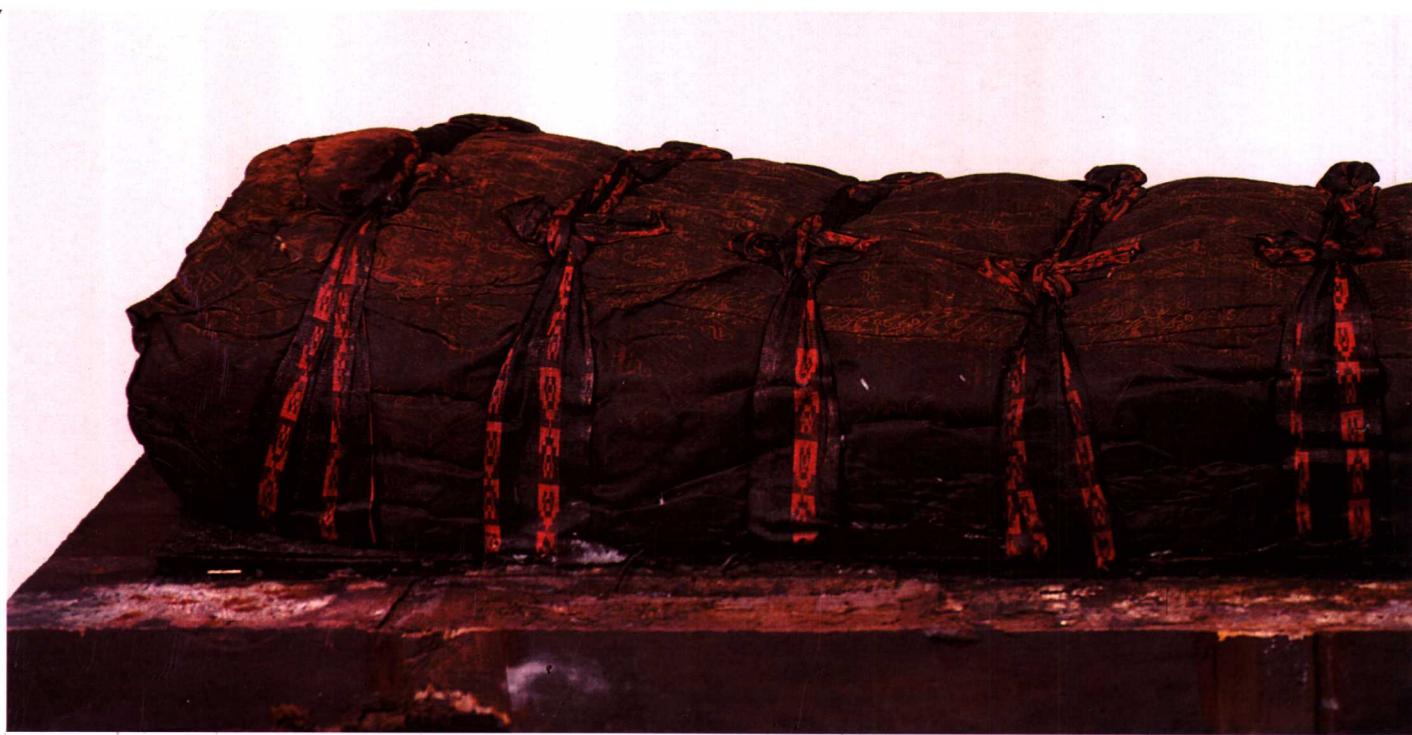
296



296 马山1号墓第二层包裹
——凤鸟几何纹锦面衾

297 用九道锦带捆扎的衣衾
包裹

297



298



299



298 衣衾包裹特写

捆扎用的锦带为塔形纹锦，衣衾是舞人动物纹锦。

299 丝织品整理现场

丰富的矿藏 与精巧的青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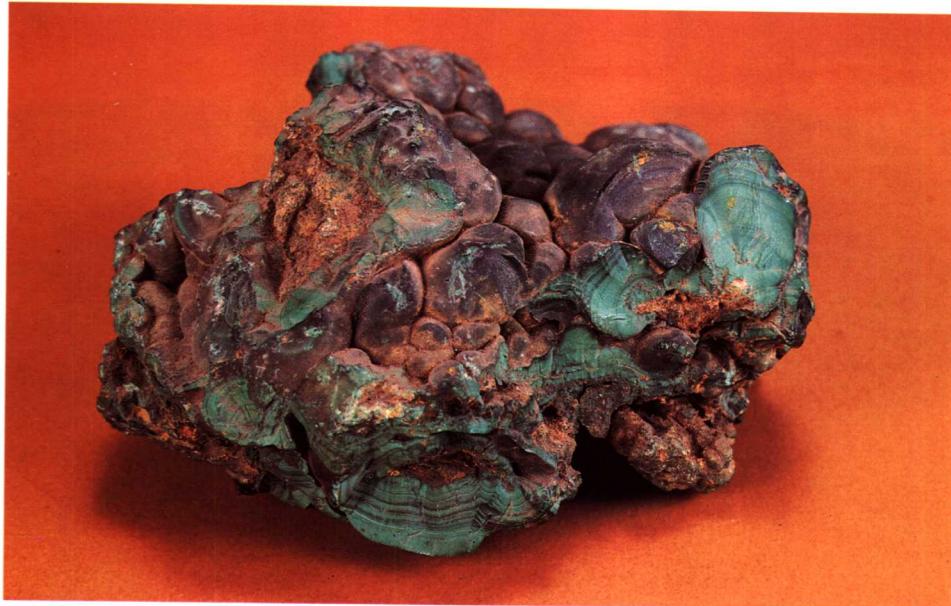
铜绿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型矿藏，该地并入楚国后，使楚国的铜矿资源极为丰富，冶铸技术也随之发展起来，造出大量青铜制品。目前发现的楚国青铜器，大多形制精美，铸造细致。至于楚国著名的“失蜡法”，更堪称先秦时期冶铸技术的典范。

300 铜绿山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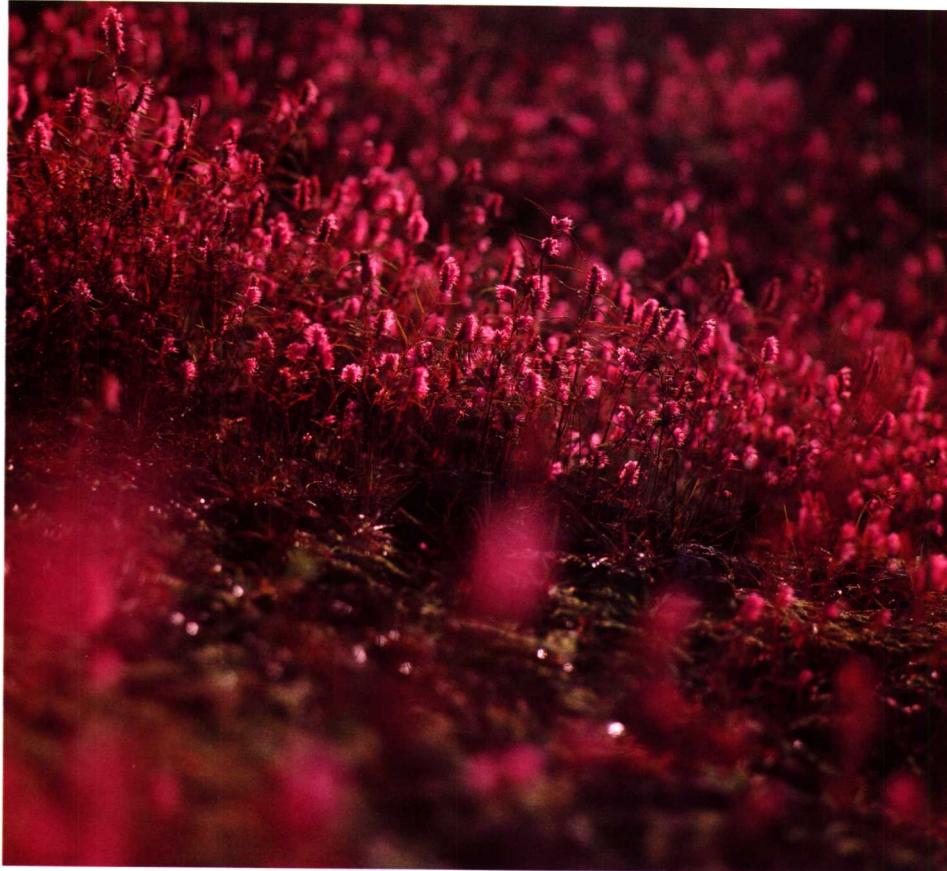
300



301



302

**301 铜矿标本孔雀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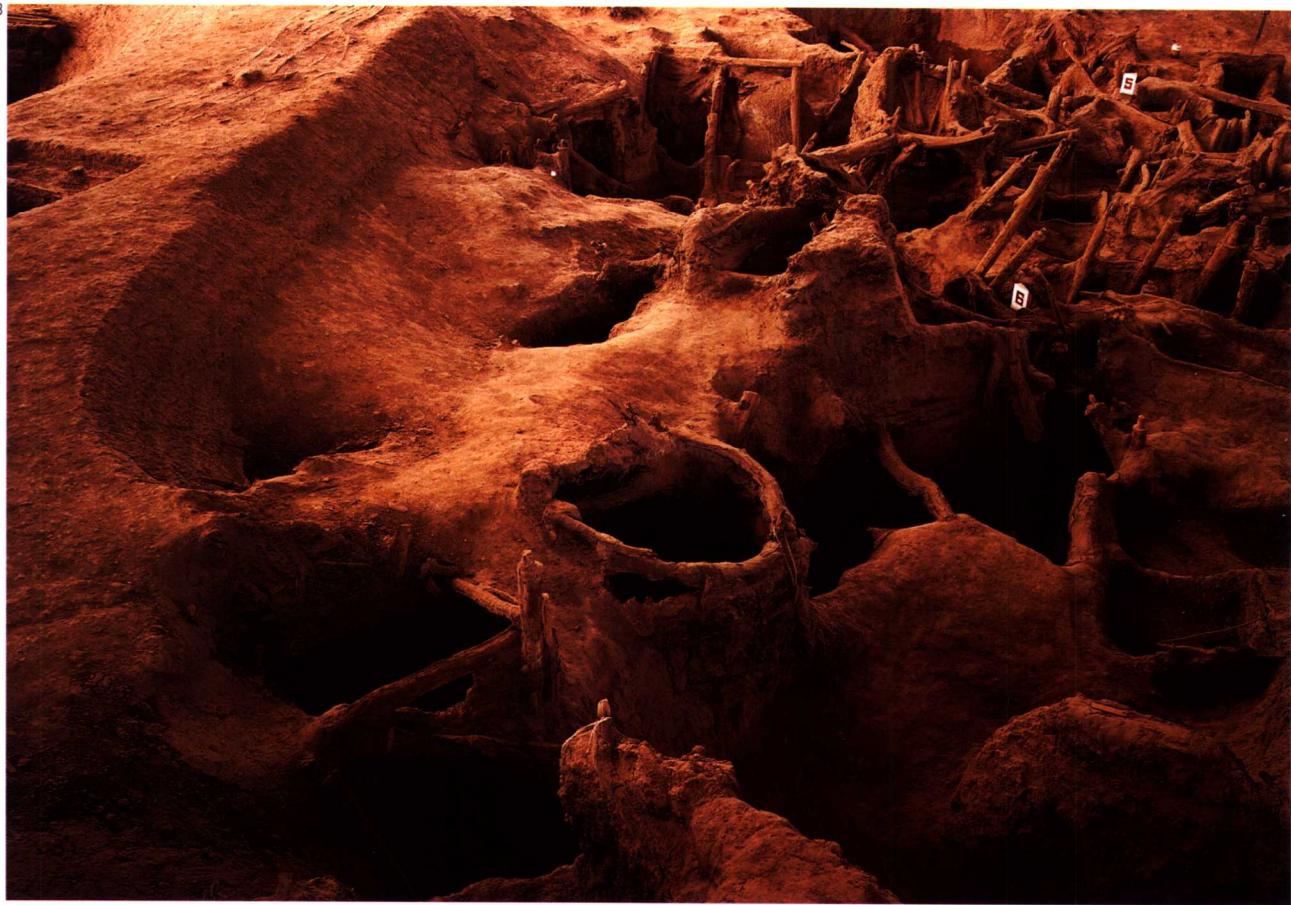
铜绿山

铜绿山铜矿矿石的含铜量在5.8%，部分可达15%-20%，主要矿石有孔雀石、赤铜矿和自然铜。

302 铜草花

铜草又名海州香薷，是铜矿的指示植物。凡有铜矿的地方，这种喜铜植物就长得十分茂盛。在铜绿山遍地生长着铜草花。

303



303 铜绿山铜矿竖井

春秋时期，楚人探矿是采用浅井探矿和陶沙盘两种方法，后者是使用陶沙盘用水陶沙，使含铜的重沙沉入盘底，从而可追踪富矿。至于采矿的方法，是以竖井进行挖掘，当竖井挖到含铜量高的矿石时，就旁开平巷。一般竖井的底部，是用四根木料穿梭上下两幅框架的“马头门”，门高与平巷相同。采矿之后就地冶炼。图中是铜绿山11号矿体，乃春秋时代的铜矿遗址。图上方的是平巷，用来运输；图中的木架结构是当时采矿用的矿井支架。图下方形或圆形的木支护井口，是竖井的井口。仅此11号矿体，就清理出炼炉八座，整个矿区的炉渣，更超过40万吨，可炼出红铜10万吨。

304



304 铜绿山采矿工具——木斗

长62厘米

305



306



307



305 铜绿山采矿工具——铁锄

春秋至战国/宽7.2厘米/铜绿山

306 铜绿山采矿工具——木锹

春秋至战国/76厘米/铜绿山

307 铜绿山采矿工具——铜斧

春秋至战国/高40厘米 刀宽43厘米/
铜绿山

开采铜矿，除了用竖井外，还需要其他工具配合，图中的木斗是用以在坑道舀水，木锹、铁锄和铜斧则用以在铜矿内开挖矿石。

308



309



310



308 铸镶龙纹铜盥缶局部

309 铸镶龙纹铜盥缶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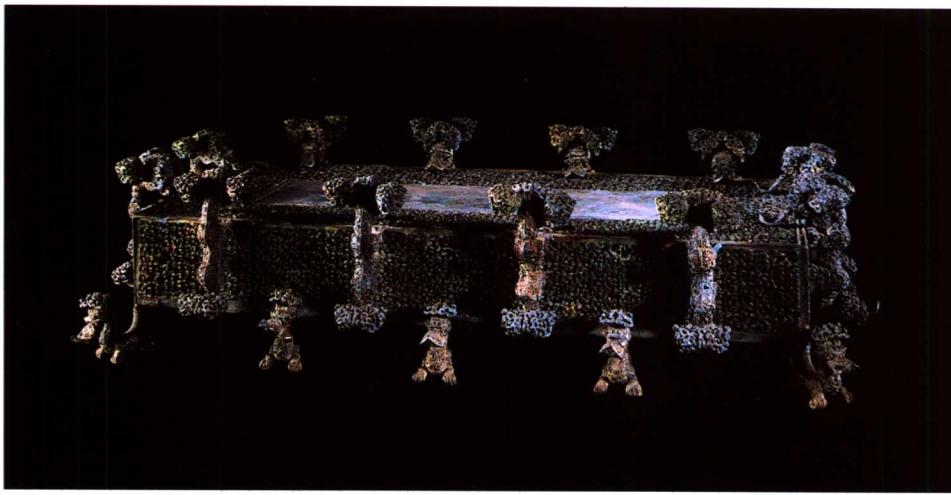
310 铸镶龙纹铜盥缶

战国早期/高36厘米 口径25.2厘米/
曾侯乙墓

盥缶上的红铜蟠龙等纹样，是
用铸镶法制作的。



312



311 建鼓座

战国早期/高54厘米 底径80厘米/
曾侯乙墓

建鼓是一种贯柱大鼓。此器是最早的建鼓实物，也是现今所见最精美的一件先秦建鼓座，出土时仅存鼓腔、贯柱和鼓座。

铜座由十六条大龙和数十条攀附其身的小龙纠结穿绕而成。龙身镶嵌绿松石。全器用了圆雕、浮雕、阴雕技法和分铸、铜焊、锡焊（铅锡合金的低熔点焊）等工艺。

312 铜禁

春秋/长131厘米 宽67.6厘米
高28.8厘米/淅川下寺2号墓

先秦时代的青铜铸造方法，大致有三种：简单的器物多采用整体一次浇铸的浑铸；复杂的器物就采用先铸附件，再铸接器体的分铸；至于器型奇特的器物，则采用失蜡法（熔模法）。这铜禁是用失蜡法铸造的，铜禁上的镂孔装饰，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失蜡法证据，它把中国失蜡铸件出土的年代，由汉代提早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

多种多样的 春秋战国漆器

春秋战国时期，漆器在楚地十分盛行，无论是镜子、扇子、饮食器具等日用品，还是祭祀用的礼器中，都有漆器。加以楚墓采用白膏泥密封木结构墓室的方法，有利于漆器的保存。故此，楚墓成为现今出土漆器最多的墓葬，这些漆器亦成为今人了解楚文化的重要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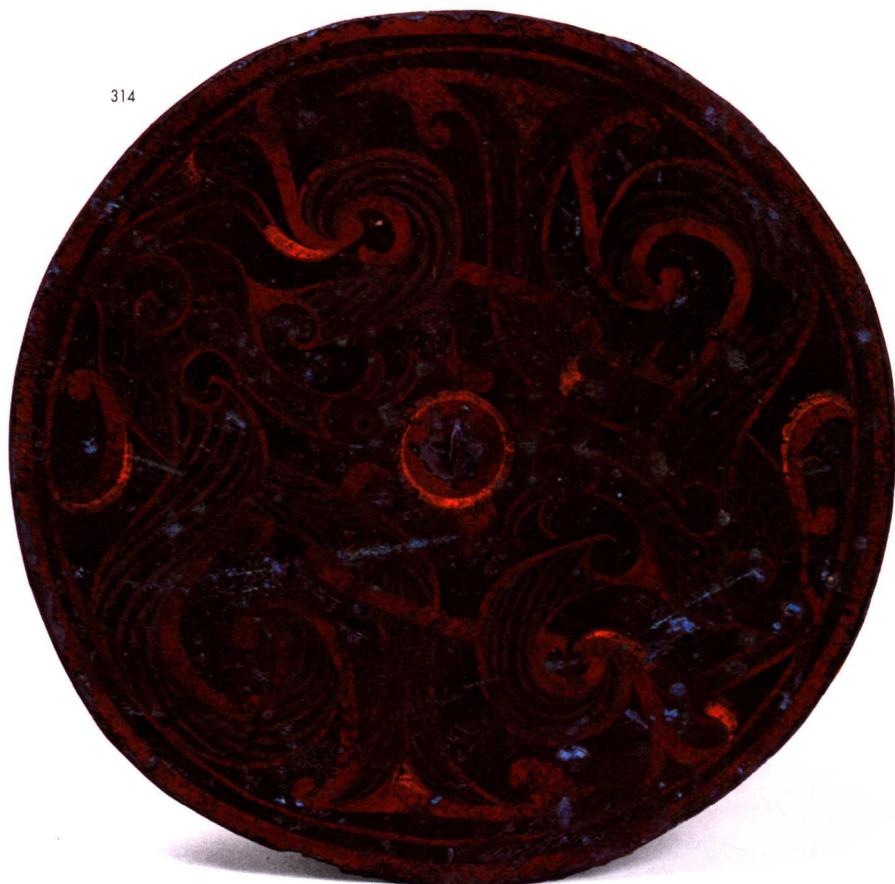
313



313 漆绘铜方镜

东周/边长10.5厘米/江陵刘家湾

314



315

**314 漆绘龙纹镜**

战国晚期/径17.2厘米/老河口仙人渡安岗2号墓

315 对龙纹漆杯形器

战国早期/高11.2厘米 径11.8厘米/曾侯乙墓

器身用红、金、绛色饰雷纹、绹纹、涡纹和八组夔龙，底部有二孔。但此器的用途不明。



316-317 蟠螭纹漆耳杯

战国中期/长径18.1厘米 宽径10.8厘米/江陵马山1号墓

此器双耳与常见耳杯不同，耳面外斜，横断面呈三角形，是成套耳杯居中的一个。内底所绘蟠螭纹比铜器放大许多。在器外壁满绘卷云纹，则是仅见的一例。

318



319



318 云纹圆漆盒

319 云纹圆漆盒顶部

战国晚期/高10.8厘米 口径24厘米/
江陵雨台山351号墓

漆盒是取代青铜礼器中的盒而出现的，是一种漆礼器渐取代青铜礼器的表现。此器表面所饰的云纹对称图案，是承袭了东周铜器纹饰的传统构图风格。

320





321 彩漆木筒

战国晚期/高28.8厘米 径6.2厘米/
包山2号墓

器身髹黑漆，用红、黄、金绘
变形凤纹。

322



323

**322 雕花云纹漆几面**

战国中期 / 长60.4厘米 宽23.7厘米
高48厘米 / 信阳长台观2号墓

古人席地而坐，用几来凭靠，
几因此又称凭几。

323 矩纹彩漆竹扇

战国中期 / 长40.8厘米 宽2.5厘米 /
江陵马山1号墓

竹扇形状如直立的刀，扇面用
细薄如纸的篾髹漆后编织而
成，靠近柄部留有两个长方形
孔。这种形状的扇，古称“便
面”，用来遮挡阳光和风尘。
两孔则为方便眼睛观察。形状
相似的竹扇在西汉的墓葬也有
发现。

四·楚人的艺术

楚艺术是楚文化的重要内容，原因有三：

(一) 人们对楚文化的深入认识，始于楚艺术。20世纪30至40年代，一些楚墓（包括楚幽王墓）被盗，铜器、漆器、帛书、帛画面世，随即引起中外学者的重视。由于楚国艺术品的风格独特，引起学者对楚器纹样、楚人铜器与中原相异的艺术风格的研究，这些都成为人们认识楚文化的先导。

(二) 又因为上述楚艺术品的发现与认识，开始从物质和形象上知道东周以降，中国文化出现了以楚和周为代表的南、北两大文化流派，进而探索长江流域早期文明，尤其是先楚文化的情况。

(三) 透过楚的艺术品，人们可以了解楚地早期文明成长的重要线索，可以见到楚人在器型、器类、纹样装饰技巧等物质形态上以追慕中原为主，在生活情态和精神上则把商周早期好巫信鬼的作风与南方土著的原始信仰融为一体。

1·楚艺术渊源及特点

正如前文所说，楚国兴起于商末周初，在春秋以前还是一个强大的势力。楚人的早期活动情况，到现在还不完全清楚，而楚国文化的元素似乎颇为复杂，因此要寻找其艺术的渊源和分析其艺术传承有一定困难。

具有鲜明特色的楚艺术是在东周时期形成的，其形成原因约有以下数点：

首先，江汉地区森林沼泽的生态条件，复杂多变，是巫风盛行的良好环境，丰富了楚艺术的题材。

其次，是楚地较炎热的气候促成了冥想清修，造就了道学形成和发展条件，丰富了楚艺术的想象。

最后，是交通便利使楚地内的各个地方文化得以融合，甚至与中原、东夷等外来因素交流，这种环境也是形成楚艺术特色的根本渊源。故此，楚艺术特点可说是楚人特有的社会生活环境赋予的。

另一方面，楚国的文物风格很独特，虽然因为器物门类繁多、各有特色，例如青铜器器型比较中原来倾向纤巧修长，如高足鼎、高足楚式鬲、提梁壶等，但整体上，楚国艺术品仍可归纳为几个特点：

- (1) 题材方面。楚国偏好龙、凤、蛇、虎、鹿等动物及云气纹和神怪巫觋题材，充分表现巫风的影响。而较为生活化的内容，则多宴饮乐舞和狩猎等声色享乐场面。此外，大抵受到精神信仰的影响，题材中亦表现出天人相通的意识。
- (2) 装饰崇尚繁缛细密。在战国中期以前的青铜器，及以后的漆器和织物都可以见到。

如典型器物有淅川楚墓的升鼎，曾侯乙墓的尊盘、铜豆，秭归、随州出土的铜敦，望山出土的错金银铁带钩等。

(3) 色彩丰富瑰丽。楚国的器物向来以色彩夺目见称，而众多色彩中，又以红色为尚，原因除了红色颜料（多为朱砂）的化学稳定性较高外，更因为它是巫教社会中鲜血、生命的象征色彩。如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衣衾以红色为主，淮阳的楚车马坑发现的战旗，亦全是火红色的。而楚漆器的纹饰也基本上是红色的。

(4) 线条运用不拘常格，飞扬流畅有强烈的运动感。这主要见于漆器、织物等艺术品。

(5) 纹样经常用分解变形、重新组合等抽象手法。楚人常抽取事物的一种特征，如一目一喙、一羽一爪来象征该物；或以近乎纯粹的曲线来表现一种形象。这常见于丝织品上的龙凤纹。有的纹样，线条飞扬流畅，有强烈的运动感，这主要见于漆器、帛画和部分织物。

综合而言，楚人这些贯穿各种艺术品的风格和特点乃源于自然，又不受自然形态限制，是楚人凝聚理想与现实所构成，这种超凡的创作想象，远远强烈于黄河流域，是楚文化区所独有的。曾有学者指出楚人艺术是“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而独创一格”，可以说

精辟地概括了造成楚艺术风格的原因。

另外，目前所见的楚艺术品主要有铜器、漆器、丝织品等，这里有几点要注意：一是现今可见的楚艺术品，只限于楚人遗留下来的器物。二是“楚”不仅专指楚民族，还涵指楚疆域或楚势力范围，所以部分具有楚艺术风格的器物，是来自与楚关系较深的邻国，如曾、蔡、巴、濮、吴、越等。三是楚贵族与平民有不同的艺术情趣，而艺术品多来自上层社会，它反映的楚艺术面貌可能并不完整。

2·楚人的各种艺术

(1) 青铜艺术

春秋以前，楚地青铜艺术基本受商周文化的影响；春秋中期开始，楚人吸收各地各文化因素，渐渐形成独有的风格。这种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某种器型、器类或纹样装饰，能适应楚人的需要和被接受后，就会稳定地保持下来成为楚艺术的特点，并随着楚的扩张传播到毗邻区域。而楚地青铜器艺术的风格可分器型和纹样两方面说明。

在器型变化上，以鼎最有代表性。湖北当阳赵家湖出土的浅腹寰底和圆腹寰底鼎，属春秋早中期器物，是中原同期流行的式样。而在春秋中期的楚墓也发现了中原新式的盖鼎，但开始出现中原没有的束颈折肩特征。同时，盖鼎也出现了鼎腹变深、鼎足变高的特征，这与

中原的盖鼎腹渐扁圆、鼎足变矮的趋势截然相反。高足鼎后来就成为楚式鼎的一个明显标志。它是楚人吸收了“越式鼎”高足因素的结果，这种形式的出现，可能是与南方的客观环境有关。由于南方比较潮湿，其建筑早已用杆栏式这种抗湿功能较强的高足建筑。楚人采用高足器皿，也是基

于同一个心理原因。这种风格出现的时间，是楚武王（公元前740—前690年）自称蛮夷不久，礼器的风格异于中原，正好符合楚人争取江汉间“民和”的政治需要。

要注意的是，楚鼎的形制繁多，种类远超中原，其中有沿用别人的，也有创新的；有用以贸易和馈赠的，也有战争中夺取的，楚人不拘一格都拿来使用，出现楚鼎多种多样的现象。它一方面反映了楚人势力不断扩展，另方面也反映了楚人适应环境，不因循守旧的创新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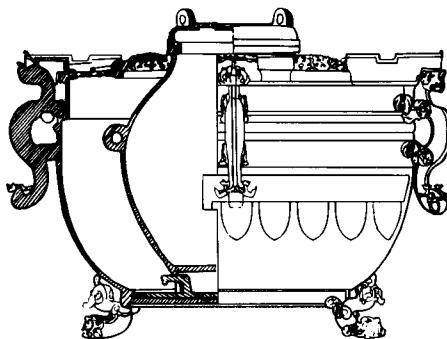
束腰平底的升鼎是楚人礼器中最典型的器物，被采用于春秋中晚期。它最早的形态见于随县周家岗曾国墓出土的西周中晚期的“廓季鼎”和刘家崖春秋早期的“登（升）鼎”。束腰的作风，曾被认为与楚人好细腰有关。从升鼎

的祭祀功能来看，陈放祭物时，浅腹平底比深腹寰底的造型合适，尤其是陈放肤（猪肉）腊（腊肉）和鸡禽一类南方常用的鼎实（鼎内盛放的祭品，曾侯乙墓的鼎实有鸡和雁），如采用直腹平底或鼓腹平底而不束腰，就会失去鼎的固有形态和美学趣味，或因鼎口太小，失去平底陈放祭物的

本意，因此，束腰敞口大概是最好的选择。楚人适应环境、不因循守旧的创新精神，在青铜器类的组合上也可以见到。

楚人早期在仪式上也采用商周传统的鼎簋的礼器组合。春秋中期以后多用鼎簋，战国又变成鼎敦、鼎盒组合。簋、簠、敦都是盛饭食的器皿，分别出现于商、西周晚期和春秋中期。楚人频繁更换食器组合的意义还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簋、簠、敦盛放不同的饭食品种。以敦为例，它源于三晋、齐地，却流行于江淮水稻地区。战国广泛流行的楚球式敦最早见于安徽寿县春秋晚期的蔡侯墓。楚人好新求变的取向，使青铜艺术在楚国得到空前发展，与同期中原青铜器的器型、器类比较，楚国青铜器的特点就是新、奇、变。

楚人青铜雕塑和纹样装饰特点有以下几个



插图·15 曾侯乙铜鉴缶结构图

方面：

- ① 在仪式用的铜器中，器物的耳、足、钮、提梁、环、附饰普遍用动物的头、身、爪予以装饰和夸张，而繁密精细程度亦远过于中原。如敦为楚人采用后，敦足就改成了兽足或龙形足。又如升鼎这种新型礼器，为避免因平底束腰敞口而显得单薄和缺少威重感，楚人在周边加饰多个圆雕爬兽，足部也做成兽面，使之美观而不失神秘感。
- ② 楚人追求纹饰繁缛的时间比中原长。繁缛的作风在中原兴盛于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就日趋式微，而楚地则保留到了战国中期。战国后期的楚国青铜器装饰才改为以素体为主，甚至仪式用器上的雕刻和纹样也是粗糙简单，仅存其意而已。
- ③ 铜器纹样方面，楚人沿袭了中原传统纹样，消长规律也与中原基本一致，如战国早期不见窃曲纹，战国中期以后雷纹、重环纹消失。与中原不同的是，楚器以蟠螭纹为主流纹样，演化要比中原多，到战国开始普遍流行云气纹。中原已少见的神怪图案在楚地仍然存在，如荆门车桥出土的铜戈上的舞人、随州擂鼓墩2号墓编钟上的神人操蛇形象。此外，铜镜上还出现大量中原不见的羽纹、山字纹。这些可能与

楚人的信仰和仪式有关（河北平山中山王墓也有山字形器，一般认为是在仪式中用的）。

④ 青铜雕刻和纹样装饰技法比中原进步。雕刻有浮雕、圆雕、透雕技法；纹样有嵌金银、绿松石和中原少见的红铜铸镶、填漆工艺，反映楚人在刻意追求铜器纹样的鲜明、富丽。

总的来说，楚人青铜艺术脱胎于商周青铜艺术，却没有后者那种庄严、狰狞，而显得活泼、新奇。器型、器类和雕塑装饰的简繁变化也完全反映出楚人精神世界和生活情态变化。在楚国兴起之初，仪式的重要性和火耕水耨生产方式带来充裕的闲暇时间，使青铜器的制作能精益求精，超过中原。愈到战国后期，楚国治内各地原始文化愈被整合成统一的楚国文化，社会世俗化的进程也愈快，楚人对神鬼世界的态度也变得现实，这使得青铜艺术走向衰落。这时一些有个性、写实的小件作品，如望山、包山楚墓的人骑骆驼灯、人擎灯、铜飞鸟等，它们已完全没有神秘意味。在文明史上看，楚地青铜艺术的衰落，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表明青铜艺术所象征的社会分层和财富意义，在战国中后期就从楚国逐渐消退。

(2) 漆器艺术

楚地漆器是中国漆器艺术的重要部分，尤其是战国时期的楚国漆器，最能表现楚文化的艺术特色。近数十年来约五千座战国楚墓出土的大量漆器，不但使我们认识到楚国漆器艺术的光彩，还导致对楚文化、楚艺术乃至先秦艺术的重新认识。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艺术尚未成型，如赵巷楚墓漆俎上的鹿和虎、龙等合体动物，其构图不讲究比例，线条粗犷而随意，便是一例。但到战国时，漆器艺术的发展已超越青铜艺术。这体现于各种多姿多彩的造型、丰富多变的纹样和反映社会生活、神话故事的漆画等方面。尤其各种漆画更能反映楚人精神和艺术特点。

楚地漆器的一大母题是动物。出现在楚国漆器上的有龙、凤、鹿、虎、马、猪、狗、蟒、蛇、蛙、鱼、鸳鸯、鹤、孔雀以及各种合体动物，如镇墓兽等。动物既有做成立体造

型，亦有描绘于器物上作为纹样的。

立体的动物造型有的较为写实，如曾侯乙墓的鸳鸯盒、望山楚墓出土的座屏等。座屏上

雕刻的鹿、鸟、蟒、蛙等五十五个动物，形态都准确自然。此外，亦有抽象的动物，最具特色的是虎座飞鸟、鹿角虎面或鹿角人面的镇墓兽等合体动物，形态奇特，或鸟身而长角，或凸眼长

舌。这种抽象的合体动物是楚地漆器艺术的一大特色。

抽象的合体动物形象，最早见于春秋晚期，如当阳赵巷4号楚墓的漆俎的图案。在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漆棺、河南信阳长台关的锦瑟上也可看到。战国中期以后仍然流行，乃至西汉时期仍能见到这类怪兽形象，如长沙马王堆的漆棺。这种处理手法在巫教艺术中是常见的，有很古的渊源，但在楚文化中最具有特色，而且流风遍及楚的整个疆域，可能是楚人受土著文化浸染的结果。



324 毛笔及笔筒

战国晚期/笔通长22.3厘米(毫长3.5厘米) 筒长24.5厘米 径2.5厘米/包山2号墓
楚人除了用毛笔书写外，也用作绘画。此笔的笔毫硬度较大，能产生流畅的线条，传达楚人的神韵。楚人毛笔与现在的毛笔不同，是绑在实心笔杆外面而不是装在空心竹筒之内的。

在动物纹样和造型上，另一值得注意的是龙凤纹。龙凤原是商周铜器的传统纹样，但在楚的漆器上，则显得形态自由，经常在器皿上作二方或四方连续装饰，也有对称出现在器皿中心，或在器体上作为主题构图，如包山楚墓的漆棺。龙凤纹样亦有写实和夸张之分。写实的龙凤纹，在楚国的早晚期都有发现，1992年沙市喻家台楚墓出土的一件漆瑟上，风鸟已写实为孔雀，只是在另外几只未完成的孔雀的轮廓上，才看出与楚墓常见的凤鸟形象的相同之处。龙凤纹以夸张变形的为多，有的只剩下类似卷云纹的龙的躯干，卷曲的凤翼、凤尾或者凤首。如曾侯乙墓出土的彩绘马胄、马甲上，便有抽象化的蟠虺纹与勾连云纹难以区分的现象。

至于楚地漆器的纹样，有仿自铜器的，如蟠虺、窃曲、圆涡（火纹）、雷纹及三角纹等，如曾侯乙墓的漆棺、瑟、豆、禁和杯形器上，都有这些仿自铜器的纹样。但在战国中后期，云纹成为主流，摆脱了在商周铜器上只作为地纹陪衬的地位。云纹演化极多，有云雷、云鸟、勾连、卷云、三角云纹、涡云纹多种，有些云纹是蟠虺、窃曲、雷纹和龙凤纹极度简化的结果。云纹在各地的漆器上都是常见的图案，但楚国的云纹萦回变幻，有如行云流水，使人感到楚人“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

之外”（《庄子·逍遥游》）的超然感，表现楚人刻意追求线条流动和柔美，完全异于中原平实规整的纹样风格。

几何纹饰是最古老的装饰纹样，陶器上也经常出现这种纹饰，其渊源不十分清楚。而漆器最早是发端于南方印纹陶地区，因而漆器的几何纹样可能是受早期陶器纹样影响的（当然也不排除是当地土著居民审美观的反映，是独立发展而成，而非受其他器物影响的）。目前所见，楚漆器的几何纹样有三角、菱形、方格、弧线、点纹、目纹、绹纹等，多装饰于器物周沿、腹部、足部，与铜器和陶器相比，漆器上很少以几何纹作为主题，但其变化繁复，色彩艳丽，是铜器、陶器的同类纹饰所无法比拟的。

楚地出土的漆器上，还有丰富的漆画，填补了先秦绘画史的空白。在光滑的漆器上可以用毛笔绘画，显得圆转流畅，不受拘束，易于表现楚人的精神和生活情态，不似青铜器因为受模范铸造的限制，显得规整。楚地的漆画既有神话的题材，也有生活风俗的表现。其代表性作品见于曾侯乙墓的漆棺、衣箱、鸳鸯盒和包山楚墓出土的漆画。

曾侯乙墓出土器物上的漆画，几乎集中了先秦的神话形象。在墓主漆棺上，绘有人首、鸟首，双首、多首龙五百四十九条，蛇二百零

四条，鹿、鸟、怪兽一百四十二个，守护墓主人面神兽合体动物二十个。衣箱上则绘有星象、苍龙、白虎、伏羲、女娲、后羿射日等神话题材。鸳鸯盒上更绘有怪兽敲钟击磬图案。这些画像构图繁复，形象夸张，色彩浓烈，有极强的仪式氛围，反映墓主欲得动物或神灵帮助，自由出入幽明两界的愿望。另外，在信阳楚墓锦瑟上的漆画，也可以见到巫师作法，人兽合体动物宴乐的场面。可见巫舞和神话题材是楚漆画的重要内容。艺术在这里是祈求幽明相通的一个必要手段，比青铜器、玉器艺术表现得更为直接，这是楚地漆画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随着社会的变化，战国中期以后，楚漆画出现了世俗生活题材。长沙黄土岭楚墓的车马卮、舞女卮和颜家岭楚墓的狩猎卮均以写实为主，这是楚人生活和精神变迁的写照。包山楚墓的漆画，更以长卷画面的形式，表现当时的社会生活，远早于宋元时代流行的长卷风俗画。它没有出现神怪形象，人物车马、动植物均绘制得自然恬淡，色彩鲜明但不夸张，与以往漆画的笔意恣肆、线条飞扬的作风大相径庭。漆画内容变成以生活为题材，是楚人精神生活受世俗化进程影响的反映。

从技法上看，较早期的信阳锦瑟漆画中还可以见到古代埃及、希腊人喜欢采用的构图，

即人物侧面时肩部也绘成正面的画法。但后来写实的漆画，却采用了典型中国画的平行透视法，在文化上虽不能说哪种技法高明，但在心理认知上，它把中国画技法形成的时代推前了一步。这是摆脱铜器材料限制后，漆工显示出来的卓越的绘画写实技巧，以及熟练活泼的笔法。

总括而言，楚地早期漆器受到青铜礼器的影响，当青铜艺术走向尽头，出现简化趋势后，漆器反而能摆脱仪式的影响，出现更繁荣的局面。这既是社会进展的结果，也可能与楚人不受拘束的性格有关。

(3) 丝织艺术、帛画和壁画

中国北方在商代就有了织花丝绸（纹绮），西周时期已发展出刺绣和织锦技术。但是，目前所见东周（主要是战国）较完整的丝织艺术品和帛画均出自楚文化的范围内，中原基本上没有保存完好的艺术品出土，这给确定楚丝织艺术的传承带来困难。从楚人高明的纺织技术来看，它的纺织技术应在借鉴中原的基础上发展，而纹样艺术则反映了楚人的精神风貌。

丝织艺术是楚国艺术中一个很重要的门类。楚墓曾出土的大量丝织艺术品，其品类繁多，工艺精湛，色彩艳丽，纹样多类，堪称先秦的丝绸宝库。这些重要发现改变了传统上认为东周工艺美术只能依赖青铜、陶、玉、漆器

的格局，在楚艺术、中国艺术乃至世界艺术中，楚国的丝织艺术都占有重要地位。

丝织品的纹样有几何纹、动植物和人物故事三类。可能是受经纬的限制，几何纹主要是菱形纹。随着技术改良，当能织出三色经双重的织物后，这些几何纹饰中就往往填上动物、人物。如信阳楚墓中仅见单一的菱纹锦，而长沙左家塘的三色双重锦中就填上燕子。马山、包山则填以龙凤和田猎纹等。

植物纹样一般为花草藤蔓，严格按经纬和对角线组成方形、菱形构图，既起装饰作用又起骨架作用。动物纹样有龙凤、多首龙凤、虎、鹿、怪兽等，有时居中，有时身体与藤蔓结合为一。动物纹样的特点是头部比较写实，身体较为夸张，如凤的翼、尾，虎的身、尾等部分。数种动物或数个动物合体的现象也较普遍，如早期有曾侯乙墓出土的双首龙纹绣，中期有马山的三首凤、龙凤合体，晚期有包山的三龙一凤等合体纹样。这类想象奇特的图案，地域分布广泛，早晚期又非常一致，它作为文化符号的意义显然比较强烈。

人物纹样见于马山出土的舞人动物锦和两件田猎纹绦。其中舞人形象为长冠长袍，腰束丝绦，佩以饰物，双手上扬，龙、凤、麒麟等动物分组排列，很可能是描绘巫师作法的场面，故而织出这种高难度图案，它开辟了织绣

人物故事的新天地。

壁画是楚人主要的绘画形式，多用于宗庙仪式，大概有绘于墙壁和用丝织物裱糊于墙面两种。据记载，屈原在《天问》中对宇宙起源、人类产生、中原和楚地的信仰、神话、历史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就是因为见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上，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奇伟谲诡，及古圣贤怪物行事，有感而发。从中可知两点：一是壁画为王公庙堂的贵族艺术；二是所画内容不是为了艺术消遣，而有宣示信仰的宗教功能，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汉代。汉代著名的鲁灵光殿壁画“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海精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也是为了“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王公庙堂的壁画无法保存下来。但楚墓偶有小型壁画可略窥一斑。江陵天星观1号墓室横板上绘有一幅壁画，用五种色彩绘菱形、卷云和三角花瓣状云纹；长沙烈士公园33号墓发现的龙凤蔓草刺绣图是裱糊在棺椁的四壁；包山楚墓椁室也挂有三龙缠体的织绣。它们的功能应该与壁画一样，这表明楚人壁画是仪式活动的重要部分。

楚人帛画是葬仪用品，是在丝织物上用笔绘画。艺术形式介于壁画和丝织艺术之间。长沙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都是战国中期作品，内容均反映墓主与

龙、凤、鹤游于天、地、人三界的情形，生动体现了楚人对宇宙分层、生与死、人与动物关系的基本认识，是浓厚巫风的真实反映。龙凤在巫术仪式中是常见的、具有通天本领的动物，帛画主人是巫觋一类的人物，他们不同于战国后期社会逐渐理性化、世俗化之后才出现的神仙。这种巫教的艺术风格在绘有怪兽、合体动物的楚帛(缯)画，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绘有天地人三界图案的帛画中得以印证。从绘画技巧上看，稍晚的“人物御龙帛画”比“人物龙凤帛画”更成熟，它的人物比例准确，画龙时用笔有顿挫转折；在构图上，加重画面上方的份量，以风足的姿势和女巫的倾斜产生运动感。前者画面中的龙和人物是静态的，只是利用冠带和舆盖丝带的向后飞扬表现出在空中高速行进，合乎道家静中取动的意境。

在中国艺术史上，完整的丝织艺术品和帛画只在楚地发现，这一事实已奠定了楚国丝织品和帛画的重要地位。至于其质地的华贵、品种多样反映出的技术、繁杂构图体现出的匠心、艳丽色彩流露出的活泼性格、纹样母题代表的民族精神以及完整故事场面所包容的习俗，使其他艺术形式都难以比肩，堪称楚艺术中最为璀璨的瑰宝。

(4) 玉器艺术

楚国玉器最早见于春秋晚期，出土地点并

非集中于楚人发祥地的荆山或沮、漳河流域，而多在汉水以北为楚所兼并的黄、申、邓、随等国境内。从楚人葬玉规格来看，有身份的人才能葬玉。

楚国玉器一出现就比较成熟，但与当地原始文化中的玉器艺术找不到直接关系，却与商周中原玉器艺术明显相关。楚国玉器中，商周玉器种类十分齐全，如礼玉（璧、琮）、葬玉（琀、玉握、俑、牌、玉动物）、佩玉（璜、玦、环、佩）和实用饰玉（梳、簪、觿、带钩、剑玉的珌、璐、琫）等式式俱备，工艺与中原轩辕难分。中原常见的阴刻、平雕、浮雕、压地等技法均能在楚国玉器中见到；中原传统的纹饰如蟠螭、蟠虺、兽面、云纹、鸟纹、涡纹和器型如“S”形玉龙佩也是楚玉装饰的主要内容。河南光山的春秋早期黄国墓葬出土玉器一百八十余件，其纹饰多样，制作精美，堪称典范。黄国在春秋中期（公元前648年）为楚所灭，其制玉技术当为楚所用，如淅川下寺楚墓所见的角形、虎形、兔形玉的样式都能在黄国玉器中找到原型，表明楚的玉器是吸收了中原的技术而发展起来的。

楚国玉器的艺术特点，是早期作品一般较小，很少见到圆雕、透雕作品，纹饰流行云纹、蟠螭纹、兽面纹等。战国早期以后，透雕作品开始增多，典型作品有信阳楚墓的双龙玉

佩，曾侯乙墓的透雕玉璜和四节、十六节玉佩。其中十六节玉佩由五块白玉和三个玉环、一根玉销钉连接而成，分别雕出三十七条龙、七只凤和十条蛇，是中国古代玉雕艺术的精品。“S”形龙形玉佩这时十分流行，纹饰保持着中原渐消退的“寄生同体”（动物主体上饰有小动物纹样）作风，“柳丝纹”（扭曲线纹的俗称）的出现也稍晚于中原，云纹、谷纹、涡纹、回纹取代了蟠螭纹、兽面纹的地位。战国中期以后，大型玉器较多见，实用饰玉也增多了。较突出的是贵族葬璧成为风尚，如淮阳楚墓一次出璧四件，包山楚墓、雨台山471号墓

出璧六件，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璧十六件，而晚期安徽长丰杨公的九座中型楚墓被盗后仍存的七十九件玉器中，璧有四十二件，其中2号墓竟多达三十六件。璧在中原文化里是重要的礼器，楚国中后期流行葬璧，大抵是上层社会更多地接受中原礼仪，逐渐远离巫觋文化的反映。

总括而言，楚艺术源于商周艺术，在东周时期融合当地土著文化之后，风格渐摆脱中原厚重雄浑、规整平实的作风，向诡谲阴柔、繁复绮丽发展。作品一般都流露出浓厚的巫风，显得怪诞洒脱，常被人视为夸张、超越常规、想象奇特的作品。实际上，楚人自己是从不把幻象与现实，心灵与物质区分开来，它们都是

一元的，都能归结于“道”。在楚人眼里，人、动植物、自然界之间是一个连续体。理性社会把一切超现实的都视为怪诞浪漫，而相信“天人合一”的楚人却反过来认为这是现实。用艺术来表现它，反映出楚人心理深层的认识。这种思想根源于古代原始思维和原始宗教，在江汉地区又进一步因为土著文化中巫风盛行所强化，可以说这是导致楚的艺术与中原艺术分流的原因，也是形成楚的艺术特色的关键所在。在秦汉大一统之后，这种特色又很自然地成为与官方礼教对立的民间俗文化的艺术源泉。

楚地各族 的艺术特点

楚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融合了国内各民族的艺术特色，表现出一种兼收并蓄的风格，因而楚艺术可说是代表了南方民族艺术的大融合。

325



325 黄季嬴铜鼎

西周晚期/高32.3厘米 径31.4厘米/
随县熊家老湾

周代诸侯国间的通婚十分普遍，封君常把女儿嫁到别国。黄国是嬴姓，出自东夷，地在今河南潢川，公元前648年为楚成王所灭。此鼎为黄国的季嬴嫁到曾国的媵器（陪嫁品），风格与宗周相同，属于中原风格。

326



327



328



329

**326 邓公乘鼎****327 邓公乘鼎局部——铭文****328 邓公乘鼎局部——蟠螭纹样**

春秋/高26.6厘米 径21.4厘米/襄阳山湾楚墓

邓国为曼姓，故城在今襄樊市北的邓城，是周人在南土的一个重要封国，公元前678年为楚文王所灭。邓公乘鼎的样式与同类楚鼎无异，两国文化显然相互影响。

329 弦纹铜盂

战国晚期/高36厘米 口径13.5厘米/江陵天星观1号墓

盂是温器，用来温酒或水，有时也和盘配合使用，属东周时期的一种礼器。这种高足的造型受到了越人器型的影响。



330

330 单虎钮𬭚于

战国/高82厘米/长阳鸭池

𬭚于是与鼓合奏的敲击乐器，流行于春秋至西汉，南方的巴、濮等族使用最普遍。在楚人的艺术形象中，往往可以见到与巴、濮等族的艺术风格相互影响的痕迹。



331

332



331 铜杯

战国晚期/高14.8厘米 口径5.9厘米/
江陵九店633号墓

这类型的铜杯不见于中原和江汉地区，而是带有越文化因素。楚墓出土这种受越文化影响的器物，清楚表明楚越之间文化的相互影响，如楚器往往有修长的风格，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332 曾侯乙内棺上的神话纹样

——水神禹强、朱雀白虎

先秦时代，民众普遍信巫好鬼，南方各国的巫风尤其浓厚。在高级贵族的墓葬中，这种神话形象的图案屡见不鲜，代表着当时的一种群体意识。图中描绘的龟蛇、蛟龙、水神等形象，也是楚人常用的艺术题材。

春秋战国时期 的楚国铜器

春秋时期，楚国的青铜铸造技术已有很高技巧，这时的铜器造型复杂、雕塑繁缛，其制作精巧甚至超过中原。战国时期，楚国的铸铜技术进一步发展，铜镜铸造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楚国铜镜在战国中期逐渐向北方传播，秦国铸造的铜镜，从形制看来，圆形、薄身、面平、边窄、三弦小钮等特征，基本与楚镜相同，明显深受楚镜作风影响。至于楚地的湖南地区，更可能是当时铸镜业最发达的地方。



333 龙首耳铜鍑

春秋晚期/口长11.7厘米 口宽9.7厘米 高5.1厘米/襄阳山湾楚墓

器身有一对龙首形附耳，腹部细密的蟠螭纹和云纹，是春秋时代流行的纹样。

334



334 兽耳铜缶局部

335 兽耳铜缶

春秋/高34厘米 腹径38.4厘米/襄阳
山湾红莲寺23号墓

335



336



336 镂孔凤纹铜镜

战国中期/径11厘米/江陵九店315号墓

铜镜背面有四对相背的凤鸟，
翅尾相连构成云纹，以表现凤
鸟乘风浮云的情态。

3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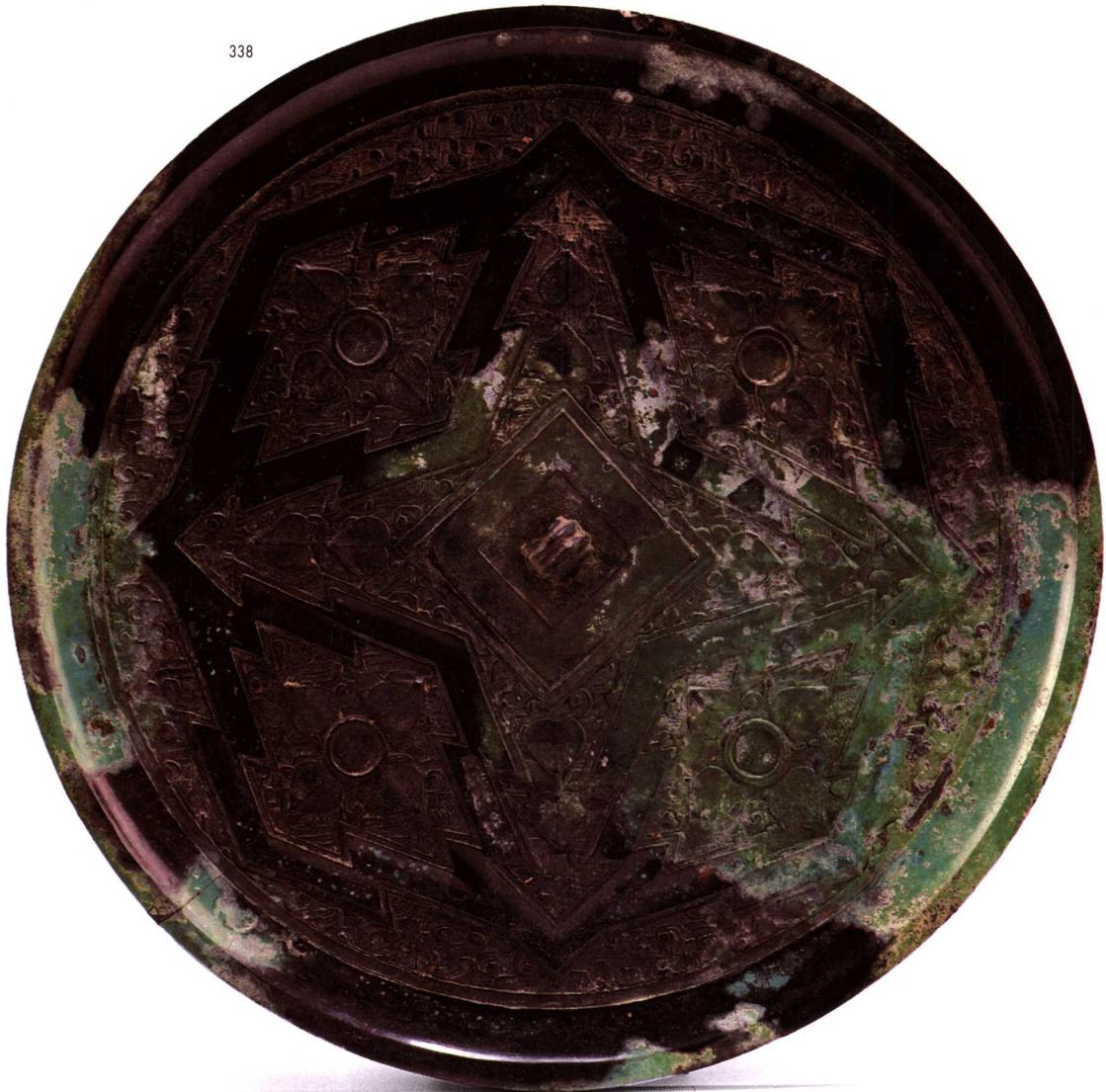


337 凤纹铜镜

战国中期/径12.2厘米/江陵九店
13号墓

铜镜背面用云纹为地，以鸟首相背的合体凤鸟为主体装饰，
鸟身上的羽纹制作极为精细，
是楚人铸凤纹镜的典型之作。

338

**338 菱纹铜镜**

战国中期 / 径21.2厘米 / 宜昌前坪
23号墓

楚国铜镜常用动、植物纹样和
几何纹样来装饰。这件菱纹铜
镜是几何纹样装饰的代表。

纤细繁缛 的失蜡法制品

楚国青铜器的纹饰精细灵巧，变化多端，自不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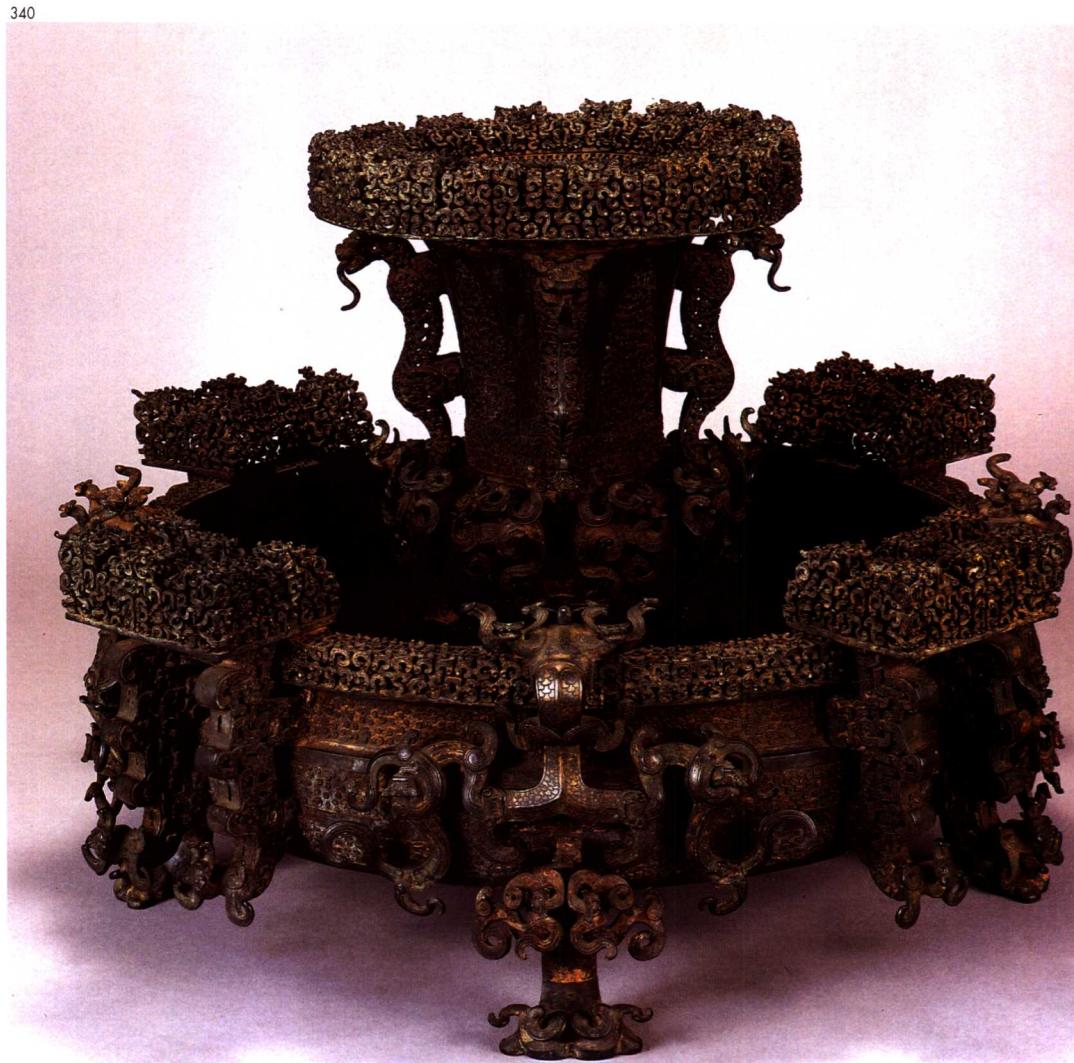
至于失蜡法的使用，更令后人叹为观止。楚国是中国最早使用失蜡法铸造青铜器的地区之一。所谓失蜡法，就是先用蜡料作一蜡模，在蜡模上涂以砂、石等粉末，形成一个坚固的外壳，然后加热熔去蜡模，这样就形成了铸件的外模。用这种技法制成的器物，其纤细程度，绝非其他铸造方法可比拟。



339



340



339 镂空蟠螭纹铜尊盘局部
——尊上的镂孔爬兽

340 镂空蟠螭纹铜尊盘



3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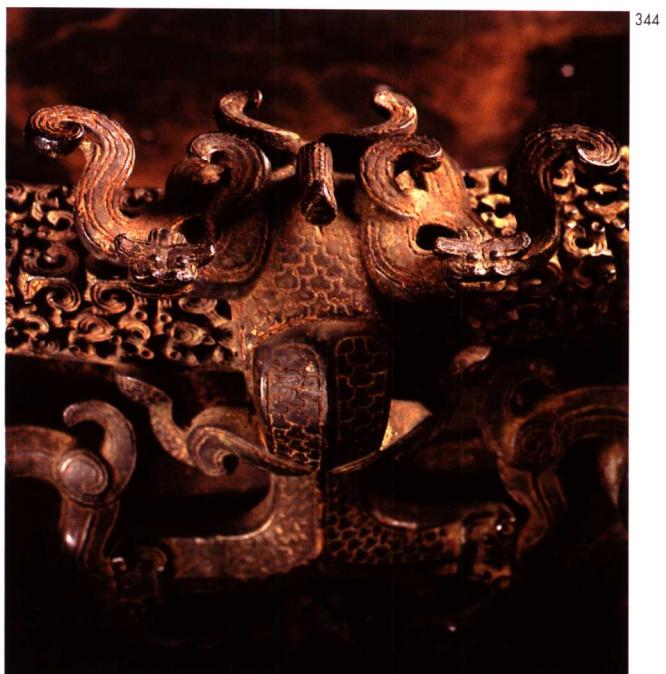


342



341 楼空蟠螭纹铜尊盘局部
——尊圈足上的龙

342 楼空蟠螭纹铜尊盘局部
——用失蜡法铸造的蟠螭纹透空口沿



343 楼空蟠螭纹铜尊盘局部
——盘足

344 楼空蟠螭纹铜尊盘局部
——盘口沿上的爬兽

战国早期/通高41.6厘米 尊高30.1厘米 尊径25厘米 盘高23.5厘米 盘径58厘米/曾侯乙墓

尊内盛酒，盘内盛冰。尊盘造型典雅华贵，共装饰八十四条龙、八十条蟠螭，工艺先进复杂，用了七十二个部件、一百处焊接而成，尊盘口沿和附饰

都采用失蜡法铸造。先秦时期制作铜器所用的分铸、熔模、铆焊、雕刻多种工艺，都在尊盘上得到完美的体现，是东周时代铜器中最杰出的作品。春秋中期以后，流行繁缛纹样，至战国早期到达顶峰，此后又逐渐衰落，反映了人们精神状态的变化。而这件尊盘正是繁缛装饰作风的典型代表。盘内原有曾侯乙先君的铭文，后改刻，可见它是一套用于宗庙祭祀的重要礼器。

楚国铜器 的纹饰与造型

春秋战国时代，楚国铜器的纹饰，以龙凤为主，这是楚人认同中原文化的象征。至于楚地流行的神怪和云气纹，则是南方巫觋文化影响的结果。此外，由战国开始，楚国青铜器又出现了一些写实造型，使楚艺术品表现出更加多姿多采。



345 曾侯乙编钟下层铜人立柱
编钟铜人的雕塑特色是人物写实、眉目清晰、神态威武庄重，看不到希腊罗马青铜雕塑那种以解剖学为依据，注重个性表现的风格，开后世秦俑神态造型的先河。

346



347



346 嵌错绿松石龙凤纹青铜盖豆局部——盖顶

347 嵌错绿松石龙凤纹青铜盖豆

战国早期/高26.4厘米 口径20.6厘米/
曾侯乙墓

**348 菱形云纹铜敦**

战国中期/高22.8厘米 径17.5厘米/
秭归树坪斑鸠窝1号墓

战国中期以后的铜器，以素面为多，像这个通体以范铸菱形云纹的食器已不多见。

349



350

**349 错银龙凤纹尊****350 错银龙凤纹尊局部**

战国中期/通高17.1厘米 口径24.4厘米/江陵望山2号墓

战国中期以后，铜器铸造趋于简约，很少在陶范上制作纹样，代之而起的是各种嵌错工艺，以弥补素面的不足。这件铜尊盖面上有四组共三十六只凤纹，器身六组二十四只龙纹，纹样繁复多变，布局严谨有序，线条柔细畅达，为中原地区所未见。

351 人骑骆驼铜灯

战国中期/高19.2厘米 盘径8.9厘米/
江陵望山2号墓

此灯形象写实，反映出楚人与北方民族有商业贸易交往。值得注意的是，骆驼形象在先秦青铜器中是极为罕见的。

352 人擎铜灯

战国晚期/通高16.3厘米 灯盘口径
8.8厘米/包山2号墓

铜灯最早见于战国中期。此器由灯盘和铜人组成。盘中有锥状灯焊。铜人头挽右髻、深衣、博带、跽坐，右手执灯。这灯可盛油或插烛使用。楚国铜雕人物像极为罕见，从该灯柱雕成的人物，可见楚人的衣着习俗。

352



351





354

**353 铜飞鸟**

战国晚期/高21.4厘米/包山2号墓

354 错金云纹器盖及错金蟠螭纹器盖

战国晚期/左高1.5厘米 径11.1厘米
右高1.9厘米 径10.1厘米/包山2号墓

楚国漆器 的典型纹饰 ——龙凤纹

漆器的成本较青铜器低，而且取材方便、雕刻容易，又能用毛笔绘制，创作空间较大，因而漆器艺术在楚国逐渐盛行。漆器艺术发展初期，多以模仿青铜器的风格为主，然而在战国中期以后，仿铜作风已逐渐减退。至于楚国漆器的题材，以动物纹较为普遍，而龙凤纹则是动物纹的主要纹样，但漆器上的龙凤纹却多以变形和抽象形式出现，充分表现楚人的别出心裁。

355



355 对龙纹漆杯局部——仿铜
蟠龙纹样

战国早期/曾侯乙墓

早期的漆器，常有仿铜器的雕刻和彩绘，因而这幅蟠龙纹样与同期青铜蟠龙纹样，有一致的风格。



356

356 对凤纹漆耳杯

战国中期/口长径15.7厘米 宽径10厘米/江陵马山1号墓

自商代以来，凤鸟被当作四季和四方风的化身，一直受到崇拜，但以具像凤鸟作为耳杯的装饰纹样，却较少见。此器底部饰满两只凤鸟，首、尾上扬，身体弯曲，作跨步状。全图华丽，线条流畅，柔美之中透出力量。

357 彩绘漆棺局部——侧面

四凤分开图案

358 彩绘漆棺局部——侧面

四凤首相聚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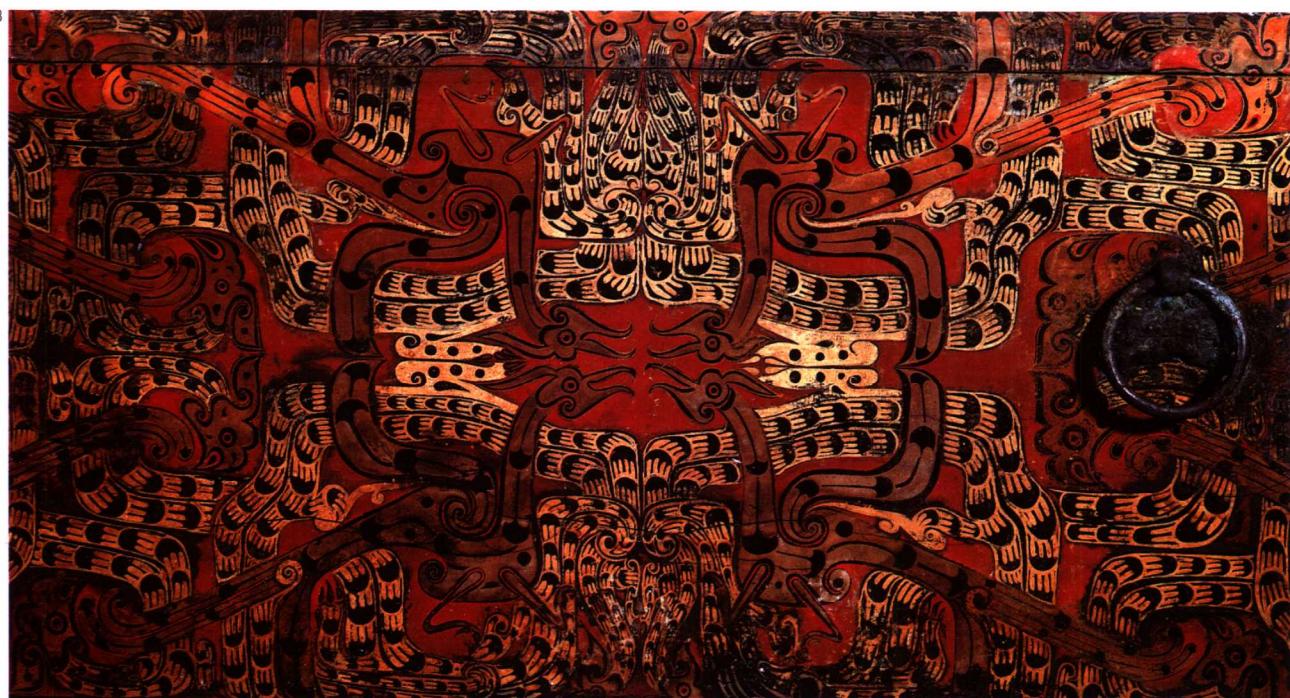
战国晚期/包山2号墓

这幅四凤蟠龙纹样，图案繁复，色彩浓烈，与同期楚人青铜器纹样日趋简化的趋势，形成强烈对比。

357



358



359



360



359 彩绘凤鸟纹漆瑟局部
——孔雀、蛟龙、凤鸟衔蛇
图案

360 彩绘凤鸟纹漆瑟局部
——四凤蟠龙纹样

战国晚期/沙市喻家台41号墓
凤鸟是楚人喜用的动物纹样，
将凤鸟与龙蛇相配，也是楚人
喜欢的一种构图。凤鸟的原形
很多，这件漆瑟上的凤鸟形象，
则明显与孔雀有关。

361 彩绘动物纹漆俎局部

361



楚漆器的传说 与写实题材

楚人的漆器纹饰，除了动物纹以外，尚有一些生活化的题材，如古代传说、贵族狩猎和宴乐场面等，这类作品既丰富了漆器艺术的题材，亦使后世能从中了解楚人的生活面貌。

362 弋射衣箱局部——伏羲女娲图像

战国早期/曾侯乙墓

这幅人面蛇身交尾的图案，是南方神话系统中的伏羲女娲图像。曾侯乙墓中出现这种图像，反映了南方与中原文化的交融。

362





363 弓射衣箱局部——后羿射日图像

战国早期/曾侯乙墓

弋射图中每棵树上有九个太阳和金乌，一人持弓弋射。中国古代传说天有十日，后羿射下九日，此画可能是表现这个神话。



364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64 彩绘锦瑟残片——狩猎

365 彩绘锦瑟残片——狩猎

366 彩绘锦瑟残片——狩猎

367 彩绘锦瑟残片——狩猎

368 彩绘锦瑟残片——梅花鹿

369 彩绘锦瑟残片——狩猎

370 彩绘锦瑟残片——动物

371 彩绘锦瑟残片——犬

战国早期/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

楚人漆画内容与器物的功能有一定关系，日用器皿上多为几何纹样和生活画面；葬具或兼有法器作用的乐器，则常见神巫、怪兽和龙凤图案。锦瑟上这种戏剧化的故事情节，使感染力超过了一般器物的纯装饰纹样。



372 彩绘车马出行图漆器残片

战国早期/残高9.1厘米 宽4.5厘米/
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

图画内容与包山漆画略同，特别的是，人物侧面时肩部仍呈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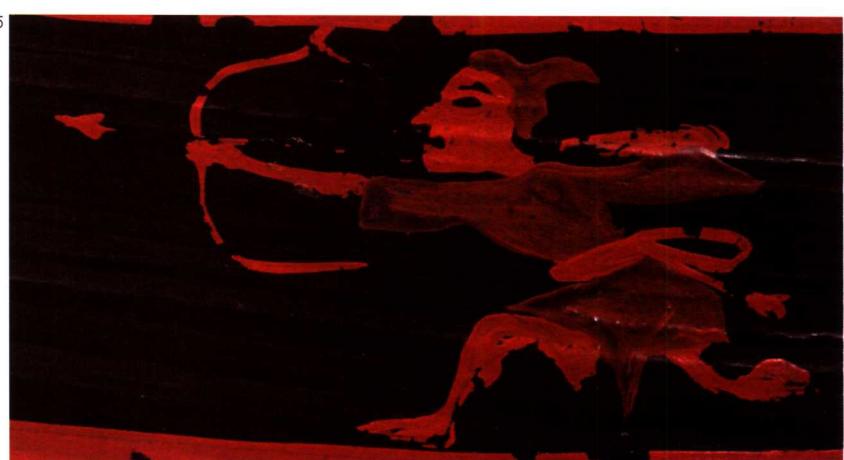
373 彩绘锦瑟残片——宴乐
场面

战国早期/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
图中的残片，以贵族的宴乐场
面为主题，是一种生活实况的
反映。

374



375



376



374 狩猎纹漆卮局部——野兽图案

375 狩猎纹漆卮局部——猎人图案

376 狩猎纹漆卮

战国晚期/长沙颜家岭35号墓
狩猎是楚人常用的艺术题材，
也是楚人生活的写照。

377



378



379



377 车马人物出行漆奩

战国晚期/高10.4厘米 直径28厘米/
包山2号墓

此奩是圆盒形、直壁、平底、夹纻胎。整器由盖、身两部分组成。奩的通体内髹红漆，外髹黑漆，用深红、橘红、土黄、棕褐、青等色彩绘图案。盖顶中部饰有四分龙凤图案，外圈为龙凤二方连续图案。盖外壁用黄、红、蓝、棕等色绘有人物车马出行图案。器身则饰变形凤鸟二方连续图案。出土时，奩内盛花椒、方形和圆形铜镜各一面、搽粉饰一件和骨笄二件。

**378-379 彩绘人物车马漆奩
局部**

战国晚期/画长87.4厘米 宽5.2厘米
高10.8厘米 径27.9厘米/包山2号墓
画面用黄、红、蓝、棕等色绘二十六个人物，骑车、骈车各两乘、十四匹马、九只雁、九只狗、一头猪和五棵树。表现当时贵族出行、迎宾的场面。画中景物比例准确、形象写实、色彩柔和、线条勾勒圆熟。这种清新的艺术风格，反映出战国中期以后，楚人传统的浪漫奇谲作风开始消退，世俗礼仪在社会中逐渐重要。



楚漆器的 雕刻与器型

漆器艺术的技巧，主要从纹样和器型两方面表现。

在纹样方面，楚国主要有各种动植物纹及写实纹饰；在器型方面，楚国亦表现得极为丰富，除了写实的器型外，还有一些抽象的动物合体形象，从这些活泼生动的器型，便可体会到楚人那种不受拘束的浪漫情感。



380 浮雕蟠蛇漆卮

战国早期/高20.9厘米 口径11厘米/
江陵雨台山471号墓

卮盖和身，分别雕有八条和十二条蟠蛇，蛇头、身和鳞片用红、黄漆描绘。蟠蛇纹源自青铜器纹饰，运用在漆木器上则加以放大和着色，使之更接近动物的实际形态，成为一种崭新风格。



381

381 双龙衔蛇器座

战国晚期 / 宽54厘米 高52.4厘米
座高7厘米 / 老河口安岗1号墓

器座双龙相向，龙口衔蛇，蟠绕卷曲，并补足“S”形龙身的空间，使龙蛇浑然一体，楚人动物形象中常见凤鸟衔蛇而少见蟠龙衔蛇的图像。

382



383





382 彩漆木雕座屏

383 彩漆木雕座屏底部

战国中期 / 长51厘米 高15厘米 / 江陵望山1号墓

全器共透雕或浮雕互相缠结的凤、鸟、鹿、蛙、蛇、蟠等动物五十个。屏面以对风争蛙

为中心，左右各雕出对鹿和朱雀衔蛇形象。屏框旁边各有一只凤鸟啄食框上的蟠蛇。器身以黑漆为地，用红、蓝、黄、银灰等色彩，根据动物纹样特点装饰。



384 角雕动物

战国晚期/高10.2厘米 径1.9厘米/
包山2号墓

全器雕出三个虎首龙身相互蟠绕的动物，这种造型是楚人多种信仰的反映。

385 彩绘鸳鸯豆

战国早期/高25.5厘米/江陵雨台山
427号墓

此器造型别致，是少见的漆器精品。它突破了以往圆形豆盘的定式，代之以写实、活泼的风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旧礼制的瓦解。

386 彩绘猪形漆盒

战国中期/长43厘米 宽15厘米 高20
厘米/江陵雨台山56号墓

在楚人动物造型中，较少见写实的动物。这件器物由整木雕两个可以扣合的猪盒，器身纹样仍保留铜器的风格，但器物造型仍显稚拙，神态憨厚可掬。



387 彩绘漆带流杯局部
——凤纹杯首部

388 彩绘漆带流杯局部
——凤纹杯尾部

战国晚期/包山2号墓

389 彩绘漆鸳鸯盒

战国早期/长20.1厘米 宽12.5厘米 高16.5厘米/曾侯乙墓

盒雕成鸳鸯形，头部可转动，腹身两侧分别绘撞钟击磬和击鼓跳舞图案。

织品与 帛画的图案

从现有的材料看，楚国丝织品上的图案与织物的用途有一定关系。在帷荒、铭旌（写有死者姓名、葬前招魂、葬时覆棺的织物）一类与巫觋招魂仪式有关的物品，多有神怪和死者飞升的图案，如楚帛书、帛画、镜衣皆是。至于一般的衾被和衣物，则多有龙凤、植物、几何纹样等，主要用以装饰。

3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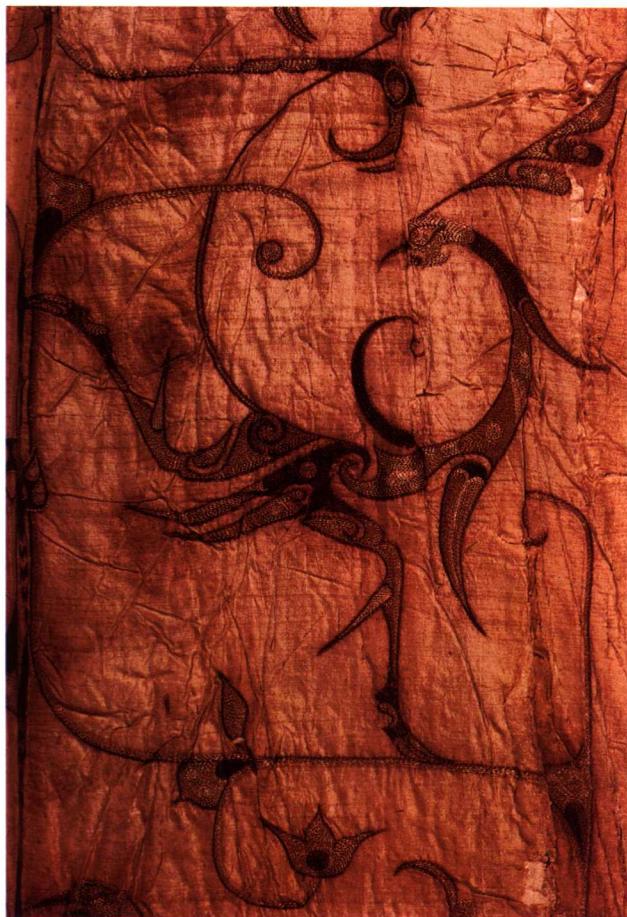


390 龙纹绣

战国早期/长28厘米 宽14厘米/曾侯乙墓

此物采用“锁绣法”，绣出一
首双身龙，其经纬密度为每平
方厘米 96×24 根。

3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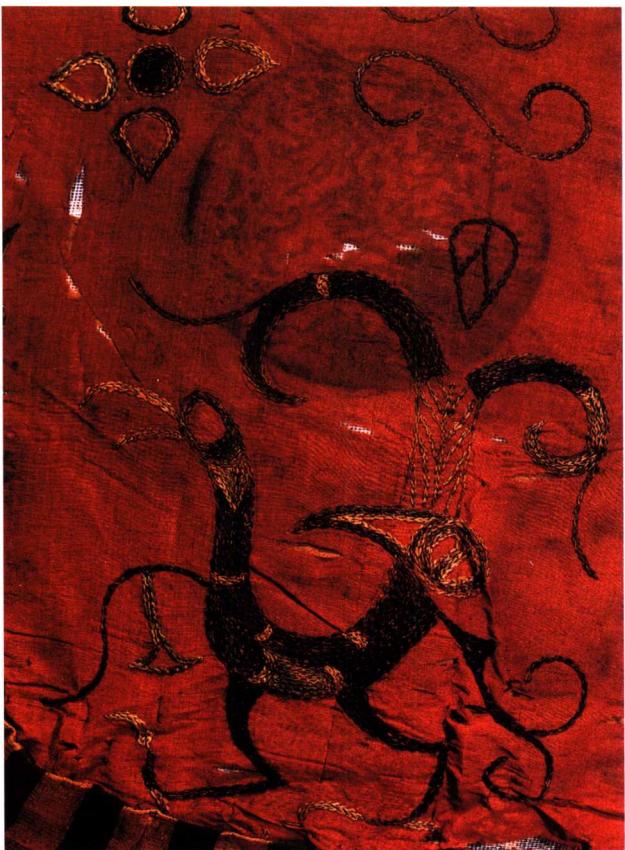
392



**391 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衾
局部——单凤**

战国中期/江陵马山1号墓

392 龙凤虎纹绣罗单衣局部
战国中期/江陵马山1号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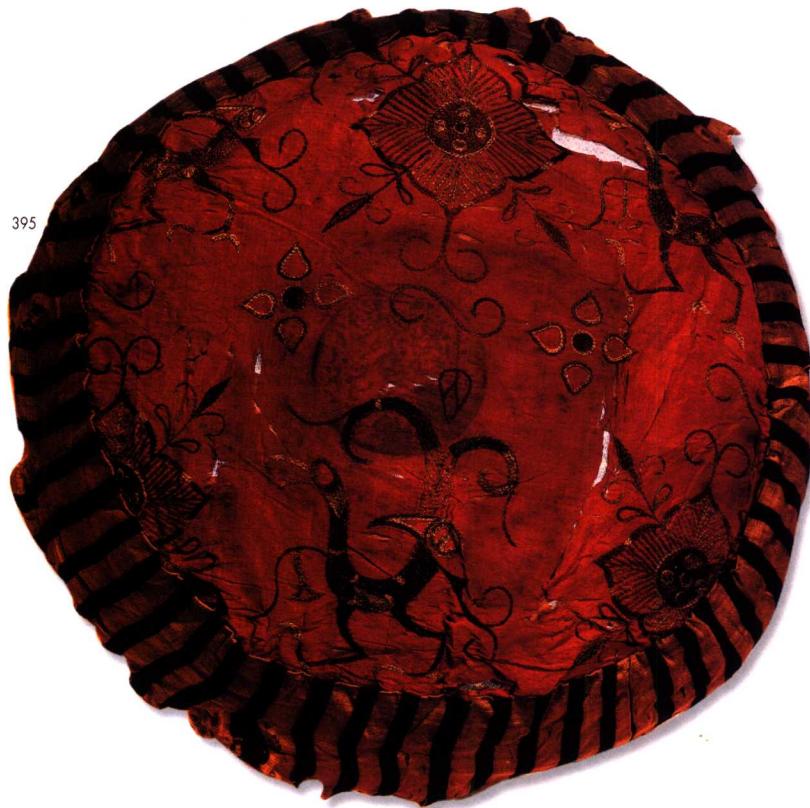


393



**393 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
绵袍局部——三头凤**

战国中期/江陵马山1号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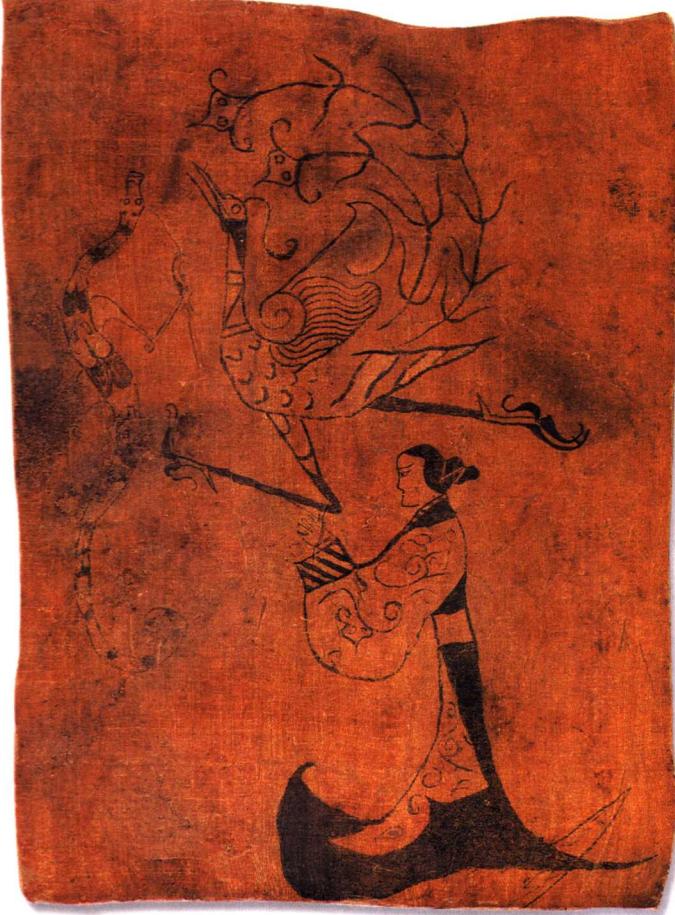


**394 凤鸟花卉纹绣红棕绢面
镜衣局部**

**395 凤鸟花卉纹绣红棕绢面
镜衣**

战国中期/高5厘米 口径17厘米/
江陵马山1号墓

这件镜衣外形似半球状，是用
于包裹铜镜的。



396 人物龙凤帛画

战国中期/长31厘米 宽22.5厘米/
长沙陈家大山楚墓

目前已知的先秦帛画实物，只有楚国的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此帛画出土时置于一件竹笥上。画中女子高髻细腰，身穿长袍，广袖长裾，袖上饰云气纹，双手作合掌状，左上方绘有一龙一凤。

397 人物御龙帛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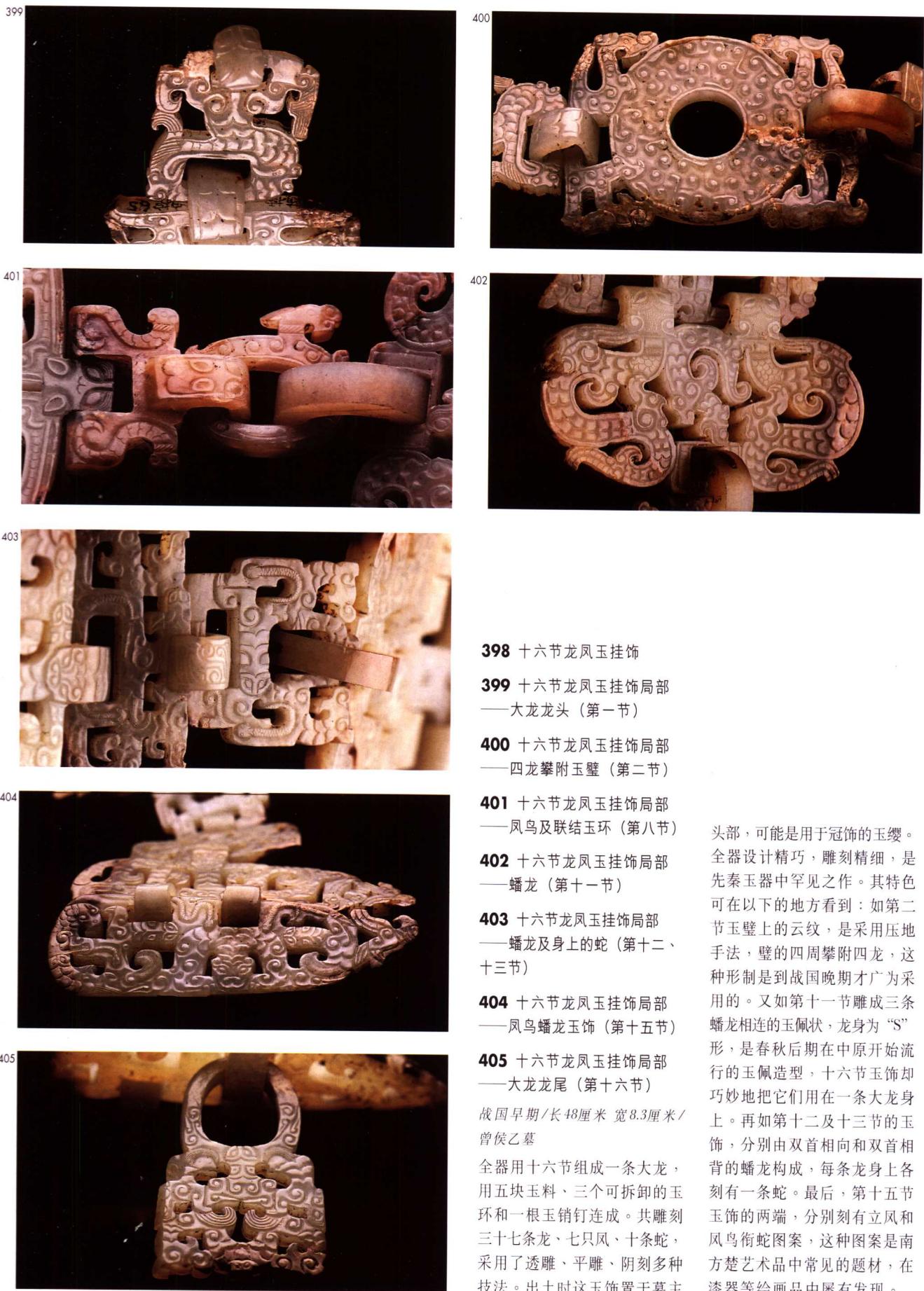
战国中期/长37.5厘米 宽28厘米/
长沙子弹库楚墓

这帛画与1942年被盗掘的楚帛书同出于一座楚墓。画中男子峨冠博带，广袖曲裾，头顶华盖，手抚佩剑，驭龙而行，神态安祥。龙身下有一游鱼，龙尾上立一鹤鸟。帛画上缘有一根细竹条，系有棕色细绳，右缘和下缘也未经缝纫（古代葬礼至亲的服饰不缝纫），其功能可能是招魂用的幡或铭旌之类的东西。这幅帛画与龙凤帛画的内容相似，都表现墓主在动物引导下漫游的情景，是楚人精神情态的生动体现。

精雕细琢 的楚地玉饰

中国是世界上玉料藏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而且品质优良，因而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已开始制造玉器。中国的玉器用途广泛，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及宗教信仰等层面，都发挥出其他艺术品不能取代的作用。在楚人墓葬中，亦发现了不少玉器，当时的玉器，是身份的象征，而造型和纹饰则多与宗教有关。





398 十六节龙凤玉挂饰

399 十六节龙凤玉挂饰局部
——大龙头（第一节）

400 十六节龙凤玉挂饰局部
——四龙攀附玉璧（第二节）

401 十六节龙凤玉挂饰局部
——凤鸟及联结玉环（第八节）

402 十六节龙凤玉挂饰局部
——蟠龙（第十一节）

403 十六节龙凤玉挂饰局部
——蟠龙及身上的蛇（第十二、十三节）

404 十六节龙凤玉挂饰局部
——凤鸟蟠龙玉饰（第十五节）

405 十六节龙凤玉挂饰局部
——大龙尾（第十六节）

战国早期 / 长48厘米 宽8.3厘米 /
曾侯乙墓

全器用十六节组成一条大龙，用五块玉料、三个可拆卸的玉环和一根玉销钉连成。共雕刻三十七条龙、七只凤、十条蛇，采用了透雕、平雕、阴刻多种技法。出土时这玉饰置于墓主

头部，可能是用于冠饰的玉缨。全器设计精巧，雕刻精细，是先秦玉器中罕见之作。其特色可在以下的地方看到：如第二节玉璧上的云纹，是采用压地手法，璧的四周攀附四龙，这种形制是到战国晚期才广为采用的。又如第十一节雕成三条蟠龙相连的玉佩状，龙身为“S”形，是春秋后期在中原开始流行的玉佩造型，十六节玉饰却巧妙地把它们用在一条大龙身上。再如第十二及十三节的玉饰，分别由双首相向和双首相背的蟠龙构成，每条龙身上各刻有一条蛇。最后，第十五节玉饰的两端，分别刻有立凤和凤鸟衔蛇图案，这种图案是南方楚艺术品中常见的题材，在漆器等绘画品中屡有发现。

406



406 四节龙凤玉佩

战国早期 / 长9.5厘米 宽7.2厘米 /
曾侯乙墓

全器用一块玉料雕成可以活动
卷折的四节，共雕出七条龙、
四只凤和四条蛇。其布局严谨，
制作精湛，在一般贵族墓中很
难看到这类玉雕珍品。

407 金缕玉璜

战国早期 / 长11.8厘米 宽2.7厘米 /
曾侯乙墓

玉璜是贵族服饰上组佩的一件，
常与玦、璧等编联佩带。

407



408



409



410

**408** 兽面纹玉琮**409** 兽面纹玉琮局部——兽面之一**410** 兽面纹玉琮局部——兽面之二

战国早期 / 高5.4厘米 径6.6厘米 /
曾侯乙墓

玉琮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出现，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皆有玉琮出土。周礼把玉琮外方内圆的形状，解释为天圆地方的意思，也就是以圆和方把天地贯通，成为了古代社会的一种法器。高级贵族陪葬佩玉，是希望保持身体不朽，至于随葬玉琮则显示他有与天地交往的能力。

411



412



411 龙形玉佩

战国中期 / 长13.2厘米 宽6.4厘米 /
江陵望山3号墓

412 谷纹大玉璧

战国中期 / 径21.5厘米 / 江陵望山
2号墓

这种大型玉璧是一种礼玉，可
能已不在服饰中佩戴。

413

**413 玉鹿**

战国中期 / 长4.5厘米 / 江陵雨台山6号墓

414

**414 龙形玉佩和谷纹璧**

战国中期 / 左玉璧径12.7厘米 玉佩长18厘米 宽12.7厘米 右玉璧径11.5厘米 玉佩长19厘米 宽12.6厘米 / 江陵望山2号墓

龙形玉佩和谷纹璧共两对，是用一块整玉料划开后分别制成。玉佩纹饰阴刻，玉璧纹样采用压地技法，从谷纹排列来看，它的制作已有画稿，实为汉代蒲纹璧的先声。

**415 金镇**

战国早期/大径9.5厘米 重327.65克

小径7.1厘米 重157.35克/曾侯乙墓

古人席地而坐，用镇压住席子四角，如《楚辞》说“瑶席兮玉镇”。此外，金镇也可能用于宗教仪式。至于镇面上这种满布繁密纹样的构图，是南方常见的装饰手法。

3

楚文化的流播

一个已经灭亡的国家，
为什么会对中国文化产生
深远的影响呢？

为什么面对强大的秦始皇
军队，楚人坚持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呢？

公元前278年秦国攻破楚郢都，楚国被迫两次迁都，最后于公元前223年被秦所灭。然而，历经数百年发展起来的楚文化，并未因政权的更迭而消亡，随着时代推移，尤其是秦汉两代，楚文化不断与秦、中原及吴越等文化交流、融合，成为统一的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楚文化中的精华已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另一方面，楚的风俗仍然保存于楚地民族的后代之中，直到今日仍有影响。

一·楚文化对秦人的影响

秦朝是中国第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度的大一统王朝。秦灭楚后，在楚国故地上，先后建立了地方政府，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历法及法令等措施。此外，为加强思想统治，秦始皇还采纳丞相李斯提出的焚书坑儒建议，禁绝私学，焚烧诗、书、百家语和六国史书，强制人们学习秦国法令。大批秦人随着军事占领从关中来到楚地，带来与楚人截然不同的习俗。因而在楚地发现的秦人墓中，随葬着与楚式器不同的鼎、豆（盒）、壶或釜、盂、瓮等，常常出现扁壶、蒜头壶等关中秦人特有的器类。

秦人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文化传统却落后于其他各国。因此，秦人在占领楚地后，无法同化当地原有的文化传统。在公元前

227年公布的一份南郡守腾的文书中，承认当地人民的乡俗未改，常与秦国的法制相抵牾。这种乡俗就是楚地原有的文化传统。楚人仍然穿着楚式服装，唱着楚地民歌，保留着原有的埋葬习俗，随葬楚式器物等，不一而足。

事实证明，秦人来到楚地后，反而受到当地传统文化的影响，从墓葬中可以见到，秦人放弃了在关中普遍采用的洞室墓和屈肢葬，改用竖穴土坑墓和仰身直肢葬。在一部分墓中，秦式器与楚式器并存，反映着秦、楚文化的沟通。在楚地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一部《日书》，其内容在建除、吉凶、禁忌之外，还有许多与鬼神相关的内容，在秦地（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发现的另一部《日书》，却少有鬼神的内容。两者的差别，反映了楚人尚鬼神与秦人重功利的不同文化传统。拥有睡虎地《日书》的喜（人名）是秦人，随秦军来到楚地任官，他接受了楚地《日书》的思想。书中的秦、楚月名对照，就是为了方便他能使用楚国的历法。由此看来，已有相当数量的秦人在精神信仰上趋同于楚人了。有远见的人已经清楚地看到楚文化的强大势力，指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不久，历史果然证明了这种看法。

二·楚文化在汉代的作用

秦亡汉兴，是政治上的巨变，在文化上亦

有深远影响，因为汉初君臣多是楚地平民。他们建立政权后，楚文化随之扩散，逐渐与中原文化互相渗透，影响所及，甚至达日常的生活细节。

1·思想的影响

汉朝君臣多有楚人，他们承袭楚文化的传统，推崇黄老之学，行无为之治，开放学术思想，取得了汉初经济繁荣与社会安定。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和《黄帝四经》是黄老学说的经典。它主张文武兼用、刑德并行。从汉初的政治、经济政策来看，黄老学说并不是消极的，对汉初社会的恢复和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黄老之学与战国时期楚地流行的老庄之学有密切关系。老子是楚地人，其学说的形成与楚地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黄帝四经》是战国中期的作品，文辞与楚人的《鹖冠子》、《淮南子》等书类似。汉简中的《引书》是汉初一部导引健身的著作，它阐明的养生理论与《老子》有关记载如出一辙。《老子》的思想不仅影响汉初政治，还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近年发现的汉初竹简中屡次见到《日书》，其内容与江陵九店楚简《日书》的内容相似，反映汉初人民仍然沿袭楚人崇巫好祀的习俗。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与今本差异较大，其中有一篇自题为《昭力》，昭力是人名，昭姓是楚国的三大显族（屈、景、昭）之一。昭力及其相邻地方出土的另一篇《繆和》都表现出浓厚的黄老思想。这

件事实，证明《易传》与楚人的思想有相当紧密的联系。在汉武帝用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黄老思想的统治地位已不复存在，但在各个历史时期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仍然得以广泛流传，甚至还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黄老思想在民间仍流传不绝，成为道教思想的渊源之一。

2·葬俗的影响

汉初的两湖地区仍然流行与战国时期楚人相似的埋葬习俗。葬具用木质棺椁，重数的多少一般与死者的身份配合。椁内仿照居室的前堂、后寝、左右房的格式分隔成头箱、边箱、棺室。自战国中晚期兴起以漆木器取代青铜器的浪潮，到汉初已经达到高峰。各种式样的漆木器，几乎完全取代曾经显赫一时的青铜器，在一般中小型墓中已难寻得青铜器的踪迹。

在达官贵人的埋葬习俗中，仍然流行用多重衣衾包裹尸体的习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就是典型例子。此墓的尸体用二十层衣衾包裹，外面再用九道锦带捆扎，其上覆盖两件绵袍。它与江陵马山1号楚墓的衣衾包裹十分相似，甚至连九道锦带结扣的方法都一模一样，明显保留楚地的色彩。马王堆1、3号汉墓中各有一幅帛画，是用来引导死者灵魂升天的铭旌。这种习俗也是来自楚人，在长沙的楚墓中先后发现过两件帛画，也是表现墓主人在龙凤引导下灵魂升天的场

面。这种惊人的相似，说明西汉初期的人还保留着楚地原有的生死观念。

3 · 服饰的影响

西汉时期，社会上层人士的衣着普遍采用直裾和曲裾衣、袍，同时还有襦、裙等，褒衣博带依旧盛行，其样式与楚服并无明显区别。社会下层的劳动者多穿着短衣、紧裤，以便劳作。与服装相配的带钩仍是形状各异，但趋向小型化。铜镜多是圆形，素镜逐渐消失，镜背的纹饰有山字形纹、草叶纹、蟠螭纹和羽状纹等，形制和纹饰仍未脱离楚式镜的风格。

4 · 漆器的影响

汉代的漆器生产已经商品化，长江流域以四川广汉郡的出产为大宗。尽管在器型上趋向统一而缺乏个性，但是在颜色和纹样的调绘上却继承了楚人的传统。因此，有学者推测，广汉郡的漆器制作技术来自楚地。西汉早期的漆器几乎全都以红、黑为基本色，器物外表髹黑漆，内部多髹红漆，与中期以后的漆器以赭色代替黑色的风格迥然相异。纹样多采用红漆绘制在黑漆地上。各种构图不同的云气纹布满了器物表面，流畅的线条勾勒出强烈动感。各种凤鸟大多经变形处理，成为对称的几何形状。描绘贵族生活场面的图画相对较少。这种崇尚自然的装饰风格与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不无关系，与楚人的漆器装饰手法如出一辙。

5 · 丝织品的影响

西汉时期最著名的丝织品，当推马王堆1号汉墓的出土品，数量之多、品质之高令人叹为观止。深入分析和研究后发现，它们与楚地出土的战国时期丝织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马王堆汉墓的丝织品有平纹、斜纹、绞经、重经等组织，并由此派生出众多的品种。平纹类织物有纱、绢，斜纹织物有绮，绞经织物有罗，重经类织物有二色锦和三色锦。这些都与楚地发现丝织物的品种相同。

最能反映西汉时期丝织技术水平的织物是绒圈锦，以表面有一层细小的绒圈得名，用来织造这种锦的双经轴织机，在东周时期的楚地已经出现。绒圈锦的纹样是在大菱形的骨骼内填充各种几何形纹，与楚国锦类织物上的大菱形纹如出一辙。原见于楚国漆器上的云气纹也见于西汉早期的刺绣品，有名的“乘云绣”、“长寿绣”便是由大朵飘逸的云彩构成。

6 · 绘画的影响

西汉时期的人物画风格与楚国人物画有不少相似之处。楚国帛画和漆画中的人物图像是全身侧立的静态，或用线条勾勒，或采用线勾与平涂结合的技法来表现人物与环境。

西汉绘画中的人物图像也是全身侧立，以静态为多。马王堆汉墓帛画中的人物是一位身份高贵的妇人，画中对她的形象、服饰和周围环境

作了刻意的描绘，妇人生前的尊荣和死后的灵魂超度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画中的人物和相关物品都用线条仔细勾勒，用笔简练，线条流畅。

漆画人物的描绘，则多运用线勾和平涂结合的技法，如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中龟盾上的人物便是如此。互相比较，我们可以清楚感受到楚国人物绘画技法对西汉绘画的强烈影响。

三·楚文化在现今的遗留

今天，在中华文化中，我们仍能见到楚文化的遗留。作为楚文化核心老庄道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脉中至今仍保留重要地位。今本《易·系辞》中保存着东周时期老庄道家传本的主要部分，这已成为马王堆汉墓帛书《易·系辞》的研究所证实。为人乐道的《山海经》，学者也多认为是楚国巫师编写的。至于东汉末年出现的道教，托以黄帝及老子为宗，大抵是源自楚地巫风及道家哲学。其神祇、祭仪、祝咒等，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又如道教仙人吕洞宾的传说，亦是源自楚文化发达的岳州地区。此外，道教的请符、化符、吞符及招魂等仪式，更成为日后民间宗教的主体形式。而楚地“医巫结合”的医病传统，也为道教和民间袭用，《岳阳风土记》说：荆湘民俗“疾病不事医药，惟灼龟打瓦……求神所在，使俚巫治之，皆古楚俗也。”

中国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素问》和《灵枢

经》，是黄老学说对生命科学和医学的精辟论述，许多观点已被证明是十分正确的。此外，楚文化孕育的著名诗人屈原，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更写下了千古传诵的篇章——《离骚》、《九章》、《天问》、《九歌》等，成为西汉刘向所辑《楚辞》中的主要作品。

此外，在很多不同地区亦显现出楚文化的影响。在两湖地区，目前还可以见到许多以楚人先祖或楚国名人命名的地名，如祝融峰（今湖南衡山）、黄歇口（今湖北监利县）等。一些著名的楚国政治家也一直受后人纪念，如在湖北沙市建有楚令尹孙叔敖的陵园，供人瞻仰。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日各地都举行龙舟竞渡，纪念楚国三闾大夫、爱国诗人屈原。

另一方面，长江中游地区现存的一些民间艺术，仍然保留着楚人的传统，最突出的要称傩戏。它是一种古老的戏剧形式，具有浓厚的宗教寓意。表演者戴着面具，扮演巫师和鬼神，通过舞蹈、戏曲的表现来请神、娱神，达到驱鬼、祛邪、消灾等目的。它与《楚辞·九歌》记载楚人事神的歌乐鼓舞有不少共通之处。另外，流行于湘西和鄂西一带的民间歌舞《神歌》和《丧歌》，曲调简单、原始，舞蹈粗犷，与楚人的巫觋乐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都说明楚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并赋予它无穷的活力。

楚文化的 遗留与影响

楚国在公元前223年被秦国所灭，但楚文化的影响并未终绝。秦汉时代的思想、艺术受楚文化影响自不待言，甚至现今居于楚地的民族，亦带有楚文化的影子。从整个中华文明来看，楚文化的因素仍占有重要地位，如文学上与《诗经》并称的《楚辞》，思想上与儒家比肩的道家以及以志行高洁而为后世敬仰的屈原，都是源出楚国的。

416 漆双虎头形器局部

417 漆双虎头形器

西汉 / 长55.7厘米 高8.2厘米 / 江陵风
凰山168号墓

此器造型奇特，两端雕虎头，其虎头造型及器型与楚国一件罕见的虎头几十分相似，应是受了楚风格的影响。惟此器不是几。



416



417



418

**418 彩绘卷云纹漆盂**

西汉/高8.5厘米 口径24.5厘米/江陵
凤凰山167号墓

孟是盛饭器皿。此器外壁饰有卷云纹，与楚器相比，其云纹较小而且零散，然而，却显得更为舒展、简约。



419 彩绘卷云纹漆盘

西汉/高3.3厘米 口径21.4厘米/江陵
凤凰山167号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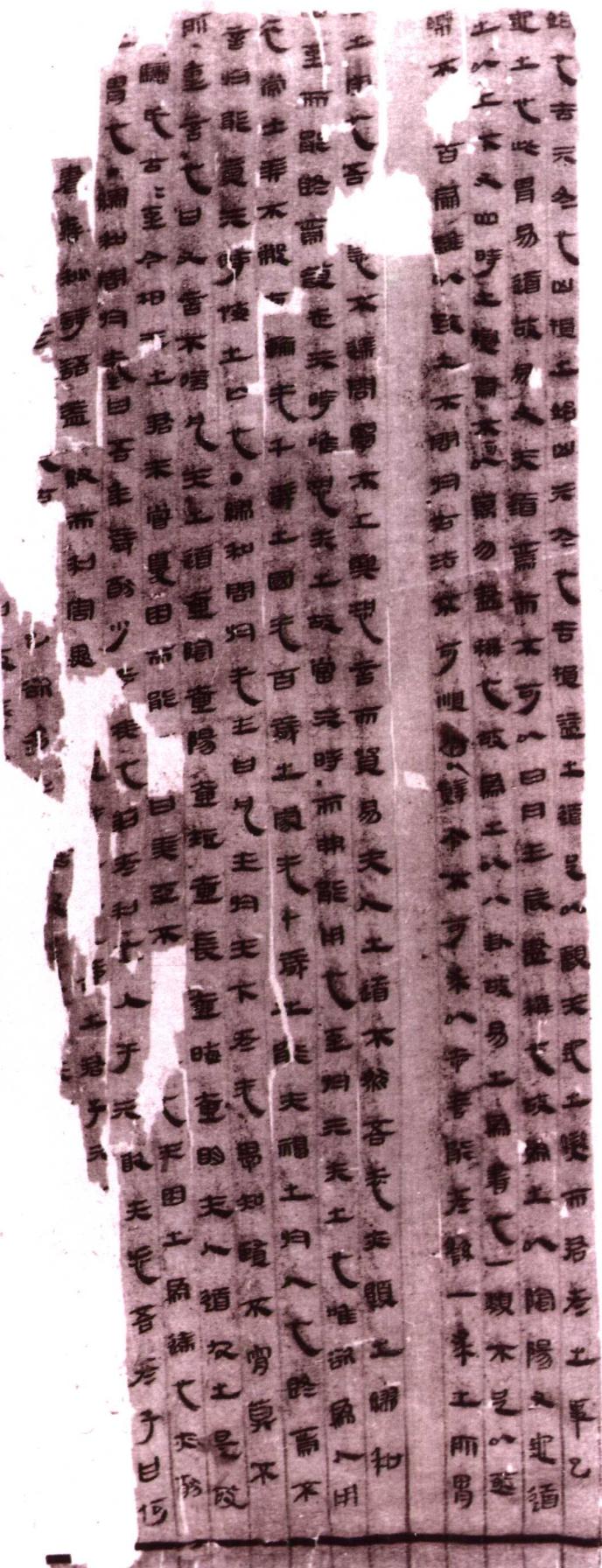


420

420 彩绘云纹漆卮

西汉/高19厘米 口径19厘米/江陵凤凰山167号墓

汉代的立体形漆器，主要是生活器皿，很少用以摆设，如这件卮就是汉代的常用容器。此外，汉代漆器的器型通常较大，可发挥的空间也较多，如此器在盖和器壁上均绘大朵云纹，便与器型十分适配。



421 马王堆汉墓帛书《缪和》

——局部

西汉/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

帛书《缪和》、《昭力》与帛书《系辞》同抄写在一幅丝帛上。《缪和》、《昭力》的内容实即一体，均以答问形式解《易》。它们均不见于今本《易传》，或为楚地传本。文中的“凡天之道，一阴一阳，一短一长，一晦一明，夫人道（则）之”与帛书《黄帝四经》的相关文句相似，表现出相当深厚的黄老思想成分。



422 马王堆汉墓帛画

西汉 / 通高2.05米 / 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

这件帛画是件极其著名的艺术品。画中的贵族妇女及其周围所表现的是死者生前的生活情景。其上则是天上的境界，两侧的龙则是沟通两处的神灵。画中的人物以侧面形象为主，设色用平涂技法，沿袭了楚国绘画的传统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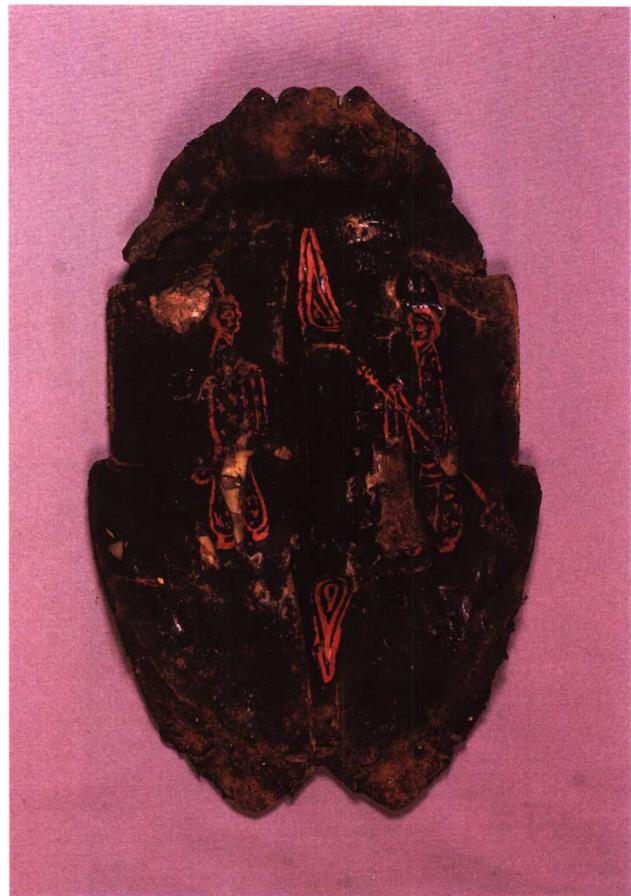
423



423 彩绘人物漆龟盾正面

424 彩绘人物漆龟盾反面

4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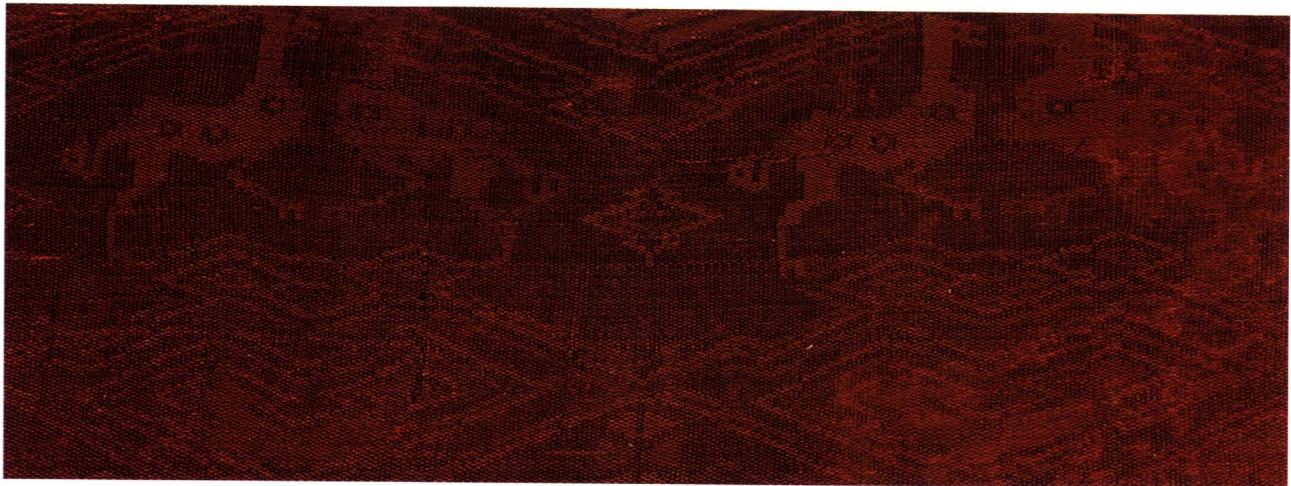


西汉/通高32厘米 宽20.1厘米/江陵

凤凰山8号墓

龟板胎，外髹黑漆，背面装有木柄。同墓所出的“遣策”记为“龟盾”。正面绘神人骑龙升天图像，背面绘两人相见图像。两图是描绘墓主人的生前活动及死后灵魂的飞升，与长沙子弹库楚墓帛画的构思一脉相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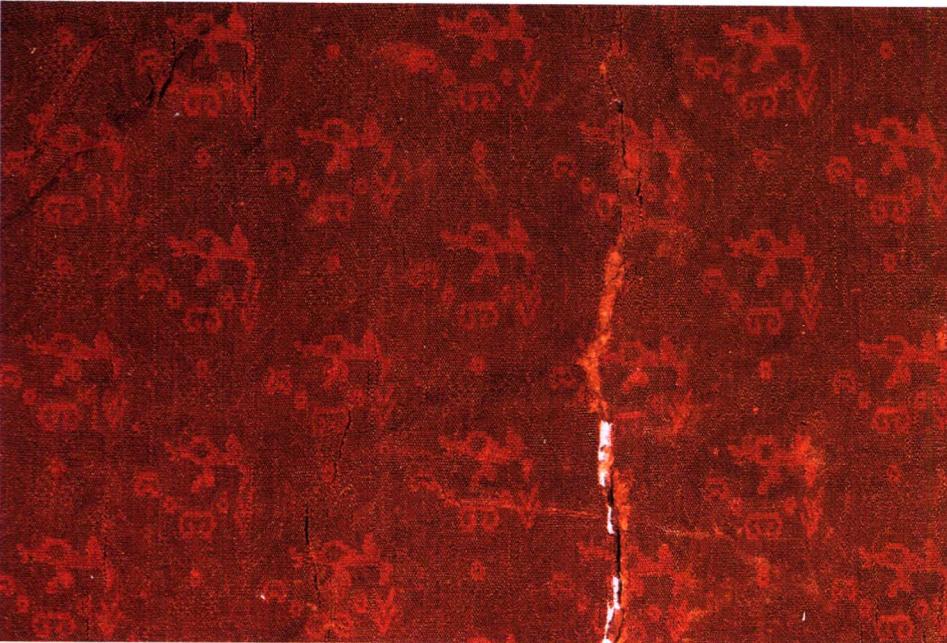
425



426



427

**425 神兽磬形纹锦**

西汉/江陵凤凰山167号墓

这是一件三色锦，花纹主题是一头奔走的神兽。它的组织结构与楚国的三色锦完全相同，以磬形组成花纹框架的构图方式，在楚国三色锦中也是常见的。

426 豹纹锦

西汉/花纹经向长2.2厘米 纬向宽5.6厘米/江陵凤凰山167号墓

这是一件二色锦。花纹的主题是一只奔跑的豹。

427 虎纹锦

西汉/花纹经向长3.8厘米 纬向宽3.5厘米/江陵凤凰山167号墓

这是一件二色锦。纹样以菱形格为单位，其中有一只红色的虎，构型简约。



428 端公舞

楚人的舞蹈是巫舞，主要用于祀神或巫医驱鬼等活动。这种舞蹈的特点是需用“禹步”表演。禹步传说是大禹的步法，它先举左脚，三步九迹。在长沙马王堆汉墓的《五十二病方》中记载，楚故地巫医均用这种舞步。今天南漳保留了一种多场次的迎神巫舞“端公舞”。端公就是巫师，它的舞步正是禹步。图中祭台上方挂有众神乘龙舟的巫画，身披红色法衣者为巫师端公。

429 鄂西土家族保留的祭神舞蹈 ——摆手舞

鄂西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与楚人关系十分密切，它们的舞蹈也是从巫舞演变而来。这种摆手舞从根源上看，是把巫师作法时进入昏迷状态的手舞足蹈动作，加以程式化后流传下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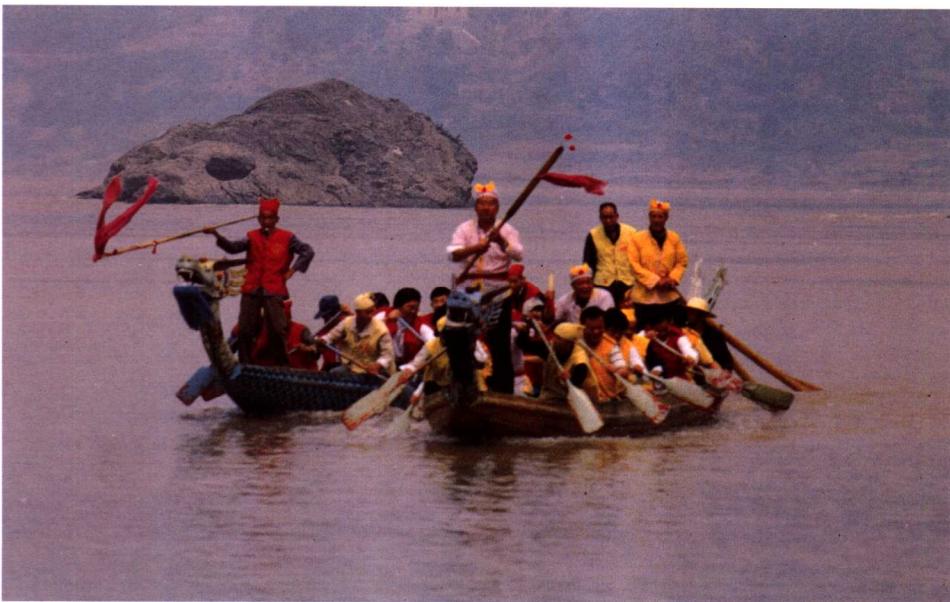
430



431



432

**430** 楚归屈原祠**431** 楚归屈原故里的屈原庙**432** 楚归每年举行的龙舟竞赛

楚国伟大诗人屈原（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278年），是楚怀王时的三闾大夫，主张联齐抗秦，受到朝臣排挤，最后更被放逐，然他仍时刻惦念国政。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下郢都，屈原亦在五月初五在汨罗江自尽。据记载，此后每年的五月初五，楚地百姓都举行龙舟竞渡和包粽子的仪式纪念屈原，这就是端午节的由来。此外，后人在屈原的家乡秭归，还修筑了屈原祠和屈原庙，纪念这位爱国诗人。屈原除了是楚国的名臣外，也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曾根据楚地民间俚曲和神话传说，创作和改编了大量诗歌，其中《离骚》、《九章》等政治诗，开创了以香草和美人讽喻现实政治的传统；其《九歌》也成为浪漫文学的先河，至于《天问》对自然现象、神话和历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先秦神话、历史和思想的宝库。

楚地区大事年表

公元纪年	历代王朝	重要事件
约公元前700000年至公元前10000年	旧石器时代	<p>约公元前700000年至公元前150000年：河南淅川、郧县梅铺、曲远河口、郧西县白龙洞、安徽和县龙潭洞等地，先后发现直立人化石。</p> <p>约公元前100000年：河南南召小空山、湖北长阳下钟家湾，发现早期智人化石。</p> <p>约公元前50000年：湖北江陵鸡公山及湖南澧县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说明旧石器时代的两湖地区，已有人类在平原上生活。</p>
约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前2100年	新石器时代	<p>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湖北枝城城背溪、湖南澧县彭头山、石门皂市等地，发现城背溪文化遗址，分布于三峡和湘西澧水一带。</p> <p>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四川巫山大溪镇发现大溪文化遗址，分布范围扩展到两湖平原。</p> <p>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600年：湖北京山屈家岭发现屈家岭文化遗址，分布于两湖平原及豫西南。</p> <p>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天门石家河发现石家河文化遗址，分布范围与屈家岭文化相同。</p>
约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600年	夏朝	
约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27年	商朝	湖北黄陂盘龙城、江陵荆南寺、湖南洞庭湖地区、江西清江吴城及新干大洋洲等地，发现商中期以后的重要文化遗存。
约公元前1027年至公元前771年	西周	<p>公元前11世纪：周原甲骨有“楚子来告”的刻文，证明楚人与中原的交往。</p> <p>公元前11世纪末：熊绎被周室封于丹阳，楚人开始由弱转强。</p> <p>约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封曾国等于隋枣走廊一带，遏阻楚人北上。</p>
公元前770年 公元前476年	春秋时代	<p>公元前847年：熊勇即位，这是楚国有确切纪年之始。</p> <p>公元前757年至公元前741年：蚵冒讨伐濮人，开始称霸江汉。</p> <p>公元前740年：熊通称王，汉水东边的姬姓大国随国也被迫承认楚王尊号。武王熊通在位期间（公元前740年至公元前690年），灭掉权国（湖北荆门钟祥之间），设县治理，是中国实行县制的开始。</p> <p>公元前690年：武王死，文王熊贲定都于郢（湖北江陵纪南城）。</p> <p>公元前684年：楚人伐蔡，这是楚人首次进入中原。从此由江汉地区进入中原的两条道路（一是经随（县）枣（阳）走廊出大别山口；一是经襄（阳）邓（城）唐、白河出方城）都被楚人打通。</p> <p>公元前659年：楚伐郑国，史书首次称“楚”。</p> <p>公元前656年：齐国的管仲以楚国不向周室进贡，及周昭王南征死于汉水为借口，向楚人问罪，双方会盟于昭陵（河南郾城东），从此揭开齐、楚争霸序幕。</p> <p>公元前638年：楚成王败宋襄公于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正式确立楚国的强国地位。</p> <p>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与齐国联手抗楚，在城濮（河南鄄城西南）大败楚军，开启了晋、楚的争霸。</p> <p>公元前628年：晋文公死，晋、楚言和，这是楚国首次与别国建立邦交。</p> <p>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借讨伐陆浑（河南嵩县、伊川境）之机，首次“观兵于周疆”，“问鼎于中原”。史书认为此举是“一鸣惊人”。</p> <p>公元前598年：孙叔敖为楚国令尹（宰相），修期思陂（河南固始）、芍陂（安徽寿县西南）作为灌溉之用，这是中国最早的水利工程。今天仍约有六十三万亩田受益。</p> <p>公元前597年：楚国在邲（河南荥阳东北）之战败晋，称霸中原。</p> <p>公元前589年：楚国令尹子重救齐伐鲁，并与秦、宋、郑、蔡等十四国诸侯会盟，这是楚国春秋霸业的顶点。</p> <p>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戌建议各大国签订弭兵和约，此后晋、楚和平达</p>

		<p>四十年，楚国亦得以专心对付吴国的扩张。</p> <p>公元前535年：楚灵王修章华台。</p> <p>公元前512年：吴伐楚，昭王迁都于郢（湖北钟祥）。</p> <p>公元前506年：吴将孙武、伍子胥于柏举（湖北麻城，一说在安陆）大败楚军，吴师攻入郢都，楚昭王避难随（曾）国。</p> <p>公元前496年：楚人范蠡、文种和善制弩机的陈音，先后投奔越国，其后辅助越王勾践灭吴。</p> <p>公元前476年：叶公率师远征东夷，楚人势力首次到达东海。</p> <p>老子在世，他是楚苦县（安徽鹿邑）人，曾任周室的太史。老子主张万物都是由“道”所生的，认为人要师法自然，有《老子》传世。</p>
公元前475年至 公元前221年	战国时代	<p>公元前445年：楚灭杞国（今山东新泰），疆域扩展到泗水流域，与齐、宋、鲁接壤。</p> <p>公元前432年：公输班（鲁班）和墨子到楚国为惠王演示攻城器械。</p> <p>公元前397年：卫国（山东定陶西）军事家吴起（?-公元前381年）到楚国。楚悼王任他为令尹，主持变法。他大削楚国封君的权力、平均爵禄、整顿吏治、奖励耕战，使楚国空前强大，北边抗击韩、赵、魏，西伐秦国，南服百越，疆域扩展到洞庭湖以南、五岭一带。</p> <p>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在世。庄子生于宋而游于楚，主张清静无为，尊奉老子，有《庄子》传世。</p> <p>公元前340年：大诗人屈原诞生，屈原名平，今湖北秭归人。</p> <p>公元前333年（一说公元前306年）：楚威王灭越，楚国基本统一了江汉、江淮、吴越地区，势力达到顶峰。</p> <p>公元前313年：秦说客张仪至楚，以割商于（河南西峡、淅川）之地来诱楚与齐国绝交，事后又拒交商于予楚。楚怀王知道受骗后，兴师伐秦，次年大败，丧师八万，失去汉中，楚国亦由盛而衰。</p> <p>公元前299年：秦昭王诱楚怀王到武关（陕西商南）拘留，三年后怀王死于秦国，秦、楚因而绝交。</p> <p>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下郢都，烧夷陵的楚先王墓，楚迁都于陈（河南淮阳）。同年，屈原感怀国变，投汨罗江殉国，有《离骚》传世。</p> <p>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任春申君黄歇（?-公元前238年）为令尹，黄歇积极经营江淮，灭邾、郯、费、鲁等国，主持韩、赵、魏、燕、楚五国的合纵，楚国国势得以稍稍稳定。</p> <p>公元前237年：楚国上蔡人李斯（?-公元前208年）至秦，受秦王嬴政重用，后助秦统一中国。</p> <p>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俘楚王负刍，楚亡。</p>
公元前221年至 公元前206年	秦朝	公元前209年：楚人陈胜（河南登封东人）、吴广（河南太康人）起事，项梁、项羽和刘邦响应。
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5年	西汉	<p>公元前202年：垓下（安徽灵璧东）之战，项羽兵败，在乌江自杀。刘邦即皇帝位。</p> <p>公元前122年：淮南王刘安造反，自杀。刘安主持编写的《淮南子》传世。</p> <p>公元前33年：汉元帝宫人王昭君（湖北兴山人）出塞，嫁南匈奴呼韩邪单干，匈奴之患渐平。</p> <p>公元前26年：刘向（江苏沛县人）、刘歆父子编校先秦典籍。</p> <p>公元17年：王匡、王凤（湖北京山人）在绿林山起事。其后刘秀在平林（湖北枣阳）起事。</p>
公元25年至220年	东汉	<p>公元23年：刘秀昆阳（河南叶县）之战。</p> <p>公元31年：南阳太守杜诗发明水排（水力鼓风机），用于冶铁，其出现比欧洲同类型机器早1100年。</p> <p>公元100年：许慎（河南郾城人）著《说文解字》，首创部首编排法。</p> <p>公元105年：蔡伦（湖南郴州人）改进造纸技术。</p> <p>公元132年：科学家、文学家张衡（河南南阳人）制造“候风地动仪”，其出现比欧洲同类型仪器早1600年。</p> <p>公元145年至208年：华佗（安徽亳县人）在世，首创“麻沸散”，用以外科手术。</p> <p>公元208年：刘备、孙权联军在赤壁（湖北蒲圻西北）大破曹操的军队，中国开始三分。</p>

公元220年至265年	三国	公元223年至263年：文学家嵇康（安徽宿县人）在世，有《嵇中散集》传世。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定都于鄂（改名武昌），后迁建业（南京）。
公元265年至316年	西晋	
公元317年至589年	东晋、南北朝	公元354年至369年：桓温（安徽怀远人）率兵由江陵北伐中原。 公元365年至427年：诗人陶潜（江西九江人）在世，有《陶靖节集》传世。 公元383年：谢安、谢玄、谢石（河南太康人）叔侄在淝水大破前秦苻坚，使东晋南朝得以偏安。 公元385年至433年：诗人谢灵运在世，以山水诗打破东晋玄言诗的诗独霸局面，有《谢康乐集》传世。 公元398年至445年：范晔（河南淅川人）在世，著有《后汉书》。 公元503年至547年：修安徽潜山乾元寺，为禅宗之祖寺。 公元555年：西魏攻下江陵，焚梁元帝所藏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是对中国典籍的一次大破坏。
公元581年至618年	隋朝	公元581年至600年：隋文帝时为佛教天台宗祖师智顗修湖北当阳玉泉寺。
公元618年至907年	唐朝	公元609年至675年：禅宗五祖弘忍（江西九江人）在黄梅五祖寺出家，传衣钵六祖慧能，促使佛教中国化。 公元689年至740年：诗人孟浩然（湖北襄阳人）在世，有《孟浩然集》传世。 公元710年：史学家刘知几著《史通》。 公元712年至770年：诗人杜甫（祖籍襄阳）在世，有《杜工部集》传世。 公元733年至804年：陆羽（湖北天门人）在世，著有《茶经》。
公元907年至960年	五代十国	公元907年：朱温（安徽砀山人）灭唐，建立后梁，开启五代十国的局面。 公元907年至963年：高季兴在江陵建立南平国（五代十国之一）。 公元909年：王审知（河南固始人）建立闽国。 公元930年至933年：陈抟（安徽亳县人）在武当山修道，著有《无极图》，后为周敦颐等采纳，成为宋代理学的组成部分。
公元960年至1279年	两宋与辽、金	公元991年至1055年：诗人晏殊（江西抚州人）在世，著有《珠玉词》。 公元1007年至1072年：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江西吉水人）在世，修《五代史》、《唐书》，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公元1017年至1073年：理学家周敦颐（湖南道县人）在世，有《太极图说》传世，他是宋理学的开山祖师。 公元1021年至1068年：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江西临川人）在世，他实行的熙宁变法，影响深远。 公元1041年：毕升（湖北英山人）发明活字印刷术。 公元1045年至1105年：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江西分宁人）在世，著有《山谷集》。 公元1046年：范仲淹（江苏吴县人）在岳阳写《岳阳楼记》。 公元1130年至1200年：理学家朱熹（江西婺源人）在世，有《朱文公集》传世。 公元1132年：抗金将领陈规在德州（湖北安陆）使用竹管火枪，这是竹管状火器使用之始。 公元1139年至1192年：理学家陆九渊（江西临川人）在世，他以禅宗融入儒学，其学说被后世称为“心学”，有《陆象山集》传世。 公元1164年：虞允文（四川仁寿人）在采石（安徽当涂）破金主完颜亮六十万大军。 公元1254年至1323年：史学家马端临（江西乐平人）在世，著有《文献通考》。 公元1275年：文天祥（江西吉安人）兴兵抗元，被俘不屈而死，有《正气歌》传世。

公元1271年至1368年	元朝	<p>公元1349年：航海家汪大渊（江西南昌人）著《岛夷志略》，记载海外的山川、地理、物产、风俗等见闻。</p> <p>公元1351年：徐寿辉、陈友谅起事，分别建“天完”和“汉”政权。</p> <p>公元1352年：郭子兴（安徽定远人）起事，朱元璋（安徽凤阳人）投其麾下。</p>
公元1368年至1644年	明朝	<p>公元1472年至1528年：理学家王守仁（江西余姚人）在世，有《阳明先生全集》传世。</p> <p>公元1518年至1593年：医学家李时珍（湖北蕲春人）在世，著有《本草纲目》。</p> <p>公元1522年：朱厚熜由湖北钟祥藩王府入主北京，是为明世宗。</p> <p>公元1525年至1582年：政治家张居正（湖北江陵人）在世，明神宗时任内阁首辅，权倾朝野。</p> <p>公元1550年至1616年：戏曲家汤显祖（江西临川人）在世，有《牡丹亭》等传世。</p> <p>公元1568年至1610年：文学家袁宏道（湖北公安人）在世，在文坛上创立“公安派”。</p> <p>公元1611年至1671年：科学家方以智（安徽桐城人）在世，有《物理小识》传世。</p> <p>公元1619年至1692年：思想家王夫之（湖南衡阳人）在世，有《船山遗书》传世。</p> <p>公元1634年：科学家宋应星（江西奉新人）完成《天工开物》，介绍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p> <p>公元1643年：李自成（陕西米脂人）称“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学张献忠（陕西定边人）称“大西王”，改武昌为“天授府”。1645年李自成死于湖北九宫山。</p>
公元1636年至1911年	清朝	<p>公元1663年至1721年：数学家、历法家梅文鼎（安徽宣城人）在世，著有《古今历法通考》、《刻圆密率捷法》等著作。</p> <p>公元1668年至1749年：文学家方苞（安徽桐城人）在世，他与姚鼐恢复古文传统，世称“桐城派”。</p> <p>公元1701年至1754年：吴敬梓（安徽全椒人）在世，著有《儒林外史》。</p> <p>公元1723年至1777年：思想家戴震在世，有《戴东原集》传世。</p> <p>公元1790年：徽班进京，楚地皮黄、徽调、弋阳等唱腔传入北京，演变为京剧。</p> <p>公元1796年至1804年：川、楚、陕白传莲教起事。</p> <p>公元1838年：黄爵滋（江西宜黄人）上“请严塞漏卮以培传国本”疏，要求清廷禁烟。</p> <p>公元1843年：魏源（湖南邵阳人）编成《海国图志》，提出学习西方。</p> <p>公元1858年：曾国藩（湖南湘乡人）兴办湘军。同年，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开放汉口、九江等十处通商口岸。</p> <p>公元1861年：李鸿章（安徽合肥人）创建淮军，与湘军合作，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同年，曾国藩设安庆军械所，开启洋务运动。</p> <p>公元1876年：中英订《烟台条约》，开放宜昌通商。</p> <p>公元1893年：毛泽东生于湖南湘潭韶山。</p> <p>公元1895年：中国与日本订《马关条约》，开放沙市通商。</p> <p>公元1897年：维新派在长沙办时务学堂，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由梁启超担任总教习。</p> <p>公元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湖南浏阳人）等六君子被杀。</p> <p>公元1904年：黄兴（湖南善化人）与宋教仁（湖南桃源人）在长沙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p> <p>公元1911年：蒋翊武（湖南澧县人）在武昌清廷新军中组织文学社，宣传革命思想。同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黎元洪（湖北黄陂人）被推为都督。</p>

图片索引	
1 江汉平原	10
2 荆山山脉	13
3 瞿山远景	15
4 鄖县猿人头盖骨	24
5 鄖县猿人头盖骨	24
6 鄖县猿人发掘现场 ——鄖县曲远河口远景	25
7 鸡公山遗址鸟瞰图	25
8 石斧	26
9 石刀	26
10 石铲	27
11 稻谷遗存	27
12 彩陶筒形瓶	28
13 彩陶器座	29
14 彩陶罐	29
15 红陶杯	30
16 彩陶高足壶	30
17 彩陶纺轮	31
18 彩陶纺轮	31
19 玉虎头像	32
20 玉猪龙	32
21 玉蝉	32
22 玉雕人头像	32
23 玉雕神灵头像	33
24 玉雕神灵头像	33
25 飞鹰	33
26 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发掘现场	34
27 清理石家河遗址瓮棺葬的现场	34
28 陶人	34
29 陶塑动物一组	35
30 盘龙城外景	36
31 盘龙城宫殿复原图	36
32 蕤纹铜钺	37
33 大玉戈	36
34 饰饕餮纹铜鼎	38
35 饰饕餮纹铜簋局部	38
36 饰饕餮纹铜簋	38
37 饰饕餮纹提梁铜卣	39
38 饰饕餮纹铜彝	39
39 饰饕餮纹铜鼓局部	40
40 饰饕餮纹铜鼓	40
41 铜尊	41
42 虎尊局部	41
43 虎尊	41
44 铜尊	41
45 蕊纹铜觯局部	42
46 蕊纹铜觯	42
47 蕊纹铜罍	43
48 环带纹铜盉	43
49 父乙卣	44
50 曾仲斿父铜方壺局部	45
51 曾仲斿父铜方壺	45
52 父乙尊	45
53 铜方壺	46
54 象首龙纹铜方甗局部	47
55 象首龙纹铜方甗	47
56 垂鳞纹铜方彝	48
57 蔡侯朱之缶	49
58 爵父盘	50
59 爵父匜	50
60 纪南城北墙的重点文物保护标志	54
61 楚故都纪南城东南角鸟瞰	54
62 荆门纪山楚墓群远景	55
63 楚章华台遗址	55
64 茅草缩酒风俗	55
65 根雕神兽	57
66 虎座飞鸟	58
67 漆鸳鸯盒上的鼓舞图	60
68 舞人动物纹锦	61
69 舞人动物纹锦局部	61
70 锦瑟残片局部——巫师	62
71 锦瑟残片局部——巫师	62
72 锦瑟残片局部——巫师头部	62
73 锦瑟残片局部——祈祷仪式	63
74 锦瑟残片局部——凤尾龙	62
75 钹鼓（有柄鼓）	64
76 虎座鸟架鼓	64
77 包山竹简的卜筮内容	65
78 包山竹简的卜筮内容	65
79 鹿角立鹤侧面	66
80 鹿角立鹤正面	67
81 鹿角立鹤头部	67
82 马胄残片——鹿首龙	68
83 马胄残片——双首龙及怪鸟	68
84 马胄残片——蟠龙	68
85 马胄残片	68
86 彩漆木雕箭箙	69
87 彩绘漆内棺	70
88 彩绘漆内棺局部——神鸟	71
89 彩绘漆内棺局部——烛龙	71
90 彩绘漆内棺局部 ——方相、羽人、神兽	72
91 兵辟太岁铜戈	73
92 甬钟	73
93 甬钟局部——神巫操蛇图像	73
94 双头镇墓兽	74
95 人面镇墓兽	75
96 铁口木耒	76
97 凹口铁齿	76
98 石镰	77
99 铜镰	77
100 铜镰	77
101 曾侯乙墓中室出土的青铜礼器	79
102 弋射衣箱上祈求天象平和的文字	86
103 王子午升鼎	94
104 铸客升鼎	95
105 素面铜方豆	95
106 素面铜盖鼎	96
107 楚屈子簠	96
108 铜套盒	97
109 蟠螭纹提链铜壶	97
110 错红铜云纹铜壶	98
111 蟠螭纹盥缶	98
112 蟠螭纹盥缶局部	98
113 彩绘蟠螭纹漆簠	99
114 彩绘蟠螭纹漆簠局部	99
115 彩绘云纹漆璜	99
116 彩绘动物纹漆俎	100
117 彩绘几何纹漆豆	100
118 彩绘几何纹漆方豆顶部	101
119 彩绘几何纹漆方豆	101
120 彩绘浮雕龙纹盖豆	102
121 彩绘浮雕龙纹盖豆局部 ——盖面	103
122 彩绘浮雕龙纹盖豆局部 ——兽耳	103
123 彩绘人物车马漆奁局部	102
124 曾侯乙墓青铜编钟出土现场	104
125 楚惠王熊章镈钟局部 ——铭文	105
126 楚惠王熊章镈钟局部 ——龙形钮	105
127 楚惠王熊章镈钟局部 ——钟体纹饰细部	105
128 楚惠王熊章镈钟	105

129 彩绘石编磬	106	174 蟠螭纹铜尊缶局部	125	219 阴刻谷纹璧	144
130 彩绘石编磬	106	175 蟠螭纹铜鉴缶	126	220 浮雕谷纹璧	144
131 彩绘石编磬	107	176 蟠螭纹铜鉴缶局部	127	221 云纹玉璜	145
132 彩绘石编磬	107	177 彩漆带流杯	128	222 谷纹玉璜	145
133 箭簇	108	178 彩绘云纹漆方耳杯	128	223 水晶环	146
134 箭簇底部	108	179 彩绘云纹漆圆耳杯	128	224 水晶、紫晶串饰	146
135 箭簇	109	180 滤酒器	128	225 料珠	147
136 箭簇	109	181 鸟首形铜杯	129	226 玛瑙环	147
137 彩漆弩	109	182 彩绘云纹漆曲耳杯	129	227 褐色绢帽	148
138 连发弩	109	183 彩绘云纹漆曲耳杯	129	228 彩绘云纹木梳	149
139 龙凤云纹皮盾	110	184 酒具盒	130	229 皮手套	149
140 粉漆皮甲胄	111	185 酒具盒	131	230 包山2号楚墓外景	150
141 粉漆木盾正面	111	186 酒具盒(揭开)	131	231 包山楚墓发掘现场	151
142 粉漆木盾反面	111	187 酒具盒局部——兽首浮雕	131	232 包山楚墓椁室	151
143 矛状车轔	112	188 彩绘云纹漆耳杯豆	132	233 包山楚墓南室出土 带羽毛的长杆兵器及弓	153
144 矛状车轔	112	189 彩绘雷纹漆俎	132	234 凤鸟纹绣绢面衾	153
145 错金银车轔	113	190 彩绘云纹漆案	132	235 包山楚墓东室出土器物的情况	153
146 错金凤鸟纹车轔	113	191 金盏、金勺	133	236 彩绘龙凤纹漆棺局部	154
147 凤首车马具	113	192 金盏顶部	133	237 彩绘龙凤纹漆棺	154
148 凤首车马具局部	113	193 金勺	133	238 单头镇墓兽	156
149 江陵九店楚国车马坑 发掘清理现场	114	194 炭盆、铜箕	134	239 彩漆竹笥	157
150 积竹木秘匱	114	195 凤纹铜熏杯	135	240 彩漆竹笥	157
151 受上端、受中段	115	196 龙纹铜熏杯	135	241 彩漆竹笥	157
152 双戈戟头部	115	197 植物香料——樱桃	136	242 彩漆竹笥	157
153 长杆矛和长杆殳头部	115	198 植物香料——生姜	136	243 楼空龙纹铜方镜	158
154 楚王孙鱼戟	116	199 植物香料——云豆	136	244 五“山”字纹铜镜	159
155 黑斑点纹铜矛	116	200 植物香料——板栗	136	245 楼空蟠螭纹铜镜	159
156 长杆三戈戟头部	116	201 植物香料——花椒	137	246 骨贝	160
157 周旆铜戈	117	202 植物香料——枣核	137	247 《夸父逐日图》木衣箱	162
158 云纹铜戈	117	203 植物香料——桃核	137	248 弋射衣箱盖面	163
159 剑盒附剑鞘	118	204 植物香料——橙皮	137	249 弋射衣箱	163
160 楚式剑	119	205 绣衣俑背面	138	250 二十八宿衣箱	164
161 越王勾践剑局部	120	206 绣衣俑	138	251 六博盘	166
162 越王勾践剑	120	207 彩绘绢衣俑	139	252 六博盘	166
163 吴王夫差矛局部	120	208 着衣木俑	139	253 楚帛书	167
164 吴王夫差矛	121	209 着衣木俑侧面	139	254 鄂甬	168
165 越王州勾剑	121	210 彩绘佩玉饰木俑	139	255 鄂甬	169
166 越王州勾剑局部	121	211 人擎铜灯	139	256 蚁鼻钱	169
167 联禁对壘	122	212 错金银龙凤纹铁带钩局部	140	257 铜砝码	170
168 联禁对壘局部——禁	123	213 错金银龙凤纹铁带钩	140	258 天秤	170
169 联禁对壘局部——禁足	123	214 鎏金铜带钩	141	259 鄂君启节	171
170 联禁对壘局部——壘耳	123	215 鎏金铜带钩局部	141	260 “王”字夹刻刀	171
171 联禁对壘局部——龙形耳细部	123	216 龙形玉佩	142	261 随州擂鼓墩2号墓编钟	172
172 镶嵌云纹铜壘	124	217 龙形玉佩	143	262 曾侯乙编钟局部	173
173 蟠螭纹铜尊缶	125	218 双龙玉佩	143		

楚文化

281

263 曾侯乙编钟局部	173	302 铜草花	195	343 楼空蟠螭纹铜尊盘局部——盘足	225
264 曾侯乙编钟	173	303 铜绿山铜矿竖井	196	344 楼空蟠螭纹铜尊盘局部 ——盘口沿上的爬兽	225
265 均钟	174	304 铜绿山采矿工具——木斗	196	345 曾侯乙编钟下层铜人立柱	226
266 均钟局部 ——背面的人面蛟龙纹样	174	305 铜绿山采矿工具——铁锄	197	346 嵌错绿松石龙凤纹青铜盖豆局部 ——盖顶	227
267 均钟局部 ——背面的人面蛟龙纹样	174	306 铜绿山采矿工具——木锹	197	347 嵌错绿松石龙凤纹青铜盖豆	227
268 均钟局部——侧面的凤鸟纹样	175	307 铜绿山采矿工具——铜斧	197	348 菱形云纹铜敦	228
269 曾侯乙编磬	176	308 铸镶龙纹铜盥缶局部	198	349 错银龙凤纹尊	229
270 曾侯乙编磬局部——龙首横梁	177	309 铸镶龙纹铜盥缶局部	198	350 错银龙凤纹尊局部	229
271 曾侯乙编磬局部——怪兽立柱	177	310 铸镶龙纹铜盥缶	198	351 人骑骆驼铜灯	230
272 铜铙局部	178	311 建鼓座	199	352 人擎铜灯	230
273 铜铙	178	312 铜禁	199	353 铜飞鸟	231
274 鹿鼓	179	313 漆绘铜方镜	200	354 错金云纹器盖及错金蟠螭纹器盖	231
275 双虎钮𬭚于	179	314 漆绘龙纹镜	201	355 对龙纹漆杯局部 ——仿铜蟠龙纹样	232
276 七弦琴	180	315 对龙纹漆杯形器	201	356 对凤纹漆耳杯	233
277 十弦琴	180	316 蟠螭纹漆耳杯	202	357 彩绘漆棺局部 ——侧面四凤分开图案	234
278 彩绘凤鸟纹漆瑟	180	317 蟠螭纹漆耳杯	202	358 彩绘漆棺局部 ——侧面四凤首相聚图案	234
279 彩绘龙纹漆瑟	182	318 云纹圆漆盒	203	359 彩绘凤鸟纹漆瑟局部 ——孔雀、蛟龙、凤鸟衔蛇图案	235
280 彩绘龙纹漆瑟局部 ——头部龙形雕刻	182	319 云纹圆漆盒顶部	203	360 彩绘凤鸟纹漆瑟局部 ——四凤蟠龙纹样	235
281 彩绘龙纹漆瑟局部 ——瑟身纹饰	182	320 彩绘卷云纹圆漆盒	203	361 彩绘动物纹漆俎局部	235
282 彩绘竹箑	183	321 彩漆木筒	204	362 弋射衣箱局部——伏羲女娲图像	236
283 彩绘竹排箫	183	322 雕花云纹漆几面	205	363 弋射衣箱局部——后羿射日图像	237
284 汉阳古琴台	183	323 矩纹彩漆竹扇	205	364 彩绘锦瑟残片——狩猎	238
285 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衾	184	324 毛笔及笔筒	210	365 彩绘锦瑟残片——狩猎	238
286 对凤对龙纹绣浅黄娟面衾局部 ——单龙单凤	185	325 黄季羸铜鼎	216	366 彩绘锦瑟残片——狩猎	238
287 龙凤虎纹绣罗	185	326 邓公乘鼎	217	367 彩绘锦瑟残片——狩猎	238
288 蟠龙飞凤纹绣浅黄娟面衾	186	327 邓公乘鼎局部——铭文	217	368 彩绘锦瑟残片——梅花鹿	239
289 舞人动物纹锦 ——麒麟、对凤、对龙	187	328 邓公乘鼎局部——蟠螭纹样	217	369 彩绘锦瑟残片——狩猎	239
290 塔形纹锦	187	329 弦纹铜盉	217	370 彩绘锦瑟残片——动物	239
291 十字菱形纹锦	188	330 单虎钮𬭚于	218	371 彩绘锦瑟残片——犬	239
292 田猎纹绦	188	331 铜杯	219	372 彩绘车马出行图漆器残片	240
293 六边形纹绦	189	332 曾侯乙内棺上的神话纹样 ——水神禺强、朱雀白虎	219	373 彩绘锦瑟残片——宴乐场面	240
294 凤纹绣被局部特写	191	333 龙首耳铜鉶	220	374 狩猎纹漆卮局部——野兽图案	241
295 马山1号墓棺盖 揭开之后满满一棺丝绸	190	334 兽耳铜缶局部	221	375 狩猎纹漆卮局部——猎人图案	241
296 马山1号墓第二层包裹 ——凤鸟几何纹锦面衾	192	335 兽耳铜缶	221	376 狩猎纹漆卮	241
297 用九道锦带捆扎的衣衾包裹	192	336 镂孔凤纹铜鏡	222	377 车马人物出行漆奩	242
298 衣衾包裹特写	193	337 凤纹铜鏡	222	378 彩绘人物车马漆奩局部	242
299 丝织品整理现场	193	338 菱纹铜鏡	223	379 彩绘人物车马漆奩局部	242
300 铜绿山外景	194	339 楼空蟠螭纹铜尊盘局部 ——尊上的楼孔爬兽	224	380 浮雕蟠蛇漆卮	244
301 铜矿标本孔雀石	195	340 楼空蟠螭纹铜尊盘	224	381 双龙衔蛇器座	245
		341 楼空蟠螭纹铜尊盘局部 ——尊圈足上的龙	225	382 彩漆木雕座屏	246
		342 楼空蟠螭纹铜尊盘局部 ——用失蜡法铸造的蟠螭纹 透空口沿	225		

383 彩漆木雕座屏底部	246	419 彩绘卷云纹漆盘	268	插图 · 8 凤鸟花卉纹浅绢面 绣绵袍展开图	89
384 角雕动物	248	420 彩绘云纹漆卮	269	插图 · 9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中 的早期采矿井架图	90
385 彩绘鸳鸯豆	248	421 马王堆汉墓帛书《缪和》 ——局部	270	插图 · 10 铜绿山 10 号炼炉结构图	90
386 彩绘猪形漆盒	248	422 马王堆汉墓帛画	271	插图 · 11 一钟发出双音原理图	91
387 彩绘漆带流杯局部 ——凤纹杯首部	249	423 彩绘人物漆龟盾正面	272	插图 · 12 青铜甬钟部位名称图	91
388 彩绘漆带流杯局部 ——凤纹杯尾部	249	424 彩绘人物漆龟盾反面	272	插图 · 13 包山楚墓南室复原图	152
389 彩绘漆鸳鸯盒	249	425 神兽馨形纹锦	273	插图 · 14 包山楚墓东、北及中室 复原图	152
390 龙纹绣	250	426 豹纹锦	273	插图 · 15 曾侯乙铜鉴缶结构图	208
391 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衾局部 ——单凤	251	427 虎纹锦	273		
392 龙凤虎纹绣罗单衣局部	251	428 端公舞	274		
393 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局部 ——三头凤	252	429 鄂西土家族保留的祭神舞蹈 ——摆手舞	274		
394 凤鸟花卉纹绣红棕绢面镜衣局部	252	430 秧归屈原祠	275		
395 凤鸟花卉纹绣红棕绢面镜衣	252	431 秧归屈原故里的屈原庙	275		
396 人物龙凤帛画	253	432 秧归每年举行的龙舟竞赛	275		
397 人物御龙帛画	253				
398 十六节龙凤玉挂饰	254				
399 十六节龙凤玉挂饰局部 ——大龙头（第一节）	255				
400 十六节龙凤玉挂饰局部 ——四龙攀附玉璧（第二节）	255				
401 十六节龙凤玉挂饰局部 ——凤鸟及联结玉环（第八节）	255				
402 十六节龙凤玉挂饰局部 ——蟠龙（第十一节）	255				
403 十六节龙凤玉挂饰局部 ——蟠龙及身上的蛇 (第十二、十三节)	255				
404 十六节龙凤玉挂饰局部 ——凤鸟蟠龙玉饰（第十五节）	255				
405 十六节龙凤玉挂饰局部 ——大龙尾（第十六节）	255				
406 四节龙凤玉佩	256				
407 金缕玉璜	256				
408 兽面纹玉琮	257				
409 兽面纹玉琮局部——兽面之一	257				
410 兽面纹玉琮局部——兽面之二	257				
411 龙形玉佩	258				
412 谷纹大玉璧	258				
413 玉鹿	259				
414 龙形玉佩和谷纹璧	259				
415 金镇	260				
416 漆双虎头形器局部	266				
417 漆双虎头形器	266				
418 彩绘卷云纹漆盂	267				

楚文化

283

示意图索引

示意图 · 1 楚地区示意图	89
示意图 · 2 楚郢都江陵纪南城 四周位置图	11
示意图 · 3 楚郢都纪南城文化遗迹 分布示意图	12
示意图 · 4 楚熊绎时期的荆山、 沮漳河上游位置图	14
示意图 · 5 新旧石器时代文化传承图	19
示意图 · 6 楚族源流图	22
示意图 · 7 楚灭国示意图	81

图表索引

图表 · 1 史前时期江汉地区 主要文化简表	18
图表 · 2 楚世系表	52
图表 · 3 楚墓出土兵器一览表	81
图表 · 4 楚剑合金成分简表	82

插图索引

插图 · 1 陕西岐山周原甲骨 “楚子来告”摹本	53
插图 · 2 锦瑟图案展开图	63
插图 · 3 江陵九店楚墓车马坑 2号车复原图	80
插图 · 4 连发弩结构图	83
插图 · 5 楚帽复原图	84
插图 · 6 江陵九店绣衣俑服饰图	85
插图 · 7 三色锦组织结构示意图	89

ISBN 7-80613-809-9

9 787806 138090 >

ISBN 7-80613-809-9/G · 617

图字：09-1997-179

定价：248.00 元